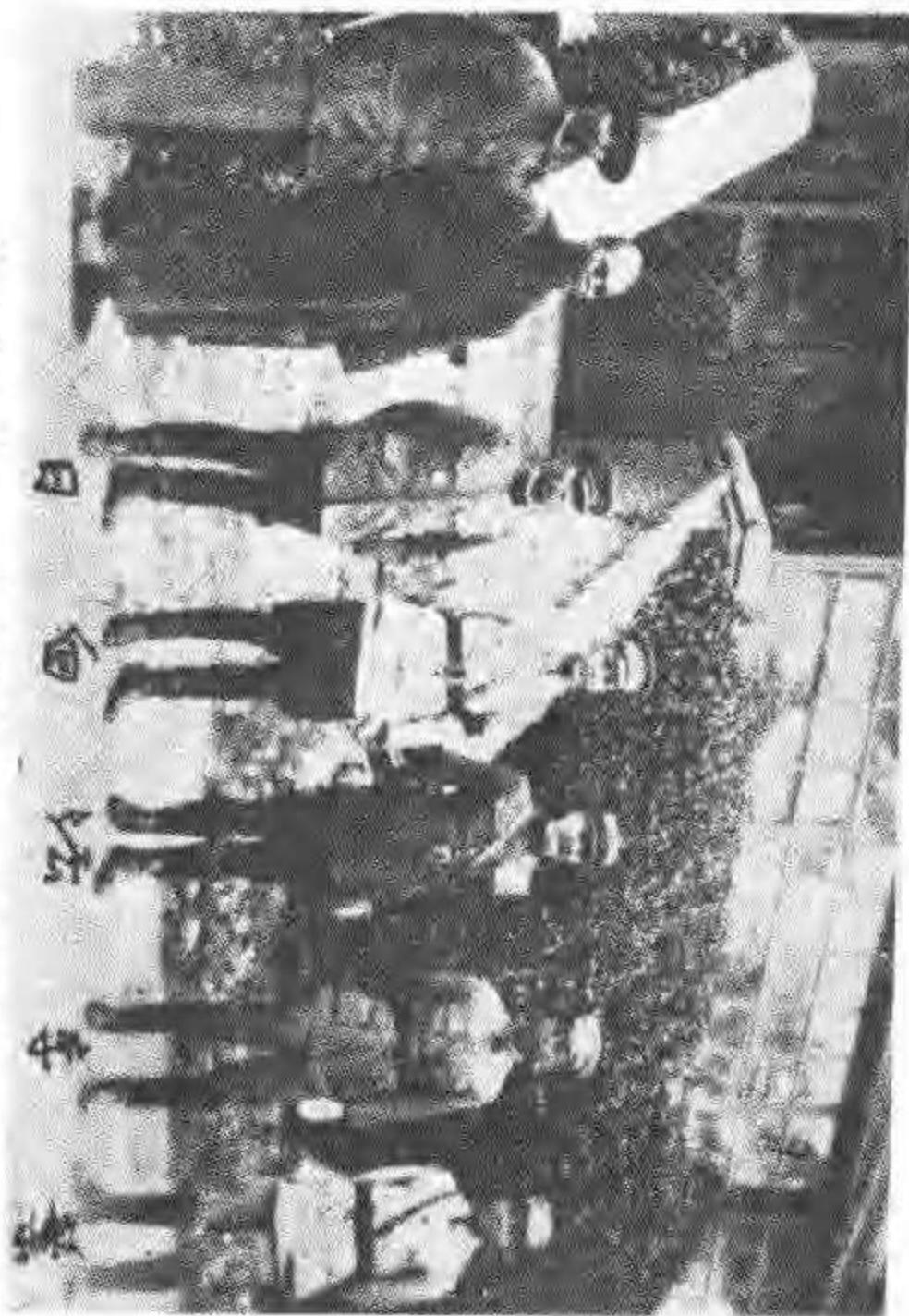


李品仙著

李品仙回憶錄



軍團集四第任時平北於攝者作書本年七十國民
。揮指總路二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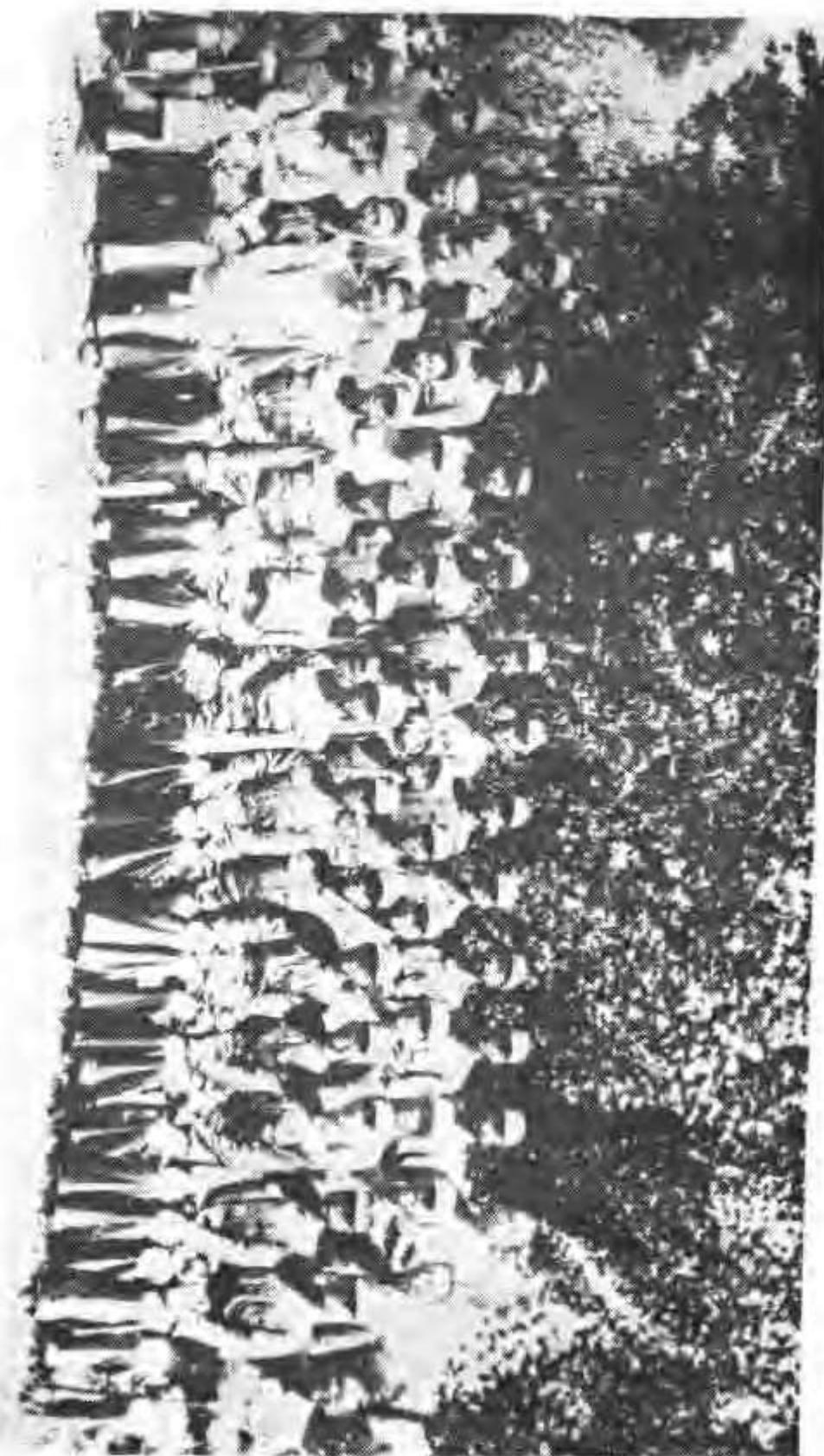


褚崇白與（二右）著作書本，後功成伐北
○攝合等同顧籍日、籍法及（中）軍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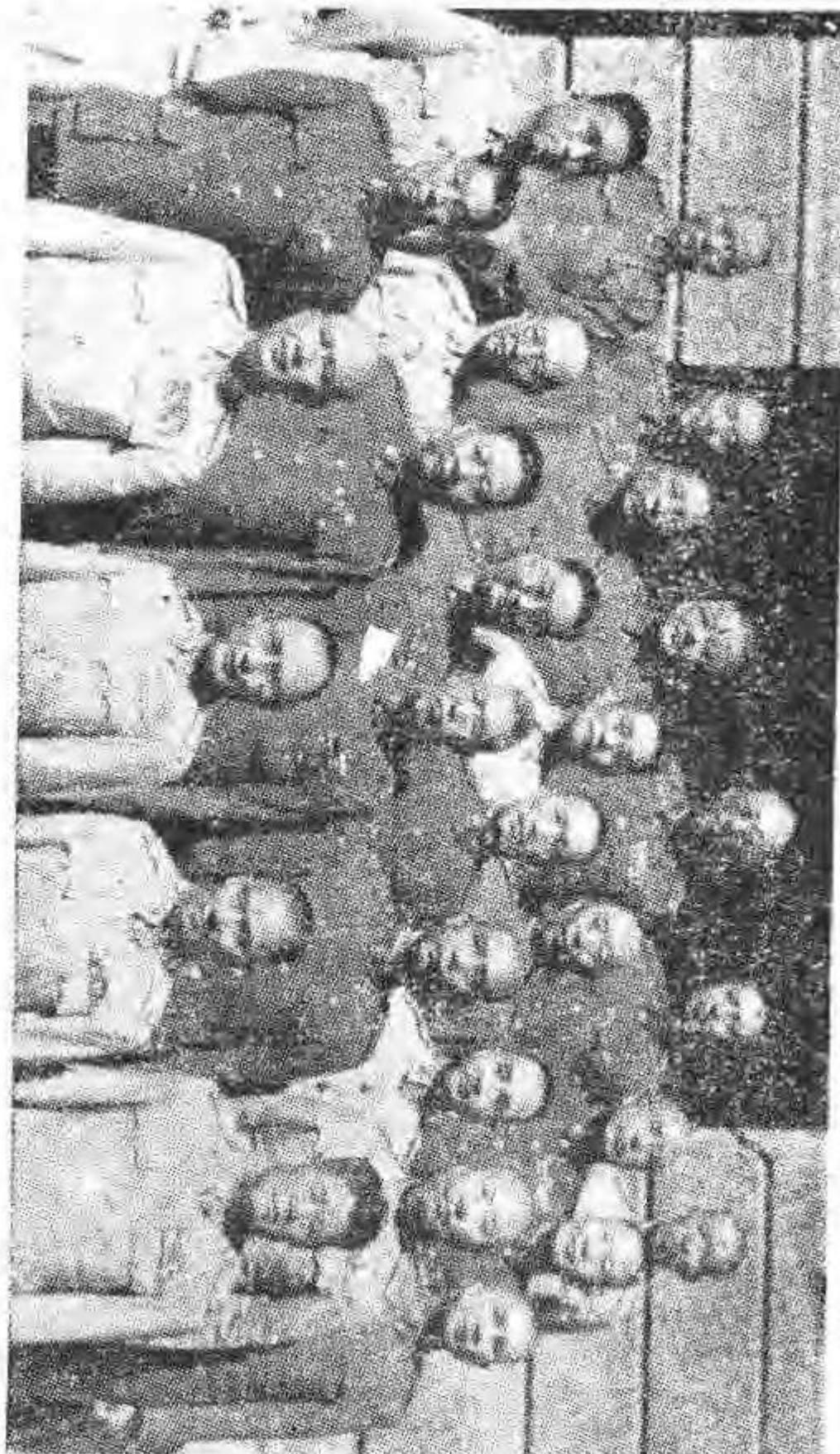


。降將等中郎次川十表代軍主降受區蚌徐任（中）者作書本利勝戰抗

○影留時議會工作員復論封官長級高軍政黨區戰十第集召者作日次降投本日



民國三十九年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全體
顧問合影，第二排右起第二人為本書作者
，左第一人為楊森將軍。



民國三十九年本書作者攝於台北時任總統府戰略顧問。



廣西陸軍小學創辦人，第一任總辦 本書作者的老師蔡松坡將軍。



白總指揮征東
在鷺山開軍民大會



形情話訓會大民軍山唐持主揮指總白

自序

民國六十年辛亥，本人八十初度，曾將八十年來領軍從政，南征北討，種種經歷見聞撰為長文，印贈親友，無非雪泥鷺爪，鈞玄提要，姑且留下一點紀錄而已。事為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先生所知，承他親蒞舍下殷切為中外讀者請，要本人將這部八十年來的回憶公開發表，雲情高誼，至深感謝。於是又花費了不少時間，將全部紀錄增訂補充，完成了多達十餘萬言的懷舊憶往之作，題曰「戎馬生涯」。自民國六十二年九月起，在銷行廣大，無遠不屆的中外雜誌開始連載。縱使本人幼讀詩書，畢生頗好吟詠，但以中外雜誌讀者之衆多，地位之崇高，確曾誠惶誠恐，心情相當的緊張。然而，也許是因為這部「戎馬生涯」寫時事事有據，語語屬實，居然博得中外高明讀者的如朝籽評，全書刊出未及其半，要求轉印單行本的讀者函電即已紛至沓來，使本人至感欣幸。中外讀者咸意拳拳，王成聖先生力請者再，本人又焉敢敝帚自珍，奉貢王成聖先生與萬千讀者的一片感情呢。乃重加整理一過，易名為「李品仙回憶錄」送請中外圖書社出版。此一個人真實記錄之終告問世，各方愛護督飭之切，本人特在此致至最誠摯之謝意。

李品仙回憶錄 目 次

李品仙回憶錄自序

一、家世與童年	一
二、柳營弦歌	五
三、旅遊染疾	九
四、武昌起義	一一
五、回桂連絡	一五
六、陸榮廷與廣西	一八
七、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	二〇
八、機關槍長的故事	二五
九、轉入湘軍服務	三〇
一〇、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	三三
一一、兩次危險的任務	四〇
一二、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	四七
一三、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	五三
一四、唐生智與顧和尚	五九

目 次

二

一五、唐生智倒趙與北伐	六三
一六、北伐序曲	七〇
一七、先鋒變成後衛	七三
一八、武漢三鎮的光復	七九
一九、寧漢分裂與清共	八三
二〇、閩粵之戰	九二
二一、北伐的最後一戰	九八
二二、編遣會議	一〇五
二三、丁憂解甲	一一二
二四、建設廣西復興中國	一一五
二五、三年邊務	一二〇
二六、再任總參謀長	一二六
二七、挑戰開始率師出征	一三一
二八、京滬棄守	一三六
二九、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	一三八
三〇、武漢保衛戰	一四五

三一、武關道上	一五二
三二、哭母	一五五
三三、隨東會戰	一五七
三四、遊武當山	一六一
三五、重回大別山	一六五
三六、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	一七〇
三七、戰時皖政實施紀要	一八一
三八、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	一九八
三九、皖南行與立煌事變	二〇四
四〇、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	二〇九
四一、邊區雜憶	二一二
四二、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	二一六
四三、日寇投降	二二三
四四、隨勝利上演的悲劇	二三一
四五、安徽的復員與接收	二三七
四六、空城計	二三九

目 次

四

- | | |
|-----------|-----|
| 四七、戡亂戰局運轉 | 二四二 |
| 四八、大陸論譏 | 二五一 |
| 四九、林泉急影 | 二五七 |

李品仙回憶錄（原名戎馬生涯）

李品仙著

一、家世與童年

我的故鄉為廣西省的蒼梧縣。那裏有雄奇瑰麗的山川，敦厚樸素的風氣，這些永遠使我懷念難忘，老而彌堅。

蒼梧為舊日梧州府之首縣，位於粵江上流的西江與桂江的會合處。西江的主源為桂西的左右兩江；由於兩江流域却是黃土地帶，故江水是黃色。桂江的上流為灕江，灕江源出桂北興安縣境與湘水同源的靈渠，所經都是奇峻峭拔的石山，故水色碧綠。因此，桂江與西江的會合處，江水分成兩股，一黃一綠極為顯明，故又有人稱此處為鶯鶯江或鶯鶯水。

據歷史記載，漢武帝置蒼梧郡，治廣信（即今蒼梧縣），隋置蒼梧縣，唐改為梧州，明清時皆為梧州府治，民初改蒼梧道。蒼梧縣城位於西江北岸，為桂省東南門戶，有江輪下通廣州，上溯邕寧，乃軍事和商業上的重鎮，清光緒二十三年依中英滇緬續約，開為商埠，在獅子山建築砲臺，以資防守，英國曾在此設有領事。

廣西為古百粵地，勾漏山脈橫亘於南。在大山高處，尚有習稱為蠻族的人居住。此種蠻族與平原地帶的漢人，風俗、習慣、語言各異，極似臺灣平地人與高山族的情形。有些人認為廣西人都是蠻族的後裔，那是非常荒謬的。其實廣西遠自秦代設置桂林、象郡時起，中原同胞即逐漸移居斯土。從興安境內靈渠的遺跡看

來，很可想見當時廣西北部，無論在農業和交通上都已有相當的開發，而那些從事水利工程的人員，自然也有不少會居留下來。嗣後東漢馬援平交趾，宋代的狄青征農智高，隨軍居留的亦必大有人在。尤其東晉五胡亂華之後，及南宋、明末等時期，不甘異族統治逃難南來的漢人，以及後來由湖南、廣東因謀生而遷居廣西者，當更不可勝計。這可以從我在民國初年所見，廣西民間記載家系的譜牒，甚多均記有其祖先係來自中原得到證明，即以我的族譜而論，就是來自湖南長沙的。那些播遷南來的漢人，在當時自然都是冒險的拓荒者。他們冒險犯難的精神，與忠義愛國之氣，由他們的子孫一代又一代的遺傳下來，可能便構成了今天廣西人倔強、勇敢、耐勞的性格。

我於前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舊曆三月二十六日，生於蒼梧縣之平樂鄉間。先曾祖超邦公，先祖父守良公，都是以耕讀相傳，家境勉可自給。先父濟朝公沉沒詩書，以能文名鄉黨；雖只是滿清時代的一個屢生，但頗為士林所重，當地的童學生員多出其門下；民國初年受地方父老推舉，曾數度出任縣長、警察局局長、廳長等職，從事地方建設，服務鄉梓不遺餘力。

先父對子女教育最為注重，督責綦嚴。余自幼隨侍左右，親承訓誨，耳濡目染，頗受薰陶；十二歲即略解四書五經，並學習賦詩屬對，偶為策論時文，亦粗具條理，父執輩對我莫不嘉許，以是在鄉里頗受讚譽。十三歲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始正式進入學校讀書。當時縣城裏雖有了小學，但鄉間仍然還有私塾存在。在寒暑假回鄉探視母親時，不免常去塾中與族中的學童遊玩。一次，在他們的央求下，竟作了他們的槍手，替他們做起文章來。當塾師閱卷發現他們的文章與往日大不相同，查出真象時，對他們說道：「李某的年齡同你們一樣，為什麼他能寫出這樣的文字而你們不能？你們為何不知長進。以後你們若再不努力，鰲頭就要讓他

獨佔了。」

滿清末年，在拳匪之亂後，雖已開始舉辦新式的學校，並且已經決定廢除科舉，但在光緒三十一年仍舉行了最後一次的科舉考試。那時在各府舉行的考試稱為院試，由學臺大人蒞臨主考；錄取之後就是秀才。但在院試之前通常必須經過縣試及府試兩次甄別考試。這兩次考試錄取後，才有資格參加院試。這最後一次的科舉考試時我還不滿十四歲，先父命我報名應考。縣試府試兩場我都榜上有名，可是院試一場却失敗了。院試，按規定考生進入考場後，是應在考棚內應試的，學臺見我年齡特別小，特將我調至大堂應考，坐在大堂的側邊。在考試中，學臺還經常走到我的旁邊站着注意我。記得我那時作的論文課題是合羣論，這個題目在當時要算是含有新的思想，頗能迎合潮流的，而且我平時作過類似的題目，所以成竹在胸，十分高興，天尚未明，我的論文已順利完稿，只待謄正就可交卷了。因我一心要想在首次開門就交卷出場，便趕快抄寫，迨抄寫完畢最後檢查時，發現試卷中竟漏寫了一頁。這叫做犯白，是科舉考試的大忌，我自知不妙，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汗和淚都流下了。當時學臺正站在我的旁邊，我無可奈何的抬起頭來看他，發現他也正在注視我。大概他已發覺我的犯白，只有搖搖頭表示遺憾就走開了。最後我只好將那空白的一頁裁下，天明便交卷出場。依當時科場規矩，考卷犯白，即行作廢，因此，落第實已在意料之中，我回到家中將經過情形稟告父親，自然免不了一番痛斥。

自此之後，清廷下令停止了科舉考試，在中國行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至此算是真正廢除了。我這躬逢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的落第考生，覺得讀書人的唯一出路既然發生了問題，同時又受了當時經過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全國上下高唱尚武精神的慟懃，於是便促成了我以後投筆從戎的決心。不料這一次秀才落第竟成了

我一生事業的轉捩點。倘我當時在考場中不是因為倉促間發生錯誤，居然考中了最後一科的秀才，那這一生的歷史也許便完全不同了。人生往往是由偶然的機會決定的，這就是所謂命運罷。

滿清政府自甲午之役慘敗於日本之後，發覺自己軍隊，原來的綠營、淮勇已是不堪一擊，乃命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創建新軍。核定全國先成立新軍三十六鎮，每鎮兩協，每協兩標，每標三營，另設騎、砲、工各營，全鎮的人數為一萬二千五百人；猶今日師旅團營的編制，這是仿效日本的軍制。在軍事教育方面，創立陸軍小學，陸軍中學，軍官學校三級，培植青年軍官。年滿十六歲的少年可考陸軍小學，三年畢業後升入陸軍中學。陸軍中學為兩年，另須入伍半年，畢業後再升入陸軍軍官學校。軍官學校畢業後，再經遇見習半年，始委任為初級軍官。

光緒三十三年，也就是我考秀才落第後的第二年，廣西創辦陸軍小學，我決心投考。那時我還不滿十六歲，本不合投考的資格，好在當時既沒有身份證和戶口名簿可查，年齡便可以隨便虛報，我乃多報一歲前去投考。不過父母親對我這樣小小的年紀，遠隔家門，却非常反對。但經我堅持，婉轉說明我的看法，認為科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與其在家坐守與草木同朽，何如棄文就武另求出路；何況國家積弱列強環伺，報效國家有待軍人，尤其新軍初創機會難得，不可錯過。我又說，男兒志在四方，我出外後自會照顧自己，無勞二老掛心。這樣，終於被我說服而同意了。

陸軍小學設在桂林，那時從梧州到桂林，須溯灕江而上，除步行外只有舊式的民船可乘，而逆水行舟又灘多水急，行程十分緩慢，舟行十五日方到桂林。那時梧州的青年外出讀書，都是前往廣州的，去桂林念書的極少，這次去桂林投考陸軍小學，同行的除了昔日的一位老師劉蔭棠先生外，別無他人。自梧州至桂林，

據船夫說須上三百六十灘；每上一灘都要全體船夫上岸拉繩，拉繩的工作是背着繩身體前傾，一步一步的掙扎着往上爬，看他們汗流浹背的情形，確是十分辛苦。若遇大灘流急，有時須聯合數船，彼此協助方可通過。當時這種逆水行舟的難辛，對展現在我面前的人生不啻是一項偉大的啓示。

灘江兩岸的地形，自昭平以下尚較平坦，平樂以上則層巒疊嶂，峭壁懸崖，觸目皆是。舟行其間雖緩慢而危險，但兩岸山巒聳翠，綠柳含烟，魚躍鳥飛，山花迎笑，亦別有天地也；只是我第一次離鄉背井，總不免別緒縈懷，對此水色山光，不能盡情欣賞，好在尚有劉蔭棠先生與我同船，一路上天南地北，說古論今，尚不覺過分寂寞。

抵桂林後，正值陸軍小學招考，我很順利的通過了入學考試，入學肄業；從此開始了我的軍事生涯。

二、柳營弦歌

陸軍小學最初是設在桂林城外大教場傍邊之老營盤內，後改設在桂林城外的象鼻山下；民國以後陸軍小學停辦那裏改建為發電廠。學校的教育是完全採取軍事管理，所揭橥的教育方針，主要在德育方面，為養成愛國愛民，負責、犧牲的精神；在智育方面，為灌輸各種科學的初步知識，如物理、化學、數學、外文等都在必修之列，與今日中學的課程概略相同；在體育方面則以鍛鍊體魄使能耐勞吃苦。數、理、化等普通學科是我前所未學習過的，固然要勉力學習，但使我感到興趣的倒是軍事學術科。尤其是術科，如遇天雨停止上課，我内心就必悶悶不樂；倘久雨不晴不能出操，甚至會潸然淚下。反之，如天氣晴和，只要課有休暇，或於月夜星光之下，我總獨自在室外自動操練，這是和其他同學完全不同的。我總認為軍人的事業在戰場，必

頗要有好的體格和技能才行。由於我對軍事學術科具有偏愛，所以在這方面的成績要遠比旁的同學優良，術科的小動作非常出色，博得隊上官長的青睞和同學們的贊美。

廣西陸軍小學的創辦人，也就是第一任總辦，是後來在雲南起義護國，打倒袁世凱而成為家喻戶曉的蔡誦（松坡）先生。蔡先生不僅是民國史上一位轟轟烈烈，偉績豐功的人物，他的道德文章在當時的將領中，也可能要算首屈一指了，我能瞻仰他的豐采，親炙薰陶，真是莫大的幸運，祇可惜在我入校不久他即離廣西轉往雲南工作。蔡先生走了之後，本校總辦由蔣尊簋、鈕永建兩先生相繼接任，他們的學問道德也都是出類拔萃的，尤其鈕老後來在辛亥革命光復淞滬之役，功勳彪炳。其他督練處勸辦人員及教職員，亦多數為留學日本的士官畢業生，思想豐富，才識卓越，如李書城、趙恒惕、尹昌衡、劉建藩、趙正午、金永炎、雷飈等當時都是知名之士，無論直接間接的影響本校教育甚大，對新思想的灌輸尤其不遺餘力。其實，滿清末年自戊戌政變與拳匪之亂而後，革命思想已甚普遍，青年知識份子固不必說，就是稍有頭腦的政府官吏，也多數自知這種時代的潮流是無法加以遏阻的。當時廣西巡撫是張鳴岐，不久張鳴岐升任兩廣總督，由沈秉堃接任巡撫，王芝祥任藩臺。這幾位當道人物也都是思想新穎，行新政用新人的特出人物。他們對我們陸軍小學內革命思想的潛滋暗漲，也沒有加以鎮壓和阻止。

光緒三十四年，清廷下詔準備立憲，將立憲的準備時間定為九年，一般有識之士懷疑是滿清政府的拖延政策，一時輿論譁然，外國報章也都有指責。那時國內在思想上分為立憲與革命兩派，經常在報紙上論戰；按當時社會的傳統觀念，革命是大逆不道的，所以變法圖強雖是全國一致的主張，但一談到革命，便難免有譖虎色變之感。可是到了這時，發現滿清政府根本沒有立憲的誠意，使維新派的人士也大失所望，無形中使

整個社會的革命思想益為激盪起來。年輕人的頭腦是最為敏感的，陸軍小學的同學們，平時本已在師長們的言論以及報章上受到革命救國思想的感染，至此在情緒上便更為激動，課餘之暇也常常肆無忌憚的紛紛議論起來。

有一件特別值得紀念的事；那時陸軍小學的學生頭上都留着辮子，而這條辮子下所隱藏的悲慘故事，在革命思想的刺激下，早已在我們的內心成為恥辱的記號，隱恨在胸已非一日了。這條辮子事實上也真令人討厭，尤其不合乎軍事要求。穿着軍服，在軍帽後邊拖着一條一兩尺長的尾巴，操作既不方便，看起來更是有些碍眼，不倫不類。大概就是為了這個原因，後來政府下令軍人得將原蓄的頭髮再剃去一半，只在腦後留一小塊，當一條小小的辮子，放在軍帽內以便操作。當大家奉令剃去半髮時，有幾位同學提議，與其再留那一小撮，何如統統剪掉。這一提議真有如登高一呼萬夫響應，大家一致鼓掌贊成。當然也有一些人對此懷有疑懼的，可是這是一種羣衆心理，誰都不敢反對，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現自己的革命精神似的。於是在歡聲雷動下，不消多時，所有同學的辮子都一齊剪去了。還有人將剪下的辮子提起來說，大意是『辮子辮子，我與你晨夕相守，片刻不離，已經是十多年了，今日我與你一刀兩斷，你休要怪我無情，你是我的贅疣，相處下去，實有難言之痛，今天我再不能不取消你了。』這件事立即惹起一場大風波，巡撫張鳴岐與地方上的各級官員都知道了。撫臺十分震怒，各級官員亦惶恐萬分，校內官長更是坐臥不寧，不知如何是好。因為當時沒有髮辮，便是亂黨的特徵之一，可以殺無赦的。大家認為如讓北京政府知道這種大逆不道，追究起來，不是槍斃便是坐牢；巡撫以下各級官員也免不了都要受牽累。

巡撫張鳴岐大概受了各官員的勸說，或者是因人數過多無法處理，也或者是出於對青年的同情心，因此

只好敷衍不報，僅令學校的監督率領全體學生到巡撫衙門，表示悔過並答應仍舊留回辮子了事。實際後來並無一人再留回辮子，亦無人再予過問，就這樣不了了之。當時全國之中，除了少數自國外回來的留學生剪去了辮子外，集體剪掉辮子的，恐怕只有我們廣西陸軍小學的學生了。這是宣統元年的事，我們第一期的學生即於該年的年底畢業。

宣統二年的春天，廣西陸軍小學第一期的畢業生，約有一百名左右，由廣西省保升湖北第三陸軍中學深造。當時全國有四個陸軍中學，接收各省陸軍小學的畢業生予以深造。第一陸軍中學設在河北省清河鎮，收訓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奉天（民國後改稱遼寧）、吉林、黑龍江七省的學生。第二陸軍中學原計設在西安，實際並未開辦。第三陸軍中學設在湖北武昌，收訓湖南、湖北、貴州、雲南、廣西、陝西、甘肅七省的學生。第四陸軍中學設在南京，收訓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四川七省的學生。

第三陸軍中學的總辦為廣東籍的李鍾岳先生，監督、教官及隊上官長均係由陸軍部所委派，可稱一時之選。廣西的學生到校後，由於我們都沒有辮子，故頗受校方的注意，但別省前來的同學則對我們欽羨不已，但校方也並未勒令我們重留髮辮；可見當時的一般官吏，對於清廷的禁令已是陽奉陰違敷衍了事的居多，滿清專制王朝的崩潰也是大勢所趨無可挽救的了。

陸軍中學的教育，相當於軍官學校的預備教育，除了日常生活起居採取完全軍事管理外，在學科方面有相當比例的數、理、化、外國文、中外史地等課程，相當於現在高中三年及大學一年級的程度，還有一門辯學（後稱為論理學或理則學）是啓導思維方法的。可見當時的軍事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已相當完備，只是當時教授這些課程的師資不易獲得，其實際成效實不免受到影響。

三、旅遊染疾

宣統二年的暑假，適逢南京舉辦全國商展大會，各地前往參觀的人很多。那時國內交通甚為不便，無法一家渡假，我乃與同學楊瑞麟（楊同學在護國之役病沒於四川）君相約同赴南京作一次觀光旅行；藉此暢遊嚮往已久的六朝勝跡。我們從漢口上船，那時長江的輪船設備相當簡陋，我們坐的又是三等統艙，悶熱難耐，只好站在船頭的甲板上。我們一路上飽覽山川形勝，沿途並於九江、安慶、蕪湖等地登岸作走馬看花般的流覽；經兩晝夜方抵南京。

南京自三國時代的東吳定鼎以來，歷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以至後來五代時的南唐，及太平天國，皆建都於此，在我的想像中，一定極為繁華的都市。可是當我們看到南京市街的稀疏零落，秦淮河竟是一渠濁水，真不勝其「六代豪華今去也」的惆悵之情。據說南京遠在上海開埠以前，實為江南文物薈萃之地，勝甲一方，以往雖多次為來自北方的敵人所侵據，均仍不失其原來面目。遭受破壞最大的是明代燕王靖難之役，燕王入京，惠帝出走，宮室付之一炬，文物蕩然無存；以後又經清兵入關，與太平天國時的兩次兵燹，此一南朝古都遂只有勝水殘山供人憑弔了。不過就山川形勢而言，鍾山、烏龍山雄踞東北，湯山、牛首山屏峙東南，浩蕩長江襟帶西北，龍蟠虎踞氣勢雄偉，頗擅天然之勝，而且城廓寬廣，不愁無發展的餘地。民國肇造後，國父孫中山先生仍以此為首都，實有由也。

南京住了七天，除參觀商展外，就是憑弔名勝古跡。那時還沒有公共汽車，偶爾雖有馬車可乘，但多數都賴步行遊覽。以南京之遼濶，雖說遊山玩水，實在也極勞累，加上南京的天氣相當炎熱，且飲食失常，因

之於返校途中即感染腸胃病，腹部膨脹如鼓，不思飲食。返校後即住入學校的醫院留醫，初不料這次南京之遊，竟帶來一場大病，纏綿病榻數月之久，幾乎被迫退學。

入院之初，以為不過小病，稍事調養即可痊癒，誰知一住兩月腹脹如故。此時學校早已開學，不免焦急起來。校醫說我是水土不服，勸我退學回家長期休養，並已簽報學校的監督准許退學，我當時真不知如何是好。廣西籍的同學們，得知此一消息後，紛紛前來看我，對我退學的事一致表示反對；認為我中途退學，犧牲了全部學業，實在太可惜了，除非萬不得已絕對不要退學，同時勸我立即請假在校外另覓醫生診治，並代我報告隊上的官長。本隊的隊長及本排的排長鮑蘭芬老師，對我退學也極不贊成，於是立即替我在校外請到一位中醫楊聞川老先生給我診治。為了使我休養方便起見，同時將宿舍內的貯藏室騰出一間讓我單獨居住，並派了一名勤務兵侍候我。他們這種同情和愛護，真使我感激涕零，永生難忘。鮑蘭芬老師是安徽人，當民國三十年我奉命主持安徽省政時，得知他猶健在，特地去探望他並挽他出任省府的顧問，以略表我對他的崇敬和多年來的感激。

我的病經楊老醫生診斷後，他說並不很嚴重，亦非什麼水土不服，乃是腸內積有食物未經消化，日久成毒，只要大泻一次將腸內的毒物清除淨盡即可，他即給了我一劑中藥。服藥後，當夜將近鷄鳴的時候，我從夢中醒來，覺得腹痛如絞，並感到便急；於是立即起床下樓入廁。不料走到樓梯附近，忽然暈倒，不省人事。及至醒來，發覺下半身滿是糞便，急往廁所清洗。這時已覺得一身輕鬆，神氣舒暢，原來腹部的腹痛亦已消滅。後來再經醫生複診吃藥，數日後即覺身體如常，食慾大增，健康隨之恢復；遂向隊上消假上課。回憶當時，一生前途幾為庸醫所誤，真是不寒而慄。

回隊後，同學們和隊上的官長都一致為我高興。可是這一學期大部已在病中消磨過去，轉瞬寒假大考即將屆臨了。期考成績如不及格，依規定必須留級。這又成為同學們暗地裏替我擔心的問題。我自己自然也有一些惶恐。他們經常問我功課補習得怎樣了。我為了使他們安心，一方面也是自尊心的驅使，總是故示沉着的回答說：「到期考還有一個多月，我好好的準備準備，我想或許不至於不及格的。」同時謝謝他們的關懷。

在期考前的這一個多月中，我盡量利用課餘時間修習病中所耽誤的功課；偶有自己看不明白之處，則向同學們請教，他們也無不詳為解說，使我得益不少。因此，臨考時，我在功課方面已有相當把握。至考試完畢公佈成績時，我不但沒有留級，而且名列優等；使官長及同學們都深為訝異。

四、武昌起義

在陸軍中學求學轉瞬之間已屆二年，此第二年，也就是遼清宣統三年（西曆一九一一年）。這年十月，革命黨人在武漢發難，一舉推翻了專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滿清王朝。當時正是陸軍中學我第二屆學生行將畢業舉行考試的時候，我們很幸運的躬逢其盛，參與了民國誕生的一役。

先是在這年的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那次起義雖不幸失敗，但黨人死事的慘烈與前什後繼的精神，却震撼了全國的人心。本來滿清自光緒三十四年下詔預備立憲之後，各省的保皇派曾不斷請願，要求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可是清廷在慈禧太后手裏，她實際並無立憲的誠意，對各省的請願奏章一概置之不理，並採取壓制手段，頗使人心怨望。迨廣州黃花崗之役後，為了緩和人心，清廷頒佈了一份立憲新內閣的名單。可是在十三名內閣大臣中滿人竟佔了八位，且其中五位還是皇族，一時有所謂皇族內閣之稱。

這份內閣名單公佈之後，雖經當時各省的諮詢局聯合上奏，指責「皇族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公例，有失臣民立憲之希望。」請求另行組織，但清廷罔顧民意，仍以「疎涉百司乃君上大權在先朝欽定憲法大綱，並註明議員不得干預」為詞，諭示不准。至此滿清政府偽裝立憲的假面具完全暴露無遺，連原來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派人士也都為之完全失望了。於是在全國人心都傾向於革命運動之下，武漢的槍聲一響就敲起了滿清政府的喪鐘。

在武昌起義之前，當時同盟會在武漢的黨人組織有共進社和文學社兩個革命外圍團體，由劉公、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等人所領導。新軍的下級幹部和士兵加入的很多，陸軍中學與測繪學堂的學生也有一部份加入。會廣州起義失敗後，全國上下排滿革命之空氣瀰漫全國，又值四川發生護路風潮，清廷命端方率軍入川鎮壓，武漢空虛；於是黨人認為機不可失，遂決定舉事。

起事日期最初決定在舊曆八月十五日，這很可能是仿效中秋節殺韃子的故事。後來因為砲營發生事故洩漏了消息，軍警戒備甚嚴，同時又因蔣翊武同志去上海連絡未返，乃議定改為八月十八日。不料在舊曆八月十七日夜孫武在漢口租界內因製造炸藥發生爆炸，巡捕循聲前來捕去黨人兩名。由此接連被滿清的官吏破獲了三處革命機關並搜去黨人名冊、旗幟、印信、文告等。設在武昌小廟街八十一號張廷輔家內的革命機關臨時司令部亦被破獲，同時捕去同志彭楚藩、劉堯徵、楊宏勝等三人當日即被殺害。在這種情勢下，黨人不免人人自危，只有即時發難先發制人，否則清吏按名逮捕必被一網打盡。

可是當時指揮機關已被破獲，負責的同志雖幸能逃脫，而同志間的連絡已十分困難，事實上無法再約定時間發起計劃的行動了。恰巧在舊曆八月十九日，也就是彭楚藩等同志被害的當天深夜，第八工程營的熊秉

坤同志於暗中準備武器時，為該營的督隊官阮榮發發現，予以干涉，熊同志知道已無法倖免，當即將該督隊官擊斃。同營之其他革命同志，本來已經像熱鍋上的螞蟻焦灼不安，忽聞槍聲，以為是發動開始，便一齊行動起來；於是槍聲四起，各標營與騎、砲兵營也隨之發動。當夜即整隊入城，佔領了楚望臺軍械庫。翌日拂曉，其他新軍單位的同志及陸軍中學、測繪學堂的學生也都聞訊整隊入城，分別佔領了蛇山、諮詢局，封鎖各城門，並圍攻總督府。因湖廣總督瑞澂及新軍鎮統張彪，已在當夜聞知新軍起事後，立即登船逃走，所以總督府他的衛隊實際上沒有抵抗就為革命佔領了。這樣，不到中午，整個武昌城已完全為革命軍所控制。

我們陸軍中學是在十九日拂曉獲得起義的消息，由學校的一位助教和負責連絡的同學雷洪將外間信息帶回。同學們獲知外面發動的情形後，在一聲集合號音下，立刻全部武裝起來，臂繩白布為號，臨時推擁排長李驥珩率領向武昌城進發，參加起義行動。入城後，先至楚望臺領取彈藥，再分隊佔領各處。我所在的一隊是受命佔領蛇山和諮詢局。由於當時武昌附近的新軍單位都響應了起義行動，而滿清政府的官吏，因瑞澂和張彪的逃走，也已經逃的逃縣的縣，羣龍無首，我們的行動沒有遭遇到任何的抵抗。

陸軍中學的學生以前參加了革命組織的並不多，而學校自總辦監督以下以至隊上的官長是舊式軍人，他們平時偶然談到革命都是趨避惟恐不及的，這時便都逃之夭夭了。只有排長李驥珩一人留在學校，大家便臨時把他擁出來帶領隊伍。不過當時學校的助教都是新軍派來的下級幹部，他們都是部隊的優秀士官，平時與新軍中的革命組織有密切連絡，又經常和同學們生活在一起，所以在他們的率領下，同學們沒有一個不參加的，而且很快和新軍的行動打成了一片。

武昌城雖然已經完全控制了，可是革命軍的內部顯然是缺乏組織的；因為是臨時發起的行動，負責的同

志如劉公、孫武、張振武、蔣翊武等均不在，沒有人出來統一領導。各機關的主管也全部逃走，一切事務只有由諮詢局的局長湯化龍出面暫時處理，但湯不是軍人出身無法領導起來，故秩序混亂。此時一部份新軍士兵，因無人指揮不免自由行動，沿街尋找旗人殘殺，強迫人民剪髮，同時不良份子也乘機搗亂，於是家家閉戶，人心大為不安，這種情形真是危險已極。

正在大家彷徨無主之際，有人報告黎元洪還在武昌未走。他是新軍第八鎮的協統，平時待人溫厚，頗得軍心，大家認為由他出來領導，負責指揮，最為適當。於是公推蔡濟民等同志會同黎的親屬前往尋覓敦請；於城外黃土坡劉宅將他找到，起初黎堅拒所請，只好以強迫手段把他拖到諮詢局，他見大勢所迫只好勉強答應，於八月二十二日正式通電就鄂軍都督職。這黃袍加身一幕，使他後來被選為副總統，並在袁世凱竊國失敗後擔任過短時期的總統，恐非他始料所及。

黎通電就職後，雖然安定了武昌的軍民心理，同時派部隊乘虛進佔漢陽、漢口，擴大了革命軍的聲勢，但實際上革命軍的力量還是非常薄弱的。而此時聞知滿清政府已一方面派蔭昌督師南下，又起用袁世凱總督兩湖，想以雷霆之勢，消滅武漢的民軍，以武漢民軍零星未整的隊伍與強大的敵人相抗，當不啻螳臂當車以卵擊石，黎元洪當時內心的焦灼是可想而知的。他唯一的希望是西南各省及時響應，出兵北上會師武漢，因此有人向他建議，立即選派陸軍中學的各省籍同志，回省連絡出兵響應的工作。這個建議，以當時的情形而言，實是緩不濟急的，但仍為他接受了。好在不久黃興先生前來武漢指揮，就革命軍總司令職，而南下清軍由於袁世凱的擁兵自重踟躕不前，他想挾借武漢革命起義的民軍向清廷討價還價，因此他的軍隊雖有一部分開到漢口，亦未積極進攻暫取觀望態度，同時各省亦紛紛獨立響應，清廷見大勢已去只有宣佈退位了。

此次武漢起義，最初在無人領導，人自為戰之時，若不是瑞澂膽小如鼠，張彪昏庸，聞風逃走，也許革命不會這樣輕易的獲得成功。

五、回桂連絡

在黎元洪正式就任鄂軍都督的第三天，楊瑞麟同學得到通知派他回廣西作連絡策動的工作。我和楊瑞麟同學一向要好，他堅邀我和他同行，並且要立即束裝就道。當時我想由武昌到桂林最快也要半個月以上，而且以我們的身份地位能否策動出師響應，也很難說，這實在是一樁萬分艱巨的使命。不過當時對這些問題似乎已再無考慮的餘地了，我只有答應和他同行，連旅途中應有的準備我也來加過問。我們沒有再回學校檢點行李的時間，當天中午便匆匆啓程。我們原想先乘船至長沙，然後再由陸路往桂林，不料此時由於戰事的關係船隻固已逃避一空，連車馬也無處尋覓了，最後我們只有徒步沿武岳大道向岳陽進發。

這次回桂之行說來非常可笑，而且幼稚萬分，最糊塗的莫過於我們在起程前連旅費都忽略了。我們兩人隨身攜帶的湊在一起還不到五塊銀元，等到我們發現這個問題時，已經是第二天的事了。我們以為與其再回武昌籌措旅費耽誤時間，不如沿途告貸，以我們的身份，並編造一套正大光明的理由，大致是不會發生問題的。第三天到達汀泗橋時，由於路費已經用罄，乃向當地黃家坂黃志成先生籌措。他是漢口一爿大藥行的主人，家資巨萬，富甲一方，借一點旅費自然毫無問題，黃老先生慨然應允，不過他有一個條件，要我們在他家中多留數日替他編組民團。我們雖然感覺任務在身不能久留，但也不得不暫時留下，因為當時我們只好說是武昌鬧革命，我們有事要回廣西去的，不敢公然說是回省策動響應起義的人物。

商人是最自私而敏感的。我們在黃家住了約一星期，將他自衛的民團編組好了之後，動身時，黃志成先生贈送了我們數十串銅錢的路費，這真使我們有些啼笑皆非。我想他可能是因為這些銅錢如果革命成功了不免要作廢，縱使還可通用也因世亂而不便收藏或搬運的緣故。但我們對這筆為數不多而重量不小的銅錢，既無處可以兌換，攜帶又嫌沉重，便真感到為難了，最後只好雇一挑夫同行。

由挑夫擔着沉重的銅錢行走，自然為宵小所注意，因此又在途中遇盜，演出了驚險的一幕。在到岳州前一天的下午，當我們行經一處靠近河邊野草叢生的荒野，忽從路邊竄出兩人。他們頭纏黑布，腰束麻繩，手執鋼刀，來勢兇兇的喝聲叫我們站着，並走向前來。楊瑞麟同學問他們作甚。他們回答是奉縣衙門之命檢查行李的，並命快將包裹打開他看。好在我當時是走在後面並帶有一枝手槍，現狀知是土匪，立即拔槍上前，指着他們說道：「朋友！請把眼睛放亮些！你們想發財？你問問這傢伙會不會答應！」我的話尚未說完，那兩個土匪一看情形不對，就骨碌地向野草叢中一跳，沒命的逃走了。我們為了趕路，也便不加追擊。

至岳陽後，改乘船直抵長沙，此時已是九月初旬；長沙已於先數日反正了。在長沙休息了兩天，知道除湖南外陝西和江西的九江亦已反正，使我們覺得非常高興。因為這樣一來武漢不再是孤立的奮鬥，而且也增加了我倆回桂連絡反正的信心。

長沙反正後被推舉出來擔任湖南軍政府都督的是焦達峯，我們抵達後的翌日前往請見，報告武漢起義的經過情形。他除派員招待外，並贈送了一些路費。越日即雇船自長沙動身趕回桂林。從長沙往桂林是沿湘江逆流而上，速度比徒步快不了很多，及抵達全州時已知廣西亦已於九月十四日由當時的廣西巡撫沈秉堃率領軍民通電反正，且廣西的援鄂軍也由趙恒惕先生率領開始出發了。這當然使我們喜出望外，不過對我們所負

的任務實際並未貢獻絲毫力量，也感覺萬分慚愧。

廣西軍政府的都督原是沈秉堃，沈因隨援鄂軍出發，乃薦陸榮廷自代。我們抵達桂林後即前往晉見，報告同省的任務及武漢起義情形。此時已是九月下旬，東南、西南、西北各省已紛紛響應獨立，推翻滿清政府已是指日可期了。陸榮廷除對我們加以慰勉外，並囑我們即留本省工作。當時廣西的軍政府設在桂林，在梧州設有分府，以我是梧州人的關係，陸都督乃將楊瑞麟同學留在桂林，而將我派往梧州的分府工作；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梧州軍政分府是由莫榮新負責，莫府長因我是陸軍中學的學生，而我的家庭又是當地的望族，對我至表歡迎，即任我為梧州軍械局的委員。那時我雖然還是不滿二十一歲的青年，在軍事上沒有任何經驗，但比之軍政分府及所屬部隊那些行伍出身，不僅未受高等教育，即讀書識字也屬不多的軍官，我要算是出類拔萃的了。因此莫府長處理有關軍務，多半找我研究討論，由我協助辦理。他待我極客氣有如上賓，愛護則有如子弟；對我這初出茅廬的人真有愛寵若驚之感。

廣西在滿清末年成立新軍時，曾向德國定購了一批武器；步槍、機關槍及望遠鏡、工兵器材、彈藥等為數不少。我到任後正值這批武器由德國運回，全部由我驗收保管。他所屬的軍官對此等武器不僅不曾用過，亦未曾見過，至於武器的構造和性能等知識，則更茫然無所知了。每逢軍官教練士兵時，都必須由我先行講解示範，因此一般軍官對我也都敬重有加。

我在梧州軍政分府工作共有一年又三個月之久，直至民國元年底接到通知前往保定軍官學校升學時，始行離職。在這段時間裡我與莫榮新長官部屬間相處非常融洽，他很器重我，我也非常尊敬他。莫府長雖是舊

式軍人出身，但謙虛樸素、實事求是的精神是頗值欽佩的；尤其待人接物極為誠懇，嗜慾貪濫一無所染，實為不可多得之長者。可惜不永天年，於民國九年病逝；使我失去一位原期在事業上可以依附的知己。

六、陸榮廷與廣西

辛亥革命之役，陸榮廷在廣西參與起義，不久繼沈秉堃被舉為廣西軍政府都督。嗣後他治理廣西達十年之久。他對民國是功過參半的人物；他的功除參與起義而外，主要是護國之役他能義不帝袁，他的過是護法之役尾大不掉，造成廣州國民政府以後種種糾紛。陸字幹卿，廣西武鳴縣人，父母早亡，幼年孤苦；稍長因家貧無以為炊，乃棄家走龍州，在水口對訊委員辦事處充當士兵。這對訊委員辦事處是前清光緒十一年中法戰役之後，根據和議所設置的邊防查緝機構，中法雙方各在邊境上設置對訊督辦公署，中國的設於龍州，法國的設在諒山。在督辦公署之下，則在各交通要點上分設對訊委員辦事處。水口辦事處是我方對訊督辦公署下轄對訊委員辦事處之一，法方在水口的對岸亦設有相對的機構。

陸在水口辦事處充士兵時，嘗渡河至對岸法方遊覽，為法方對訊辦事處所養的警犬所傷，陸對此深為痛恨，曾向對訊委員報告，定要將該狗打死洩恨。對訊委員怒其惹生是非予以制止，陸不聽，遂被開革。以此陸益為恚恨，遂越河至法境將狗殺死。陸自此逃入山中結黨為盜，專劫法人。嗣後聚衆漸多法方始終無奈之何。最後受蘇元春督辦收編，以剿匪有功逐次晉升至廣西巡防軍統領、提督等職。

陸雖出身綠林，無新學識，但正因出身寒微故頗瞭解民間疾苦，愛護部屬，且行俠慕義，故得部屬竭誠擁護。袁世凱僭位之初，為籠絡他，除授以崇高的封爵之外，並表示要將女兒下嫁給他的兒子裕勳為妻，期

結通家之好，不料竟為他所拒絕。後來陸子裕勸由北京回桂，途中忽然暴卒，陸認為係袁世凱所毒殺，遂成為陸氏反袁之一大原因。

當蔡譯（松坡）由北京潛回雲南起義護國，袁即電令廣東的督軍龍濟光與陸氏會師攻滇，同時任命廣西巡按使王祖同以會辦軍務為名從中監視。陸得袁電立予答覆，一方面表示竭誠遵辦，一方面以鈞精一時籌措不及，必須稍待。同時分電龍濟光除表示遵袁命出軍外，以廣西接近滇邊，為避免被敵各個擊破之故，須俟粵軍到達桂西一帶後，廣西軍隊方可出動西進。其實，陸此一着的主要目的，一在向袁騙取軍餉以充動員之需，其次在引粵軍深入桂西，以便斷其歸路，俾可一網打盡，免賠後患。當時他對內部則聲言，我們過去幫助孫先生打倒滿清皇帝，若今日又擁護袁皇帝，違背國民公意，出爾反爾，有何面目以對國人；由此可見陸的機智與重信義的一面。

陸榮廷的兩通秘電，果然取得了袁世凱與龍濟光的深信不疑；袁得電後即撥發現洋五十萬元給陸作為軍餉，廣東方面則由龍濟光以雲南查辦使的名義率軍西上，由梧州直達百色一帶。陸於此期間，外示恭順，不動聲色，迨粵軍抵達桂西後，即遣兵斷其後路予以包圍繳械。於是，不僅廣西一省，不待蔡譯派遣前來敦促出師的梁啓超到達，即已通電討袁，廣東的龍濟光在精銳盡失之餘亦不得不隨後響應。

護國討袁之役，自蔡譯、唐繼堯等人在雲南倡義之後，袁世凱原期以武力鎮壓，並遣曹錫率師入川，準備進剿。其間雖有貴州一省響應於前，但迄廣西宣佈獨立反袁之前夕，入川之護國軍則與袁軍苦戰於敘、瀘一帶，黔軍則受阻於麻陽一隅，其他如山東、上海等地雖曾舉事，亦少進展。當此之時，如陸榮廷竟昧於大義，甘為袁鷹犬，與粵軍協同拊護國軍之背，則袁氏之敗亡或難如此之速。由陸榮廷於民國五年三月十五日

宣佈獨立，聲罪討袁之後，不數日而袁下令撤銷帝制兼觀之，陸氏之贊附共和或大出袁世凱意料之外，而為促使洪憲皇朝不旋踵即烟消雲散關鍵之所繫也。

當時我已由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派回廣西陸軍第一師任見習，依我平時對陸氏的言行判斷，雖然知道他是絕不贊成袁氏帝制自為的，但我想他未必有此膽量，尤其沒想到他能有此機智和謀略，不但騙取了袁世凱的軍餉，還同時毫不費力的削弱了龍濟光的大部份實力，使龍不得不俯首聽命於他。陸以草莽出身，有此智勇，且正義凜然，為盜則不掠國人，迨掌兵符，能響應武昌之排滿革命於前，復能義不帝袁舉兵贊附共和於後，真是不可多得。可惜他終以學識不足，思想落伍，用人行政追不上時代，以致後來當 國父開府廣州興師北伐之際，竟為北洋軍閥利用，首鼠兩端，而為時代所淘汰了。

七、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

民國元年，袁世凱以擁兵自雄兩面更挾的手段取得了總統寶座之後，任段祺瑞為陸軍部長，黎副總統兼參謀部長（由王士珍代），並下令開辦陸軍軍官學校，定於民國二年元月正式開學；同時通令各省，所有各陸軍中學的第一期畢業生，以及第三陸軍中學第二期行將畢業的學生，一律入軍官學校第一期受訓。

我於民國元年十一月接到入學的通知後，即向梧州軍政分府莫府長榮新提出辭職。莫最初不准；經我一再表示來日方長爾後定有報答知遇的機會，目前我年輕學淺總希望前輩能栽培我，讓我能多讀幾年書；這樣他才只好答應了。

陸軍軍官學校是選定原陸軍速成學堂的舊址為校址，位於河北保定，所以後來習稱為保定軍校，由陸軍

都委派趙理泰為第一任校長。我於民國元年十二月中旬，摒擋一切，束裝北上，逕往該校報到。這次我是取道廣州，乘海輪前往天津，再改乘火車前往保定；初見大海，心胸為之一濶，沿途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均曾短暫勾留，雖只是走馬看花，也增加見識不少。

保定軍校第一期學生，分為步、騎、砲、工、辎重五個兵科，編成十二個連。大多數同學自辛亥革命起義之後，都在各省的軍隊中擔任過各級幹部，有的直接帶兵，有的從事幕僚和行政工作，職位官階一般都不算小。由於各人在軍事與普通教育上都有相當根基，又經過一番閱歷，其眼界自是不同；而當時學校的教官或隊上官長，多是以往講武堂或速成學堂的畢業生，他們的教育程度既差，官階又低，遂不免為同學們所輕視。入校不久，大家都覺得學校的教育實在離我們的理想太遠，於是在同學們會商之下，推派代表要求陸軍部改派曾留學國外軍事學校畢業的軍官前來擔任隊長或教官。陸軍部長段祺瑞沒有接受學生的要求，學生們便以罷課相抗議。

這次風潮鬧得很大，時間也拖得很長。參謀部方面認為學生的要求很有道理，支持學生的意見，結果造成參謀部與陸軍部之間的芥蒂，以至各省的都督也介入其間，紛紛電請陸軍部迅速謀求解決，也有對陸軍部予以責難的。最後陸軍部無法下臺，乃免去原派校長趙理泰，改由參謀部的參贊蔣方震（百里）接替；教官及隊長亦由蔣校長親自遴選派任。

當時陸軍部和參謀部可說是代表新舊軍人的兩個壁壘；陸軍部的人員多是舊式軍人，從國外留學回國，學術思想比較進步的多在參謀部任職。這次風潮的結果，在學校的人事上，是由參謀部的新軍人排除了陸軍部的舊軍人，陸軍部的主管人員心懷芥蒂，對由參謀部派任的校長不免存心要加以為難了。

學校換了校長和教官，添長之後才算正式開學。蔣百里先生浙江海寧人，是我國最著名的軍事學家。他十三歲入費門，嗣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德國陸軍大學；在日本士官係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日本天皇曾親贈寶刀，使日本學生不得贈刀引為奇恥；在德國曾任德第七軍的見習連長，亦極受德軍將領的重視，與登堡元帥並譽為未來東方的將才。當他在日本留學時，與蔡锷、蔣尊簋曾有軍學三才子的美譽。以這樣一位傑出的軍事人材來接任校長，學生們自然是無話可說了。

蔣校長那時還是三十歲不到的盛年，剛學成回國不久，對軍事教育頗有一番抱負，很想將其所學致力於這個培養新軍將校的學府，實現其建軍建國偉大的宏願。據說他從參謀部派來擔任軍校校長時，他曾立下諾言，如果辦不好軍官學校，他願自殺以謝國人，由此可見他的決心和抱負。不料，他的這項諾言，後來竟使他真的演出自殺的一幕，這是他的不幸，也是國家的不幸；雖然他的自殺幸得不死，但學校失去了這樣一位有學問有氣節的領導人，實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蔣百里先生到職後，除了在教育設備教育方法上銳意革新而外，對於精神教育尤其着重，每以日本的大和魂和歐洲的騎士精神來訓勉學生，從日常生活起居，處處以身作則；不到半年已粗具規模，同學們無不對其景佩與敬畏。但陸軍部方面因蔣校長是參謀部的新派人物，不僅不予支持，且遇事掣肘，有意使蔣校長的建校計劃無法兌現，藉以打擊參謀部；因此，學校應有的武器、器材不獨不予供給，每月的經費亦常扣壓不發。這種情形同學們最初無法知道，直至當年六月十八日的早晨，始由蔣校長集合全體學生訓話，宣稱目下本校因上方諸事掣肘辦理困難，教育的理想無法實現，自己深感對不起本校的同學和自己的良心，決以一死表示負責到底。這次訓話一反以往的情形，非常簡短，但中間有幾次顯然因情緒的激動而停頓。同學們聽到

他決以一死以示負責一句話之後，雖為他嚴肅的語氣而深為震驚，但尚不及料他在說完之後，立即高呼全體學生立正，同時舉槍自戕。這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全校在場員生，一時感到錯愕，繼而為之痛哭流涕，聲聞四野。

百里先生的自殺在一般人看來也許認為是不必要的，飽經世故的人還可能批評他缺少任重道遠，忍辱負重的毅力。但我們發現他的自殺決不是矯揉造作，也不是一時的衝動；完全是出於守信負責的精神，也就是他平日所說大和魂和騎士精神的表現，亦即是為陸軍軍官學校樹立一個千古不朽之模範。他在自殺的前晚曾終宵不寐，痛哭流涕，並留有遺書給各友好，告知他自殺的理由，主要在信守他的誓言，對他的承諾負責。因此他的自殺頗使學生深受感動，不啻是一種偉大的身教。

他此次自殺雖未擊中要害，但已造成重傷，所幸當時同學們立即將他擡回校長室由校醫予以急救，旋又由他的日本友人，當時任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武官，將蔣校長接運北平入日本醫院悉心救治，這樣經過數月之後才告痊愈。住院期間，那家醫院還派專門侍候他的日籍護士，非常仰慕他的才華與氣節，他也為她長期的辛勤守候動了博愛之心，因而成為一段婚姻佳話；這要算是他不幸中之幸了。

由於蔣校長自殺，同學們激于義憤又掀起一次風潮，推舉代表晉京向陸參兩部請願，而且較之上次尤為激烈。結果，陸軍部總算改善了對學校的態度與支援，同時另派曲同豐將軍前來接任校長，器械經費也如數撥發，學生纔恢復上課。

袁世凱本是一個毫無信義之人，辛亥革命按兵不動弄垮了滿清政府，那只是他陰謀篡奪的手法，並非真有愛於民國；故在取得總統寶座之後，即暗中分化與壓制革命黨人，以期鞏固其權位。至民國二年刺殺宋教仁的陰謀揭露後，國民黨中有識之士深知袁氏終將背叛民國，乃密謀聲罪致討。袁世凱於是公開下令查封國

民黨的機關，同時撤免國民黨中堅份子，如江西之李烈鈞、廣東之胡漢民、安徽之柏文蔚、湖南之譚延闔四督軍，並違法對外借款，準備用武力清除國民黨在南方各省的實力。是年七月，李烈鈞在湖口舉兵，黃興入南京宣佈獨立，正式爆發了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爆發之時，正是蔣百里校長自殺之後不久，當時同學們的情緒尚在浮動，且又值暑假時期，於是甚多同學紛紛南下參加。不幸這次討袁的軍事行動旋告失敗，而暑期過後遠赴南下的同學亦都一去不返。我那年因鑑於前此在陸軍中學時的南京之遊一病數月，不敢再冒暑遠遊，故未南下。是年冬袁世凱野心未死，帝制之心時刻不忘，因欲編組一個模範團自任團長，擴充他的實力，派員來校挑選若干優秀學生，準備在畢業後分發該團充任下級幹部。初步遴選總共有一百多人，我也在被選之列。後來在個別談話時，主持人問及我的經歷，我一時失於考慮，竟將我參加辛亥革命的經過和盤托出。他聽了這段話知我原是革命份子，在談話之後，便將我的名字從候選名冊中剔除，爾後遂被派回廣西軍隊充見習官了。當時很多同學為我的愚昧扼腕。我自己也不免自怨自艾，可是這批被選派到模範團的同學，於袁世凱死後，都改編到徐樹錚所屬的邊防軍充任下級幹部。後來在直皖戰中，徐樹錚的邊防軍為直系方面繳械遣散，這些同學竟不知去向了。回想當初我從候選名單中被剔除，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們保定軍校第一期，於民國二年春開學，經過不到兩年的時間，於民國三年冬畢業。其間兩度罷課，經過三任校長，甚多同學參加二次革命自動中途退學，剩下來的同學雖然總算挨到畢業，但在那短短的時間中加上學校人事的動蕩，所受的教育，效果不無影響。

八、機關槍長的故事

我自保定軍校畢業後，奉陸軍部分發廣西省內部隊見習。此次卒業的同學，除部份派往陸軍部直接統轄之各師外，餘均按省籍分發回省，因此廣西籍的同學，多被派回本省見習。那時行伍與學生畛域之分，到處一樣，釀成此種情形或與軍閥割據之局，不無關聯。這次回省見習的學生，將來必然是在省內服務，因此部隊中的官長，對此多少有點不含口味。廣西同學回省的多數是派在第一、二兩師，我與陳桂、周祖冕、蔣餘銓等五人，是在第一師第一團見習。第一師是廣西編練的新軍，幹部多係省內前此講武堂的畢業學員，與譚浩明，莫榮新的部隊比較，自然進步多了，可是門戶之見却很濃厚。該師師長為陳炳堃，師轄三團，第一團團長為賁克昭；我們到團報到之初，賁團長將我們留在團部，兩月後始派往各連，我被派在第一營的第一連。到連後，除擔任值日勤務之外，連長常要我在操場出操或野外演習時擔任指導工作，有時奉派往附近各縣從事兵要地誌調查。那時的軍官能夠認識兵要地誌的都不多，這種工作，自然是要我們擔任了。團長賁克昭係柳州人，講武堂卒業，與我父親尚有些友誼，待我還算不錯。當時我的眷屬是住在團長公館的附近，因此無事時他常招我到他的家中閒談。

軍校分發的學生，在見習期內是以上士的階級支薪，每月只有十六塊銀圓。那時生活程度低，這點收入維持一個小家庭的開支，還勉強夠用。見習的期限本來按規定只有六個月，見習期滿就可依軍官派任實職；可是我們這批見習官，却幾乎見習兩年之久，若非民國五年討袁之役帶來偶然的機會，也許還要繼續見習下去。因為那時既談不上人事制度，一般軍官都是從行伍中一級一級爬上來的，因之門戶森嚴，如非有特別的

機遇或人事背景，便只有在部隊裏無限期熬下去了。

民國五年春，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那時陸榮廷表面上還在效忠袁皇帝，實際上已決定反袁，部隊根據上級的祕密指示已在加緊動員準備一切，忙碌異常。此時我還在第一連見習，某天黃團長達團附謝華嵩來找我，說庫房裏現有兩挺機關槍，問我會不會使用。我說：「我學的是步兵，機關槍是本行，那有不會使用的道理。」他說：「那太好了！」立即要我隨他前往庫房查看，入庫房後即見兩挺機關槍放在庫房的角落裏，滿佈灰塵且紅銹斑駁，好像廢品一般，並與我在學校中操作過的不同，不知究竟是何種程式。當時我心想，無論那種機關槍的連發原理都是一樣，其他各部份的作用也一定差不多的，我這個見習官可能會派上用場了，不可失去這一機會。於是我就應著：「好，好，只是銹得太多，不知內部機件是否仍屬完好。」然後我要他把機關槍及零件箱等交給我，待我拆卸詳細檢查擦拭之後，再提出報告。

謝團附依我的要求將機關槍送來我的寢室裏，我便開始研究，心想，只要機件完整，憑我在校學得的兵器知識，必可將它弄妥。於是在晚上熄燈之後，我關起房門獨自將機件逐一按序分解，詳細檢查研究每一機件的作用；結果發現各部份機件並無缺損，無論裝填擊發的機能作用均屬良好。我斷定那兩挺機關槍，必是以前從外國買來之後，無人知道使用，以致存置庫房任其塵封生銹，其實是完全未經使用的新品。經我擦拭、潤滑，並多次分解結合熟練之後，我向謝團附報告，說機關槍已經檢查擦拭完妥，即可使用，要求指派數名老兵由我指導操作，然後再做一次實彈射擊即可，謝一一照辦。

實彈射擊結果成績非常優良，謝團附高興萬分，我也喜出望外；遂將經過報告黃團長。黃令各連中挑選老兵三十名組成機關槍隊，由我訓練兩星期。當時我滿以為這新編成的機關槍隊的隊長是非我莫屬了；但却大出

意外，貴隨即發佈一道命令，派我為機槍隊第一槍的槍長，另一位姓陳的同學為第二槍槍長，歸團部直接指揮，這樣一來我不但沒有獲得晉升，反而降級了；因為我們見習生原是上士待遇，而一挺機槍的槍長，按編制階級不過是中士罷了。真不知貴團長心目中認為槍長比見習官大呢，還是有意予以降級。當我們分發見習之初，滿以為六個月期滿就可升任軍官，有些同學還說過見習期滿非上尉不幹，現在見習了一年有餘，不但沒有當上軍官，反而派我去擔任一名槍長；回想早在未去保定軍校以前，我就擔任梧州軍政分府的軍械委員，無論階級待遇都比現在高多了，現在總算混了一個軍官學校畢業的資格，反而連一個少尉排長都當不上，真有些不是滋味。但團長命令已下，斷難收回成命，除非決定不幹一走了之，否則只有忍耐待機一途，且不可稍露慍色。同時我還考慮到，那時正在動員，辭職一定不准，如果不告而別，可能還要落個棄職潛逃的罪名。經過這一番考慮，我決定以逆來順受的精神暫時幹下去再說，並且積極的按照命令加緊訓練，同時自動的去研究配備行軍所需要的駄鞍等，準備隨時出發。

陸榮廷將龍觀光所部在桂西繳械後，遂於民國五年三月十五日宣佈獨立，響應討袁，並立即下令分途出發。以莫榮新、韋榮昌兩部由梧州下肇慶，解決龍濟光的殘部。以譚浩明的部隊直趨欽廉，對西江下游形成鉗形攻勢。陳炳堃指揮第一師及沈鴻英、林俊廷所部分三路向湖南出發；中路經由永州（零陵）向衡州（衡陽）前進，左翼第一支隊以林俊廷所部為骨幹由全州（全縣）出寶慶，右翼第二支隊以沈鴻英所部為骨幹由平樂出龍虎關，經桂陽向攸縣前進，計劃與當時向湘西前進之贵州護國軍相呼應，攻下衡（衡陽）、寶（寶慶），會師長沙。我所屬之貴克昭團為中路軍的先遣部隊，自柳州出發，經桂林、全縣向永州、衡陽前進。

在陸榮廷的戰略指導上，初期的作戰重點是指向廣東方面，必須將龍濟光澈底擊潰之後，才能解除後顧。

之憂。因此初期對湖南方面的行動並不十分積極，直至四月下旬，龍濟光在桂軍入境無法抗拒不得不宣佈獨立之後，才開始向湖南境內前進。當時湖南的督軍是湯蔭銘，他是袁世凱的死黨，為緩和廣西軍隊的前進，在四月下旬令零陵鎮守使望雲亭宣佈獨立，自己則繼續採取觀望態度。

賁克昭團於到達全縣之後，停留很久；我對這一臨敵徘徊不前的舉措曾深感狐疑。當時機槍隊自出發以來都是擔任團部的衛兵勤務，一天晚上，團長出來巡視與我談起當前的情況，我向他表示我的意見，認為本團是先遣部隊應及早進入湖南，望雲亭既已宣稱獨立，當不會與本軍作戰，倘望雲亭的獨立是一欺騙行動，也可依本團的積極行動來加以證實，好讓後續部隊到來之前，了解敵方的兵力部署和企圖；若等後續部隊到達之後，本團仍然在此停留不前，似乎違背了先遣部隊的任務；賁對我的意見未表同意，只說你不懂的，我自有道理。

又過了幾天，此時右翼第二支隊沈鴻英部已進出湖南道縣，左翼第一支隊的林俊廷部已向湖南武岡前進中，中路軍的後續部隊亦已到達，並據報永州望雲亭的軍隊已於兩日前向衡陽撤退，永州已是一座空城，貴團長這纔急忙下令各營連夜向永州前進。

為了迅速起見，賁團長命我率領機關槍隊改乘民船，沿湘江順流而下，相機前進。我們於黃昏出發，預期第二天上午到達永州。可是當時正是夏季，江水大漲，船行遠較平時為快，又是黑夜行舟，難辨方向，船上除了一個舵手和衛兵以外其他均已進入夢鄉，及至天明發現已超過永州甚遠。當即靠岸向當地老百姓查明情況，得知敵軍已先一日向衡陽方面退走，遂一面派人向團長報告沿途並無敵情，本隊續向衡陽前進，並請團長率隊趕向衡州前進。當天黃昏我率領的機槍隊到達衡州對岸附近，目睹城外河邊尚有甚多士兵搬運行李

上船，顯得非常忙碌，我判斷敵軍部隊正自衡州撤退中，但機關槍隊兵力有限，此時顯已孤軍深入脫離本團的主力過遠，不敢孟浪從事，入夜後始於靠近衡陽的上流對岸登岸，露營度過一宵並作零星擾亂性的射擊，表示我軍業已到達。

第二天拂曉，我派出兩組哨兵向江岸碼頭方面搜索，發現敵軍已悉數渡河向北退走，我遂以一個機槍隊不足五十人的兵力佔領衡陽，不久團部與部隊亦迅速趕到。貴團長來到後，又要我率機槍隊仍乘原船向株州搜索前進，當時我心想，他前此在全州是那樣遲疑，現在却又如此輕率，暗自納悶。但看他的語氣非常嚴肅，我又不能不遵照命令行動，後來才知道陸榮廷對他在全州的遲遲不前頗為震怒，並予以記過處分。

由衡陽到株州乘船順流而下，最多一晝夜即可到達。我深感這時已進入湖南的心臟地帶，再不可輕舉暴進，於是循東岸慢慢搜索前進，沿途亦未發生情況。抵達株州後獲知所有北軍均已向北撤走，湖南亦已宣佈獨立，乃在株州停止，並遣人向團部連絡。

湖南自黔桂兩省相繼獨立後，不少黨人志士在各地自組民軍，準備響應討袁，惟在袁世凱嫡系軍隊監視之下，不能有所行動，至五月初黔桂兩軍分別自湘西湘南進入湖南，袁軍不支向北節節撤退之後，各地組成的民軍遂乘勢而起，截擊向北撤退之袁軍，迫使湯薌銘不得不宣佈獨立，以求保持其督軍地位。我到達株州後不久，有一軍官帶着湯督軍致陸督軍的函件前來接洽，大意謂湖南已於五月廿七日獨立，現袁軍已退出湖南，請貴軍暫在株州、澧陵、衡山一帶停止，以免發生誤會，餘俟面商。我當即將原函專送衡陽團部處理，旋奉團長命令囑本隊即在株州停止待命，團部亦隨後來到株州，師部亦推進至衡陽，除右翼沈鴻英支隊自醴陵繼續前進直達長沙城外始行停止外，其餘廣西部隊概在湯督軍要求之線停止前進，等待會商，入湘桂軍之

軍事行動至此亦告一段落。

九、轉入湘軍服務

民國五年六月初，袁世凱因帝制不成，引起全國反對，目睹各地討袁的軍事行動如火如荼的展開，終於羞憤而死。袁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總統，電令各省停止軍事行動，護國之役至此結束。

湖南自袁軍退走後，原有各地編組之民軍，繼續招兵買馬，正式成立湘軍。這些部隊的上級軍官多為日本士官的畢業生，下級幹部則多屬軍校畢業的學生。其中如第二師的師長趙恒惕（炎午）先生當我在陸軍小學時代時他在廣西督練公所工作甚久，其他連排長中則不少保定軍校第一期的同學。當時有一位與我相交最篤的張湘砥同學在長沙城內的獨立營擔任連長，知我隨桂軍來到株州，特函約我到長沙一敍契闊。那時我軍正在株州候命返回廣西，乃欣然應邀前往。數年不見，老友重逢，歡愉之情不在話下，其他同學知我來長沙亦多來相聚敘談，每日輪流邀宴。盤桓數日，本欲回國銷假，他們以我在廣西部隊尚是一名見習官，堅邀我留在湖南的部隊工作，尤其張湘砥同學，並為我引見他的營長李剛培先生，李營長係日本士官學校卒業的，亦誠懇的留我在該營工作。最初我不敢遽然決定，經過我詳細的考慮和他們誠懇的挽留，最後我只有答應了。以我是張同學邀約前來，而過去只當遇見習官，張乃要我暫時委屈在他連內擔任中尉排長。當時我曾考慮到，我是廣西人，道義上我應留在廣西的部隊服務，我雖然幹了快兩年的見習官，而貴團長對我確是特加青眼，如就此請假一去不返，於心頗為不安；不過以一個新進的青年與老行伍軍人相處，在思想上總是格格不入，彼此既不能開誠佈公，自然難以互信互賴，就過去的情形推斷，留在原部隊繼續埋頭苦幹，恐亦徒耗光

陰而已，於己實在無益，若待以後仍不得不請辭他去，反不如趁此機會脫離為好。

我決心留在湖南部隊工作之後，委婉的寫了一封信向貴團長請辭。貴得信後曾派謝團附來長沙找我，我因決心已定，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唇舌，沒有與他見面。事後據謝告我，他當日奉貴團長令去長沙找我時，團長一再對他叮囑，務必找到李某要他回來，並說他與我父親是最好的朋友，此番回去必定保我擔任實職。

是年七月初旬，我在李營到職還不滿一月，湘人發起驅逐湯鄉銘的運動，湯倉皇遁走，督署人員亦四散逃匿，長沙的秩序一時頗為混亂，本連奉命進駐督署擔任守護，張連長湘砥因事不在，由我率領全連入駐督署。我以此番任務關係重大，入駐後，首將督署印信，檔案集中連部封存保管，同時將庫存銀元八十餘萬元清點查封，嚴禁人員入庫，督署人員之私人行李什物亦加以收集封存，並將督署前後側門緊閉，佈置衛兵，飭令官兵一律不得外出，亦不准任何人進來，晝夜親自巡邏，嚴密戒備，靜候新任督軍前來接收。

在此期間，湖南都督一職，曾發生爭奪的局面；最初議由湖南第一軍總司令曾繼梧代理，旋因譚延闇、程潛反對，爭持多日均無結果，最後推舉湖南元老劉人熙出來作為緩衝，以免發生意外。劉出任後派員來署接洽，我遂將保管之印信、檔案、公物與封存之庫銀等一一點交清楚，其餘私人行李什物無人認領者，亦集中一室聽候上級處理，並將各處清掃乾淨，開啓前後各門。當時連內官兵，認為我對督署的銀物，處理過嚴，這樣大好的機會沒有讓官兵得到絲毫好處，不免心存怨懟，我聽到他們暗地裏批評我說：「這個新老爺（當時士兵對連排長的習稱）真奇怪，有錢不知道要，連累大家跟他倒楣。」經曉以大義，衆始悅服。稍後上級允准將無人認領衣物，分給官兵用資獎勵，我令各排選出數人，公開處理，公平分配，本人不取一物。最後士兵以外套一件，皮鞋一雙，指揮刀一把送來給我，我除將指揮刀留下外，餘均退還士兵，從此官兵對我

莫不敬畏。

此次守護督署，上峯以我處置得當，秩序整然，操守廉潔，一介不取，頗為嘉許，尤其新任劉都督特遣副官召我至其辦公室，很和藹的垂詢我的家庭狀況，履歷及服現職的經過，並當面予以勉勵，真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適在此時本連連長張湘砥同學奉令他調，復將我升為本連連長，在短短不滿一月的時間內，迭獲升遷，實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更時刻反省警惕，在我的職責上加倍努力，以酬知遇。當時本連士兵，多係民元起義時的老兵；他們原是招募而來，積習已深，行為放蕩，雖嚴加管教而收效不多。我升任連長後，遂決定逐次淘汰老弱游滑，另招新壯，加意訓練；不出兩月果有起色，復將本連財務補給予以整頓，使有節餘以添置士兵服裝，不足之數更以個人薪餉所餘貼補，同時倡導正當娛樂。於是全連士兵的精神由委靡放蕩而轉為振奮肅肅。

劉都督雖是湘中元老與湘桂軍人都有舊，但自己並無實力，亦因此未能久於其任。劉都督就職後不久，成立一直隸督署的衛隊營，以唐生智為營長，此乃因劉督與唐父有舊交的關係。我因前此守護督署有功，劉督乃指定將本連編入衛隊營，其餘三連則由唐招募另行成立。唐生智為保定軍校一期同學，為人精明幹練，膽識俱佳，此看得與共事，私衷頗為快慰。唐因我係劉都督所特別提攜，而我又是廣西人，不會參與湘軍的複雜人事關係，故對我亦信賴有加。此後我與他同在一個部隊共事多年，其淵源即在於此。

是年八月，北京黎元洪政府任命譚延闔先生為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到職後即着手整頓湘軍，將原有之四個師予以縮編；將原來陳復初之第一師與陶忠洵的第三師合併為新編第二師由陳復初任師長，將原來趙恆惕的第二師與程潛的第四師合併為新編第一師由趙恆惕擔任師長；督署衛隊營則改編為第一師第二旅第三團之

第三營，唐仍任營長，團長為宋鶴庚，旅長為林脩梅。湘軍經此整編，內部遂告安定。

一〇、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

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後，順從國父的主張，於民國五年六月廿九日申令恢復民元公佈的約法，八月一日召集舊國會，並經國會同意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組織責任內閣。由袁世凱篡國所毀棄之法統，至此已經恢復，如果大家能共同遵守，我國當可由此臻於民主法治，踏上光明燦爛之途。無如段組閣後，野心勃發，立即飛揚跋扈起來，初則與黎不和迭起府院之爭，至民國六年五月因參戰案未獲國會通過，竟至運用北方的督軍團威脅黎總統要求解散國會，因而引起張勸復辟的一幕，幾至危及國本。後段氏雖誓師馬廠救平辦逆，但復自任總理毀法如故，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統一全國。

民國六年八月下旬國會於廣州開非常會議，決議組織軍政府，戡亂護法。九月一日依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國父為陸海軍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仍虛總統位以待黎元洪。同月十日國父就大元帥職，發表宣言，述明討逆戡亂，恢復約法，召集國會之宗旨。

段祺瑞以民國再造之功自居，非法自行組閣，對西南護法各省，思以武力解決，於八月六日先發表傅良佐取代譚延闔為湖南督軍，並統率北洋軍王汝賢的第八師，范國璋的第二十師隨同南下入湘，揆其目的乃在統治湖南，進窺兩廣，以遂其統一的迷夢。當時湘軍有趙恆惕先生的第一師及陳復初的第二師，如同心合力自可抗拒，無如陳復初自譚蒞任整編之初即心懷攜二，至此且有與傅勾結為其內應之跡象。譚知不敵乃飄然離職去滬，幸臨去前因趙恆惕先生之建議委劉建藩為零陵鎮守使，先於湘南預作部署，以期保存湘軍一部實

力，並作進攻退守之基地。同時將第一師的主力林脩梅旅移駐衡陽。第二師則向湘西移動。時第一師師長趙恆惕先生因丁憂已回衡山原籍治喪。

傅率領大軍進入長沙之後，一方面從事對湘軍部隊之分化工作，同時使王汝賢部第八師尾隨第一師（即趙師）之後向湘南進逼。九月中旬第一師李佑文旅長與傅亦暗中勾結，傅於是下令免零陵鎮守使劉建藩職，蓋此時湘軍既已大部份向傅靠攏，料不難傳檄而定也。

九月十八日零陵鎮守使劉建藩與林脩梅在衡、永宣佈獨立，通電主張恢復國會，尊重約法，並否認段祺瑞的非法內閣，同時敦請趙恆惕先生回師領導。時我團（團長宋鶴庚）正由湘潭沿津寶大道向寶慶移防，途中奉林旅長命停止南移，在界嶺附近待命。旋得密報，第二師的朱澤黃旅已由湘西向湘鄉移動，有躡擊我團並進攻寶慶之企圖，此時北軍王汝賢的第八師也有進犯衡山的模樣。我第一師師部乃下令準備向衡寶前來之敵分途迎擊，於是護法戰爭首在湖南展開序幕。當時湖南獨立軍各部隊之部署大致是以湘軍第一師的主力林脩梅旅及零陵鎮守使劉建藩部，防守衡山、瀟州河一帶，本團則在界嶺之線設防，掩護師之左翼。

九月末，湘軍第二師附逆之朱澤黃旅經湘鄉進抵永豐附近。同時附逆之李佑文旅則與北軍王汝賢部向衡山進攻，惟該旅到達衡山後所部官兵深明大義，反戈將李驅逐，重回第一師趙師長的懷抱一致參加護法，李佑文旅雙身潛逃，湖南護法軍的聲勢一時為之振奮。此後我第一師主力遂與北軍鏖戰於衡山、瀟州河一帶。

我團在界嶺附近潭寶公路兩側佈防之後，十月中旬敵自永豐沿潭寶公路前進，當與本團發生戰鬪。敵受創，稍向後撤；因敵兵力較我遠為優勢，我亦不願輕舉出擊。入夜後且奉命逐次向寶慶方面撤退，此可能係上級恐我團兵力過於薄弱，不宜死守一地陷於決戰，作過早犧牲也。轉進間，本連最初擔任掩護部隊，掩護

全團各部隊向黑田鋪附近集結；隨後又在黑田鋪附近佔領陣地，逕擗敵軍向寶慶之前進。由於敵在界嶺附近向我攻擊時受創甚重，故對我團之撤退未敢跟蹤追擊，本連遂很容易的達成了掩護全團安全撤退的任務，並奉命向黑田鋪集結。翌日本營在黑田鋪早已佔領陣地完畢，但未見敵前來，營長唐生智又委我率本連再向界嶺方向前進，實施搜索，直至到達界嶺附近捕獲敵哨兵三名審訊之後，始獲知敵後續部隊於先一日始到達界嶺，現在界嶺附近休息中。此時界嶺之敵可能聞悉我軍到來，曾目覩其紛紛向界嶺兩側山地展開，約有兩營之衆。我於達成搜索任務之後，又再度撤回黑田鋪。

次日本營奉命向寶慶撤退，附逆之朱澤黃旅亦跟蹤前來。當本營到達距離寶慶二十五里之紅橋時，本團奉上級命令退守寶慶以陽間之吊井嶺（距寶慶約三十里），因需確責掩護衡陽主力軍之側背起見，故放棄寶慶城。本營乃即在紅橋附近停止，掩護團主力向吊井嶺佔領陣地。附逆湘軍朱澤黃旅於十月二十一日抵達寶慶後，亦不敢再進，雙方乃暫成對峙狀態。同時，護法軍之主力方面，當本團退出寶慶之際，亦於與敵激戰之後放棄衡山，退守益州河之一線。

當湖南護法軍與敵苦戰之時，廣東的軍政府鑑於湖南乃兩廣的屏障，如果萬一挫敗，當然極為不利。於是一方面派程潛為湖南護法軍總司令，一面派潭浩明為粵桂湘聯軍總司令出兵援湘。十一月初桂軍沈鴻英、林俊廷、林虎、韋榮昌、陸裕光等率部入湘，我湖南護法軍之聲勢隨之大振。進出湘東之桂軍，首將李傳業之安武軍予以擊破，衡陽方面得桂軍陸裕光、林虎等部之支援，亦發起反攻，擊破當面之敵收復衡山。桂軍韋榮昌部則協同我第三團向寶慶攻擊。寶慶之敵，知我獲得桂軍支援後，最初仍閉城防守。我團於十一月八日自吊井嶺向寶慶前進展開攻擊，桂軍則在我軍之後跟進支援。當時我擔任前兵連的連長，於中午時分即進

抵寶慶城下。敵自城上發礮向我轟擊，繼之彈如雨下，在我身邊的號兵當即中彈陣亡。此時主力尚未展開，本連乃向寶慶城之東面採取包圍的態勢，將正面讓開，以便主力展開攻擊。不久我團之主力已經展開，桂軍亦分數路向寶慶城之西南兩面包圍前進。

桂軍韋崇昌部原是舊時的省巡防軍，這時他們雖然已經不再穿着在背心上寫有一個很大「勇」字的服裝，但他們的戰術却仍舊採用古老的戰法。當他們在到達離城三、四華里之處分成數路，每路用幾面大紅旗高聳起來搖曳空際，同時吹角與大號之聲齊鳴，隊伍則隨着以排山倒海般向前衝進；既不發槍也不開礮，只高呼吶喊而前，其勢汹汹好像毫無畏懼的樣子。這種戰法，以現代的眼光看來，自是陳舊落伍之至，如果遇上沉着應戰而又火力強大的敵人，傷亡必然慘重無法成功。可是這次對寶慶的攻擊居然非常成功，在他們未到達之前，城上之敵人不斷向我們轟擊，而在他們到達城邊時，城上的槍礮聲却逐漸減少，未等到爬越城牆攻擊，城上已寂然無聲，此時敵軍已棄城而遁，這可能是敵人眼見桂軍的旌旗浩蕩，在心理上感受威脅而然。

當天下午二時左右，敵軍已悉數北遁，我軍在民衆代表的開門歡迎下進入寶慶。我率領之連是首先入城的，入城後為恐尚有殘敵遺留城內，當即沿主要街道配置崗哨，展開搜索，同時令人準備午餐。當我正在午餐之際，又奉團長命令，立即出發，沿潭寶大道搜索前進，追擊敗退之敵。敵軍的主力雖已在數小時之前沿潭寶大道向東北撤退，但顯然非常倉惶狼狽，我連沿途截獲敵遺棄之行李彈藥為數不少，也有若干落伍的敵兵向我投降。當天晚上到達紅橋附近，據當時的情報判斷，北軍係沿潭寶大道向界嶺以北撤退，附逆之湘軍第二師朱澤黃旅則係經樓底穀水向湘西退却。我覺得附逆之湘軍只是他們的長官一時罔顧大義，為敵收買，決不會為北軍賣力作戰，此番創敗向湘西原駐防地區退却，表示他們的勾結至此已告一段落。於是，將情報

報告團長之後，決心於第二天拂曉，僅隨北軍之後向界嶺湘鄉前進。

在本連自寶慶出發時，桂軍的先頭部隊也已經進駐寶慶城，他們作戰雖很勇敢，但紀律却相當廢弛。他們進城之後即沿街強取民物，團長宋鶴庚目觀這種情景向我說，你們貴省的軍隊如何這般胡來，我說這是以往綠營兵的積習，請趕快去找他們的指揮官商量，迅速派出巡查隊，予以制止才好。因我曾經在廣西的軍隊中當過一年多的見習官，而且在此之前還在莫榮新的下面服務過，對於他們的情形比較了解。不過我在廣西見習時的部隊是屬於新軍，而韋榮昌部却屬於舊式的省巡防軍。新軍是仿照日制師、旅、團、營的編制編成的，前此已經說過。舊式的巡防營則是從以前的綠營兵蛻化而來。在民國初年，廣西的軍隊，還是兩種軍隊都有，陳炳堃的第一師和陸裕光的第二師算是新軍。譚浩明、莫榮新、韋榮昌的部隊都是舊巡防營，這種部隊直至民國十三年後才完全淘汰。舊巡防營在滿清時代的編制和指揮系統是這樣的，最高的上級官叫提督，陸榮廷本人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廣西巡防軍的提督。提督之下為統領及副統領，相當於以後的師旅長，以次為幫統，相當於以後的團長，再次為管帶相當於營長，再下為哨官相當於連長，最下為弁目什長之類相當於今日的中下士班長。營為最大單位，有左右前後營之分，營之下為哨，哨亦有左右前後哨之別。每哨的兵丁多少不一，初無定額。兵丁都是招募而來，無所謂教育，每季僅在操場練習射擊而已。服裝亦極簡單，每人由公家製發背心一件，背心前後各繕有「兵」字或「勇」字，以示區別；頭不帶帽，只以一塊三四尺長的黑布包紮，腰間亦束以布帶，小腿以三角黑布綑紮當作褲腿，腳穿草鞋。軍中傳達命令，均以令箭為憑。旗幟種類頗多，每一主官都有他的旗號，大抵是用紅布或紅綢製成，中間繡着主官的姓氏，或寫一個很大的「令」字。旗幟的多少依官階的高低而定，大致統領四面，管帶兩面，哨官一面；平時插在主官住地的營門外，行

軍時則令人斜撐着在隊伍先頭行進。另有一種大號，由銅製成，共有三節可以伸縮，用時拉開長約五尺，發音簡單，平時在定更或列隊時使用，行軍作戰時則與大旗配合在一起，置於隊伍的先頭。這是滿清時代廣西巡防軍的情形，其他各省可能也只是大同小異而已。那時韋榮昌的部隊雖然已經不穿「兵」字或「勇」的背心，可是還沒有新軍一樣的正式軍服，一般穿的是對襟的便裝，在今日看起來直有烏合之衆之感。

第二天拂曉，本連沿潭寶大道繼續向北追擊，在本連出發之後不久，本團其餘部隊亦自寶慶出發向前推進。翌日本連到達界嶺，據報北軍當天中午通過界嶺向湘鄉退去，永豐附近尚有敵一部駐守。我當將情況向上級報告，同時當天已經行軍九十餘里，乃在界嶺附近宿營。當夜奉到營長唐生智的命令，命本連於次日拂曉出發，沿潭寶大道右側之小徑繞至經永豐通洪羅廟之大道，向永豐之側背突擊，營主力則沿潭寶大道兩側前進，夾擊永豐之敵。

第二天拂曉以前我將連部的大小行李及傷兵留置後方，親率本連官兵輕裝從潭寶大道以東的小路向敵後迂迴。由界嶺至永豐約四十華里，但我們因為從小道迂迴的關係，而且還要繞過永豐，行程總在六十里以上我和全連官兵輕裝急進，沿途未為敵人發現，晌午甫過，即順利的繞到了指定的位置。我當將全連隱蔽在附近的村落中，一面休息用餐，一面蒐集永豐敵軍詳細的情報。本連的士兵大半都是湖南湘鄉人，在這一帶出生的也不少，與當地居民不乏親友關係，因此很快獲得了當地民眾的合作。他們除自動的提供了情報，擔任嚮導之外，還有不少自攜刀棍要隨我們去襲擊敵人，使全連官兵受到極大的鼓舞。

根據當地民眾的報告，駐紮永豐市內的敵人只有兩三百人，其餘大部都駐守在永豐外圍的山頭上，並築有工事。依我判斷永豐市一定是敵人的指揮部和預備隊的所在地，如果能潛入永豐市實施突擊，必可使敵猝

不及防發生混亂，達到以少擊衆的效果。於是在黃昏前將路線偵察好，並秘密由敵人的後方向永豐市內接近。黃昏將近，一聲號令槍聲大作，即向永豐市內突進。果然，敵遭我突襲，四散奔逃，兩側山上的敵人以為市內已為我軍攻佔，亦盲目的掉轉槍頭射擊自相殘殺，並紛紛放棄陣地向湘潭方向奪路而逃，逃避不及的即藏匿於市內的民家。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我已毫不費力的收復了永豐市，避匿民家的北軍散兵亦為民衆解送前來；除俘虜敵人數十名外，還得到不少彈藥武器和輜重。等到本營主力到達永豐，這場戰鬪早已結束。當晚本連於清點據獲械彈報繳團部後，於永豐以東數里之村落宿營。團部及各營即進駐永豐市。章榮昌部桂軍尚在數十里外的清樹坪、界嶺一帶宿營。

翌日，本營仍擔任圍的前衛，繼續向湘潭挺進，沿途未見敵蹤，當日到達湘鄉附近，距湘潭約四十餘公里。此時，在衡山方面之湘桂聯軍，於收復衡山繼續向株州易泗河之線推進中。三湘民衆於獲知桂軍來援，反攻得手，亦莫不歡欣鼓舞，以前向傅投靠的湘軍將領此時不是匿跡潛蹤，便是率部來歸聽候改編。北軍師長王汝賢於兵敗之餘，於十一月十四日通電請求南北停戰，放棄長沙退據岳陽。督軍傅良佐與代理省長周肇祥於先一日棄職逃走。我軍於十一月十四日又收復長沙。

那時北洋政府由馮國璋代理總統，由於段祺瑞的驕橫跋扈積不相容，尤其馮國璋的部將曹錕等人更對段心懷嫉忌，因乘北軍在湖南節節敗退之際，於十一月十三日通電主和，迫使段去職。從此北洋軍閥遂分裂為直皖兩系如同水火。

段祺瑞於民國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辭去國務總理，十七日馮國璋通電發表國事意見，力促南北和議。無如北方各軍閥目的是為自私對和議並無誠意，南方軍政府此次護法之戰原在恢復國會與民元約法，以維法統，

除此而外即無和談餘地，因此和談終無法接近。

一一、兩次危險的任務

長沙收復之後，護法各軍已集中長沙附近從事整理，桂軍各部亦逐次向長沙集結。本團在長沙休息幾天之後，奉命向北推進，沿汨羅江之線擔任警戒。其時北軍主力駐守岳陽，在汨羅江北岸僅有敵少數前哨部隊與我隔河而守。北軍以新敗之餘且正協言和議一時自無南犯的企圖，我護法軍正在整補也沒有積極前進的跡象。不久譚延闔先生亦再度回湘擔任省長兼督軍之職，急須調整人事部署一切，故雙方暫時成了休戰狀態。

我在到達汨羅之後，獲知桂軍旅長賁克昭部進駐長沙，在又一村內設帳。他是我在桂軍見習時的團長，以往對我相當器重。前此我脫離桂軍前來湘軍工作時，未經批准即行離職，嗣後他派謝團附到長沙找我，我又未獲見面，於心總覺歉然。如今事過境遷，趁他此番來長，無論如何有拜訪他一致歉意的必要。我於是趁前方平靜的當兒，請假數日遄返長沙。我見賁旅長時，他對我昔日的不告而別不僅毫未見責，反對我問長問短十分關切與勉勵，使我深為感激。在長沙休息期間，與其他桂軍中舊日袍澤相晤敘，在戎馬倥偬之餘，連朝歡會，抵掌談天下事，亦快慰無已。

在汨羅前線與敵軍隔河相望一月有餘，至民國七年一月上旬，我湘桂護法聯軍已整補完畢，因和議始終無成，乃擬肅清岳陽的殘敵進寇武漢，以期恢復國會建立新的政府。於元月十五日以桂軍主力經平江、通城向鄂南進發，湘軍主力及桂軍一部則越汨羅河直趨岳陽，本團於新市附近渡過汨羅江驅逐當面敵警戒部隊後繼續向北推進。於一月二十三日，本營已在上游渡過新牆河到達更口以北地區。其時，沿鐵路線北進之桂軍

則受阻於新牆河，無法超渡。於是本營營長唐生智轉奉上級命令，命我率領本連向桂軍當面新牆河北岸敵軍之側背挺進，威脅敵軍後路，俾友軍容易渡河。

新牆河北岸是一片小的丘陵地帶，地形相當複雜，我率領本連向西前進一段之後，為了能利用小路保持行動的祕密起見，乃僱用熟悉當地地形的居民帶路。真是事有湊巧，找來的嚮導，由於他的妻子曾被北軍強姦，對於北軍正是恨之入骨。他不僅無條件的給我們帶路，還約同村中壯丁數人各攜刀矛和我們同行。我原來只希望將目標指向於距新牆河北方數里處之道路要點，以遮斷敵之退路，利用夜暗虛張聲勢，威脅敵人。不期該嚮導等以復仇心切，竟將本連導向敵第一線部隊之近後方，發生了一場面對面的近接戰鬥。好在他們選擇的道路非常隱蔽，直至戰鬥之前始終未為敵軍發現；因之雖然有些危險却意外的獲得了奇襲的勝利。

那時作戰在小部隊中沒有軍用地圖，只能按照概略的方位行進，而在山谷中依着偏僻的小徑，要避開敵人可能的警戒迂迴行進，便只有全憑他們領路了。我們在山徑中走了幾個鐘頭，於黃昏附近，走出一片松林。松林的前方是一帶小高地，高地上也有若干叢樹，小高地的前方山腰部便是敵人面對新牆河的陣地。當我們剛爬上高地，就發現了敵人，彼此相距不過二百公尺，於是立即展開戰鬥。好在當時我們已佔領山頭有居高臨下之利，我用密集射擊對衝上前來的敵人當即擊斃數十人之多。其他山坡兩側的敵人，不知所措，一面向我還擊，一面向山下四處奔逃，也有一部想衝過我們所據守的高地向後奔跑的，一時陷於混戰，本連也有數人傷亡。所幸時已黃昏，敵人弄不清我到底有多大的兵力。過了一陣槍聲漸稀，敵人們似已向新牆河的下流方向退去，我也不便追擊，只好就地向四週警戒。這時清點人數，那幾名嚮導，一個都不見了。黑夜中也无法派人尋找，我還以為他們可能在那一陣激烈的戰鬥中偷偷的跑掉了。可是過了約兩個鐘頭，他們陸續從

山坡下跑了回來；原來的刀矛都換了步槍，滿身血斑，興奮而激動；我這纔明白他們真的是報仇去了。遇了一會他們又帶來幾個當地的男子，挑着茶水米飯來給我們充饑，並報告新牆河北岸的敵人已經完全向岳陽方面逃走。這真是戲劇性而又感人的一幕；使我實際領略到軍隊的紀律和軍民的合作是如何的重要。

由於本連不預期的獲得了奇襲的成功，新牆方面的友軍於翌晨順利的完成渡河，繼續向岳陽推進。新牆河距岳陽二十餘公里，是守岳陽的主要防線，敵軍既已放棄新牆河，所以岳陽也就未經堅強抵抗，而為我軍於一月二十七日收復，北軍向武昌方面撤退。

湘桂聯軍在岳陽稍事整補即繼續向蒲圻、汀泗橋推進，當與北軍吳光新部在汀泗橋一帶發生接觸，劇戰數日並無進展，雙方遂成對峙狀態。此時北京政府已於一月三十日下令向南方護法軍進攻，並發表曾錫為川湘粵贛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為援粵軍總司令，吳佩孚副之，張敬堯為攻岳前敵總指揮，分別率兵南下增援。

二月下旬，北軍張懷芝率兵入江西，同時以海軍船隊駛向上游。三月初北軍水陸並進，大舉進犯，陸路自鄂南及贛西向湖南進逼，水路由長江駛入洞庭湖，向岳陽、湘陰一帶騷擾。湘桂護法聯軍慘勢頓感不利，經過劇烈戰鬥之後，即逐漸向湘北撤退。三月十日，岳陽為北洋海軍掩護之一部陸軍所攻佔，三月十七日北軍吳佩孚進據岳陽，湘桂護法軍繼續向長沙附近撤退。此時北軍張懷芝部自江西向湘東之醴陵西進，張敬堯部自通城經平江向長沙進逼，長沙在敵水陸四路進攻下亦無法確保，不得已再向湘南轉進，四月二日，長沙再度為北軍所攻佔。

由於北軍的節節勝利，北京政府的主戰派氣氛益為高漲，三月廿三日段祺瑞復出任國務總理，繼續其以武力統一全國，企圖摧毀廣州護法軍政府的迷夢。

三月二十七日，北京政府發表張敬堯為湖南省的督軍。張敬堯是段祺瑞皖系的將領，段祺瑞上臺不到四天就發奏張敬堯主湘，在直系的將領看來，自己打出的天下竟為皖系囊括而去，心中自然極為不滿，因此更促成北洋軍閥的內部傾軋。吳佩孚後來在衡陽固兵不進，並私下與湘軍議和，撤軍北返，與奉軍聯合夾攻皖系，再度搗毀段的政權，主要種因於此。

湘桂護法聯軍自岳陽、湘陰相繼失守後，沿途退却，擁塞不堪，在敵三面包圍之下，無法立足，極為混亂，北軍乃乘勢襲佔長沙。湘軍大部退至衡山、湘鄉、攸縣一帶方行停止，重整陣容，一部則渡湘江後向湘西撤退。桂軍則退至衡（陽）寶（慶）一帶整頓。北軍進展至株州湘潭一帶後亦暫行停止。此際湘軍為準備繼續作戰，乃利用空隙調整人事及部署並擴充部隊。本團團長宋鶴庚升任第二旅旅長，本營營長唐生智升任第三團團長，本連則擴充為第三團第一營由我擔任營長。其他團營亦有相當擴充。

四月下旬，我軍甫行整補完畢，北軍復分三路向南推進；中路由吳佩孚之第三師指向衡山、衡陽，右路為張敬堯所屬田樹勳部指向湘鄉、寶慶，左路張懷芝部由醴陵攻攸縣。張敬堯自己之部隊則在長，株附近駐防。此時粵軍馬濟、黃標榜奉令率粵軍來援，我軍士氣復振，亦發起反攻。以桂軍全部固守衡寶，湘軍會同粵軍則由湘江東岸發動攻勢；一路經攸縣、黃土嶺向醴陵進攻，另一路沿湘江東岸向株州推進。粵軍於攸縣以北之黃土嶺與贛軍張懷芝部遭遇，經兩日惡戰將其擊破，敵死傷甚衆，粵軍乘勝追擊，收復醴陵，殘敵退回江西之老關附近。此後粵軍除以一部對其監視外，並以一部推進至瀏陽附近擔任警戒。

沿湘江東岸推進之湘軍，於渡過洣水之後向株州攻擊。本團經神伏港渡過洣水，於四月廿六日下午三時許到達姚家壩。此時湘軍主力已進至株州附近與敵軍張敬堯部猛烈對戰中，惟戰況艱苦毫無進展。湘軍總指

揮部為期正面攻擊奏功，乃令本團以有力之一部，乘夜由姚家壩向敵後挺進，襲擊敵後使我正面容易進攻。唐團長奉令後又找我商量，說我前在永豐、新牆迷奏膚功，對於迂迴襲擊，最有經驗，此次任務，仍要本營擔任，才能達成任務。我明知這也許是一頂高帽子，我仍欣然接受，並不推辭，但我自心在想，自護法戰爭開始以來，我總是進則在前，退則在後，危險艱苦總是我的。此無他，無非我是一個廣西人，給予困難的工作，總是不便推諉的，因此我必然要較別人多吃一點虧；但是從另一方面想，如要成大功立大業就必需要經歷千辛萬苦，置生死於度外，由奮鬥中方能得到。何況這次擴編上級已將我升任營長，長官既已酬功，我亦自當報德。事實上我對任何危險的任務，從來未曾推諉過，我認為貪生怕死固人之常情，但戰場上並未有絕對安全，也沒有定死無疑的事，而且既以身許國，就應該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想法。也許因我有此種觀念，乃能臨事鎮定履險如夷。

受命後，立即吩咐各連埋鍋造飯，隨將全營輜重行李及非戰鬪人員加以區處，使隨團部行動，飯後立即出發。我的部隊初從姚家壩向西北易家灣方向之道路前進，沿途僅用偵探與嚮導，入夜後再折向西方前進，預期次日拂曉前，迂迴至敵軍陣地之後方，佔領陣地再相機發起攻擊。當夜月色無光，全營在當地居民的嚮導下，以一路縱隊，沿偏僻小徑摸索前行。午夜過後，概已繞過敵之側翼，更折向西南方向前行。株州東北至瀏陽河之間，橫廣各約二十公里之地帶，都是標高二一三百公尺之起伏地形。敵軍之陣地西倚湘江，向東包括此起伏地形之一部在內。本營的前進目標，概在株州與五里墩間敵陣地之中央後方，選擇敵方之空隙處前進。午夜後二時左右，來自株州附近的斷續槍聲已清晰可聞，知已距敵陣不遠，當時我在先頭連之後尾行進，遂一面派遣斥堠隨時嚮導等循槍聲方向實施偵察，一面使全營在前方高地之稜線下方逐漸靠攏，先頭連則

在高地前方不遠處擔任警戒。一小時後派出之斥堠及嚮導返回報告，謂前方之另一線高地上有敵兵往來行動，槍聲就在該高地的前方不遠處。我判斷離敵人的陣地已經不遠，於是重新將方位地形作一番研究之後，令第一、二兩連佔領左前方的高地，第三連登右側方的山頭佔領陣地，第四連隨第三連之後在左側高地的緩線後方停止待命，我則隨第三連登上右側的山頭。第一連到達左前方的山頂已是拂曉時分，發現敵兵即分佈在該高地的前側，迅即與敵發生戰鬪，槍聲與喊聲大作。我心想這又是新牆河一幕的重演，但此次戰鬪是在拂曉展開，將無夜暗可以利用，天明後如敵發現我兵力薄弱，必拼命向我攻擊，其危險必然更大。於是我一面命第一、二兩連務必堅守現在的高地，一面命第四連迅速對正前方的一線高地發起攻擊，第三連則以火力掩護第四連之攻擊。敵軍經我突襲，倉惶應戰，此一帶高地很快為我全部攻佔，敵軍四處奔逃。當時天色猶未大明，四處槍聲繁密，只有就地據守以待情況的發展，對敗逃之敵亦未予以追擊。

拂曉以後，遠處之槍砲聲，逐漸減弱，敵人似已退却，我於是派遣傳令與團部連絡，自己再往各處巡視一番。人在緊張繁忙時，不覺疲勞，可是一旦輕鬆，即感困頓。我因連日行軍作戰，再加上昨晚通宵未曾合眼，此時頓覺疲倦萬分。適陣地後方的山腰鞍部有一茅舍，我便入內稍作休息，不料偶一閉目養神，竟告酣然入夢。及至衛兵入內將我推醒，報告有敵兵向我前來，我驚猛然驚起。我探首門外果然有數十敵兵，正向茅屋前來，相距已不到一百公尺。此時返回本營佔領之高地已不可能，開槍射擊又寡不敵衆，就越茅屋後窗向山腹一側之樹林脫逃。通過小樹林就是一片水田，無路可走必須徒步涉過，當我正在徒步之際，敵兵已繞過樹林在我的右後方出現；本想快步通過，可是水深沒腰，舉步困難，此時與敵相距不過一二百公尺，已為敵人發現。敵人數十枝槍一齊向我射擊，彈着紛紛落在我們的前後左右，泥濘與水花四濺，身面為之濺濕，危

險萬狀無法形容。內心在想敵彈還未擊中真是祖宗暗祐。將及田邊我奮力一躍跳上草坡，因用力過猛竟將一隻皮鞋脫落田中，此時敵仍繼續向我射擊，只有向前方另一樹林跑去。不期我的前進方向，正好就是敵人的退却路線，喘息未定，敵人又隨後跟來，及通過那片樹林之後，兩側另無隱蔽地形，只好繼續前走。此時為避免引起敵人注意只有索性將軍服和另一隻皮鞋丟棄，便衣跣足而行。後來我發現所走的方向有誤，轉向右方的一處山谷行走，始脫離了敵兵的視線。

在谷地的山坡上休息一陣之後，回想剛纔所遇的敵兵，必是拂曉為我擊潰的散兵，此時繞經我陣地後方，向長沙的方向撤退。如我仍從原來的道路回去，不免又有與敵散兵遭遇的可能。於是，我繼續沿山溝中行走，經過一兩小時的越野運動，纔找到條山徑。望望附近的地形，似曾相識，原來已到達昨夜行經的路上，估計與本營的位置可能已有十餘里以上的距離。時近中午，旋得土人告知，株州已為湘軍收復，我料想本營部隊必已前往株州與團部會合，遂經昨宵原來的小徑轉往通姚家壩大道，逕向株州歸隊。團長原以為我遭遇意外，及見我安全歸來，欣喜不已，但看我便衣草履，困頓狼狽之狀，又為之驚駭不置。我為其具述經過，皆謂我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事後想來，數十枝槍向我射擊，居然膚髮未傷，也真是如有神助。此次我軍攻克株州，是由本營突入敵陣心臟，陣腳搖動因而潰退。

湘軍收復株州，本已構成戰略之有利態勢，威脅到衡、寶方面敵軍的退路。無如我兵力不足，且配合不好。在湘軍攻佔株州之前，吳佩孚已於四月廿二日將其總部移駐永州（零陵），湘軍本身的後方已發生危殆。同時，向廣西邊界撤退。譚督軍亦於四月廿二日將其總部移駐永州（零陵），湘軍本身的後方已發生危殆。同時，湘軍攻下株州後未能繼續奪取長沙，而敵軍增援部隊到達後，立即開始反攻，株州旋又為敵軍所攻佔。在湘

江東岸的攻勢行動，就此破滅，並開始向湘南轉進。粵軍經攸縣、安仁向粵邊撤退，湘軍則經攸縣向郴州、永興轉進。因此時吳佩孚已攻佔衡陽，並以一部向耒陽前進中；我後方的門戶可說已完全洞開。

湘軍在退却途中於五月一日渡過漿水，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即在渡漿水時落水遇難。他是湘軍首舉護法義旗的人物，壯志未酬，即以身殉，良堪痛悼。

一一、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

湘軍退駐郴州、永興之後，北軍亦在安仁、耒陽、祁陽之線上停止前進，桂軍則已退回廣西。自民國七年五月中旬起，直至民國九年吳佩孚撤軍北返，整整兩年多的時間，湘軍與北軍之間，實際上已成為休戰狀態。其主要原因，一是北洋直皖軍閥之間，彼此爭權奪利，敵對之勢日益尖銳；對南政策，往往甲方主戰，乙方主和；廣州的軍政府內部，亦不協調，不能貫澈國父的主張；實力最大的陸榮廷且與北方暗通消息，陰主和議，因此亦不能集中力量揮師北伐。湘軍方面，因湖南居南北之衝，自民國五年以來，幾經劇戰，屢進屢退，亦元氣大傷，無力再戰。

不久，吳佩孚為欲打擊段系，秘密派遣代表與湘軍接洽，謀局部妥協，旋於六月十五日雙方代表於耒陽舉行協商，簽訂停戰協定。八月廿一日吳佩孚遂發通電請罷內爭，旋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覆電，同意促進和平主張。九月二十六日南北雙方將領譚浩明、吳佩孚等又聯名通電主和，並頒請頒發停戰令，至此南北和議之路似已完全鋪妥。於是，南北雙方代表於民國八年一月在上海開始和平談判。

揆吳佩孚之力倡和議，旨在打擊段祺瑞，並提高自己與直系的政治地位。因當時直系領袖馮國璋代總統

之任期即將屆滿，北平的偽國會即將選舉總統，段祺瑞在北洋政府中，數次出任國務總理，縱橫捭闔，炙手可熱；當時正任國務總理位居要津，如不加以打擊，當選已隱然在望。吳佩孚當時雖只是北洋軍第三師師長兼援粵軍副總司令，因曹锟和張懷芝一切要政均倚重於吳，實際上吳佩孚已成了直系的主要人物；在以實力為後盾的選舉中，他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反對，對段的政治身價，無疑可構成嚴重的打擊。同時吳佩孚是曹锟的代替者，這樣又無異於提高了曹锟的政治身價。至於岑春煊之贊同和議，則多係陸榮廷所主謀。因陸榮廷當時已受了北方政府之利用，暗中反對 國父的主張；當十二年五月改組軍政府時，將大元帥制改為七總裁制，由岑春煊擔任主席，即有抵制 國父促成南北和談之用意。

這次南北和議，如果雙方出於至誠一心為國，捐除私見，和衷共濟，未始非國家之福，無如誠如 國父所言『不求之於國家之根本，而求之於個人權利之關係』，以致自民國八年一月起以迄五月止，時斷時續之和議，終於破裂。和議雖告破裂，而因各自內部之傾軋日甚，雙方均未能有所作為。湘軍在此兩年之中，困處湘南一隅，專意於休養生息，亦未遑介入任何一方內部之政事。當時湖南全省大部份已在北軍控制下，湘軍所能控制的僅最南部幾個貧瘠的小縣；在稅收方面極為有限，軍隊的擴充與器械的購置固無力舉辦，即軍隊的糧餉也大成問題，好在軍民非常團結，老百姓踴躍輸將，官兵又深明大義枵腹從公，才算渡過難關。

湘軍退至湘南之後，除食米、油、鹽而外，薪餉一律停發；士兵每月僅發一元的零用金，軍官不分階級每月只發五元。軍糧是向地方預征田賦與借貸來維持，軍服多是補了再補，夏季防蚊，則以紗紙作帳，冬衣鞋襪則各自由家中寄來。同時各部隊就駐地附近，開墾荒地，種植雜糧蔬菜，養雞飼猪，以解決副食問題，如有剩餘則攜往市鎮易取其他必需物品。在這樣艱苦狀況之下，不獨人心士氣並不因之涣散，反益為團結無

間。士兵不但沒有叛逃，且甚多鄉間壯丁自動來營投效。因此各部隊單位不但沒有缺員，反多超出編制。整個防區之內，軍民之間，休戚與共，和睦相處，彼此往來，有如家人；事後回憶，猶令人感念不已。

民國九年三月，北方直系軍閥為爭逐中原，準備對皖系用兵，謀與湘省合作，利用湘省居南北之間，另立一個局面，以防止西南勢力之北進。其時南方軍政府方面，亦以粵桂失和，互相傾軋。湘軍當局見粵桂與援已不可恃，亦莫如促使直軍北返，使皖系之張敬堯軍陷於孤立，俾將來容易解決，如能與吳佩孚合作，將張敬堯部及時解決，使湖南早日脫離北軍的蹂躪，則更為得計。因是，吳佩孚與譚（延闇）趙（恆惕）兩公幾經信使往返，秘密協議，吳軍北撤，遺下防地由湘軍秘密接收，湘軍在吳軍的密秘掩護下，乘機推進，圍攻張敬堯部，將其解決。

五月十八日吳軍以南北和議為名開始撤退，湘軍第一師隨即進駐衡陽。並隨吳軍之後，以本團由洪羅廟直向湘鄉，遽斷皖軍田樹勳部之退路，另一路則經攸縣、醴陵襲擊張敬堯之背後。張敬堯得訊，立即退逃，離開長沙，田樹勳部則向湘西逃竄。六月十一日湘軍遂收復長沙，但無所斬獲。除岳陽外，其他各地亦未發一彈，相繼收復。六月下旬，繼續向北推進，以期收復岳陽將張敬堯殘部解決。我軍乃以主力由黃沙街新牆直向岳陽前進，本團則奉命經桃林進出岳陽東北武岳路上之五里牌車站，切斷張軍退路，予以截擊。本營又奉團長命令即日在新市渡過汨羅江後即向五里牌前進，經二晝夜之急行軍，沿桃林逕向五里牌，其他各營則由新市河上游渡過新牆河，經桃林向五里牌跟進。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左右本營到達五里牌車站，此時獲知岳州方面之張軍，正由岳州準備乘車北撤，先頭第一列火車已自岳州開出。我立即令各連沿車站兩側之堤基埋伏，機槍排佔領陣地，準備掃射敵軍列車，同時將車站附近之鐵軌緊急破壞。一切部署妥當後，遙見車

烟起處一列火車向北駛來，同時汽笛長鳴，全營官兵均屏息以待。有頃，轟隆一聲，列車出軌顛覆了，我步機槍隨即開始射擊。約一營以上之敵軍，僅少數得向江邊嘉魚方向逃命，其餘除死傷外，並為我俘獲一百餘人，彈藥、輜重、槍械幾全部為我所獲。

此時岳陽方面之敵軍與升火待發之後續列車，聞知五里牌出事，改由陸路沿大江南岸向嘉魚逃竄，張敬堯本人則由岳陽乘船北遁。同日，我軍主力收復岳陽，本團其餘各營，於當日黃昏以後到達五里牌，即在該地宿營。翌日拂曉，續向嘉魚追擊，到達嘉魚時則敵已乘夜渡江北去。至此湖南全境已完全收復，本團即撤回岳陽整理。本營自民國六年四月中編成以來，裝備原即不足，駐防湘南兩年，亦未獲得補充，此次本營虜獲既多，上級特准優先留用，此後本營之戰鬪力量遂特別充實。

南北之間，自民國六年首由傅良佐督湘引起的護法戰爭，最後至驅逐張敬堯止，暫告結束。湖南當局本傾向於廣州的護法政府，惟鑑於當時廣州的護法政府，由於內部彼此不斷傾軋，早已名存而實亡，尤懲於湖南居南北之衝，一有兵爭即首蒙其禍，故湘省政府乘全省底定，而南北兩方皆自顧不暇之際，於是年七月二十三日通電全國，宣佈自治，聘請專家多人，制定省憲，廢除督軍，改用民選省長，建成一個中立姿態的省份，避免捲入南北內戰漩渦。

其時，吳佩孚自五月底撤軍北上後，於七月中即與皖系發生衝突，造成直皖戰爭；陸榮廷與陳炯明亦於八月間終以兵戎相見。而此後數年內武力干政之風益熾，南北兩方內部大小戰鬪層出不窮。湖南雖宣稱自治，企圖閉關自守，但實際上，無論外部內部覲視者均大有人在，此蓋當時綱紀敗壞，始作俑者，既未加以應得之懲罰，野心份子遂羣起效尤也。

是年十月，湘西有王正雅為人仇殺；因該部原是土匪收編，其殘部遂由賀龍率領，四出滋擾，慈利、澧縣、石門、桑植等縣為之騷然。辰沅鎮守使蔡鉅猷無力清剿，省方遂命本團自岳陽開赴常德，會同剿辦。本營奉命先期出發，由岳陽乘船渡湖而西。全營以數十民船，分為五組，每組各以汽輪一艘拖帶。時正秋高氣爽，湖光似鏡，碧波萬頃，遠望君山，如龜島浮江，不禁興思古之幽情。入夜，明月懸空，水天一色，繁星漁火相映成趣。自離湘數載，戰役頻仍，難得良夜如斯，一清塵慮；遂與營中部屬效古人之扁舟一葉，放乎中流，臨風把酌，談笑無忌。翌日即抵常德。

湘西王正雅殘部股匪，經我團會合蔡鉅猷部分路圍剿；本團由石門慈利大庸桑植方面進剿。不久悉予剿平，僅少數殘餘份子向鄂西逃竄，本團乃集中常德附近整訓。此時適程潛舊部李仲麟陰謀驅譚擁程，在長沙發動兵變被誅之後，譚公不安於位，引退赴滬，由趙師長恆惕代理湘軍總司令。不久，湘軍又行整編，由本旅旅長宋鶴庚升任第一師師長，魯蘇平任第二師師長，賀耀祖任第一旅旅長，唐生智任第二旅旅長，張輝贊任第三旅旅長，劉炯為第四旅旅長，葉開鑫為獨立旅旅長。第二旅改編時，以劉興為第三團團長，我為第六團團長，何鍵為騎兵團團長，統歸第二旅指揮。本團整編後以張國威任第一營營長，熊震任第二營營長，張元達任第三營營長。此次改編除了汰除腐化分子，遴選能力堅強者外，主要幹部尤在選擇經驗豐富及學術優秀者。我以廣西人而能膺選團長，亦異數也；可能是因我平時為人忠實，練兵作戰不顧艱危使然。

譚公引退後，湖南創立自治，宣佈廢除督軍，民選省長，故除總司令一職歸趙公擔任外，省長一職則由省議會另舉林支宇擔任，實行軍民分治。此後湖南政局，粗告安定，民政、財政，亦逐步恢復正軌，並於民國十月初着手制定省憲。當時國內若干名流學者，目睹自鼎革以來，干戈擾攘不可終日，無非爭權奪利，擴

充地盤，視人民如芻狗，以是對湖南所倡自治之說，不乏推許響應之聲，爾後更有若干省份，欲相繼彷行，遂發展成為轟動一時的聯省自治運動。

民國十年七月，湖北黨人李書城、吳醒漢、蔣作賓、孔庚等，響應聯省自治，先後來湘商討湘鄂聯省自治問題，並要求湖南出兵援助湖北，驅逐督軍王占元。湘鄂兩省本有唇齒之誼，而湖南又倡導自治於前，故勢非援助不可。於是，推舉趙恆惕為湘鄂聯軍總司令，以駐湘鄂軍夏斗寅部為先鋒，並動員湘軍一、二兩師出兵援鄂。主力湘軍第一師及第二師之一部，於七月下旬向岳陽以東集中，準備沿武岳路向北攻擊，另一部則經通城、通山前進，合攻武昌。本旅奉令後，由常德出發，經洞庭湖，於榮家灣附近登陸。當時王占元所指揮孫傳芳的一個師，駐守趙李橋附近，築有堅固工事。我軍於七月二十九日開始攻擊，本旅配屬第二師的五、六兩團及砲兵一營，統歸我指揮，在鐵路以北擔任主攻。七月二十八日黃昏前，我親自對敵陣地詳加偵察，判斷敵主力即在趙李橋鐵道附近，其右翼有連亘之高地直達江岸，無法迂迴，遂決心從正面攻擊。入夜後以三個步兵團，展開於敵陣地前方，利用夜暗，依次秘密推進至敵陣地直前之山脚下，規定於翌日拂曉，以我砲兵之第二發砲聲為號，全線同時攀登敵據守之高地，一鼓作氣，突入敵陣與敵肉搏；預備隊緊隨第一線團之後跟進，準備支援第一線各部隊。部署完畢之後，我於拂曉前到達砲兵陣地，親自指示砲兵的射擊。天甫微明，我即令砲兵開始發射。不料，我砲兵射擊第一發之後，敵砲立即還擊，且有一發敵彈竟命中我第一砲的砲位，砲手及排長均為破片所傷。我當時本來也在第一砲的砲位近旁，恰巧在下達射擊口令時因後退兩步一不小心跌落壕溝內，故敵彈破片都從我頭上飛過，幸未受傷。我立即令第二砲發射；全線官兵，隨即向敵陣發起衝鋒，槍聲喊殺聲及砲聲在微曦中匯成一片，真是山鳴谷應。敵人在我猛烈的衝殺下，以死傷重

大，全線動搖，即行潰退；我各部隊立即猛烈追擊。敵潰退時，孫傳芳雖在陣地後方督導反攻，亦未能挽回頽勢，遂向蒲圻、咸寧方面撤退。此戰我軍雖獲全勝，本身亦損傷甚大，僅我所屬的第八團，即死傷達長三員、排長六員；士兵傷亡在十分之二以上，元氣大傷，幸預備人員充足，立即獲得補充。

趙季橋一戰獲勝後，我軍跟蹤追擊，於八月初，連克茶園鋪、蒲圻等地直達汀泗橋，與王占元軍對峙於汀泗橋兩岸。同時湘鄂聯軍之左翼亦連陷沔陽、嘉魚；右翼亦克崇寧、通山，武漢為之大震。於是北洋政府下令免王占元職，改任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率軍南下援鄂，大軍隨之源源南下。我部隊以趙季橋之役損傷過大，在汀泗橋之線受阻約近一週，未能一鼓作氣攻下武昌，湖北自治至此頓成泡影。

八月十二日吳佩孚抵武漢後，一面揚言和平解決，要求雙方停戰，一面部署軍隊準備作戰。八月十九日吳佩孚軍與我大戰於汀泗橋等處，另以海軍掩護陸戰隊進攻岳陽，我以後方空虛領感危殆，遂放棄對武昌之攻擊，轉向湘北轉進，而岳陽亦旋於八月廿七日為敵海軍陸戰隊所攻陷。吳佩孚佔據岳陽後，知湘軍無力再戰，且因其方有事於北方，不願以兵力陷於湖南，遂再度表示和平誠意，約請趙總司令恆惕赴岳陽會晤，商談雙方善後方案。趙總司令亦遂毅然赴岳與吳面商，於九月一日雙方達成停戰協議，據鄂之戰遂告結束。此後湘軍陸續撤返原防，鄂軍夏斗寅部仍退回湖南歸趙指揮。吳部北軍亦以一部暫駐岳陽，以防湘軍之再度北進。此部北軍直至民國十四年一月始行撤去。

一三、國父督師北伐與湖南護憲

早在民國九年夏天，湘軍與吳佩孚協議停戰，驅走張敬堯，並宣佈湖南自治之際，國父情奉春煊與陸

榮廷私自與北洋軍閥和議，命當時在閩南漳州的粵軍陳炯明回師廣州，驅逐岑、陸恢復軍政府。桂軍戰敗，岑春煊宣佈解除軍政府總裁職務，陸榮廷同時退回廣西。民國十年，廣州的非常國會議決，正式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四月並選舉 國父為非常大總統。不久，陸榮廷受北洋政府的指使，又駐兵犯粵，圖消滅廣州的民國政府，國父下令討伐，由陳炯明率師攻桂。因得桂軍師長劉震寰的內應，旋將陸榮廷擊潰，驅走安南。其時，亦正是湖南出兵援鄂，與吳佩孚軍鏖戰於汀泗橋失敗，在岳陽簽署停戰協定的時候。

國父底定廣西之後，主張乘勢出師北伐，於當年十一月，在桂林組織大本營，籌備北伐。無如當時陳炯明於擊敗陸榮廷之後，已勢甲西南，也和其他軍閥一樣，想以兩廣為地盤，做西南的霸主；因此不願跟隨國父率師北伐。當時湖南省政當局，於援鄂新敗之餘，原來即已倡言自治，這時更亟謀超出南北政爭之外，以求自保，對於 國父的北伐並非立心反對，但却不願北伐軍假道湖南，以免再度引致北軍入湘，重遭战火的蹂躪。

民國十一年元月一日，湖南當局公佈省憲，並由省議會推舉趙恆惕為省長；同年三月，湖南各人民團體一面致電吳佩孚，要求撤退駐岳陽的北軍，同時也呼籲阻止北伐軍入境，以確保湖南的中立。適在此時，陳炯明的叛迹益露，除了截留北伐軍的飼械外，並遣人於廣九車站刺殺了當時接濟北伐軍飼械最力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銳。國父不得不將已到達湘南邊境的北伐軍撤回廣東以資鎮憚。嗣後，國父於是年五月九日在韶關再度誓師北伐時，遂改道經由贛南進兵。

是年六月中旬，當北閩軍許崇智、朱培德、李烈鈞、黃大偉等部已經領有贛南，正向吉安猛攻時，陳炯明在粵遂公然叛變，砲轟廣州觀音山的總統府，使 國父幾及於難；於是北伐軍又奉命回師戡亂。

前次國父命北伐軍回師鎮憤時，陳炯明的主力還滯留在廣西的南寧，所以國父雖免去他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的職務，只讓他留任大本營的軍政部長，陳不過退居惠州堅辭不幹而已。可是此時他已暗地將駐桂粵軍調回廣州，廣州附近除少數海軍艦隻外，幾乎盡是叛軍的勢力。同時他又乘北伐軍後方空虛，迅速北進佔領了韶關、南雄、翁源等地，阻止北伐軍的歸路，廣東全境都入了叛軍的勢力範圍。國父僅賴幾條兵艦，缺乏岸上兵力的接應，自然無法敉平變亂，不久只好忍痛離粵赴滬。

在北伐軍向贛南進兵時，北洋政府也同時派蔡成勛為援贛軍總司令率兵南下，此時已經進入江西，因此同師戰亂的北伐軍，遂腹背受敵。七月中旬，北伐軍於韶關、翁源一帶與陳部叛軍大戰不利，而贛南又復入北軍之手。結果，許崇智和黃大偉兩部退往福建，李烈鈞和朱培德兩部則向湘粵邊境撤退。

當時，湖南當局深恐戰爭波及湖南，先已派我第八團，自常德開往湘南郴州、宜章一帶，沿湘粵邊境擔任防堵。我團到達郴州後即已派兵一營進駐砰石一營分駐汝城擔任守備。八月上旬李烈鈞部北伐軍退至宜章之白石渡。那時其軍隊已殘破不堪，人數不過二三百人，他本人亦病不能支，派人與我接洽，表示他願離職去滬，其部隊由湘軍收容改編。我當即請示旅長唐生智，經其轉報省方得省方同意將李部予以收容，他本人則由我派人護送至長沙，取道往滬。朱培德部則經由湘粵邊境退往廣西。本團爾後即在湘南地區繼續駐防。不久之後國父檄調在桂滇軍楊希閔，及桂軍劉震寰等入粵討賊，叛軍回保廣州，湘南得保安謐。在此期間我曾乘機請假一月赴香港省親。

民國十二年二月，滇桂軍將陳炯明逐出廣州之後，國父重返廣州，設大元帥府，準備繼續北伐。恰好那年六月，直系曹吳等軍閥復將黎元洪逼迫逃往天津，陰謀竊奪政權的野心更形積極，國父發表告全國軍

民書，號召共討曹锟、吳佩孚。可是當時陳逆炳明還據東江一帶，滇桂軍久攻不下，另一叛軍沈鴻英部也在西江及粵北一帶，尚未肅清，實在抽調不出軍隊從事北伐。

譚延闓先生曾數度擔任湖南督軍，趙省長原是他的部屬，因此 國父於是年七月任命譚公為北伐討賊軍總司令，要他回湖南領導湘軍北伐。那時湖南的內部，湘西的辰沅鎮守使蔡鉅猷，湘南的衡州鎮守使謝國光，寶慶鎮守使吳劍學，以至第一師師長宋鶴庚，第二師師長魯濬平等與譚先生都早有默契。至於趙省長方面因有長官部屬的關係，過去風雨同舟已非一日，在譚看來也無問題，縱使想保持自治招牌，在多數高級將領都擁譚的狀況下，也絕不致於堅決反對。因此，譚延闓先生於八月七日在衡陽竟宣佈就湖南北伐討賊軍總司令職，並召集湘軍將領開會于衡州。

那時我第八團早已自湖南返防常德，因蔡鉅猷在六月中旬通電反對趙恆惕，本旅已奉令對其加以征討，故未參與會議事。趙省長因立場不同，亦未前去參加，因之擁護趙的各旅長也沒有前去參加。這自然出乎譚延闓先生的意料之外，再加之旁人從中播弄，譚、趙之間便成水火。結果，八月十九日，趙省長在長沙通電護憲，終於引起了湖南之內爭，這就是所謂湖南的護憲之戰。

趙恆惕省長原是黨中的積極份子，是剛毅木訥型的人物，頗有幾分堅強脾氣，為人重然諾，做事很篤實，極為部下所信仰，自民國五年討袁之戰起，在湖南確有不少建樹，尤其當時湘軍的一、二兩師的軍官，可說是經他手裡訓練乳育起來，旅團長以下的幹部大多數都是擁戴他的。那時湖南的軍官，也隱然分為新舊兩派，高級的將領以舊派居多，擁譚就是這批人物，新派大部是保定軍校的學生，多數擔任旅、團、營、長，以往與譚沒有淵源，自然都是擁趙的。例如葉開鑫（獨立旅旅長）、賀耀祖（第一旅旅長）、唐生智（第二

旅旅長）、第二師旅長劉礪園長葉琪和袁植等人，都是擁戴趙省長的，他們也正是湘軍的實力派。

在擁譚的一派方面，第一師師長宋鶴庚因為所屬的一、二兩旅都擁趙，實際上失去了指揮能力，戰鬪一經開始，他便只有離職去滬。第二師內部擁譚擁趙的都有，意見頗不一致，因此魯滌平雖擁譚，最初主張仍是中立。兩方在戰鬪之初，譚軍方面的兵力，除遠在湘西的蔡鉅猷外，在湘南方面的兵力為謝國光的第三混成旅，吳劍學的第五混成旅，以及陳嘉祐的第七混成旅。在兵力上，表面看來，雙方似不相上下，在裝備和訓練上，這些混成旅要遠比第一、二兩師的部隊為差。

趙省長通電護憲之後，不數日雙方即在株州至衡山之間發生戰鬪。當時趙軍在長沙附近的只有葉、賀兩旅，我旅（唐生智旅）還正在湘西辰沅方面與蔡鉅猷部作戰。戰鬪初期譚趙兩方彼此互有勝負，八月二十四日趙軍在衡山附近將譚軍擊潰，八月卅日葉旅即攻佔衡陽，譚公延闔一度退走常寧。九月一日第二師的朱耀華團，輸誠於譚，乘長沙空虛，襲擊長沙，趙省長及長沙城幾臨危殆。葉賀兩旅祇得迅速回師，把朱耀華團趕走收復長沙。譚軍於此時，遂向長沙推進。九月中旬，趙省長以所部退守長沙，同時並令本旅折回長沙策應。當時本旅已將蔡鉅猷部驅逐至辰沅以西地區，奉令後即星夜向長沙開拔。

當趙軍退守長沙之際，魯滌平曾一度以魯仲連自居，電請雙方停戰言和，未為趙所接受，後遂率兵一團投譚而走。

十月初，譚軍已進至長沙附近，一部且佔領嶽麓山，隔河對長沙實施砲擊。趙則堅守長沙，制止敵之渡河。如此相持約有半月之久，待本旅集中長沙附近後，準備開始向譚軍發起反攻。

十月下旬，趙下令反攻，以第一旅由寧鄉向湘潭、湘鄉之線攻擊，以第二旅並配屬葉琪一團由易家灣沿

湘江東岸，經朱亭向衡山，衡陽行迂迴攻擊，守長沙之葉開鑫旅則從正面渡過湘江切斷湘潭衡山間的交通。我方之攻擊進展非常順利，譁軍士氣不振，幾乎一觸即潰，湘潭、湘鄉次第收復。我旅到達朱亭後，迅即渡河攻佔衡山，繼續向衡陽推進，十一月七日即收復衡陽，再分向郴州、永州追擊。至十一月中旬譁軍即經宜章退入粵境。此後本旅即駐防衡陽郴州一帶，並由旅長唐生智兼任湘南善後督辦。

湘西的蔡鉅猷部，在本旅向長沙調動之後，又糾集殘部向桃源、常德進擾，於是復派賀耀祖旅前往征討，於十二月底將其澈底解決，蔡隻身逃往貴州，另派陳渠珍為辰沅鎮守使。湖南為護憲引起的一場內戰，至此遂完全結束。

戰後湘軍整編，趙省長論功行賞，出力的幹部均各遞升一級。湘軍由原來的兩個師；擴編為四個師賀耀祖升任第一師師長，劉瑞升任第二師師長，葉開鑫升任第三師師長，本旅旅長唐生智則升任第四師師長，我也依次升為第四師第八旅的旅長。各師的編制是每師兩旅，每旅三團，惟本師轄有三旅，每旅仍是三團，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師幾乎多出一半。

這次湖南的內戰，雖然使國父的北伐遲延了將近三年，更遺憾的是國父未能及身目覩北伐的成功即與世長辭。不過就當時的情形看來，直系的氣勢正盛，廣東的陳炯明尚未敗滅，廣西也未統一，僅憑湘軍的力量以言北伐，恐尚難取勝。縱使連合張作霖、盧永祥以討曹、吳，北伐軍即使勝利，而我國民政府本身的力量，還不能控制全局，對於統一，仍是無補於事，不過是利用軍閥，打倒軍閥，結果軍閥局面仍然存在，何異於拒虎易狼。趙省長當時堅決護憲，阻止北伐，或是基於此種觀點，亦屬未定。

一四、唐生智與顧和尚

從民國十二年底至十五年初，湖南在經過了護憲戰爭之後，內部稍獲安定，趙恒惕省長乃展開省內的各項建設，主要在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軍事方面只是維持四個師的編組，沒有擴充部隊，武器裝備也沒有什麼增購。後來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趙省長被迫離湘，吳佩孚好幾次想利用他出來，仍然領導湘軍和北伐軍對抗，都一一為之謝絕，他恬澹的胸懷與凜然的風骨，確是值得令人欽敬的。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中，湘軍第四師一直駐防湘南一帶，師部和湘南善後督辦公署駐在衡陽，本旅則駐紮郴州至宜章一帶整訓。師長唐生智在此期間對於軍隊的訓練和充實真是不遺餘力，煞費苦心。本師在護憲戰爭結束之後，雖比其他三個師多出一個旅，但人員武器却並不充實。那時省政府的施政重心既不着重發展武力，力圖與民休養生息，所以也無意購發武器，必須自行設法。唐師長是個雄心勃勃的人，在此數年間只要軍費稍有節餘，或從其他方面可以籌得的款項，就用以添購武器。那時湖南四面都是敵人，從國外採購武器自然不易辦到，大部份是經過馬濟從吳佩孚手裏買的漢陽所造。訓練方面除了一般的學術科和演習教練，認真要求提高水準之外，他還拿出佛教的真傳，在軍隊中宣揚佛法作為精神教育，並令全體官兵一律入教。

在他的幕府中有一位介於師友之間的佛教居士，姓顧道號淨緣，一般知道的人都叫他顧和尚，我們軍隊的官兵則叫他顧老師。顧和尚是江蘇人，那時年紀大概在五十歲左右，能言善辯。他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大乘的真諦向官兵說法；實際上也無非是要人立下救人救世的宏願。所謂大慈大悲，也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精神，這和我國儒家「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傳統思想實際並無不同，只是他以宗教的說法

和儀式來灌輸此種思想，更利用一般人的信神敬佛的心理從中引導，遂自然令人起神秘之感，無形中官兵的思想和行為便受到它的約束與指使。

唐生智與顧和尚究竟有何淵源，我從來沒問過他，也沒聽他提起過。不過他對顧和尚真是以師禮相待，言聽計從；他自己率領高級幹部，定期在特別設置的佛堂，聽顧和尚說法之外，還披上袈裟跟着顧和尚從事修練，並參加各項法會，我當時總以為這是他的精神教育的手段。佛家的五戒：戒殺、戒淫、戒盜、戒謊、戒貪，以及天堂地獄罪孽輪迴之說，雖屬渺茫之事，若用之以維持軍紀，用佛法、念咒來提高臨陣的勇氣，也頗能發生效力。後來這位顧和尚是始終跟着唐生智，直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退之前，我從武漢華中剝總調任廣西綏署，路過湖南往訪唐生智時，這位顧和尚仍在湖南東安居住。後來又隨唐的眷屬逃難大陸到了香港。

唐生智既然篤信佛教，並在軍中宏揚佛法，所以全體官兵都一律接受五戒，只是不像一般的出家和尚在頭上用香火燒上戒疤而已。有人曾問顧和尚佛家戒律中的第一戒就是「戒殺」，軍隊打仗就是大殺特殺的，既然要戒殺何以還要打仗呢？他說，大乘佛法中戒殺的解釋不是不許殺，只是不許亂殺，凡是違背天理不合人道的都應格殺無論，「以殺止殺」正是佛祖大慈大悲救世的法門。又說西方的極樂國和地獄，也並不是地球上的西方真有這樣一個國家和地球下面有這樣一所牢獄，這只是代表苦與樂的一種境界。一個人如果六根清淨，修行圓滿，一切行為不違天理不昧良心，自必心安理得無憂無慮，不僅生前得到安樂，死後靈魂也是永恆的愉快，這就是進了極樂世界了。反之，如果無惡不作，蔑絕天理，做了罪孽深重的事，即使一時不至東窗事發，而問心有愧，良心永遠受着責罰，立於人羣之中總是自慚形穢，無限痛苦，生前如此，死後靈魂亦

是如此，這豈不如同進入地獄在黑暗中受煎熬一般。他這種說法和儒家的「止戈為武」，「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又有什麼不同呢？他又說大乘佛法以捨身救世為主，小乘佛法以修身自了為主，我也以為與儒家「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論一致。我當時對唸經、拜佛的事雖不作十分迷信，但也無意反對，我以為所有宗教的儀式，都只是藉莊嚴或神秘的氣氛，使人們在心理上有所敬懼，從而加強其在行為上的自我約束而已，而所有宗教都是引人向善的。我生平雖不十分迷信任何宗教，也不反對任何宗教，對宗教既沒有作深入的研究，故還不知一切法咒究竟有什麼玄妙，佛教的教義還有什麼更高深的奧義。回想那時跟着衆人披袈裟進出佛堂，總不免有隨緣之意，也許我缺少那份慧根吧！

到民國十五年北伐開始以後，唐生智指揮的部隊越來越多，同時戎馬倥偬，我們這個部隊對於奉持佛法一事漸漸的再無人提倡，便也漸漸淡忘了。至於究竟有什麼效果呢，我想當時對於軍紀倒不是完全沒有幫助。以後外面有人說唐生智打仗都要看日子的，是否確有其事，也只有唐生智和顧和尚兩人知道了。至於我們拜佛念經持咒則確有其事，但亦不過和基督教徒的祈禱或默禱差不多，在陣前像諸葛亮披髮仗劍借東風似的，是絕對沒有的事。說到借東風，我還想起一事，大致是民國十三年的夏天，湘南一帶久雨不晴，水災嚴重，顧和尚表演了一次開法會誦經念咒求晴，果然不到兩天天候放晴，可能有人因此相信他的佛法無邊，我心想久雨之後必然終有一天轉晴，這不過是巧合而已。這種求晴求雨的事，我國以往的地方官吏每於久旱久雨之時，是必定照例舉行以示愛民之意的，故亦不足為怪。

顧和尚平時吃素，有人說他背地吃鷄；這可能不是造謠。不僅此也，他可能還不止一位太太。據他說，

大乘佛法是密宗，飲食男女都不是絕對禁止的，何況他實際上不是和尚，只是居士；然而我對於顧和尚的看法，他不僅是非普通和尚，也許還是政治和尚呢！

唐生智字孟瀟，湖南東安縣人，和我是保定軍校一期的同學，以後從民國五年我在湘軍中擔任連長起，直到民國十五、六年北伐之後，我們始終同在一處工作，他當營長我是連長，他當團長我是營長，他當旅長、師長、軍長我即是團長、旅長、師長，最後他當總指揮，我接他的軍長，外人看來我與他必然有不平凡的關係和交情；實際上我和他除了同學和長官部屬的關係而外，並沒有特別的私交，說起來可能是彼此個性的關係。唐自負不凡，除了顧和尚而外，幾乎目無餘子。他領袖慾極強，生就一副不能屈居人下，剛愎自用的性格，也缺乏納言聽諫的雅量。他的長處是膽識過人，機智果斷，遇事大刀闊斧敢作敢為，待人接物不拘小節，對下能任專器使不干求苟細。他對於事務的處理，每有出人意料的獨特見解，甚至在遊戲場中也常有驚人的舉措，處處表現他的卓犖不凡，勝人一等。像他這種性格自然很難作他的上司，也不易做他的朋友，若作部下的話只要了解他的性情誠實相待他絕不有過份要求的。我的性格正和他相反，也許正因為我是愚拙誠厚不願多事的人，所以相處十餘年彼此沒有發生磨擦及不愉快的事；主要我能凡事忍讓順從，除了份內之事從不涉及其他。

唐生智生性高傲而手段凶狠，可能也是無出其右的。民國十五年北伐開始之前他聯粵倒趙，自然不免遭到他人的反對，及後他到長沙接替省長時，有部份人出來反對，遂將反對的張雄興、蕭培階、劉重威等人拘捕後加以殺害，並將第二師師長劉炯也扣押起來。張雄興原是趙省長的重要參謀，蕭培階在省政府擔任什麼職務已想不起來，劉重威則是第三師葉開鑫的旅長，這些人都是他保定知己的同學，平時也相處很密切的，

一朝因政治主張不同，竟採用絕情手法，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在趙省長被迫離湘之時，本來只有葉開鑫的湘軍第三師集結在岳陽附近準備反抗。其他賀耀祖與劉炯兩師，心中雖然可能不服，可是表面上還沒有舉兵相抗的意向，但由於唐將張、蕭、劉等人處決後，遂使他們發生疑懼，結果遂在湘西與葉開鑫相呼應，聯合反唐。葉開鑫更不惜接受吳佩孚的援助與任命反攻長沙，使湖南在北伐前夕又發生一次內戰。好在此時廣東的國民政府今總統蔣公已完成北伐準備，立命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及第四軍分由粵桂出師來援，始得收復長沙。從此唐亦正式加入革命陣營，將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所有第八軍全部將領一律參加中國國民黨成為黨軍，從事北伐。

一五、唐生智倒趙與北伐

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的北方政局，先是曹錕賄選竊位成功，直系軍閥掌握了北洋政局的中心，其他軍閥不免為之側目。於是在民國十三年秋先有蘇、浙的齊（燮元）盧（永祥）之戰，繼之又爆發了直奉的第二次戰爭。那時直系南自長江流域，北至長城以南都成了他的勢力範圍，吳佩孚滿以為只要消滅閻外的奉張便可達成武力統一全國的迷夢了。對於兩廣、湖南屆時揮師南下不難一鼓蕩平，其他雲、貴、四川更是傳檄可定。不料吳佩孚正親自督師討伐奉張之際，內部發生變化，馮玉祥和胡景翼兩軍自熱河前線回師，獲得孫岳與王承斌的內應襲佔了北京，將曹錕逮捕監禁，繼而攻佔天津斷了吳的後路，吳佩孚在張馮前後夾擊之下澈底失敗了。馮、胡、孫等人佔北京之後改稱國民軍，將這次倒吳因曹的行動稱為首都革命。

馮雖然控制了平津，由於馮在第二次直奉戰前還不過是一個師長，聲望自然不足，而所有國民軍的力量

亦自不能與其他各系軍閥的聯合勢力相抗。馮於是一面電請國父北上，一面與其他軍閥共同推舉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的臨時執政。

國父中山先生，在曹锟賄選竊位之後，曾發宣言並約張（作霖）盧（永祥）共討曹、吳，段祺瑞在皖直戰爭失敗之後也曾派遣代表晉見國父有輸誠贖罪之表示，而當時廣東內部反叛尚未肅清，革命武力正在建立，今見曹、吳既倒，北方已出現新的局面，遂毅然北上，冀能以其謀國之誠感召北方軍人，開誠佈公，從此放棄個人權利之爭，共謀國家之統一與建設。

國父於民國十四年初到達北京，當時全國報紙和輿論，無不企望從此結束民國以來十餘年的混戰局面。無如國父抵達北京之後肝病復發，在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尚未實現之前，竟與世長辭。這真是國家的最大不幸。

國父逝世之後，和平統一全國的一線生機隨告幻滅。那時奉系的勢力已伸展到長江下游，馮玉祥則控制北京支持段祺瑞政府發號司令；因此馮張之間乃不免發生衝突。最初奉系軍閥想追走馮玉祥的國民軍，以控制北京的政權。適在此時奉系內部郭松齡倒戈，馮玉祥當即予以呼應。後郭松齡失敗，而直系的吳佩孚又乘機再起，於是吳、張又聯合起來向馮進攻。民國十五年初，馮部國民軍被迫放棄平津向西北撤退，段祺瑞失去武力的支持，又為吳佩孚趕下臺來，至此北方政局實際上成了無政府狀態。

在廣州的國民政府方面，於國父逝世之後，今總統蔣公率領以黃埔軍校為核心的黨軍，兩次東征肅清了陳炯明盤踞粵東的殘餘份子，以及平定內部的劉（震寰）楊（希閭）之變，於十四年底廣東的革命根據地已告統一。廣西在民國十二年初，劉楊等的桂軍及滇軍奉命入粵討伐陳炯明之後，陸榮廷乘機復起，不久

沈鴻英在粵北叛變失敗亦竄回廣西，與陸榮廷發生地盤的爭奪戰。至民國十三年七月李宗仁、黃紹雄等在寧鳴起自稱定桂討賊軍總指揮，先聯合沈鴻英將陸榮廷驅逐下野，十四年春復將沈鴻英擊敗逐出廣西。李、黃旋接受國民政府的正式任命，分別擔任廣西善後督辦及省長，兩廣遂告統一。於是，今總統蔣公及桂省李白等於十五年春建議黨中央，乘機出師北伐。

在此時期，標榜中立自治的湖南，由於南北雙方俱自顧不暇，大體尚稱安定，其中不過也發生過兩次小戰事。一次是民國十四年一月，程潛勾引李國柱所率的湘粵邊區土匪約千餘人，入寇宜章、汝城一事。我這裏稱他為「入寇」，乃因李國柱部原係湘南邊境打家劫舍的股匪，後經湘政府痛剿，乃竄匿粵北而為程潛包庇收容，作成他的基本隊伍。程潛竟親率該幫匪類，進入湘邊，既非政治作用，更非北伐，純屬為掠劫地方財物，奪取地方武器，擾害人民的痛心行為。當時正是舊歷年關時候，我防軍不疑他有此卑鄙的行動，因此防範不免稍有疏懈，該幫匪類竟乘機襲攻宜章商民及駐軍，將地方財物掠一空，我駐防宜章之張元達團聞警倉卒應戰，吃虧甚大，及援軍到達，雖將該匪驅逐，並幾將程潛擒獲，而張元達團長，及若干連排長，皆在此役殉職或慘遭殺害。程本是湖南省元老，以往與譚延闔趙省長之間，為爭奪政權，雖不無積怨，但湘軍幹部仍都以長者視之，尤其當時湖南雖號稱自治中立，而一般軍人仍都心儀廣州革命政府，對此番「入寇」豈不令人遺憾！

另一次小的戰事是十四年四月川軍熊克武部與蔡鉅猷竄擾湘西。熊克武的部隊大槩是在十三年底在四川經過混戰之後敗退進入湘西，由於他當過四川的督軍，國父也給過他討賊川軍總司令的名義，同時在民十援鄂之役，川軍曾與湘軍相約從鄂西進攻宜昌，算來還是友軍。因此入湘之初湖南當局本以客軍相待。不料

後來竟與蔡鉅猷連合，對湘有不利的行動，趙省長乃下令派軍予以驅逐出境。

以湖南人的立場而論，確保中立自治以期不介入戰爭漩渦，原不可厚非。不過湖南乃四戰之地，如南北之爭終不可免，則必有一天要捲入在內，這是當時湘軍高級幹部一般的看法。至於當時湖南一般青年的心理，由於湖南密邇廣東，對於國父的革命主張自易受到感召，故自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來，革命思潮極為澎湃，感認為欲挽救中國，必先求全國的統一，而統一則非剷除一切軍閥不為功。及至國父北上逝世，和平統一的一線希望幻滅之後，在湖南青年學生中北伐的呼聲也愈為激烈。尤其民國十四年的「五卅」慘案發生之後，長沙的青年學生除請願示威之外並到處演講呼號，一般民眾也開始同情北伐主張，在心理上益為傾向廣州的革命政府。此種民心士氣的發展，對湖南當局的中立政策，有識之士遂難免訾議。

唐生智（孟瀟）本是雄心勃勃的人物，發現湖南的一般輿論，對趙省長的中立政策已有不同的見解，尤其廣西李（宗仁）黃（紹雄）的崛起無疑給他更大的鼓勵，於是開始對湖南的現狀無意中常有不滿的言論。大概是在十四年年底與十五年初的一段時間內，他偶然同我談起這些問題，也許是想了解我內心的趨向。當然我們對時局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我們當時的共同結論是：湖南在南北之間不可能長期中立，要挽救國家必須及早統一，南方的國民政府是符合國家利益與民心嚮往的政府，我們自然不能倒向北方。我當時並對他說目前北方直奉與馮（玉祥）成鼎立之勢，直奉兩系為報倒戈策反之仇，雖可能聯合起來對馮玉祥的國民軍進攻，但直奉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奉系的勢力伸展及於關內之後，直系的吳佩孚必無暇南顧，此時南方國民政府正宜向長江流域推進。最後說到湖南本身的問題，我的意見是趙省長倡導中立有年，要他自動取消省憲未必接受，如行兵諫則必引起軒然大波，似應從長考慮。在我當時的想法，最好是乘南方政府北伐時，我

們可邀請趙省長舉全省以從，如是不但我們可含情合理的達到目的，而且力量集中於大局更為有利。初不料他在南方政府出師北伐之前，演出兵諫的一幕。我想他可能是不願湖南落於譚、程之手而首先發難。最初，唐督辦曾經秘密派遣葉琪旅長及劉文島兩人分赴粵桂向國民政府接洽，敦請北伐頤效前報，同時又發動長沙的青年學生從事反憲運動。

那時廣州的國民政府已經統一兩廣正在醞釀北伐，對唐生智的輸誠無疑是喜出望外；因為由兩廣出師北伐，取道湖南，在交通上固較取道江西為便，在戰略形勢上也要優越得多，何況還可以加上湖南雄厚的人力及物力，所以唐的輸誠，可說是國民政府在北伐出師之前政治上的重大勝利。

唐與廣州政府連絡的情形，以及在長沙發起的反憲運動，自然很快傳到趙省長的耳中。據說趙雖然很不滿唐的行動，可是眼見湖南的中立局面必難長久維持，也不忍湖南再因內爭而受戰火的糜爛，不得不有自動辭職的打算。只是他周圍的一批人對唐有極大反感，因此大加反對，尤其是葉開泰等人反對特甚，不惜再來一次護憲戰爭。當時湘軍的四個師長中，第三師師長葉開泰要算是一員戰將，據趙最力頗得寵信；由於他的堅決對唐不滿，一度使趙猶豫難決。

三月初，唐督辦生智正式電請趙撤消省憲，暫息仔肩，同時將所屬各旅分三路向北推進；第二旅沿湘江兩岸指向長沙、湘陰之線，第九旅經攸縣指向醴陵，本旅則奉命向衡山附近集結。我湘軍第四師，在湖南原有常勝軍之譽，在湘南經兩年的整訓，人員武器也遠較其他三師為充實。同時我們知道其他各師的中下級幹部，也不乏同情北伐主張的，估計不致遭遇太大的抵抗。那時湖南的第一、二兩師還駐在湘西未動，在湘中一帶只有第三師，兵力與我第四師燒略相等。我們判斷趙如果決心護憲，很可能以葉開泰的第三師向衡陽攻

擊，唐命本旅向衡山附近集結，就是準備迎擊葉的攻擊。

本師之前進並未遭遇抵抗，三月十一日趙省長向省議會辭省長職，並舉唐為內務司長，代理省長職務，其本人亦同日離長經岳陽赴漢。葉開鑫則率部撤離長沙向岳陽附近集中，第一師之全部亦受葉之引誘隨同離去。時第四師先頭部隊已接近長沙，十三日唐遂趕赴長沙接管省政。當我軍各部確實控制長沙之後，國民政府方面隨即派遣大員白崇禧陳銘樞二人到湘答聘，並商定北伐以後一切計劃與人事安排。同時為了安定湘軍人心與士氣，唐旋於三月二十五日宣佈就湖南代理省長職。

唐到達長沙後獲知第二師師長劉炯態度不明，深怨該師受其影響，成為日後內部之隱憂，遂將劉炯予以扣留，所部葉唐兩旅，暫由唐直接指揮，同時本師原有各旅擴編為師，採取每師三團制之編制，以劉興為第四師師長，何健為第二師師長，周闡為教導師師長，我原來的第八旅，則擴編為第三師，我為第三師師長。又將葉開鑫第三師之旅長劉重威，及趙省長之高級參謀張雄興、蕭培堦等三人，均予捕殺，致令賀耀祖及第二師部隊亦隨同葉開鑫師一同參加反唐。

唐就代理省長職後，下令免葉開鑫職，並派第四師劉興部向岳州推進，於三月底攻佔岳州，葉部退往湖北邊界。其時葉開鑫已向吳佩孚接洽投靠，吳佩孚任葉開鑫為討賊湘軍總司令，並準備派遣部隊助葉反攻長沙。吳佩孚又委彭壽年為湘鄂邊防督辦，加派宋大沛旅歸葉指揮，聯合向岳陽進攻。當時我軍第四師劉興部駐守岳陽，衆寡不敵，同時又聞湘西方面之賀耀祖及劉炯殘部為葉開鑫誘使合攻長沙，如是劉興所部第四師於四月十九日放棄岳陽向長沙撤退。

四月底葉部即自平江向長沙接近，五月初湘西賀耀祖與劉炯殘部組成護湘軍與葉開鑫部相呼應。江西方

西北軍唐福山部，亦對長沙形成側面威脅。此時廣州方面之北伐軍，因種種關係，未能及時出動，唐省長為保持實力避免決戰，並奉廣州方面之指示，暫時放棄長沙，逐次向湘潭、湘鄉、衡山、攸縣、寶慶一帶撤退。及我軍退至該線後，即以本軍第二、四兩師，在花石、漣水、永豐之線佔領守勢陣地，擔任潭寶大路方面之防守，由我指揮第三師及周灝之教導師除以一部在攸縣方面擔任警戒，另派一團掩護鄂軍夏斗寅部，由株州渡河通過大路鋪來歸，嗣後防守衡山作為前進陣地外，主力包括周灝師，沿瀟州河南岸至南岳東麓之線，佔領陣地，固守待援。

當時敵方，左翼為北軍唐福山部約一旅，由醴陵向攸縣推進。中央為葉開鑫部及北軍余蔭森旅，共約五至六個團之兵力，沿株州衡山方面南進。右翼則為賀劉兩師之湘軍，除中央一路外，兩翼部隊之行動，均欠積極。本師在攸縣之一個團，於黃土嶺與敵接觸之後，即退至攸縣固守，始終未為敵所攻佔，左翼方面之第二、四兩師，亦始終與敵沿漣水隔岸對峙，並未發生劇烈戰鬪。

中央部份，敵於五月中旬接近衡山，與我衡山前進守備部隊經一日之戰鬪後，我守備部隊退至瀟州河南岸改任總預備隊，敵繼續向我瀟州河之主陣地猛烈進攻，頗有一鼓作氣攻佔衡陽之勢。五月中旬，敵數度強襲或偷渡瀟州河均為我堅強抵抗予以擊退。敵渡河進犯不逞之後，一度向我第三師之左翼與教導師之線猛攻，進至金蘭灣、紅羅廟一帶，我軍激烈抵抗，經數度拉鋸戰，卒將敵之攻擊阻止。此後直至六月下旬，敵我隔瀟州河對峙。

六月底，敵軍獲得增援，再向我瀟州河正面攻擊。當時我兵力既感薄弱，且彈藥亦將消耗殆盡；最後一次，敵軍一部已突入我瀟州河南岸之陣地，敵唐福山部亦向我固守攸縣之團猛攻，情勢至為險惡。幸此時今

總統蔣公即令第七軍軍長李宗仁，迅速以第七軍增援。李軍長令其獨立營王贊斌部提前出發，並押運彈藥趕到衡州，該營到達後，復由唐省長指示受我指揮，參加前線作戰。該營遂於翌日加入荳州河戰線反攻，始將敵之攻勢粉碎。我軍遂乘勢向敵猛烈追擊並克復衡山。同時唐省長亦於六月初在衡陽正式奉派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所屬原有各師亦同時改為國民革命軍之番號；如是北伐之序幕即於此揭開。

一六、北伐序曲

當我在荳州河南岸竭力防止葉開鑫所率領之湘軍，及吳佩孚所派遣之北軍向我方進攻，正感力盡彈絕之際，幸得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之獨立營營長王贊斌奉命率領步兵一營押解彈藥前來；唐總指揮隨令該營歸我指揮。當時我荳州河南岸之防禦陣地，已有一部為敵佔領，我乘夜調整部署補充彈藥，並將王營亦使用於第一線，隨同我原來的守軍於翌日拂曉實施反攻。由於該營之到達我全線官兵獲知桂軍大部隊將陸續前來增援，因此士氣亦為之大振。

拂曉我軍發起猛烈衝鋒，突入敵陣。敵驟見我軍中有服裝及口音皆與湘軍不同之部隊，且勇猛異常，知桂軍業已到達，大為驚恐，立即向荳州河北岸潰退，我遂乘機全線出擊。荳州河北岸敵軍受其潰軍之影響，並見我全線紛紛渡河勇猛前進，遂亦不支向後撤退。我軍乃得一鼓收復衡山，殘敵則向衡山以北退去。北伐就這樣出乎意外的揭開了勝利的序幕。此戰王營經長途跋涉之後，立即加入作戰，且表現特別奮勇，至為可佩。

我收復衡山之當天下午，第七軍之另一個團亦奉令到達衡山歸我指揮。該團團長尹承綱是我陸軍中小學

時代的同學，我倆見面時，雖然久別重逢彼此都掩不住內心的喜悅，但我當時最感關切的是派在攸縣方面獨立作戰的一個團，因此我們無暇細敘契闊，只匆匆數語就請他向攸縣前進增援該方面的作戰。

那時軍隊還沒有無線電，有線電也很少，指揮連絡主要靠傳令，情報的傳遞非常緩慢。本部收復衡山之後，由於兩翼友軍的情況不明，只好在衡山附近停止，不敢對敵作深遠的追擊；於是遂在護湘關東西之線重新佔領陣地。當面之敵狼狽潰退後，經一晝夜之行軍始在茶園鋪附近集結整理。

當本師收復衡山時，第七軍先頭部隊之鍾祖培、楊騰輝兩旅，不久亦到達我左翼第二、四兩師方面加入戰鬪，敵遂自金蘭寺向漁水北岸退却。該方面之敵軍中原有湘軍第二師之葉琪旅因早經參與唐附和廣州國民政府之計劃，且曾借返桂省親之便偕劉文島潛赴廣州通款，此時見國民革命軍援軍已經到達，北伐大業已經開始，遂亦乘機率隊在戰線上起義來歸。我右翼方面第四軍之先頭部隊此時亦已到達攸縣附近，旋將碌田一帶之敵擊潰收復攸縣，繼向北推進至黃土嶺之線，整個戰線遂恢復五月中旬敵向我攻擊以前之狀態。由於七、四兩軍之後續部隊亦陸續到達，唐總指揮乃於七月五日下達攻擊命令，全線開始轉取攻勢，向長沙推進。

本師奉命後，於七月六日開始前進，七月七日上午到達茶園鋪，敵軍稍事接觸即向易泗河、湘潭方面退却，我軍跟蹤追擊，當日即到達易泗河、湘潭一帶。由於本師之迅速前進，當面之敵未能在湘潭附近渡過湘江東岸，逕沿湘江西岸向長沙附近退却。八日上午本師由湘潭附近開始渡河向長沙追擊。左翼方面原期由湘鄉、潭水行左翼包圍，殲滅漁水北岸之敵，不意敵未加抵抗即迅速向湘西寧鄉、益陽方向退却，我軍亦即予以追擊，右翼方面亦將黃土嶺之敵擊破後向醴陵追擊前進中。

九日我第三師全部已渡過湘江經易家灣向長沙追擊，沿途未經戰鬪，十日晨本師先頭部隊克復長沙。此

際沿湘江西岸退却之敵軍，葉開鑫部之第三師以及第二師之一部，正自岳麓山渡河，企圖竄入長沙，適與我追擊部隊相遇，立即予以包圍截擊。其已渡河者，全部為我師繳械，計俘獲敵旅長劉雪軒一員，中下級軍官三十餘員，士兵兩千餘人。其餘尚未渡河者則向靖港方面逃竄。本師當日全部到達長沙，周嫺之教導師則經如意亭向寧鄉追擊殘敵。翌日我左翼部隊亦到達寧鄉岳麓山之線，右翼亦已收復醴陵。

此役敵軍大部為我軍擊潰，殘敵除賀耀祖之原湘軍第一師，以及第二師之一部向湘西方面退却，爾後向國民革命軍投誠，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外，葉開鑫所部湘軍及北軍之殘部由靖港附近渡河向汨羅江以北逃竄，適吳佩孚續遣董政國等率部未援，爾後遂在汨羅江以北防守。敵左翼唐福山之殘部則仍竄返江西之萍鄉一帶。

本師收復長沙之當日，有少數士兵因前此向湘南撤退時家眷未及逃出，後為敵方第三師士兵蹂躪，此番佔領長沙敵方官兵眷屬亦未及撤走，遂乘機加以報復。余當時雖派遣巡查四出制止，未見生效，為鎮憚計乃向長沙監獄提出待決死囚數名，換穿軍裝，押赴通衢，佈告罪狀正法，如是違紀暴行乃得制止。此舉雖心感疚憾，而迫於當時情勢，不得不然。

我軍收復長沙後，因北伐軍後續部隊猶未到達，遂奉命暫停前進以掩護大軍之集中，直至八月上旬我國民革命軍第四、七、八各軍概在汨羅河以南至長沙、瀏陽、醴陵一帶停止。其時，今總統蔣公於七月九日正式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通電北伐，並在廣州舉行誓師典禮。當時國民革命軍之戰鬪序列，除已在湘之四、七、八等軍外，尚有何應欽之第一軍、譚延闔之第二軍、朱培德之第三軍、李福林之第五軍、程潛之第六軍。以上各軍，除李福林之第五軍大部守備後方，第一軍之一部在閩粵邊境，嗣後取道福建、浙江向北進

軍外，其餘各軍、師正紛紛在道向湖南行戰略集中。此外，於七月中旬復任命彭漢章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集中湘西之常德、澧縣一帶，準備向鄂西進攻。

唐總指揮於七月十七日將總部移駐長沙後，通電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取消省議會。嗣即成立湖南省政府，由唐任主席，同時成立省黨部，本軍各級幹部均宣誓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溯余自辛亥革命在武昌參加首義以來，為時已十五載，討袁護國，護法無役而非親冒矢石與敵搏鬪，其間千辛萬苦，真是一言難盡，幸都能化險為夷，從未發生意外，能不令人額首，感謝上帝的仁慈。

一七、先鋒變成後衛

當我北伐軍收復長沙前後，北方的直奉軍仍正在南口居庸關一帶對馮玉祥的國民軍作最後的總攻。吳佩孚因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由於馮玉祥的倒戈遭致慘敗，對馮真是恨之入骨。所以後來與奉系聯合起來非把馮軍消滅不可。據說馮軍在撤出北京之前，馮部將領鹿鍾麟，當時任北京的警備總司令，曾函意向吳求和，吳在覆電中竟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寢汝之皮」等詞句，其內心如何不問可知了。同時吳佩孚認為廣州國民政府的力量，對付盤踞東江一隅的陳炯明尚窮數年之之力始克削平，則其實力實不足慮，滿以為在消滅馮軍之後再揮師南下，猶未為晚。因此雖然曾遣董政國、宋大霈等率軍入湘援助葉開鑫，但主力則仍然集中在江北對馮作戰。直至八月中旬直奉聯軍攻下南口、張垣之後，吳佩孚始倉卒督師南下。在此之前，吳佩孚對退守汨羅江以北之敵軍，是命令他們堅守防地，非有命令不許進攻亦不許擅退。

為等待後續部隊向湖南集中，我革命軍四、七、八各軍在汨羅江以南也停頓達一月之久，直至八月中旬

以後始發起攻擊。那時粵漢路韶關以北還未通車，徒步行軍自然十分緩慢。八月十二日清晨總司令 蔣公抵達長沙，當晚在長沙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作戰計劃及總攻開始日期。其時整個部隊仍未完成集中，可是多數將領的意見都認為應早攻擊，乘直奉軍正在南口對馮作戰不能轉用於南方之前，一鼓作氣攻下武漢，一則可以擴大聲勢與號召；武漢無論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都十分重要，奪取之後足寒敵膽。再則北方的奉直兩軍以壓卵之勢進攻馮軍，馮軍以察綏一隅之地苦撐已近半年，勢難持久，若馮軍一旦瓦解，奉直移兵南下，屆時國民革命軍縱能取勝，亦必事倍功半，而當時在湘北鄂南之敵軍多屬敗創之師，此大好機會萬不可錯過。於是決定趁日進軍，先取武漢然後再向長江下游發展，預期先掌握長江以南再揮師北進。

當時的作戰部署概作如左的區分：

(一) 中央軍即以第八軍以及第七、第四軍編成，由唐生智兼任總指揮官。第一步肅清洞羅河以北敵軍，乘勢進出鄂南，將敵軍殲滅於黃蓋湖以南地區，繼續奪取武漢。

(二) 左翼軍由第九、第十兩軍及第八軍周闢之教導師編成，由袁祖銘兼任指揮官，向荆沙進攻，策應武漢方面之作戰，並準備進出襄樊。

(三) 右翼軍由陸續到達之第二、第三軍，及第五軍之一部，獨立第一師編成，由朱培德任指揮官，先監視江西方面之敵，掩護大軍之右側背，爾後相機向江西前進攻佔南昌。

(四) 第一、第六軍為總預備隊，另有砲兵及航空隊擔任一般之支援作戰。

中央軍之攻勢部署分為左右兩縱隊；左縱隊為我第八軍，概沿長武路兩側地區向北攻擊，先攻佔岳陽、雲溪之線，再向鄂南進出。右縱隊為第七軍，概與左縱隊平行向北攻擊，先攻佔羊樓司東西之線，繼續向鄂

南攻擊。第四軍在攻擊初期梯次於第七軍之後前進，爾後相機經通城向咸寧方面推進，以策應正面之作戰。預期殲滅當面之敵軍於鄂南地區，爾後以主力沿岳武路北攻武昌，以一部於武昌上游之嘉魚附近渡過長江北岸，相機攻佔漢陽、漢口。

此一作戰計劃，顯然是以原來在湘的第四、七、八軍為中心。由於攻擊開始的時機已嫌稍晚，以後卒與吳佩孚南下之師在汀泗橋與賀勝橋之間相遇發生劇烈戰鬪。如果這三個軍在收復長沙之後，不在湖南作長達一月以上的停留，當機立斷繼續北進攻取武漢，相信在吳佩孚軍南下之前即可攻下武漢，而且可能比後來容易得多。

攻擊發起的日期最初定在八月十八日，後因第六軍須在十六日始能到達瀏陽接替第四軍的防務，因此又改為十九日開始攻擊。那時在南口、張垣的馮軍，已在八月十五日戰敗向綏遠方面退却；直軍則已首途南下了。在攻擊開始前我中央軍當面之敵軍，大概是宋大霖的三個旅防守汨羅江北岸的陣地，陸濤部守平江，董政國部則在湘鄂邊境之羊樓洞、五里牌以及楊林、桃林一帶，在岳陽則另有婁雲鶴部防守，陳嘉謨則坐鎮武昌。左翼軍當面，有王都慶部駐守公安、澧縣一帶，駐在石門附近的湘軍賀耀祖師及第二師的一部，此時則正向國民革命軍接洽投誠中。右翼軍當面之唐福山與謝文炳部分駐萍鄉、萬載，另有陳錦堂一個騎兵旅駐銅鼓、修水。

中央軍方面之攻擊，為期在敵軍主力到達之前擊破當面之敵軍，奪取武漢，必須使攻擊儘早開始，故在十七日我第八軍正面即開始佯攻牽制當面之敵，使第七軍得以順利開始渡河。本軍則預期於第七軍渡河成功後；按第三師、第四師、及第二師的順序渡河，鄂軍第一師，則於本軍渡河後到達栗木橋待命。

先時本師為軍之右翼，奉令於新市與長樂街間佔領渡河攻擊準備位置，本師之右即為右縱隊之第七軍。我想起民國九年驅逐張敬堯之役，那時唐生智當團長，我當營長就是從新市附近渡河。現在本師的前進地區，也概略與當時本團的前進地區相似。因此以往向五里牌挺進截擊張軍北退火車的一幕，立刻湧現在我的記憶中，我想此次作戰可能是要歷史重演了。於是我在奉命之後，部隊開始行動之前，向預期爾後的前進路上及目標地區派出若干便衣斥堠偵察敵情，俾爾後在前進間得隨時了解敵軍的情況，並囑各團隨帶爆破器材。後來本師在渡河之後，果然又奉命經關王廟、楊林、桃林，向五里牌挺進，包圍截擊自岳州後退之敵軍。

八月十九日，第七軍自浯口附近渡河成功，第四軍亦渡河向平江攻擊。該兩軍渡河後曾與敵發生劇戰，將余蔭森、陸灝、董政國等部北軍擊潰。二十日拂曉本師亦自新市與長樂街之間發起渡河。本師渡河成功後，第四、二兩師亦相繼渡過汨羅河向北岸敵陣地之左翼席捲，於是敵全線不支向後潰退。當日上午本師遂奉命追擊潰退之敵向五里牌挺進，由於本師之渡河成功，切斷了第七軍當面敵軍之退路，當日第七軍在浯口附近擊斃敵軍之旅長陸灝並將其殘部完全繳械。本師亦在關王廟附近截擊敵軍一股約千餘人，其一部二百餘人為我所俘並繳獲槍械數百枝，餘敵向北奪路竄去，當夜本師到達楊林。

翌日，本師繼續向五里牌急進。當到達桃林附近，敵軍董政國部二千餘人在桃林北方沿河防守，我先頭部隊之第八團當即展開攻擊，激戰至午後五時，敵不支向五里牌方向逃竄，該團跟蹤向五里牌方向追擊。黃昏前後余隨師主力部隊到達桃林，接獲五里牌方面預遣便衣偵察之報告，謂據五里牌車站人員密報，敵軍宋大蓀部已退至岳陽，岳陽車站現調集有甚多車輛待命，敵似以火車運輸向北撤退模樣。我當令先頭部隊第八團，務乘夜向五里牌急進，破壞鐵路截擊敵軍，其餘部隊亦乘夜向五里牌前進。二十二日上午八時左右，先

頭部隊到達五里牌車站。當部署尚未完畢，路軌亦未及破壞，已有火車一列自岳陽方向疾駛而來，幸該團所配屬之火砲兩門已在車站附近進入陣地，遂立即下令直接向火車射擊。也許由於砲手慌張，未能命中車頭，僅將列車後半部之車輛擊毀脫落，前半部車輛竟得衝過車站兔脫而去。

當我步砲兵正向第一列車射擊之際，敵之第二列車亦接踵而來，因聞五里牌車站槍砲聲大作，該列車遂在距車站二千公尺左右停止。瞬見敵軍官兵紛紛下車向江岸方向逃竄。我部隊即向其包圍攻擊。敵除一部脫逃外，傷亡及被俘官兵士兵達千餘人，彈藥輜重全部為我截獲。後據俘虜供稱，第二列車為宋大霜之司令部及直屬部隊以及軍官團等，宋大霜本人亦在該列車中。惜我部隊當時未能跟蹤，對少數逃竄之敵加以積極追擊，竟使其得以逃脫。

當日我第八軍之二、四兩師佔領岳陽，第七軍先頭亦到達羊樓司附近，第四軍亦攻佔通城。此役敵在汨羅河北岸之守軍，雖未全部就殲，但概已損失過半，僅殘破零星之部隊退至趙李橋、蒲圻一帶，經收容後退守汀泗橋。

本師於到達五里牌後之當日下午，以所屬之十五團為先遣追擊部隊向羊樓司前進，其餘部隊除留一個團在桃林、五里牌一帶清掃敵軍潰兵外，主力亦於二十三晨向羊樓司趙李橋之線推進。在前進途中曾接獲唐總指揮之電令，着本師迅速向羊樓司趙李橋之敵予以殲滅。當本師到達後，該處之敵已向蒲圻、汀泗橋方面退去，於是繼續向蒲圻前進。是日晚，本師到達蒲圻，先遣之第十五團則推進至中伙鋪附近。同日，第七軍亦到達蒲圻附近，第四軍則自通城向崇陽、通山前進。

當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進入鄂南之際，亦正是吳佩孚沿平漢線率軍南下增援之時。孫傳芳亦派遣大軍向

贛西北之德安、銅鼓等地推進。此時在援軍到達前乘勢奪取武漢之希望遂告破滅。嗣後中央軍方面之主力乃在汀泗橋與賀勝橋之間與敵軍發生劇烈的爭奪戰。所幸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士氣如虹，孫傳芳軍到達贛邊之後未對我軍側背採取積極的攻勢行動，同時，蔣總司令亦親來前線督師，終將吳佩孚軍擊潰。

八月二十三日晚，我中央軍高級將領在羊樓司開會，商討進攻計劃，決定第四軍陳銘樞與張發奎兩師由通山、崇陽向汀泗橋之側面攻擊，第七軍及本師向汀泗橋之正面攻擊，第八軍之主力則自嘉魚附近渡江向漢陽進攻。可惜這一計劃未能立即付諸實施；兩天之後，敵軍陸續增加，汀泗橋一度得而復失，第四軍遂亦加入正面之戰鬥。

二十四日第八軍以何健的第二師及夏斗寅的鄂軍第一師，編成江左先遣軍，由何健擔任指揮，於岳陽至臨湘一帶征集小火輪十餘艘，渡河成功，並向漢陽前進。廿五日本師正在蒲圻候命向汀泗橋發起攻擊之際，唐總指揮奉統帥部之命，着第八軍增派一師渡江，加強江左攻漢陽之兵力。時劉興的第四師尚未到達，乃命本師即開嘉魚渡河。奉命後，本師以在蒲圻前方對敵警戒之第十五團，暫留原地以待第七軍前來接替，其餘部隊即日向嘉魚移動。爾後第四軍參加汀泗橋正面之戰鬥後，該團乃改配第四軍指揮參加對汀泗橋之攻擊。

本師於二十六日到達嘉魚，適江水大漲，上游下游之堤防均告潰決，洪水泛濫，一片汪洋，且所有船隻亦早被數日前宋大霖殘部向江北逃竄時擄去，只有望洋興歎。我將本師渡河困難情形電告總部並請示爾後之行動，旋奉令改由嘉魚沿長江南岸向金口、沌口前進，以掩護中央軍之左翼。無如由嘉魚至金口之蕭家堤亦同樣潰決無法通行，只好在原地待命並再度向總部請示。直至廿九日，此時第四軍已經過幾番劇戰之後攻克汀泗橋，敵軍退守賀勝橋之線。此時唐總指揮親率第四師到達咸寧之後，已改派第四師向沌口附近渡河，加

強江左先遣隊的兵力。當日下午，我接獲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健生）之電話，着本師迅速開往賀勝橋方面擔任總預備隊。當我師到達賀勝橋時，該處亦已為七、四兩軍所攻克。此役敵軍一再增援反撲，敵我雙方均死傷累累，吳佩孚親自臨陣督師，在賀勝橋一戰，為阻止所部後退且曾手刃團長八、九人之多，誠革命軍戰史上最慘烈的一役，第七、四兩軍爾後被人稱為鐵軍者即以此役而得名。本師原是率先到達蒲圻附近，攻擊前夕奉調北渡，竟不能親自參加此偉大之一役，何其不幸！尤其在嘉魚因洪水阻渡幾近三天，成為會戰中的游兵，令人倍感懊然！後來我指揮大部隊作戰時，我常常以此役所得的經驗告誡我的參謀人員，作戰前當草擬計劃時，必須確實體察天候地形對部隊行動之影響能否實行，不可隨便拿着紅藍鉛筆在圖上隨意決定，尤其大部隊的渡河必須事先準備渡河工具。此次本師奉命從嘉魚附近渡江，上級參謀人員可能以為兩天之前何、夏兩師既已順利北渡，本師當亦毫無問題，殊不知江水暴漲，前此可通行無阻者，現已汪洋一片，初未考慮天候對地形產生之影響；渡河工具是對渡河作戰部隊最迫切的後勤支援，可能亦未計及。

嘉魚附近為三國時代曹操與孫權會獵的古戰場，有名的赤壁之戰的赤壁即在其境內；大江中流，兩岸遍佈湖沼，無怪當年雙方鏖戰都用水師。如果當時有人想到這一點，也許我便不致在嘉魚等三天之久，由前鋒變成了後衛。

一八、武漢二鎮的光復

八月二十九日，我奉到白健生的電話，命本師開赴賀勝橋擔任總預備隊，我立即率部就道。那時吳佩孚軍正由汀泗橋進至賀勝橋繼續防守，我想也許還可能來得及參與戰鬪。我知道當時原來擔任總預備隊的第一

師及第六軍，由於第一線部隊之進展迅速，他們距第一線還有數日行程；第一師還在岳陽，第六軍則尚在乎江附近；七、四兩軍已經過數日的劇戰，本師到達後，可能要算是新銳之師。

嘉魚與賀勝橋之間隔著黃蓋湖，直距離不過四十公里，可是必須仍繞道蒲圻行進，這樣幾乎要增加一倍的行程。本師經過一晝夜的急行軍於三十日下午到達，時敵人已向武昌潰退，乃在賀勝橋待命。翌日晨到紙坊謁見總司令蔣公，荷承接見並獎慰有加，無任感奮。這是我與今總統蔣公第一次見面，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印象却極為深刻；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似猶歷歷在目。

吳佩孚軍退據武漢之後，即以陳嘉謨及劉玉春部約三萬人死守武昌。我第四、第七兩軍隨對武昌進行攻城戰。第八軍則對漢陽、漢口攻擊。本師旋奉令歸建，隨第四師之後於沌口渡河，參加漢陽方面之作戰。此際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即着手以原來之右翼軍，及總預備隊從事對江西方面之作戰。

當時武漢三鎮之敵軍，除陳嘉謨、劉玉春死守武昌外，在漢口有高凌相之十四及十五混成旅擔任漢夏守備軍，在漢陽有劉佐龍之鄂軍第二師及閻日仁之豫軍第二師擔任襄河守備軍。此外葉開泰師及婁雲鵬旅編為上游守備軍，馬濟部及任應岐之第十師編為下游守備軍，河南張占鰲之十三混成旅等部隊；吳佩孚之大本營則駐於漢口之查家墩。

九月三日，我第八軍之第二師及夏斗寅之鄂軍第一師開始於蔡甸方面對漢陽攻擊，不久劉興之第四師亦加入戰鬪，頗有進展。防守漢陽之劉佐龍因與革命軍早有秘密接洽，於九月六日派員與我軍通知。時本師亦已到達漢陽，即由本師在劉部之內應下，擗陣進入漢陽佔領龜山。劉隨即宣佈獨立，參加國民革命陣營，漢陽乃全部入於我軍之手；隨即渡漢水向漢口攻擊。吳佩孚見大勢已去無法挽救，遂登火車駛離漢口向孝感、

花園北逃。我軍於七日佔領漢口，並跟蹤向北追擊。

吳佩孚之專車駛至黃陂車站時，該處鐵軌已為我方人員預先破壞，吳只得下車乘馬落荒而逃。吳乘用之豪華花車，為昔供滿清西太后所專用者，竟為我軍所截獲，吳本人亦幾為我軍所俘虜。

九月八日唐總指揮移駐漢口，同時分令第四師配屬本師之十八團，沿平漢路向花園、武勝關追擊，本師主力則經黃陂向九里關追擊，九月中旬我軍已佔領武勝關、鶴公山、九里關一帶，至此除武昌一座孤城而外，武勝關以南之長江北岸已無敵踪。

漢口、漢陽已為我軍佔領之後，武昌之敵唯一的一線希望便是孫傳芳的軍隊自江西前來解圍了。當時國民革命軍之作戰重心已轉移至江西方面，孫傳芳雖不斷派軍西上，實際上已自顧不暇，固守武昌之敵向我投降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九月十日左右，第七軍奉命轉用於江西方面進攻九江，圍攻武昌之任務又由我第八軍派遣一部與原來之第四軍共同擔任。嗣於十月初該敵知援軍解圍無望，曾一度突圍亦為我軍擊敗，加之彈盡糧絕，城內敵軍將領富雙英乃秘密向我軍投降，開城迎納我軍。於是遂克復武昌，生俘陳嘉謨、劉玉春以下官兵九千餘人。時正十月十日，回想辛亥武昌起義，時間上何其巧合若是。為獎勵敵軍來歸，富雙英仍以獨立師師長任用。

九月中旬，孫傳芳為牽制我在武漢方面之軍隊遣陳調元部自安徽進駐鄂東長江北岸之武穴，並有西進援救武昌之企圖。本師於追擊吳佩孚殘部佔領豫鄂邊境之後，復奉令開赴鄂東阻止該敵西進或渡江而南威脅友軍之側背；於是將九里關防務移交第四師負責，於黃陂集結後向蘄春轉進。時陳調元軍較我遠為優勢，我遂展開於蘄春、漕河一帶，採取牽制戰法，時以佯攻與敵保持接觸，或以逐次抵抗與其相週旋。如此直至十月

中旬，始終將該部敵軍拘束於廣濟、武穴一帶。武昌克復之後，唐總指揮率富雙英部及第四師之一部來援，乃合併本師對鄂東之敵進攻，於十月下旬，本師相繼克復廣濟、黃梅，十一月初唐總指揮亦攻佔田家鎮及武穴，陳調元部敵軍盡退回安慶。此際江西方面，國民革命軍亦已攻克南昌、九江，孫傳芳在贛之敵軍大部為我革命軍所擊敗。孫傳芳本人逃回南京，一面向奉張乞援，一面整頓蘇浙皖各省殘餘勢力以圖恢復；但所部陳調元、周鳳岐等均已瞭然革命大勢所趨早已心懷攜貳。時蔣總司令駐節南昌，各方面輸誠通款之代表，已是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了。

自九月下旬，蔣總司令移節江西督率各軍進討孫傳芳部時，即將湘鄂軍事付給唐生智負責，故在我軍規復鄂東之後，唐總指揮即回駐武漢，鄂東一帶即由本師駐守。因本師與長江南岸的第七軍有切取連絡的必要，十一月中旬左右，我自武穴乘輪親赴九江訪謁李軍長宗仁，至九江時適李已上廬山，承該軍第一縱隊司令夏威將軍陪同我上廬山訪李，並順便一覲此一名山的真面目。適是日總司令蔣公亦在廬山與俄國顧問加倫將軍商討軍事問題，遂承寵召共進晚餐。是夜並留宿廬山。當時已是初冬，山上氣候嚴寒，通宵竟苦不成寐。

自廬山返武穴後數日，即奉命調回漢口整編，作進軍河南之準備。於是原第八軍各部為基幹，分別擴編為三十五、三十六、第十二、及第八軍，以何鍵為三十五軍軍長，劉興為三十六軍軍長，葉琪為十二軍軍長，我則任第八軍軍長。第八軍編成三個師，每師步兵三團及砲、工兵各一營，由張國威為第一師師長，熊震為第二師師長，李雲杰為第三師師長，另組一軍官教導團以資儲訓幹部。當時撫獲敵軍的武器裝備既多，且有漢陽兵工廠可以供應，各師、團之武器裝備自無虞匱乏。

國民革命軍在江西方面相繼攻下九江、南昌之後，東路軍開始向閩、浙進攻，在贛之革命軍第一、二、

六軍，以及第七軍亦先後向東進入浙江與自福建北上之東路軍相呼應。於十六年二月底定浙江之後，會師北進，至月底相繼光復上海、南京，孫傳芳殘部潰走蘇北，奉系之魯軍張宗昌部亦敗退徐蚌。至此大江以南已全為國民革命軍所有。

國民革命軍誓師之初，雖號稱十萬之衆，實際上不過五六萬人，而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後不過八個月的時間，領有長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

一九、寧漢分裂與清共

國民革命軍相繼攻下武漢、南昌之後，隨之向長江下游進兵；以何應欽的第一軍由福建北上，以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率東路軍之一部由贛東進，攻下浙江之後，繼沿滬杭路及京滬路向上海南京進攻；同時程潛的第六軍與李宗仁的第七軍主力亦分由長江南北兩岸東下，遂於十六年三月底兩路會師攻佔南京。其間孫傳芳因大部份地盤已入革命軍之手，遂向奉張投靠，張作霖並遣張宗昌、褚玉璞率直魯軍在京滬路一帶支援孫傳芳作戰；結果並未能挽回頽勢，遂向長江北岸徐蚌一帶退却。時張作霖在北京自稱安國軍總司令，旋復自任大元帥，頗有統一北方各殘餘勢力與革命軍相抗的趨勢，乃傳檄敗退河南的吳佩孚，欲收為旗下。當時吳佩孚勢窮力蹙，倒是無可無不可的，只是其部屬靳雲鴻、魏益三等堅決反對附庸奉張，因此函電往返磋商，躊躇不定。張、吳之間本有直奉兩次戰爭的宿怨，魏益三原是奉張部將，曾幫助郭松齡倒戈，所以與奉張也有一箭之仇，因此，遂在張、吳函電往返之際，奉軍已沿平漢線南下進入河南。那時吳軍在屢敗之後自不是奉軍的敵手，且內部又不團結，結果吳佩孚退守華縣，以後竟不能自存，這位虎踞洛陽，曾經咤叱一時的風雲

人物，此後便消聲匿跡了。吳的部將新雲鶴嵩奉軍南下之際退到許昌，後一度將吳軍各部合組為河南保衛軍與奉軍對抗，失敗後投降了武漢的國民政府。

十六年四月，馮玉祥部接受國民政府令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由陝西東出潼關。武漢方面唐生智以第四方面軍總指揮亦由武漢率軍北上。入據河南的奉軍在唐、馮夾攻之下，於五月底向黃河以北撤退，六月一日唐、馮兩軍遂會師鄭州。在南京方面，那時雖已另組國民政府與武漢方面發生分裂，但總司令蔣公仍親率第一集團軍，於五月中旬分三路沿津浦路及其兩側向北攻擊。於六月初旬先後攻佔徐州、海州，旋與沿隴海路東進的馮軍在徐州附近會師。此時黃河以南除山東外，已完全入革命軍之控制下，在晉冀方面的閻錫山，亦通電易幟，服膺三民主義，將所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東出娘子關威脅平漢線奉軍之側背；在北京的奉系將領見大勢已去，已有退保關外之議了。

無如此時，國民黨中央，由於共產黨的滲入，內部發生裂痕，形成武漢與南京兩個對立的國民政府，由相互指責，而各走極端；這就是國民革命史上的所謂寧漢分裂。

由於內鬨的結果，唐生智的第四方面軍退回武漢，將河南交給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防守。在徐海方面，亦調兵回保南京，致使長江以北復入敵軍之手，孫傳芳且一度渡江南犯，南京為之震動。後幸有第七軍及第一軍在京滬路上，將敵東西兩面夾攻，卒將孫傳芳軍擊敗。此役孫軍幾全軍覆滅，為北伐史上有名的龍潭之役，第七軍爾後亦以此役而得享盛譽。

說到寧漢分裂的遠因，要追溯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甚多共黨份子在本黨的中央盤踞要津把持黨務，實行篡奪黨權。國父逝世之後，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內部，

共產份子更是猖獗一時。所以早在民國十四年冬，本黨中央的若干執監委員就在北京西山的總理靈前開會，決議要清除黨內的共產份子。民國十五年初本黨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上述的西山會議派也同時在上海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黨的中央委員；這樣黨的中央遂出現雙胞胎了。廣州的第二屆代表大會可說是在共產份子的操縱下召開的，很多共產黨人及左傾份子都當選了中央的執監委員，共產黨人的陰謀更趨積極。當時今總統蔣公在廣州辦理黃埔軍校，統率黨軍，在消滅東江陳炯明殘部之後，無形中成為黨的中流砥柱，也成了共產黨所欲打倒的第一號目標；於是發生中山艦的陰謀事件。中山艦事件共產份子的陰謀敗露之後，黨的中央雖撤除了共產份子譚平山、林祖涵、毛澤東等在本黨中央的部長職務，並通過了蔣公整理黨務的辦法，予參加本黨的共產份子以若干限制，暫時穩定了黨的中樞，順利出師北伐，但共產份子並未真正覺悟只是暫時斂跡而已。而且當時黨內部份要人如汪精衛等，甚至受到共產份子的蠱惑，對蔣公的肅黨北伐謀加抵制，這是北伐出師以前的情形。

迨武漢、南昌光復之後不久，廣州的國民政府決定遷移武漢。在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尚未完全到達武漢之時，共產份子目覩北伐成功指日可待，深恐如不積極對國民黨進行破壞篡奪黨權，一旦北伐完成共產黨當無立足餘地。於是乘機向本黨在武漢的中央人士進行挑撥分化，以期收漁人之利，同時在兩湖展開民衆運動，宣傳共產主義製造鬭爭糾紛，以期裏應羣衆供其驅策。在民國十五年北伐前後這段時期，共產黨幾乎在本黨之內造成了一種輿論勢力，只有左傾才是革命，共產黨是左傾的，也就是革命的，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都是反革命。那時黨的政策原是聯俄容共，國民革命運動又造成了一時澎湃的風潮，在共產份子二分法的操縱影響之下，連本黨很多追随國父的老同志都受其邪說的蠱惑，或是憚於反革命的帽子而噤若寒蟬，其他

無知的青年更是不問可知了。不僅此也，在那時聯俄的政策下，政府各部門、黨部和高級軍事機構還有俄人充任顧問，因此共黨份子的囂張，自無怪其然了。

在民國十五年底至十六年初的這段期間，今總統 蔣公駐節南昌正指揮策劃對長江下游的軍事行動，無暇內顧，代理中常會主席的張靜江與政治委員會主席的譚延闔，還在自廣州北上途中，未到武漢，此時武漢方面的共黨份子如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陳友仁、周恩來等，在俄國顧問鮑羅廷的策劃下，組成一個中央執委與國民政府委員的臨時聯席會議，執行中央的領導權，武漢政府遂一時被共黨操縱。那時武漢方面的軍事是由唐生智負責，但唐既不是中央委員，對黨政方面的決策，自然發生不了任何力量。何況當時我們這支隊伍，還是剛加入革命陣營的新兵，對共產黨與國民黨兩者之間，既未十分了解，對黨和政府高階層的決策，何敢妄贊一詞。

十六年一月初張靜江、譚延闔兩主席及部份委員自廣州北上抵達南昌。因見當時武漢中央各委員已在共黨份子蠱惑控制之下，乃於七日在南昌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但已到達武漢的中央人員（共黨份子）深知中央政府改駐南昌後，因有總司令 蔣公在，篡奪的陰謀必難得逞，因此對蔣公及中央主要人員大肆攻擊。蔣公等人為求黨內團結，不忍見北伐未成而中樞趨於分裂，後亦同意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仍遷至武漢。於是共黨份子，在是年三月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種種有利於共黨之議案。因此共產黨的篡奪陰謀愈見凶惡，而國民黨在武漢無異於名存實亡了。

四月初，國民革命軍已佔領京滬，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等先後提出共產黨謀叛證據，請求各地軍事當局採取非常緊急處置，以及聯名發表通電護黨救國，斥責武漢政府自聯席會議成立以來之種種荒謬措

施。同時，武漢方面的共黨份子又乘機攫取江西，勾引軍隊（朱培德的王均師），殺戮人民，搗亂省政，種種惡行，肆無忌憚。於是，上海、南京兩地的中央執監委員遂於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會議；但因人數不足乃改為預備會議。會中決定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發表奠都南京宣言，並揭櫧驅逐共黨份子，實行三民主義；這樣寧漢兩方遂宣告分裂，南京政府同時宣佈清共。

當四月中的南京宣佈成立國民政府之際，譚延闔尚在武漢，汪精衛也甫自國外歸來，經上海來到漢口。

唐生智總指揮則統率第四軍、十一軍、三十六軍正在河南上蔡、漯河一帶與吳佩孚所部苦戰中。

按理說，漢口的國民政府是廣州遷來的，又經第三次中央全體委員會議通過改組而成，在法統上頗有堅強的依據。不過，武漢政府內部有很多原是共產黨的跨黨份子從中把持，而那時共產黨頂着國民黨的招牌，隨北伐的進展，在各地積極進行赤化運動，煽動工人、農人鬪爭地主和資本家，造成流血事件，社會為之騷然，兩湖一帶尤為慘烈。因此，武漢政府頗為國人所不滿，而南京政府因揭櫧清共却極為各方所同情，尤其各地的軍人，因多來自農村，對共黨份子之所作所為頗為不滿。於是，南京方面宣佈清共之後，繼之廣州、四川、貴州各地均一致響應開始清共。

當時武漢政府所掌握的軍隊，計有唐生智的第四方面軍，張發奎的第四軍及第十一軍，以及在江西方面的朱培德的第三軍；其中以第四方面軍的實力最大，下轄我的第八軍，葉琪的第十二軍，何健的三十五軍，及劉興的三十六軍。在這些軍隊中除張發奎屬下的小部份官兵，可能已受共產黨的滲透外，其餘也都是反共的，尤其第四方面軍的官兵大都是湖南人，而那時湖南省受共產黨的為害最大，全軍官兵無不痛恨共產黨，所以不久之後，武漢方面也開始清共；這完全是由第四方面軍的幾位將領所決定的。

由於當民國十五、六年間，湖南各縣在共產黨領導的所謂農民和工人運動之下，凡稍有家財或聲望之士，輕則帶上土豪劣紳的紙帽子，被他們用繩子牽着遊街示衆，重則予以處死，無法無天到了極點。共產黨這種殘暴橫行的消息傳到軍中，湖南的軍人真是悲憤填膺，恨之入骨。民國十六年四月下旬，那時何鍵的三十五軍在漢口大智門一帶正整裝待發，準備北上河南方面作戰，由於他獲知湖南方面共產為害地方的情形，與很多部屬人員因父兄遭共產迫害向他的哭訴哀告，遂企圖停止北上，獨自率軍回湘清共。

當時我所率的第八軍，擔任武漢的衛戍任務，對於清共自是人同此心，但當時前方作戰正殷，我總覺得應該顧全大局；無論為北伐的前途或武漢的安危着想，我以為在戰事尚未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前，內部不宜發生分裂，最低限度也要在戰事告一段落，戰局已經穩定之後，才能回過頭來解決後方的糾紛。因此我在獲悉何軍的情況後，內心頗為焦急。恰巧當天晚上，何鍵軍部有一位參謀很匆忙的前來見我，告知三十五軍已不北去河南，翌日將開回湖南的決定。我問他：「為什麼開回湖南，係奉誰的命令？」他答道：「是何軍長自己決定的，準備回湖南清除共產份子。」我說：「何軍長未得總指揮的命令，自行開回湖南，他這樣作是關係整個大局的，責任實在太大了，你們為什麼不諫阻他呢？」他答道：「我們大家都很替他擔心，但又不敢諫阻，除非請軍長你親自前去，否則無效。」於是我说：「好！我馬上就去，你先回去罷。」

於是我就去何的軍部。本來我與劉（興）、何（鍵）三人平日交誼素篤，可以無話不說，但此事他既未事先與我商量，我即不便單刀直入，想旁敲側擊探詢他的隱衷。晤面時發現他坐立不寧，精神頹喪，便知他正是進退兩難，意猶難決。寒暄數語後，他問我說：「老弟深夜來此，有何責幹？」我說：「聞你明日出發河南，特來送行的，因明日我有他事恐不克抽身，所以利用夜間前來看你。」他面帶苦笑的說：「我明日

不去河南了，準備回湖南。」我故作不知的問他，回湖南何事，是否是總指揮的命令。我又把我所知關於湘軍多數幹部為家鄉給共產黨鬧得鷄犬不寧，軍心渙散的事告他，要他多加注意。他這纔把他計劃回湘清共的事和盤托出。他說：「湖南已給共黨份子鬧得天翻地覆，如果不把他們剷除，我們自己的命也要被他們革掉了，總指揮那裏我想等到長沙，再打電報告訴他，准也罷，不准也罷，我想他決不會贊成共產黨。」於是我就說：「我正想為此事與你商量，你既認定共黨份子非肅清不可，那和我的想法可說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必須研究一個妥善的辦法，使能夠達到目的而了無遺憾才好。現在你帶一個軍回湖南，對清除共黨那是毫無問題可以成功的；可是河南方面總指揮正在上蔡、漯河一帶與吳佩孚、張作霖的大軍廝戰，非常吃力，畢竟劉興的第三十六軍和張發奎的第四軍的兵力，是無法解決戰局的。你此時不去河南助一臂之力，萬一敵軍發起反攻，將我軍擊敗，那時不僅北伐要中途遭受挫折，恐武漢亦難確保；而且我今天接得岳州方面的情報，說夏斗寅部已背叛武漢，並有進攻武漢的企圖，如此武漢屆時南北受敵，我的第八軍豈能久持。如果武漢失守，湖南亦勢難獨存，北伐大業恐不免前功盡棄了。」我說到這裏停了一會，看他略有動容，然後他就說：「依你之見呢？」我於是又繼續說：「依我的意見，清共當然是勢在必行，不過我們大家要忍耐一時，你的第三十五軍還是遵總指揮的命令先赴河南，協同第四軍和第三十六軍先將吳、張兩股敵軍擊敗。目前馮玉祥的軍隊已攻下洛陽繼續東進，我想你這支生力軍到達之後，不久便可與馮軍會師鄭、汴。屆時河南底定，我軍即可回師，然後我們三個軍一致聯合起來向總指揮表示清共的願望和決心，我想他一定會同意的。你去河南前線之後，我即去見顧老師，將各方情形和利害向他詳細說明，要他參加我們一致向總指揮要求，他是提倡大慈大悲的佛家先覺，必然贊同我們的主張，而總指揮對他是素來言聽計從的，這樣一定可以達成我們的目

的，而又絲毫無礙於大局和我們湘軍的團結，而且那時我們在兩湖地區，同時實行清共，也一定更為澈底。你以為如何？」我說完之後，他考慮了一兩分鐘，再說：「老弟，你的想法比我遇到穩妥，就照你的意思去做，我明日仍連命出發河南，但後方的工作你要完全負責，尤其對孟瀟方面要多下工夫。」我說：「當然，一切你放心好了。」遂握手而別。

何軍開赴河南之後，我為安定軍心，顧全大局起見，一面安慰在武漢各部隊官兵的心理，一面派本軍參謀長陳友嘉持函專程赴豫，將武漢情形詳細報告唐總指揮，並要他暫時忍耐，不要追問此事，一切等戰事結束後再說。同時又請葉軍長琪馳赴長沙與周代主席商量處理後方事件，但萬勿妄動，影響前方作戰。但葉在飛長沙途中，因座機發生故障迫降，足部受傷，折返漢口就醫，長沙方面只有另電周代主席妥慎處理了。

不久之後，長沙方面因共黨份子騷擾出征軍人家屬，駐在長沙的何部補充團團長許克祥，遂率所部官兵以武力解散長沙工會農會自衛隊，除解除其武裝外，並大加誅戮，事後率隊離開長沙。此事後來一般稱為「馬日事變」。

六月初，河南方面，我第四方面軍將吳佩孚等擊破之後，隨與馮軍協力將奉軍驅逐退向黃河以北地區。此時唐總指揮得到我的報告與何雲樵的當面請求，唐即返還漢口，將本方面軍一致決定清共的決心，請示於汪。當時汪以軍隊中尚有部份左傾親共者，一旦宣佈清共，武漢方面的內部必然發生分裂，同時他主張決定以武力推倒南京的政府，因此他反要求唐率軍東征，清共的事等以後再說。唐見不得要領，乃藉口巡視湖南返長沙。六月下旬，今總統蔣公在徐州與馮玉祥、胡漢民等中央委員舉行會議，對武漢方面頗多指責，汪因此對南京的軍事行動遂迫不及待，速電催唐返漢。唐的回電必以清共為先決條件，否則無法東征。後汪

又召集在武汉的将领会商，徵询意见，各将领半答以先清共而後東征。汪不得已，最後只好下令由衛戍司令部執行清共，這是六月二十七日的事。

我奉令後即密令軍警人員分別出動逮捕共黨分子及查封共黨機關，解散漢口總工會及農會以及工會之糾察隊等，並將俄籍顧問集中看管準備遣送出境。由於清共一事經過多日商討始行決定，以至共黨在武汉之重要人物均已聞風逃匿，捕獲的不過是些無關重要的分子；但在搜查中獲得不少共黨的秘密文件，證實了共黨顛覆本黨的陰謀，使原來若干自誦革命為共黨所惑的本黨同志，至此幡然憬悟，也可算是重大的收穫。至於在武汉三鎮以外，及湖南各地之共黨操縱之工會農會一律解散，並將惡跡重大者予以懲處。此次武汉方面的清共，首先由衛戍總司令部命令執行，後來政府遷臺之後，還有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問我：武汉的清共是否是受國際方面美英的請求，我說：此事完全是由於軍隊及民衆的請求，與任何外國都毫無關係。

武汉方面着手清共之後，原來在本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內部的共黨份子，後來隨賀龍、葉挺部隊逃竄於粵贛邊界一帶。

一〇、闖牆之鬪

民國十六年六月底，武汉方面的軍隊，採取了清共的行動。七月間武汉的本黨中央委員，因發現共產黨有關顛覆中國國民黨的秘密文件，也決心實行反共清黨，隨之將武汉的黨務和政治機關從事改組，清除了中央黨部及政府中的共黨份子，以及所有俄國派來擔任軍政工作的人員。寧漢分裂至此本可告一結束，無如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南京和武汉的各中央委員之間，尤其是汪與南京方面及西山會議各人之間，可能還含有個

人的成見。因此，武漢政府方面在採取清黨之後，仍飭令武漢駐軍將兵力向江西安徽方面集中，準備東征。南京方面也在六月末向武漢發出最後通牒並向安徽方面增兵，雙方都劍拔弩張準備以武力解決的姿態。

汪、唐之間對於東征的行動，可能在河南戰事結束之後不久即已決定。因此早在六月下旬，武漢清共行動開始之前後，即將在武漢方面張發奎的第四軍，蔡廷楷的第十一軍移駐江西之南潯線上，準備加上朱培德的第三軍沿長江右岸東下進軍。汪的計劃最早自然是受了共黨分子的慫恿，他們想利用汪來打倒當時的蔣總司令，推翻南京的國民政府，然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最後則將汪推倒取而代之。這個陰毒的計劃不料為唐堅持先清共而後東征所破壞，唐的清共主要是受了所屬湘籍幹部的影響，至於東征則是他受了汪的指使與誘惑。那時他已由汪任命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自然要為汪效命。而且汪要他打天下，成功之後，自己便是第一功臣，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大約是在六月下旬一個非常燠熱的晚上，當時正是唐從長沙回到武漢與汪醞釀東征的時候，我們幾個軍長聚集在漢口西園，唐的總司令部和唐在一起納涼。他向我們大家談及此事，他說：「汪先生極力主張東征，我想乘張、孫聯軍南下之際，以第三十五及第三十六兩軍東下相機攻取南京，以第八軍留守武漢及肅清第二軍殘餘部隊，鞏固兩湖後方，將來以雲桂（何鍵）部駐守安徽，鞏固江左連絡第三軍任江右防守，鞏徽（葉琪）與鐵夫（劉興）兩部隨我到南京；建都後整理一個時期再行北伐，這是我已考慮成熟的腹案。」我們聽了之後，我內心頗不以為然；當時我想北伐之功未竟，清共已是萬不得已，現在既已清共，與南京政府的要求已經一致，雙方都應該沒有成見可言；至於國民政府的位置和人事如何解決，當可召集一次中央全體委員會議來解決。如果竟作閱牆之闕，豈不是觀者痛而仇者快！無論哪方勝利，哪方失敗，失敗者是自受其

等，勝利者也沒有什麼光彩可言。如果萬一雙方相持不下，而敵人乘勢坐大，則太平天國的覆轍重蹈，更是一場歷史的悲劇了。我雖然想到這裏，但我深知唐的個性，如果這樣直截了當的反對，不僅他不會接受，而且我很可能不能在他的下面立足。於是我在默然良久之後說：「總司令的想法，為我們的團體和大家的前途着想，我們大家自然十分感謝，可是我有一點意見想說出來還請總座裁奪。汪先生要攻南京，主要是靠我們的力量。我們這個部隊由原來的一師不到一年擴充成四、五個軍，我們不可諱言的幾乎都是新兵，缺乏訓練，人數雖衆但作戰力量則遠遜於前。其次在人才方面，我們到了南京之後，對各機構各部門都要有得力的人分別負責，現在我們的人才照我看來實在不夠，甚至可以說沒有。在經濟方面尤其重要，以我們目前的情況，恐怕難以作較長時間的支持。因此我認為東征一事不可操之過急，現在暫時觀望，看清情況再作決定。我想只要我們不派兵東下，南京方面未必非煮豆燃萁不可，必然還有時間給我們從容考慮的。」他對我的意見未置可否，但似有不豫之色。及後他僅說一句「這是國府汪主席的命令啊！」於是大家趕快掉轉話題。

唐之為人主觀最強，雄心最盛，順着他的心理容易進言，逆着他的想法很難收效。結果他仍是聽從汪的指示決定動員東征。至七月下旬，那時第四軍、第十一軍已在南昌附近待命，卅五軍則奉命向安慶、無為、合肥一帶進發，卅六軍亦準備經九江向蕪湖前進待命。第八軍奉命以一師，另由湖南方面抽調一師，即日將宜昌一帶之第二軍魯滌平部隊驅逐出境，其餘主力則駐防武漢，維持兩湖治安。唐本人則於九江開設第四集團軍總部的前進指揮所，東征已勢如箭之在弦。此時，南京方面因得知武漢方面準備東征之消息，已將前方部隊之一半以上退回江南保衛南京，北伐作戰無形停止，而張孫聯軍已再佔徐州並繼續南下。當時我對大局真是焦慮之至，但却想不出什麼方法。

八月一日張發奎所部的共黨份子賀龍、葉挺等忽在南昌叛變。朱培德第三軍在南昌的部隊受叛軍之攻擊損失頗大。翌日，共產黨且在南昌成立革命委員會。於是武漢政府命張發奎率領所部加以討伐。最初武漢方面的共黨份子原是鼓動汪、唐對抗南京的，現在武漢政府亦已清共，他們的陰謀計劃無法得逞，自然要獨樹一幟，另謀發展，貫澈他的主張。

共黨叛軍在南昌燒殺兩天之後，向贛南逃走。此時第四軍張發奎部為要進擊葉、賀遂率師回粵。第十一軍的蔡廷楷部也乘機脫離武漢政府，開向浙贛邊境。至此東征的部隊幾乎散失了一半，以後第三軍在江西方面也觀望不前，結果只有卅五、卅六兩軍分別於八月中下旬到達安慶、蕪湖之間。此時，總司令蔣公不忍見黨內再鬧意見，自相廝殺，已於八月十三日通電下野以示忍讓。最初反對武漢政府最烈的胡漢民、張靜江、蔡元培、吳敬恆、李石曾等人，亦以赴滬挽留蔣公不果，而一去不返。南京方面的各將領見黨內分崩而張宗昌、孫傳芳的軍隊亦適自徐州方面節節南下，捲土重來，威脅京滬，遂迭電汪、譚等要求捐棄前嫌通力合作，並派李宗仁赴九江直接協商。八月二十四日，寧漢雙方代表在九江初步會商之後，譚、孫（科）兩人遂隨李宗仁同赴南京。是時正值孫傳芳軍在鎮江、儀徵間渡江大舉南犯，發生龍津戰役，東征軍知道孫軍渡江進攻南京，遂在蕪湖以西停止前進。

九月初，南京方面因第一軍、第七軍合力將孫傳芳軍殲滅，已轉危為安，汪精衛也想見風轉舵，當即率朱培德、顧孟餘、陳公博、徐謙等人前往南京，準備與南京的各中央政要會商一切。東征的行動至此停止，寧漢兩方理應盡釋前嫌重歸統一；汪精衛到京之後並已自認對共產黨人之防制過遲，自効下野聽候處分。無如在上海會商的結果，由於原來曾參加西山會議的諸前輩，又發生了爭執。西山會議的諸前輩於民國十五年

在上海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委員，原是廣州的黨中央所不承認的，但他們對於清共來說却無疑是先知先覺者；而寧漢分裂之初，寧漢雙方的中央委員人數，都不足法定人數，南京方面為了加強黨的人數號召清共，事實上已與廣州原來不承認的西山派合流。上海會商時，武漢方面的中委陳公博等主張召開二屆四中全會，這樣就等於排斥西山派在上海所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委員，不得參加，西山派的元老自然反對。結果決定由寧、漢、滬三方面合組一個『過渡時期的中央特別委員會』。陳公博等以這個三方面合組的中央特別委員會於法無據，加以杯葛，因此陳公博、顧孟餘、汪精衛等人於九月下旬又相繼回到漢口，與南京相頡頏；成立武漢政治分會，並通電指責南京的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職權之不當。

十月間，廣州方面也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時譚延闔、孫科等已在南京，中央特別委員會乃派孫科、伍朝樞等人為代表求取汪、唐等對該會之諒解。旋寧、漢、粵三方面的代表在廬山開會，協定在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追認特別委員會。南京方面同意後，譚延闔等遂通電各地中央委員，決定於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會，請各地代表，一致莊會，同時汪亦電廣州方面的中央同志，約期一致與會。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南京國民政府，又依軍事委員會的決議，下令對唐生智免去其本兼各職，議交軍事委員會治罪，並由程潛李宗仁率軍分別沿長江兩岸西上。這時雖預定召開的四中全會，已不過十天，黨的統一業經在望，統一的國民政府，便可產生，軍隊團結，繼續北伐，大可樂觀，不料軍事的分裂，突然又起，使整個局面又陷於分裂，真是令人痛心。

南京國民政府這次討唐的軍事行動，當時一般人稱為西征。唐生智獲知南京方面遣軍西征之後，即令何健、劉興兩軍退回鄂境。其後西征軍繼續西進佔領武穴時，何健、劉興兩軍猶在黃梅、廣濟一帶，除遣一部

擔任掩護與西征軍略有接觸外，其餘部隊均未發一彈即退向武漢附近集中。蓋此時汪精衛已秘密離漢經滬前往廣東，唐以為汪走之後南京方面當會適可而止，不難握手言和。

可是西征軍却窮追不捨，程潛第六軍更派遣很多奸徒潛來武漢，利用醴陵小同鄉的關係，勾引在武漢並未參加東征的第八軍部隊，從事叛變，聲言無論官兵只要能帶隊歸附於他，一律加升兩級及犒賞現金若干，好似把在武漢的第四集團軍當作軍閥的軍隊看待，非澈底摧毀不可。當時我第八軍的第一師師長張國威竟見利忘義中其奸計，欲率隊反叛，幸發覺尚早，當予逮捕正法，其他同受其愚的少數官兵，也有依法懲處，也有被其誘去的。

武漢方面若干人士見我第四集團軍一再退讓避戰，而西征軍竟步步進逼，曾主張就武漢附近與西征軍作一決戰，予以打擊。經我們考慮再三，總覺得閱牆之關勝之不武，敗了更是對不起全軍將士，對不起總理的苦心領導吾人革命，莫若再讓出武漢退回湖南，聽候中央解決。這是我軍多數幹部的意見。唐總司令本人亦願下野出國，以期息爭，遂於十一月十二日通電下野，乘輪赴日。

汪、唐相繼下野離漢之後，此時禍首既去，南京政府方面的各先進，理應以黨國為重，立即電令兩方停止軍事行動，派員來漢撫慰軍心，辦理善後，保持北伐元氣使第四集團軍這支革命隊伍不至破碎，令其能繼續為北伐而效力。當時在武漢我們這幾個軍長，只要南京方面有一紙命令或派一員代表前來，表示南京中央的旨意，各軍沒有不聽命的，無如不此之圖，仍令西征軍窮追不已，而西征軍的各軍之間，亦惟恐武漢這塊肥鴨落入他人之手，都奮勇爭先，如餓狗之爭食，竟然忘却北伐大業猶待進行。雖然如此，我們第四集團軍的各軍，對南京前來的西征軍仍然不忍煮豆燃萁，始終以忍讓為重，見西征軍未因唐生智的宣佈下野停止前

進，即於十一月中旬又讓出武漢，撤回湖南，期待最後能得南京中央的諒解，和平解決。

寧漢分裂基本上與唐生智無關，東征之罪按情理而論，主要亦不在唐生智。唐當時既非黨中要人，亦非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只是武漢政府下的一個軍事長官，舉兵東征完全是遵照武漢國民政府的命令。因此萬方有罪應罪在一人，今舍元兇不問，獨對奉行命令者執行討伐，把唐生智當成替罪的羔羊，即已有失公道，尤其唐生智在汪精衛下野之後，不待南京方面西征軍之前進，已自動撤回鄂境不與交鋒，退讓三舍，旋復逼電下野出國，以示脫離軍隊，西征軍仍是紛向武漢進迫，似乎非摧殘這支有功於民國，而堅決反共的部隊不可。南京軍事委員會，用這樣處置，實出人意料之外，這不是公忠謀國之道，而是種下後來分崩離碎的禍根。按當時北伐軍總司令 蔣公已經離職下野，南京方面由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職權，對唐生智之討伐，係根據軍事委員會的建議，當時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先生大都是軍隊的高級將領，其中有湘籍委員數人，在北伐之前與唐有私人恩怨在內，也許是公報私仇，主張西征根本解決武漢的武力，或者因唐據有武漢及兩湖地盤，或未經政府許可擴張軍隊，凡此均足以令人不快，因此必要予以打擊並將其軍隊解體亦未可知。

茲據開私人恩怨不談，就唐生智統管兩湖與擴軍而言都不足以罪唐。攻佔武漢係奉統帥部之命，駐守武漢亦是統帥部指派，並非違令而行。當初奪取武漢，係犧牲無數官兵血汗得來，論功行賞也不為過。平心而論，當年革命軍在廣州誓師之初，兵力不過數萬，若非湖南這一支大兵團願效前驅，參與北伐，兩廣的北伐軍能否進出中原還是大有疑問。至擴充軍隊，原是為日後北伐之需，並非擴兵自衛，且所需武器裝具，均屬取之敵方，不費政府一文，而能建成北伐所必需的軍隊，不僅無過且應有功。

若謂勾結孫傳芳夾攻南京，危害黨國，這是莫須有之事，僅是時間上的巧合而已。如果真是唐、孫實行

勾結，則在孫傳芳軍大舉渡河，南京岌岌可危之際，唐之東征軍為何停止於蕪湖、合肥不進？既停止不前，對垂手可得的南京而不取，所謂勾結敵軍之說，實不足以取信於人。後來白崇禧屢次問我，唐、孫勾結有無其事？是否是蔣百里先生從中促成？我說，就我所知蔣百里先生當時確在漢口朝夕見面，惟唐、孫連合進攻南京的事，我個人既未聞唐說過，也未聞蔣談起，以我當時在第四集團軍的職位以及與唐的關係，如果確有此種計劃自當與聞；因此我想絕無其事。

我最感遺憾的是前第六軍程潛還用最卑鄙的手段，前來勾引第八軍的官兵。一個革命軍的高級軍事領袖，竟如此卑劣破壞軍紀、獎勵叛變，自難免養成日後叛逆之風，他本人於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時變節投匪就更不足為怪了。

二一、北伐的最後一戰

西征軍並未因我們進入湖南而停止，當我們返回湖南之後不久，由白崇禧、程潛指揮的西征軍又開始自湖北向湖南進迫。我們始終採取忍讓政策，不惜退避三舍未表示我們的無他。最後我們退避到湘西及湘南一帶，岳陽、長沙、湘潭、衡陽、寶慶都讓由他們佔領。

直至民國十七年四月，那時今總統蔣公為調和黨內分崩離析的局面，徇黨內各派的請求，重行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北伐軍總司令，領導北伐，任命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任，白崇禧擔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當時我的第八軍及三十六軍駐紮在湘西漵浦。因退却過遠，拖延過久，士氣因之不振，部隊不免有散失情事發生。一天接到白自寶慶打來的電報，說他已派一位陸軍小學時代的老師前來看

我，要我和他洽談。這位老師姓張名國權，是陸小時的排長，那時他可能是在白的司令部當參議或顧問一類的工作。他來到之後，說白總指揮特地派他來邀我赴寶慶面談。我們本無意與任何人為敵，他既邀我面談，我當欣然前往。當天晚上我以此事在電話中告知劉興軍長，他極表同意，翌日我即偕張老師同行。到達新化與胡軍長宗鐸晤面，胡軍長由電話告知白總指揮說我已經到達新化，白立即要求在電話中與我談話。他問我說：「你們的意見怎樣？」我說：「我們原來就並無意見，軍隊是國家的，中央認為要怎麼都可以啦！」他說：「那麼好，請你在寶慶等我，我明天即去長沙與李總司令商量。」就這樣幾句話結束了我們之間半年多來的閭牆情形，新舊第四集團軍的部隊算是合流了，演變到此之一段經過想來真是啼笑皆非。

經過白健生（崇祺）與李德鄰（宗仁）商量之後，我所屬的第八軍，葉琪的十二軍，劉興的三十六軍合編為第四集團軍的第十二路軍，由我兼任總指揮繼續北伐。何鍵的三十五軍則歸第四集團軍總部直接指揮，留駐湖南擔任剿共的工作，後來他這一軍在湘贛方面剿共有功，他也繼魯蓀平之後當了湖南省的主席。

第十二路軍編成之時，我原欲解甲歸田，曾向李德鄰總司令建議由劉興擔任總指揮兼軍長，後因劉堅決表示不願再事領軍，我因此遂順從各方意見及愛護部屬計，只好勉為其難。劉興交卸軍長之後離開部隊，與周闡二人同時一度擔任湖南省政府的委員；三十六軍軍長遂由廖磊升任。廖磊沉默寡言、勇政耐勞，確是一位標準軍人，以之升任軍長確能勝任愉快。

部隊經過一番整頓之後，隨即加入第四集團軍的戰鬪序列，於五月中旬離湖北上。那時，第一、二、三集團軍已經三路向平津出發，進展順利；第一集團軍沿津浦線前進，雖日本帝國主義出兵濟南圖阻北伐而造成「五三」濟南慘案，但蔣總司令洞燭日本軍閥的陰謀，忍辱負重，一面交涉一面繞道渡過黃河繼續向北

推進；第二集團軍沿平漢線北進，其東翼已越過德州，進逼馬廠；第三集團軍自晉綫沿正太、平綫線東進，亦已分別攻佔石家莊及張家口附近；整個北伐大軍已對平津形成大包圍的形勢。第四集團軍是擔任北伐軍的總預備隊，由白崇禧指揮我的十二路軍及他自兼的十三軍，沿平漢線北進。

當我們渡過黃河之後不久，奉張的軍隊即向關外退却，北伐軍很順利的收復了平津，時為六月初旬。張作霖於回瀋陽途中，其專車在溝幫子為日本人所預置的炸彈爆炸重傷斃命；北伐至此已入尾聲。

奉軍放棄平津之後，除有特別任務者外，所有北伐各軍的部隊均奉令在平津的外圍停止待命。我第四集團軍各部乃暫時停駐於自北京近郊之南苑以迄保定之平漢線上。白總指揮、葉琪（翠微）和我都是保定軍校的先後同學，因乘暇相偕往訪這一別十餘年的舊遊之所。那時保定軍校早已停辦，當我們到達保定東關外母校的舊址時，但見偌大一座校園已久無人居，亦無人看守，到處都是頽牆敗瓦，荒烟漫草，一片蕭森落寞的景象，兩株古樹則仍然矗立於校院中間。回想當年在此聞鶴起舞，那種莊嚴宏偉，蓬勃奮發的氣象，已是杳不可尋。我們騎着馬在校園內徘徊良久，相顧默然。

六月六日北伐軍正式接收北京，城內秩序由第三集團軍派遣衛戍部隊負責維持。本十二路軍指揮部隨後亦移設於北京西單牌樓之順成王府內，部隊則仍駐紮於長辛店至保定之間。北京是元、明、清歷朝的首都，為當時全國最繁華的都市，我以往在保定軍校就讀時，雖遊覽過一兩次，亦不過走馬看花而已，現在舊地重臨，仍不免有陌生之感。至於我指揮部的幕僚和隨從人員，他們從來沒到過北京，更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而那時我們南方的部隊，草鞋雨笠，身裁一般矮小，在外觀上與北方的隊伍大不相同，加之言語不通，北平人見到我們的官兵也都不免為之訝異。

最有趣的是我偕葉軍長抵達北京的當天，指揮部還未部署停當，我的那位隨從副官為了替我們找一處地點休息，下了火車之後也未及打聽清楚只吩咐人力車夫要找一處稍好的旅店。人力車夫以為我們是革命軍的高級将领，身份當是不凡，便迎將我的隨從人員及行李送往北京飯店。北京飯店本是北京招待外賓的豪華觀光大飯店，可能從來沒見過這種腳穿草鞋帶着鋪蓋捲周身掛著水壺乾糧袋前來投宿的旅客。當車夫將行李搬進大客廳放在漂亮的地氈上，侍者們固是瞠目結舌，一般外賓亦覺莫明其妙，召來經理人員知是革命軍的官兵也感覺尷尬萬分，既不便歡迎又不能拒絕。正當我那位副官與飯店經理因言語不通，彼此在指手劃腳爭鬧交涉的時候，我和葉軍長隨後趕到，一看是北京飯店，情知我們找錯了地方，乃告知該經理代為引導至附近的其他旅店休息。回想這次「土包子」進北京的笑話，固然為我們當時軍人的社會地位以及其生活的知識和水準而可憐，同時對那些買辦階級者的崇洋媚外心理，也不禁深為太息。

七月初，蔣總司令偕各集團軍總司令來到北京。七月六日集會在北京的中央委員及各級將領一百餘人至香山的碧雲寺。國父孫先生靈前行祭告禮。嗣即由各集團軍總司令會商軍事復員和軍隊編遣等問題。這個會議當時一般人稱之為四巨頭會議。在巨頭們會議期間，我們則乘機在各處遊覽。那時張宗昌、褚玉璞的直魯軍殘部雖尚有五、六萬之衆盤據平東開平、唐山、豐潤一帶；但退出關外的奉軍，因張作霖已死，張學良頗有向國民政府歸附的心理，張濬殘部已失去奧援，故我北伐軍對平東之殘敵也一時未採積極行動，只是監視待其自動來歸。

直至七月下旬，盤據平東之直魯軍殘部迄不投誠，且勾引山東烟台方面之降軍叛變，於是統帥部令白崇禧任總指揮重新編組各軍向平東進剿。白總指揮奉令後以我十二路軍第八軍之第一師，魏益三部之三十軍，

劉榮春之獨立第八師，及鄭大章之騎兵軍編為左翼軍，由我指揮在玉田附近集中。第三集團軍徐永昌部為中央軍，在蘆臺、楊家泊一帶集中。右翼方面，原指派第二集團軍一部擔任，後因該部調回河南遂改以范熙績軍為右翼軍在寶坻附近集中。各軍原定七月廿九日集中完畢，後因連日天雨，交通不便，改為八月五日集中完畢。本路軍之十二軍及卅六軍任總預備隊，在天津附近待命，爾後依令推進至蘆臺附近。

部隊集中完畢之後，先是張學良恐直魯軍窮途亡見，乘張作霖新喪東北內部不穩之際，向關外竄擾，猶圖力予說服，令張（宗昌）褚（玉璞）下野，部隊由中央接收改編，請求白總指揮暫緩行動，並由彼負責改編直魯殘軍；故我軍在集中線上復停留數星期之久。至九月初旬，張宗昌不聽勸告繼續頑抗，並有將所部由海道移往烟台圖謀不軌之計劃。張學良一面向張褚提出最後警告，一面陳兵榆關以西堵截直魯軍之東竄，白總指揮乃於九月二日下令開始攻擊。

左翼軍奉命於九月八日以前奪取豐潤，嗣後以一部向榛子嶺進出，主力轉向唐山、開平，攻擊敵軍之側背，以配合右翼及中央兩軍對唐山、開平之攻擊；奏功後沿鐵道以北向灤河西岸追擊。左翼軍當面之敵為褚玉璞部數萬人，佔領豐潤城北之狼山、波羅山、廟山、牙屈山，以及豐潤西北一帶之村莊固守。

右翼軍及中央軍概係沿京奉路（後改稱北寧路）及其北側向唐山、開平攻擊，預期攻佔唐山、開平之後，沿鐵道以南地區向灤河西岸之樂亭附近追擊。

左翼軍於九月三日開始前進之後不久，白總指揮以左翼軍與中央軍之間空隙過大，即令總預備隊之十二軍及三十六軍統歸我指揮，加入左翼與中央軍之間向唐山、開平之敵攻擊。九月七日原來左翼軍之部隊，排除當面敵前進警戒部隊之抵抗已接近豐潤，而十二及三十六兩軍亦已到豐潤西南至豐臺之間。九月八日我

遂以原左翼軍之獨立第八師及三十軍向豐潤北方高地及豐潤城攻擊，騎兵之主力擔任左側之掩護並防止敵軍向熱河方面逃竄，一部在右側掩護並擔任與中央軍方面之連絡。同時令新到之第十二軍向唐山攻擊，三十六軍則自豐潤以南向開平方面突進。第八軍第一師為預備隊，隨獨立第八師之後跟進。

當日拂曉開始，三十軍展開向豐潤城以北及東北一帶之高地攻擊，最初敵居高臨下，前進一度受阻，經該軍猛烈肉搏突擊，終將敵陣地攻佔。獨立第八師亦於拂曉同時向豐潤城西側之高各莊、小王各莊、安東莊、西魏莊、七里屯等處之敵攻擊，經數小時之激戰後，敵亦放棄各外圍據點，退入城內。該師遂分向豐潤城之西南兩面協同三十軍自東北兩面對豐潤城行包圍攻擊。因此時三十軍已攻佔豐潤以北各高地，對敵有牽制之效，且獨立第八師迅速跟蹤追擊，退入城內之敵尚不及登城，我軍即已突入城內，敵見情況不利乃倉皇放棄豐潤向外突圍，除一部為我俘虜外，其餘大部向榛子鎮方面撤退。

十二軍亦於九月八日開始向韓城鎮之敵攻擊，將敵擊破後，追至曹江口、馬駒橋之線。三十六軍亦於同日將老莊子之敵擊破，推進至小馬各莊、榛莊子之線，並繼續向開平方面攻擊。

翌日，三十軍及獨立第八師沿平榆大道向榛子嶺前進，到達牛郎山、板橋、國特營一帶，遭遇敵褚玉璞殘部之抵抗，旋即對敵展開包圍攻擊。第十二軍及三十六軍方面，因不斷向敵猛擊，敵軍無法立足，第十二軍遂迅將唐山克復。爾後該兩軍沿京奉路兩側向東併列推進，九月十日三十六軍經數小時之戰闘後亦克復開平。

九月十一日，據守牛郎之敵，在三十軍與獨立第八師之圍攻下，經一晝夜之劇戰後卒不支向東潰退。魏軍長除枋其第一師續向椅子山之敵攻擊外，親率其餘兩師及聯合獨立第八師向雙橋、栗園、後屯一帶攻擊。

騎兵第一軍亦全部由最北翼向南轉至平榆大道，協同三十軍圍攻椅子山、榛山鎮之敵，並防止殘敵向冷口、喜峯口方面逃竄。同日，十二軍及三十六軍亦與中央軍及范熙璜部相連繫，沿京奉路兩側地區續向窪里山一帶推進。

十二日下午，第十二軍與中央軍攻佔窪里、呂家坨之線，敵軍退向古冶。椅子山、榛子鎮之敵則悉向灤河敗退。翌日我各軍全線向灤河推進。十四日，我軍各部次第進抵灤河西岸。我左翼軍總指揮部隨即推進至雷莊車站開設指揮所。張、褚軍殘部當日退往灤河東岸，並將灤河鐵橋炸燬。

當我軍進抵灤河之線時，奉軍亦在榆關以西之遼安、盧龍、昌黎一帶佈防，阻止直魯軍之東竄；並電請我軍暫勿通過灤河以免誤會，更表示願負責解除直魯殘軍之武裝獻給我軍；因此我軍遂在灤河西岸暫時停止監視。同時，張宗昌、褚玉璞亦派遣代表前來，謂直魯軍要與奉軍決一死戰以洩憤，不論勝負，戰後即遵命繳械，全體來降，請我軍務在此時勿渡河相迫。我當將以上情況報告總部，奉指示由我的情處理。此際直魯軍復將軍眷及非戰鬪人員全部送來灤州城，托由我軍照顧，表示誠意。我遂姑准其要求暫緩渡河，並允許其眷屬返回瀋州居住，待其雙方決戰；同時我亦選派人員前往直魯軍內觀察其作戰情形與訪問張、褚等人。據觀察人員回報，張、褚等人坦白表示，奉軍太對他們不起，當初奉軍入關，他們曾盡全力協助奉軍，今日失敗奉軍竟不讓他們出關，還要繳他們的械，因此他們誓與奉軍拼一死戰，將來勝也好、敗也好都決定將人員武器交與我軍，此刻只求我軍暫勿渡河以免影響他們的作戰，並准許他們在瀋州方面採購糧食。

直魯軍與奉軍果然在灤河東岸打了起來，雙方砲戰甚烈，步兵也發生衝突。我派往直魯軍前線觀察的人員回來說：「直魯軍的官兵見到我方人員時，只是帶着苦笑的招呼說『老鄉，您好』，看來情形殊為悽楚，

可笑亦復可憐。」

直魯軍殘部與奉軍相持數日之後，奉軍開始發起總攻，至九月二十一日，直魯軍卒不支放棄抵抗，一部為奉軍繳械，大部則退回瀋州向我軍投降。褚玉璞不知下落，張宗昌則退至瀋河黑夜乘小舟向下游逃遁，爾後據說係由日在瀋河口接應逃往大連。

退至瀋河西岸向我投降的直魯殘軍總計約三萬人，火礮三十門，手槍及步機槍兩萬餘枝。對此大批降軍解除其武裝實非慎重不可，因萬一發生意外，四處迷竄，不免造禍地方。因此一面分發給養，安排休息，並對各級官兵加以慰撫，告知準備將他們送回天津聽候改編，國民政府決寬大為懷不必憂慮，使他們安心。然後將他們按步、砲、騎分別編成若干隊，每隊以一列車載運，每列車相距一小時，依次向西開行。同時指定不同的終點站，並於各終點站分別指派部隊負責繳械。砲兵則直至所有列車開出之後在原地收繳。因各列車到達之終點不同，時間上亦有先後，如此分地隔離處理，結果非常順利，完滿達成解除武裝分別資遣的工作。

直魯軍翦除之後，不久張學良在瀋陽正式易幟歸附中央政府，北伐大業於茲完成，全國統一於此實現。此役戰鬪經過各方記載，多有不同，或略而不詳，或記載錯誤，其實際情形，應依此篇所述，方不致離題太遠。回想我自十五年六月在衡陽開始北伐，至十七年九月在瀋河前線解除直魯軍殘部結束北伐，其間雖不幸因寧漢分裂，一度退回湖南，但不久又歸回北伐行列，在前線躬親作戰有始有終，私衷引為稍慰。

二二、編遣會議

在瀋河前線將直魯軍殘餘部隊處理之後，時東北三省因張學良已有歸附中央之表示，我北伐軍遂於十七

年九月二十六日下令班師。此後第四集團軍前敵各部，除葉琪的十二軍調回武漢整編外，其餘各部隊分駐平東之開平、唐山與北平之南苑一帶，聽候編遣。我的十二路軍總指揮部初期亦駐於唐山附近。

我們部隊的官兵幾乎全都是南方人，慣食米飯，而北方不出產大米，必需自南方運往補給，有時採辦運濟不及，只好改發麪粉。士兵對於麪食最初頗不習慣，而且不會製作，往往煮成糊漿，食後多罹腹瀉。嗣後各部隊長建議，雇用當地人擔任炊爨，並訓練原來的炊事兵學做饅頭麪包，這樣吃的問題雖算勉強解決，但時屆隆冬，冰天雪地，南方部隊原來的草鞋赤腳，自然不能適應，手腳都患凍瘡，深為痛苦。於是又設法購發布鞋布襪和手套。如有社會人士或慈善團體贈送慰勞品，也要求他們改送這些禦寒的物品。

十八年一月，指揮部從唐山移設北平。是月一日南京舉行編遣會議，前後經過將近一月之久，至月底始行閉幕。會後頒發了一個編遣區組織大綱，將全國區分為六個編遣區，並規定各區應予編遣及保留的部隊數量。第四集團軍的部隊是屬於第四編遣區。編遣大綱頒發之後，接着在三月下旬又下達了撤消各集團軍總部及各指揮部的命令。

軍隊的復員編遣問題，早在十七年七月北平的四巨頭會議時，就已商定大致的原則，後來二屆五中全會在南京舉行又通過了五項整理軍事的基本原則，至編遣會議開會時，已不過是討論編遣實施的細節而已。不過在編遣會議中各方意見，對於編遣及保留員額的分配，却存有異議，最後決議案雖勉強通過，但在進行編遣時發生了種種不愉快的事情。循至後來相持不下彼此竟以兵戎相見卒使統一之局又復分裂，兵連禍結，舉國紛擾，影響到建國大業不能早日實行。這都是各方面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能開誠接受編遣的結果。

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奉到中央的命令，任我為第四編遣區北平編遣特派員，當時我已着手準備編遣

事宜，並令各部隊限期造報名冊，以便開始點驗。在此之前傳聞武漢政治分會因改組湖南省政府，使魯蓀平去職一事，與中央方面發生權貴衝突。不旋踵又聞南京中央已向武漢進軍。隨後白總指揮崇德即以視察部隊前去唐山。接著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唐孟瀟（生智）自天津派人持函前來，據說他「已奉蔣總司令的命令前來接收第四集團軍駐平各部隊，現已到達天津，日內即可來平，把晤在即，詳情面告」等語。唐孟瀟是我追隨十多年的長官，自他下野出國，已有年餘未通音問，他此番前來雖然我還未奉到中央的命令，不知是真是假，我都有前往天津迎晤一談的必要。第二天又接白總指揮自唐山來電，大致說他一時不克返平，本軍駐北平及平東各部隊及前敵總指揮部均要我代理統率。旋復傳說白總指揮及廖磊已經離開唐山，經天津轉赴大連去了，又聞武漢方面發生事變，中央已開始對武漢用兵，更有謂中央對第四集團軍駐北平各部隊要如何如何處置等等。一時謠啄紛紛，莫衷一是。此時我既未獲武漢方面的電報，也接不到中央的指示，內心至為焦灼。後來我想孟瀟既來信說是奉命來平接收部隊，衡情酌理，當非虛構，惟此時謠言四起，為了穩定部隊的情緒，我即決心赴津迎唐來平。當時我想如唐果奉有中央指示，為公為私我都應當將部隊交由他接替指揮。

隨後消息證實中央方面確曾對武漢加以兵討，我知道我是處在夾縫當中頗難處決，不消說唐孟瀟之來定是中央經過慎重考慮而安排的了。我當然是遵照中央命令為主，唐到後我即遵照移交，各部隊官兵看到老總司令回來，也自無話可說。唐接收部隊後，番號即改為十五路軍，並電保我為副總指揮仍兼第八軍軍長。前此已經着手的編遣工作，遂亦停頓下來。四月初本路軍即奉令移駐山東曲阜、泰山一帶，旋又開往豫東的馬牧集，總指揮部則仍留駐北平未隨部隊移動。

五月初我得到家父臥病的消息，那時父親已是六旬以上的高年，且平時體弱多病，而我自民國六年離開

廣西到湘軍服務以來十餘年間，只在民國十二年冬返港省親一次，圓聚不過一星期之久，以後即戎馬倥偬再沒有省親的機會。同時我又自小離家，由學校而軍旅，二十多年甚少有晨昏定省的機會，真是子職多虧。想到父親已來日無多，遂電唐總指揮要求准假返港省親。等到我將公務辦妥就緒經南京至上海準備乘船南下的時候，又得到家父電諭，謂病已痊愈，囑我應以國事為重，不必回來。會時部隊剛移駐馬牧集不久，唐總指揮只在北平遙控，部隊的管理指揮實際仍是由我負責，而且那時馮玉祥在河南已與中央發生齟齬，隨時可能發生事故，唐總指揮原只准我返港探視略盡子職之後即需返同，現既得到父親的電諭以病愈不必返港，因此我又趕回部隊消假視事。但想不到這次省親之行，半途而止，竟再也見不到他老人家而遺憾終身了；至今想來還是悔恨之至。

我回到馬牧集之後，那時馮玉祥也繼武漢事變之後，將所部軍隊退回洛陽潼關一帶。在西撤途中，他的部屬韓復榘和石友三投效了中央，馮本人則在華山發出了入山讀書的通電。後來閻錫山也向中央請求辭職，與馮玉祥聯名發出下野通電。這些駭人聽聞的事件不斷發生，都是由編遣會議裏產生的嚴重問題。為什麼編遣會議會發生問題呢？不外是兩種原因，第一種是在會中的諸公，見仁見智的不同或國家觀念輕於個人利益的觀念，不能自我犧牲，其次因我國當時的社會民生凋敝，一般窮苦大眾，為解決他衣食問題，只有報名從軍，當兵吃糧。此時一經當兵不但可以解決他的衣食問題，運氣好時，還可以有升官發財的機會，因此無形中一般人已把當兵當作固定的職業了。官兵之間，不僅是長官部屬的關係，並變成事業上的夥伴。部隊一旦裁撤，所有官兵就等於失業和前程的破滅。若無業可轉只有回家，而家無恆產，又何以為生，當主官者，眼見多年同生共死之部曲，不忍看他墮入溝壑而不予以援手，因之不得不為之力爭。更因北伐完成之後，舊日

的軍隊制度已不適用，新的制度又未成立，大家不免有爭多爭少之事，又因革命過程中，有不少新由軍閥隊裏投降過來的部隊反得留用，老革命軍出生入死的同志反而被淘汰，其不平之處亦遂成爭執原因。不期因爭執不已遂至兵戎相見，使統一之局又復分離真是國家的不幸。假使編遣會議稍緩執行，先召集國民大會，將編遣問題留待國民大會解決或者糾紛可免，這是個人的感覺不是批評。

十八年十月中旬，唐總指揮轉來中央命令，飭本路軍趁日移駐鄭州。我率該部到達鄭州之後，唐亦將指揮部自北平移來鄭州。有一天唐總指揮對我說：「鶴齡老弟，你率領這支部隊兩年未東征西剿，走遍了天南地北，受盡了險阻艱辛，實在多虧你了。你的老成持重和對我們這個部隊的愛護，都是我深所感佩的。現在本路軍已奉 蔣總司令之命將向洛陽馮軍進攻，但是汪精衛先生也是我們所要擁戴的，目前汪、馮之間還沒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將馮軍擊敗佔領陝西後，請你在關中主持一切，我則率領本路軍在河南宣佈獨立，請汪先生回國主政。只要我們宣佈獨立，屆時響應我們的友軍必定很多，不會孤立的。」我乍聽之下，深為駭異，我想他可能又是發生毛病了。於是我就回答，我說：「總指揮的這個作風，委實使我有點憂懼，有再加考慮的必要。前在武漢的時候，總指揮主張東征，我就力主慎重，非我有先見之明，蓋時勢所不許也。那時黨內分歧，以黨派言武漢尚名正言順，以實力言亦勢均力敵，結果尚且失敗。今北伐告成，全國人民久經戰亂之餘方慶更生，南京中央是經過第三屆代表大會所產生的政府，且 國父陵寢所在，蔣委員長功高望重全國人心歸向的象徵，無論內外都已視為正統，就憑我們這點力量要捧汪先生出來主政，不亦難乎！況且本軍既要獨立又要攻馮豈不是自尋末路。」我看他默然不答，我更赤裸裸的說道：「蔣委員長要總座重來領導本路軍，已是不計舊惡，總指揮既已受命就要有始有終，不宜再去作冒險。」這時他似乎欲言又止，且似有

不豫之色，我知他意志已定，無可挽回，隨後我便說此事關係重大，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尚乞再三考慮為是。最後我不待他回答，我便提出要求：「我有一點要請總指揮體諒的，我現在的身體精神與以前大不相同，日見衰萎經常失眠，必須作一個較長時間的休養方可。本來在總指揮到北平之初我就想提出請假的，因總指揮初向我若提出請假深恐叫人誤會。今總指揮一切已安排就緒，我始敢提出請求，請總指揮准我一個稍長的假期去調理，休息兩三個月，將來或者還可效勞。」

唐總指揮對我的一席諍言始終未置可否，只是對我請假一事表示允許，我內心自是感激。後來我到了北平住進協和醫院檢查，索性將副總指揮及軍長各職一併辭却，以便能安心休養。這樣過了一段閒雲野鶴似的生活，感到無比的愉快。北平雖是舊遊之所，可是以往多是戎馬倥偬，走馬看花，難以盡興，只有這次能隨心所欲各處留連，頤和園的亭臺樓榭，故宮的歷代珍藏，以至西山的紅葉白雲，湯山的玉液溫泉，皆得盡情欣賞，引為平生快事。

當我在北平暢遊之際，也正是中原烽火瀰漫之時。自十月下旬開始，蔣總司令誓師討馮，隨即在鄭、洛之間發生激戰，蔣總司令並一度親往河南前線督師。當時唐孟瀟仍率十五路軍參與對馮作戰，蔣總司令回京之後，且曾以前線統一指揮責任委唐。至十二月初，馮軍被棄洛陽敗退陝州，中央軍正擬繼續西進向潼關攻擊。十二月二日，石友三忽在浦口叛變，自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軍總司令。唐孟瀟可能以為機不可失，隨於十二月五日通電擁汪獨立響應石友三，脫離南京政府，將十五路軍改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同時將第八軍自西撤回，沿平漢線南下，進攻武漢。

唐孟瀟此一鹵莽滅裂的行動，其失敗實早在意料之中。中央第一集團軍的部隊自然不會響應他的，而且

當時都集中在豫、鄂境內對馮作戰，近在咫尺，所以一開始獨立，唐軍馬上便受包圍攻擊。同時馮玉祥的部隊在新敗之後，一時亦無力反擊，中央軍乃得全力對唐軍進攻。當時正值隆冬，天寒地凍，四野冰封雪深沒膝，不僅行動不便，連方向亦都難辨別。在此種天候下，原只利於守而不利於攻，尤其南方部隊易受雨雪限制，十五路軍作戰方針，本是南下進攻武漢，今為大雪所阻，違反天時與地利，加之不得人和，結果前後不出五週，便被包圍在郾城、駐馬店一帶為中央軍澈底解決。他這次不聽我的勸告，卒將第八軍第三十六軍算送，真是令人浩嘆。

我在北平協和醫院檢查身體完畢之後，原定十二月初旬返回香港的。及至獲知唐舉兵背叛，深知這部隊處境的危險，乃暫時延緩歸計。因我雖已脫離部隊，仍良不忍其就此毀於一旦，尤其對十餘年患難與共的部屬難以釋懷，希望能在適當機會及可能範圍之內加以挽救。十九年元月初旬，從各方面傳來的消息，判定十五路軍已面臨最後命運，我情不自己即趨謁當時在鄭州的閻總司令（時已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商請他通知前方，由我親赴前線將該部隊接引回來，仍歸中央統轄以免潰散，縱使只能收容一部，將來仍可為國效命。閻總司令立予同意，要我即赴前方，專車直往漯河，可惜當我十三日下午到達漯河時，部隊已於當日上午全部繳械，士兵亦被中央軍各部隊分別收容編散了。唯恨遲來一步，只好悵然而返。當我的專車準備返同北平時，被繳械的各師旅團等部隊長擠滿了我的座車回平，相見之下彼此黯然。他們感認為這真是命運註定有如此慘敗，並說：「若軍長（指我）早來一日，即不會有這樣的結果。」當時我向他們查詢唐總指揮的下落，說是已化裝工人乘煤車逃往徐州去了。嗟乎，昔日南征北剿之革命第八軍竟從此烟消雲散了。

二三、丁憂解甲

河之行，因遲了一步，未能及早引導部隊反正而獲得拯救，已是黯然神傷；而最遺憾的是到達深河的當天，接到家中拍來的電報，得知家父於是月初旬以舊病復發，醫藥罔效，於先一日棄養。由於我想拯救部隊，延誤歸期以致未能與老父謀最後的一面，使他老人家在易黃時猶抱倚問之悲；忠孝兩虧，椎心泣血悔恨。

返平途中，思前想後，真是心灰意冷。返平後本應即日南歸奔喪，無如此際一部份隨我至平的部屬須設法為之安置，或設法資送返籍，不能丟下不管，同時原設在平的辦事處等機構也只有由我來辦理結束，勢須長時間辦理妥當之後始可成行。於是只好電示諸弟，先將父親遺體入殮，覓地暫厝，待我辦完畢，即行回家正式安葬；同時我亦在平設靈遯祭遵禮成服。直至十九年二月初，始經天津買舟返港。

舟出渤海，颶風大作，驚濤駭浪，迎面撲來，余坐艙中頓覺天旋地轉。如此經過約數小時，風勢始稍戢，出詢舟子，謂剛纔情形險惡萬分，其他同自天津開出船隻，均為風勢迫向大連、秦皇島方向駛去，此船幸有巨大鯨魚兩尾夾着船側而行，得以減煞風浪，尚勉能向青島方面駛去。余未目覩，姑妄聽之。是日晚船抵青島，進入港內暫避，俟風浪平靜後始繼續駛港。

抵家後，父親靈櫬業已安厝在香港東華義庄的一處小磚屋內，即由諸弟扶往展拜祭奠，想起父親生我育我以及對我的期望，二十年來事業不過曇花一現，而奉養多虧，方期倦遊歸來謀取水之歡，不料遽爾撒手人寰，且臨終未謀一面，不禁悲從中來，撫棺痛哭。祭奠後仍暫厝原地，因父親生前已立下遺囑須歸葬蒼梧，

當時西江一帶適陳濟棠與張發奎等鏖戰之後，地方不靖，商旅眾足，不得不稍待時日返梧覓安墓園之後，始能運柩回籍安葬。

我在北平辭職養病之時，即感久歷戎行心力交瘁，而世事多變亦感心灰；潔河之行而後，益堅我解甲歸田之志，乃於服喪期間，將先父遺下香港元朗土地，親自率工開為魚塘，兼飼鷄鵝白鶲，以為日後維持家計之需。魚塘挖好之後，擬將週圍空地遍植竹木蔬果，既以自給，亦可點綴風景。不出兩月，鷄寮鷄舍均已建妥，魚塘亦大致就緒，心想數年而後，一竿垂釣，柳蔭蟬鳴，亦足樂也。時香港某報記者於訪問我後刊出報導，以我畜養魚、鷄、鵝、鴨，陸海空無不俱備，因說李某乃北伐健將，戰功彪炳，現丁憂歸來，仍以訓育海、陸、空軍為樂，真是跋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可說雅謔之至了。

是年夏，當我所聞的農莊粗具規模的時候，迭接李德鄰、白健生兩位前後由長沙來電，約我赴日前赴長沙有事相商。我以長官屢電敦促，復以在湘十年，昔時友好與軍中袍澤，亦多來函邀約敘晤，因是舊情復熾，遂於六月初經廣州逕赴長沙。時白健生已赴岳陽方面指揮作戰，與李總司令相見之下，彼此都不勝感慨。由北平十二路軍的改編與我爾後卸職的情形，以至丁憂返港的事，他都一一垂詢並多方安慰。最後他說到他與馮、閻相約會師中原的計劃，並以我在湘多年頗得人和，要我替他負責維持後方支援前線的工作。我當以缺少經驗，後方工作煩瑣非我所長，又以我在香港新聞農莊甫行經營乏人照料，而先父歸葬的事也已不能再緩，否則尤虧子職，請他另擇賢能。如此推脫再三始終未邀諒解，只好應允暫為照顧。

先是是年三月，馮、閻、李等高級將領通電反對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汪精衛適亦自歐洲返國通電響應。中央派軍分路討剿，以是中原戰事益形擴大，李德鄰、張發奎遂亦於五月中由桂出兵遙相呼應，於奪取長

沙之後，擬繼續向武漢推進。余抵長沙之際，正值四、七兩軍向岳陽推進中。

余既力辭不果，李總司令遂委以湖南善後督辦一職，並撥第七軍之獨立團王中英部及原第八軍留湘之周闡、唐生明、李澤民等湘軍部隊隸余指揮調遣，同時組織湖南善後督辦公署，處理湖南後方一切事宜以及維持地方治安之責。

至六月中旬，形勢突變，中原方面馮閻各軍未能進展轉趨不利均向後撤退。中央軍遂由河南、山東各處抽集部隊沿武長路南下，有進迫湖南之模樣，與此同時在廣東方面的第八路軍，亦由韶關北上向衡陽進攻，其先頭已到達郴州。此際第七、四軍已不免有腹背受敵之感。而前進既不可能，如令衡陽失守，爾後更陷於危殆。因此，七、四兩軍遂放棄向武漢進出之企圖，即日由岳陽、平江經株州、醴陵沿湘江東岸向湘南轉進，擬迎擊第八路軍於衡陽以南，予以殲滅，藉保後方連絡線之安全，當時並令留在廣西之黃旭初師由黃紹雄率領經道州向湘南前進，截擊第八路軍於耒陽附近。我則率領王中英、唐生明兩部維持長沙秩序，至最後將長沙交歸何健方面維持，始離開長沙。第八路軍因先佔領衡陽，據城而守，第七、四各軍乃迂迴至常寧、松柏附近渡河轉至衡陽之西南方面，對衡陽發起攻擊。無如第八路軍已佔有堅固之城堡，一時不易攻克，雖劇戰數晝夜毫無進展，由湖北南來的中央軍已紛紛入湘，於是李、白、張等人決定仍退回廣西，遂於七月下的經祁陽、零陵，全師而返。

第七、四各軍由岳陽、長沙向湘南轉進之後，湖北南下的中央部隊即尾隨急進，在六月十七日晨已逼近長沙。當時我為維持長沙治安起見，我個人仍在城內坐鎮，至是日入夜城中守兵均已出城我仍在城中未去。當時長沙的父老獲知我尚留在城內，頗為我的安全着急，都前來勸我早離省城為妙。我只是笑而不答，最後

我向他們說道：「我是維持長沙治安的，不是與他們打仗的，我懼怕什麼。」直至午夜十二時左右始離開長沙，此時敵軍便衣斥堠部隊，早已到達城邊。我恐敵軍斥堠混入車站，已早經派得力士兵在車站附近巡邏警戒，並管制列車人員之行動。登車前將所有燈火一律熄滅，並吩咐司機途中不得任意停止。當我們上車完畢，列車開行甫出車站之際，忽槍聲四起齊向車上射擊，列車則在彈雨中繼續加速前駛。其時我與參謀長程宗洛同坐床沿，一彈恰自車窗飛入由我之頭部後側擦過；我幸僅傷及皮膚，而我的參謀長却正中頭部，当场殉難，倒在我的膝上。這真是驚險的一幕。程君宗洛廣西桂林人，也是保定的同學，其人才氣縱橫，不幸捐軀，至堪痛悼。後來回想，所幸當時敵軍未將鐵軌破壞，否則誠不堪設想。

我由長沙撤退到祁陽與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會合之後，當時本想立即取道返港，以韶關道路行走不便，只好隨軍退到桂林。到桂林後，我請求讓我返港為先父營葬，及照料我的魚塘事業，但李、白、張等極力挽留，非要我擔任總司令部的參謀長不可，同時家鄉父老亦以為桑梓服務的大義相督責；至於營葬先父的事，答應一俟梧港間交通無阻，即准我返港進行。我與李、白、張諸公平日亦頗相得，今見其意氣誠摯，遂不忍患難相棄，只好應命了。

二四、建設廣西復興中國

第四集團軍退回廣西之初，處境非常險惡；滇軍盧漢的九十八師、張冲的二〇一師、和朱旭的九十九師正向廣西當時的省會南寧圍攻，城內由十五軍軍長黃旭初率領之韋雲淞師固守，可說相當危急。此外，又有余漢謀率領粵軍第六路沿西江而上，自梧州至桂平、貴縣、賓陽一帶都為其部隊所佔領，切斷了西江上游及

邕、柳間的交通。劉建緒的湘軍第四路和原由廣東到達衡陽的第八路，也尾隨本集團軍之後，向桂林、平樂一帶進迫。桂軍主力當時只有困處於柳州、宜山、河池一帶。

由於各客軍的深入廣西，省內政令已不能普遍行使，交通、經濟亦陷於停頓，軍需物資與金融財政同告枯竭，而土匪散兵復乘機騷擾，整個局面頗有難以支持之象。

廣西為了挽救這種危局，自非首先將外來的客軍排出廣西不可，尤其必須先解南寧之圍，維持省政於不墜，然後才能鼓舞民衆協助政府和軍隊，安定秩序，再謀政治經濟的健全發展，及軍隊的整理補充。本軍於是經過短少時間的整領補充之後，於當年十月中的首先以主力展開對滇軍的攻擊以解除南寧之圍。

整個作戰部署，是由黃紹雄（季寬）指揮原來留守省內的部隊於荔浦、修仁、鹿寨、黃冕之線採取守勢，對付平樂及桂林方面的第四路及第八路軍。第八軍的一部附軍連芳的一個團，在遷江、來賓間牽制余漢謀的第六路，使其不能向南寧方面轉移，並阻止其向柳州前進。主力四、七兩軍由白健生指揮，經上林繞出高峯坳之左右兩側，分向南寧前進，夾擊滇軍之側背，並與南寧守軍連絡使同時策應出擊。此外，另以李白雲率所部由龍州東下攻擊南寧對岸亭子圩之敵，羅活之獨立團由武鳴進出於崑崙關附近擇險固守，阻止余漢謀部應援滇軍。

以上對南寧外圍滇軍採取攻勢之各部隊，規定於十月十一日到達攻擊準備位置，十二日同時發起攻擊。

圍攻南寧滇軍各部的位置，是盧漢的指揮部在窯頭，朱旭的指揮部在心圩，張冲的指揮部在亭子。本軍攻擊發起之前，南寧附近的老百姓曾就滇軍各部所在地名的諺音，傳出一種民謡，說是「張冲停止，朱旭心虛，盧漢搖頭，不敗何待」。這首民謡傳到軍中，大家認為滇軍已呈敗兆，頗增加了勝利的信心。攻擊發起

之後，果然大家勇氣百倍，奮勇直前，一鼓作氣而解了南寧之圍。

南寧外圍的滇軍經我內外夾擊之後，分別向田陽、靖西方面逃竄，我軍跟蹤追擊直至百色以西，將其驅回雲南境內方行停止。沿途繳獲滇軍遺棄的槍枝械彈甚多，雅片烟亦復不少，對我軍戰力的恢復可說不無小補。

滇軍被桂軍擊退竄回雲南之後，余漢謀部亦不欲久留境內，隨亦向廣東境內撤退。桂北方面的第四路及第八路軍也相繼退回湖南。因此遂解除了廣西的危險局面。

我隨着余漢謀軍之撤退，即率第八軍各部於十一月初收復了沿江各重要縣城及梧州市。回到梧州後，覺得父親遺體歸葬之事不可再事遲延，尤其不可錯過這次機會。這是我於此次回桂的主要目的。我於是立即派人赴港協助諸弟將家父的靈柩運回梧州，同時托人在家鄉長州附近選擇墓地，並鳩工興建，旋即發引移靈安葬。家父在鄉里素為地方父老所欽敬，發引之日設奠路祭及執拂送葬者，沿途絡繹不絕。

先父葬事料理完畢之後，因前在港經營的魚塘工程，中途停頓乏人照料殊覺可惜，故又重返香港。此次返港本擬決心歸農，經營漁業，惟不數日，李、白兩公均來電催迫返桂，尤以李總司令且派專人來港挽我回桂，情詞殷切，加以父老們也從中督責，不得已又祇好返回廣西，重作馮婦。

我於二十年初回至桂林，那時北方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等經由擴大會議籌組的政府，由於軍事一再失利，張學良不肯入夥，早已烟消雲散，馮、閻相繼下野。廣西方面雖已將外來客軍排出省外，但整理軍政，休養生息也需要長時間的和平安定，同時李、白、黃諸公認為同室操戈的局面不宜再有，否則實無以對。國父在天之靈；今後無論任何方面，不應再有意氣之爭，應轉移目標一致對外，因此決意改弦更張，停止內

戰，從事省內建設，並率先實行以資倡導，俾能化干戈為玉帛，變戾氣為祥和。於是一面準備召集黨政軍會議討論復員整軍，及今後建設廣西，革新黨務諸問題，一面推請黃紹雄先生親赴南京表達廣西軍民今後和平建設的願望。黃紹雄先生去京之後，後來中央發表他出任內政部長，廣西省政府主席一職乃由黃旭初先生專任。黃主席與軍師長雲淞此次堅守南寧省會為時數旬之久，俾廣西得從容恢復可說厥功甚偉。

黨政軍會議經籌備多時後於二十年春在南寧召開，與會者除黨政軍高級人員外，並邀請海內外學者專家多人參加研討，以期博採周諮，羣策羣力，助此盛舉。會中，李總司令首先致詞，大意略謂列強環伺，中國早已淪為次殖民地的地位。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便是要挽救中國。而民國肇造以來，始則袁世凱竊國，軍閥弄權割據，陷國家於分崩離析者十有餘年。北伐成功，方期統一，一致對外，奈何復以兄弟相爭，同室操戈，言之痛心。往者已矣，吾人今日決率先倡導不再逞意氣之爭，集中一切力量從事國家的建設。廣西是中國的一省，中國亡，廣西的一切必同歸於盡；反之，廣西若能壯大起來，對整個中國的復興，必會有極大幫助；因此我們今後要以從本省的建設作起，進而求中國的復興，作吾人的奮鬥目標云云。

李總司令訓示之後，白總指揮健生及黃主席旭初都相繼發言。指示要點如下：白所講的主要的是說今日吾人要建設廣西應以總理的三民主義為依歸，也就是要切切實實去實行三民主義。今後全省全省一千三百萬軍民努力的目標便是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黃主席講的是說明「三自政策」。他說：我們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廣西，必須先定下三自政策作為準繩，三自政策即是自治、自給、自衛，三自政策係淵源於三民主義而來，三民主義係建設目標，三自政策係工作準繩。今後，凡屬政治建設、經濟建設、軍事建設，以適合於自治、自給、自衛為主旨。如何實現此項政策，希望大家多提意見與辦法，共同努力。

最後我貢獻於大會的是屬於軍方面，關於軍事方面。除了整理現有的軍隊而外，便是如何改革軍制。我認為二十世紀的戰爭，兵不但貴精而且貴多；須有大量的兵員才能應付多方面的戰爭與長期的消耗戰，自然也必須有優良的訓練、嚴密的組織、旺盛的精神。要達到兵多的目標，最好是全國皆兵。全國皆兵則凡屬適齡壯丁皆須有服兵役的義務，所有壯丁平時即按軍隊的組織及管理方法，依區、縣、鄉（鎮）、村（街），甲的行政區域劃分，組成總隊、大隊、中隊、分隊、班的系統，層層節制，擔任地方的自衛，或集體工作從事公共性的建設，戰時則隨時可編成正式的軍隊出發作戰。至於常備兵役更要改為征兵制，廢除以往招募的方法。軍中的下級幹部，也必須加強教育訓練，並大量的培養，始足敷用；會後即成立黨政軍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

大會閉幕之後，全省的建設工作即逐步開始規劃實施。軍事方面由白崇禧總指揮負責，省政方面則由黃旭初主席負責，李宗仁總司令則擔任全般指導以總其成。是年秋日本在東北製造「九一八」事變，全國上下團結禦侮之呼聲響徹雲霄，廣西之建設工作亦因是益為積極；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軍事建設都齊頭併進。發現問題就集會研究討論，一經決議就貫徹執行，發現錯誤決不諱疾忌醫或文過飾非，隨時加以修正或補充，真是做到了羣策羣力。至二十四年底，常備軍的整理已經完成，官兵的訓練、裝備的改良，均有相當成效。民團組織普遍完成，全省三百萬壯丁均已接受初步軍事訓練。鄉（鎮）、村（街）均採三位一體的組織，即鄉（鎮）長兼民團自衛大隊長，及中心國民學校校長。所有鄉（鎮）長都是民團幹部學校畢業的學員充任。征兵制度也正在建立。國民學校普遍成立，教育相當普及，文盲已大為減少。

偷漏。公務人員和學生一樣，一律都是淺灰色的制服，生活簡單、樸實。黨務工作也有一番改革，即嚴密組織、肅清遊離份子、淘汰腐化份子，認真開小組會議，舉凡一切問題，得由小組討論提出意見，彙交軍、政主官參考採納。

我於二十年初返廣西之後，為整頓軍隊，首先辭去我自兼的第八軍軍長一職，專任總部的參謀長，殘餘部隊則撥編入第七軍。不久於南寧創辦軍官學校第一分校，李、白兩位要我出任該校校長。這是我最樂於擔任的工作，因欣然從命，總部參謀長一職即交由葉琪（翠微）接任。

軍校校址選在南寧城外，創辦之初華路藍縷，經數月之籌劃始具規模。受訓人員分為學員及學生兩班，學員班為輪流調訓軍中現有中下級幹部，一年六個月畢業。學生班招考高中畢業學生，三年六個月畢業，採用保定軍官學校課程及訓育方法。教育人員多為保定軍校畢業同學，教育長為留學日本多年之劉士毅先生。

軍校於二十一年春正式開學。一個學期之後，於是年八月我又在整理邊務的需要下，出任廣西邊防對訊督辦，後來又兼左江區行政監督及龍州區民團指揮官。是年冬我前往龍州就職，軍校校長則由白崇禧總指揮兼任。

二五、三年邊務

所謂「邊」是指中國與安南（即今越、寮、柬三國）的邊界而言。安南在滿清光緒以前原為我國的屬國，本無邊防之設，至光緒十一年中法戰役，清廷昏瞞無能竟以勝兵而與法國訂立天津條約，放棄對安南的宗主權，成為法國的殖民地，從此中國與安南始有邊界問題。中國與安南的邊界東起廣東的東興經廣西以至雲南

境內瀾滄江所經之新寨附近止。為處理兩國邊界糾紛，前清張之洞總督兩廣時，奏請清廷特設邊防督辦，以蘇元春提督兼任斯職，督辦公署設於龍州。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中法雙方議定為查緝雙方走私越界份子，另設置對訊機關辦理來往商旅簽證查驗事宜，於是又成立全邊對訊督辦。嗣將邊防與對訊兩督辦署合併，遂稱為廣西邊防對訊督辦署。對訊督辦一職，自前清開始，擔任人員迭經更改，迄民國二十年時係由廣西省府委派防軍師長韋雲淞兼任鎮南清鄉司令及對訊督辦。在此以前擔任督辦之人員多屬文人，且政府常假此以為酬庸或使閒曹濫竽充數。清末民初國內紛亂，政府當局更無暇注意邊防的重要，及維持國家的尊嚴，以至尋國變權，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之事，屢見不鮮。甚至界碑為對方擅自移植，變更界址，亦無人過問，日久湮滅無形中失地不少。土匪流氓則利用邊地為逋逃之藪，騷擾地方打家劫舍不一而足，劫奪自越者窩藏入華，劫奪於華者則窩藏入越，不僅商旅絕跡，且成為社會的亂源。因此經過廣西黨、政、軍聯席會議的討論，決定大加整飭以固邊圉。

在民國以前，對訊督辦一職多由當地之文武官員兼任，故督辦公署甚為簡單，僅增設一、二官員專司對訊外交事務即可。民國二年由林紹斐專任後，始單獨組織督辦署，署內除督辦、副督辦外，下設軍事課及外交課分掌邊防及對訊兩大職責，另設收支、庶務、收發、檔案、監印、校譯等單位；其後雖偶有修改，大致變動不多。我在接任時，原是專任邊防對訊督辦；後來由省府和總部商量提出聯席會議又要我兼任左江行政監督及龍州區民團指揮官；於是一身而兼有四職。

邊防、對訊原是合併為一的機構，行政監督與民團指揮官是另一個二合一的組織，故實際須有兩個機構。為了工作方便，將各機構集中於督辦公署內合併辦公，督辦公署仍設於龍州。

督辦公署內部，按當時需要設參謀長一員負綜合協調之責，署內業務分由三科負責；第一科主管軍事，科長為鍾紀上校；第二科主管外交，科長為吳助之；第三科管總務，科長為黃少伯；參謀長則為胡朝俊少將；各科視業務繁簡各設若干職員及秘書。

督辦公署之下，沿廣西邊境通往安南境內之重要通行地點，各設對訊分署，每分署設對訊委員一人，任該訊區內治安及訊署一切業務。當時廣西通往安南邊境設有對訊分署的地點計有九特、愛店、鎮南關、平而關、水口、碩龍、龍邦隘、平孟隘、百南等九處。同時設有訊警隊計十五隊，每隊設正副隊長各一，班長三，士兵三十名。每一對訊分署配屬訊警一隊，歸委員指揮，維持訊區治安，稽查出入人員，及查驗過境證件等工作。其餘各隊則控置於督署供臨時差遣，以及輪流實施訓練。我到任之後，原有老弱士兵悉予淘汰，另募精壯人員補充；原有之陳舊武器亦一律繳銷，換發新武器；其他裝備及服裝亦換發新品，以壯軍容。

此外督署之下設邊務學校一所，專供養成訊務、軍事、外交等人之需，由我兼任校長，以劉鵬九為主任教官，總理教務，另聘專家擔任教授必要課程，招考高級中學畢業生，三年畢業，畢業後派在署內及各分署工作。邊務學校以往雖亦曾辦理，然中途停辦未能收效，我就任後認為確屬需要，乃繼續開辦。

廣西與安南邊境之對訊分署，在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中法兩國初訂會巡章程時，原係七處，其後幾經增減，至光緒卅一年改為九處，嗣後迄未變更。九處中以鎮南關、平而關、水口關三處最為衝要。鎮南關原名鷄陵關，又名大南關或界首關，明永樂時一度更名為鎮夷關，位於憑祥之南，距龍州百四十華里，為中越交通孔道，為全邊商旅往來最繁密之處，並經常有法人來此遊覽觀光，認為是中國有名的關塞；中法戰後法軍為我國馮子材軍擊敗即在此關之外。抗日戰爭初期，日軍尚未進攻中南半島之前，鎮南關、平而關、及水口

關三處一度成為我戰略物資輸入的要道。平而關在龍州之西南，相距約七十餘華里。水口關在龍州之西北，相距約八十華里；龍江流經其側，故有水路可通龍州；與水口隔河相對之駁隆設有法方的對訊辦事處。前曾提及陸榮廷在水口充訊警時為對岸法方所蓄之警犬所傷，即是此處。水口原設有國際橋，並有汽車路可直達越北之高平，在我出任督辦前該橋業已毀壞尚未修復。水口附近青山綠水，風景如畫，媲美桂林。

除鎮南、平而、水口三處外，其他各處訊所均係偏僻小道，重要性較少，惟既為雙方來往交通之地，仍不可忽視。在蘇元春首任邊防督辦時，他確曾下過一番苦心，投下巨大的人力、財力；沿邊各險要處所及關隘上，均親自督率開山闢路，構築砲臺。當我就任之後前往各處巡視時，這些當年構築的砲臺仍然存在。全邊砲臺總計大小百餘座，壘上的火砲均購自德國。最大的火砲，其口徑達十餘英吋，砲管長約丈餘，雖已陳舊無用，然虎踞森嚴雄風猶在；尤其此等砲臺多築於懸崖峭壁間，彌懷昔日工程之難巨，令人肅然起敬，苟無雄心魄力是無法辦到的，費用之巨大也難以估計。據傳說，所有建築及購置火砲的費用，並非政府專案發給，而是蘇元春節約郵隊的飼餉所得。聞當地人士言，當時蘇元春督辦對他的部隊是不發餉的，如部屬向其索餉，則曰：「你們有槍有彈，為何還向我索餉。」以致他的軍隊紀律最壞，到處搶刦。後為岑春煊參奏清廷，受到革職充軍的處分，死於新疆。其實他並非貪污，軍餉都移用於購砲築壘了。其情可原而遇可憫，良足悲惋！

中法戰役之後，安南成為法國屬地，使中法因而毗鄰，法方人員對我國官民都以戰勝國自居心存藐視，我方軍民自亦以仇敵視之，此種心理當足為邊務之障礙。我到任之後，為革新邊務，舉凡以往不合理之事，與不平等待遇等皆一一提出與法方商討，互相改善。法方此時亦樂於與我開誠相見，共商修改。至民國二十

二年，法國越南總督，眼見廣西的政治軍事，日新月異，一切措施，迥異以往，特數次派員前來，邀請我方軍政當局，前往越南觀光，並參觀法軍的秋季演習，表示重修親善之意。我方為禮節起見，不便拒絕，我遂於是年秋偕同黃主席旭初一同赴越訪問。法駐越總督對我們禮遇甚隆，同時越南王保大亦設御宴相待，宴畢並授我以頭等寶星勳章一座。

在參觀法軍演習時，見法軍部隊的服裝形形色色頗欠整齊劃一，且當其部隊經過我們的座車時，居然有些士兵脫離隊伍跑到我們的車前手舞足蹈，大叫大笑，並將車頭的引擎蓋敲得叮噹作響。當時我想他們的軍隊，自由浪漫未免離譖，紀律未免太差。後來法軍在第二次大戰，以及更後來在越南奠邊府的作戰中，遭致慘敗，實有由也。

因為除了邊防對訊督辦之外，我還兼有左江行政監督及龍州區民團指揮官的任務，因此同時須督導邊區各縣，依照省府所頒的施政計劃及工作綱領，健全基層政治組織，劃分鄉、鎮、村、街區域，成立鄉、鎮、村、街、公所，調查戶口，編練民團，成立各級學校，本三位一體的精神，三自政策的基本方案，齊頭並進一致努力。我每年親自前往各縣及各訊所三次，並依需要召集各縣長及有關人員至龍州督辦公署共同研究檢討，改正工作的缺點及推動新工作。

龍州、靖西一帶邊區，原屬高山峻嶺，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山間谷地多是苗猺集族而居，起居飲食及風俗習慣與漢人大相逕庭，仍留於未開化狀態，巢居穴處之跡猶存；卽山區的漢人，亦以交通不便文化落後，其風俗習慣亦甚多奇異之處，如吃姜葉（可能即是大麻葉）、染黑齒（越南鄰接地區亦有此習俗）、信鶴鬼、放盜等，均為內地居民聞所未聞者。他們的男女婚配極為自由，不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歌圩

中自由選擇。所謂歌圩即是在喜慶節日或趕集之時，青年男女集在一起唱歌跳舞，利用歌詞互通傾慕，互通情愫，彼此鍾情之後，即可自由結合；惟新婚之初不住夫家，必須生育後始回夫家居住。凡此陋俗均非短時間可以改革；必須在交通發達及教育普及之後，始可期其默化潛移。

邊界一帶因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故林木茂密，野獸繁滋，虎豹熊狼麋鹿狸蛇所在多有，尤以蛤蚧是這一地區之特產，為中醫之貴重藥物，據說能壯陽補腎。我對狩獵頗饒興緻，故常於公務之餘，約同防軍中善於畋獵之官長，外出狩獵，每次多少總有收穫。有時且利用暗夜行獵，利用獵燈找尋野獸或屏息伏候於山崖間，俟野獸經過予以邀擊。某次我與防軍師長宣雲派出巡平而關，一時興起相約夜獵，深夜在外山邊突然發現兩顆閃閃發光的眼睛，以為是鹿羣之類的動物，逐漸向其接近後仍見其目光不斷閃動，其他部份在黑夜中雖以獵燈照射亦難以辨識。一般野獸於黑夜中見到燈光時必企立不動定睛而望，因此很容易發現其眼中反射的光芒便可向此目標射擊。於是瞄準它的眼光予以發射，槍聲響處該物大吼一聲向我疾奔而來，我急向側方閃讓，該物遂經我身旁疾衝而過，因係暗夜仍未能加以辨別，完條何種野獸。但憑其吼聲與足音判斷當係龐然大物。野獸受傷後性情兇暴，最易傷人，我心想既已將它打傷黑夜中不宜再行追捕以免發生危險，乃收槍回村安睡。翌晨我們相偕轉往鎮南關，出村未及兩里，途遇村民向我報告說：「青辨昨夜行獵打死了我的牛。」我說：「昨晚竟誤打了你的牛，既然誤打你的牛，自然須賠償你牛價。」我隨取了五十元的安南幣給他作為賠償（相當於本省當時的省幣一百伍十元），並說：「死了的牛也送給你們宰食罷。」那時五十元的安南幣，足足可以買進兩隻牛，村民自是歡天喜地道謝不迭而去；經此之後我也提高警覺不再在夜間狩獵了。

敵或愚弄他人。中蠱毒者於一定期間內開始發作，腹部膨脹如鼓，睡臥不寧，精神委靡；除非在發作前服用施蠱者之解藥解救，否則一經發作，不久即行死亡。中鷄鬼者的症狀為發高熱，神智昏亂，喉內嘎嘎作響有若鷄鳴，至此亦多無救。我當時認為放蠱與鷄鬼都可能是特殊的疾病，土人故神其說，以訛傳訛，歷久遂成荒謬不經之邪道迷信。因此，我特地聘請過一位德國名醫前往龍州實地調查。他也認為可能是熱帶森林之特殊疾病，需詳加研究試驗，始可找出原因。可惜當時醫藥研究設備不足，未能作進一步研究。

二六、再任總參謀長

二十四年的夏天，當我在百色巡視邊務途中接到南寧總部發來的通知，前往南寧出席黨政軍聯席會議。會議後的第二天，總司令部參謀長葉琪忽然因墜馬身故，參謀長一職無適當人員接替，李總司令又要我回總部擔任參謀長。於是遂再作馮婦，將對訊督辦、行政監督及民團指揮官諸職，交由韋雲淞師長兼任；邊防督辦一職則予以撤消。

葉為人慷慨豪放，心地坦白，不拘小節，且疾惡如仇，素性好勝，畢業於保定軍校騎兵科，平時好騎快馬，以騎術優良誇示朋輩間。當時廣西設有馬種改良所，購有來自國外的種馬，後又有華僑某君送來馬場快馬三匹，葉遂就中挑選一匹作為自己的乘馬，每日清晨往總部上班，總是騎馬衝殺疾走，以示不忘馬上生涯。

黨、政、軍聯席會閉幕之翌日，葉照常自家中騎馬上班，行至大街轉角處，恰巧有一工人，背着一捆竹桿，從側道出來穿越馬路，一時閃避不及，馬腳為竹梢所擊，馬負痛受驚遂狂奔起來，一時無法控制。當馳

至總司令部營門正欲入內時，忽又掉頭向大街馳去，旋經過離總部營門百餘公尺之一處豬肉店前，馬突失前蹄，前足跪地，突又一躍而起；就在此一仆一躍之瞬間腹帶繩斷，連鞍帶人將葉拋出馬前數尺，倒栽着地，當場頸骨折斷，氣絕身亡。葉與我自同在湘軍中任下級軍官起，幾近二十年患難與共，英年突遭變故，資志以歿，不勝悲悼。

從葉之死聯想起一段與葉有關的怪事。那時南寧鄉下有一俗稱仙婆的老婦人，據說她能召請鬼神附體說話，卜問未來休咎。葉死後不久，有一天白健生總指揮偕葉的外甥，往城外遊覽，歸途路過仙婆處，一時好奇興起，遂往仙婆處，請他代召葉參謀長的靈魂說話。白當天身穿便服輕車簡從，仙婆當不知其身份，同樣也不知葉琪是什麼人。他們將所要找人的姓名籍貫告知仙婆後，仙婆焚香楮，口中念念有詞，少頃雙目緊閉，面色為之一變，聲音神態都酷似葉生前，前來與其外甥談話。其甥問當日騎馬出事經過，仙婆完全以葉的口吻，說來歷歷如繪。最後並告其甥說某處的抽屜內有他一個玉錶墜，鑰匙交與何人保管，可取回留作紀念。歸來後，依囑往該處尋找，果然不爽。我從來不信鬼怪邪說，但此事是白健生親身經歷，事後親自告我的，我想絕非虛構。

廣西在民國二十年以來的這幾年間，由於上下一心邁進從事，確實在各個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在我再度接任參謀長之後，目睹這種現象真是無任欣喜。這幾年進步很快的原因，除了決策的正確，上下團結一致的奮發外，而最重要的是「九一八」事變之後，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對我一連串的侵略行為，激起了大家救國的情懷。

在我再度擔任參謀長後的二十四、五年間很多名流學者前來本省訪問，都一致給予佳評，尤其對於民國

組織、學生軍訓感覺興趣。這兩種制度在現在看起來並無新奇之感，但在當時確是全國的首創。那時我們認為對日抗戰的基本條件，乃是廣土衆民，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砲，必須全民武裝起來，在每一寸土地上，每一個角落裏，同他糾纏到底始能有濟。基於這一戰略概念在軍事建設上確定了寓兵於農，寓將於學，寓徵於募的所謂「三寓政策」。

大概是在民國二十一年，首先成立了民團幹部學校，招考各縣中學畢業的青年，授以軍訓半年；畢業後派回各縣擔任鄉鎮長、村街長兼民團自衛各級隊長，同時兼中心國民小學的校長，集管、教、養、衛的全責於一身，這叫做「三位一體」的制度。

民團幹部學校總共只辦了三期左右，受訓的多是三十歲不到，受過中等教育的農村青年。那時省內教育很不普及，各縣受過中學教育的並不多；受過大學教育的更是鳳毛麟角。這是因為在此之前，省內還沒有大學，中學畢業後要投考大學，不是去廣州、香港，就得去上海或北平；在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的當年，肯令子弟遠道求學的家長，真是少之又少。

各縣受過中學教育的青年雖然為數不多，但他們的出路却極為有限。在當時的社會情形，中學畢業生既不能升學，又沒有工商企業可以容納，耕田又不耐苦，除了在鄉鎮中擔任小學教員而外，簡直無更好的職業可供選擇。因此民團幹部學校招生投考的相當踴躍，對建設地方衛國保家的政治活動，自然會表示極大的熱誠和興趣。

這批民團幹部確實發揮了預期的功效，一般說來做到了公正、廉潔，能獲得多數民衆的擁護，做事有活力、有魄力。為政在人，有了可用的幹部，基層政治建設自然容易收效；所以不到一年，政令的貫澈和地方

的治安都有了很大的改進。在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抗戰開始前後這段時期，廣西的農村社會即使尚未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但盜匪確已絕跡。這都是民團組織的力量，所有的壯丁都加入了民團組織。那時雖沒有無線電廣播收音系統，但鄉村的電話網很嚴密，由省到縣，由縣到各鄉、鎮公所都有有線電話連絡，各鄉、鎮的民團自衛大隊隨時可以很快的集合起來，擔任一切的任務。民團自衛組織健全了，內部的宵小完全斂跡，外部的姦宄很難混雜進來，混進來的也很容易發現和消滅。民國二十三年冬共匪在江西無法立足大舉向西流竄，經過湖南之後，不敢進入廣西，就沿湘桂黔邊境向貴州、四川方面竄逃，可能是瞭解廣西的民團組織使他難以滲入和立足的關係。

其次是學生軍訓，從初中起就實施軍事管理，學生一律住校。初中畢業後實施半年的集訓，相當入伍教育，必須集訓之後始發給文憑，才可以投考高中。高中以上的學校更加強軍事課程，每人都配發有武器，例假外出都一律穿軍訓制服配帶刺刀，從外表看來幾乎和軍官學校的學生沒有分別。

學生軍訓除了寓將於學的目的外，還有導學生運動入於正軌的作用。那時的學生對政治相當敏感，國家民族的意識和情感非常強烈。「九一八」事變以後，京滬平津各地學生遊行示威請願的事經常發生，其他各省的學生也羣相響應。這種學生的愛國運動原是無可厚非的，不過情感的偏激也很容易受奸徒甚至敵人的利用。實施學生軍訓，讓他們感覺自己是在準備對國家民族作更直接的貢獻，使學生的愛國運動在政府的指導下作正常的發展。

記得在民國二十四、五年，那時有一個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的組織，各省也成立了分會，學生救國運動風起雲湧。絕大部份學生的動機都是純潔的可愛的，但也有少數是受共匪的操縱，不免有越軌的情形發生；

平津一帶學生與軍警衝突之事常有所聞。我們為了避免學生鬧事，發生不幸事件，政府不但不正面去壓制和干涉學聯分會的活動，反而加以輔導，給予很多方便。例如當他們召開全省學生代表大會時，由政府津貼旅費、安排交通工具，以及招待各地代表的食宿，這樣表示政府與他們是站在同一立場，他們自然不再反對政府，聽從政府的指導。所以在那幾年，其他各省都有學潮發生，尤以平、津、京、滬為甚，惟有廣西學生從未有過反政府的遊行或示威；這乃是因勢利導使然也。

除了上述革新基層政治組織，編組民團，訓練壯丁，以及實施學生軍訓而外，其他如教育、交通、財政、經濟等方面也不遺餘力。在教育上，以普及教育掃除文盲為主要目標，每村設國民學校、鄉（鎮）設中心小學，每縣設中學，同時創辦廣西大學，培養各種專門人才。在交通方面，除了前面談到的鄉村有線電通信系統外，並積極推展公路建設，湘桂公路、黔桂公路，及由南寧經龍州至鎮南關的公路，都是在此一期間完成的，其他縣級公路更不計其數。據當時的統計在全國各省中，廣西的公路網，依面積的比例而言當首屈一指。在財政、經濟方面，廣西是比較貧瘠的省份，物產不豐，只有靠開源節流以資挹注；如節約浪費，整理稅收，剷除貪污，務使涓滴歸公。自民國二十二年至廿五年間，為了充實軍備，每年軍費支出約佔全省歲收百分之四十，數達三百二十餘萬元。增加的軍費主要為購買武器；在民國二十四、二十五兩年中，向比利時購買了步槍六千枝，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克虜伯七五公厘山砲二十四門，步機槍彈千餘萬發，又成立航空大隊購買小型偵察驅逐機十餘架，總計用去數百萬元。在民國二十五年還向日本騙取了九五式戰鬥機九架，步槍一萬枝。這批飛機和步槍雖然未付現款，但運費及特別支出仍達數十萬元。此外，還成立了航空學校、馬種改良所、血清製造廠、兵工修理廠、水泥廠等。這些都是「九一八」事變以後至抗戰開始前的五、六年

間，從華路樞紐中，慘淡經營的成果。以上所說的，在先進的國家或富裕的省份看起來是不值一提的，但在貧瘠的廣西而言，則屬竭盡一切力量才能做到的。

二七、抗戰開始率師出征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北平附近日軍尋釁，與二十九軍的部隊發生衝突，爆發蘆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八年戰爭的序幕。因此次事件日軍是有計劃的大規模行動，我中樞也洞燭其奸，知道和平已到最後絕望時期，不能再事退讓。今總統蔣公於七月十七日在廬山就中日事件發表了嚴正聲明，宣佈了我國的立場和最低限度的條件。

日本軍隊仍不顧一切於七月下旬在華北大舉進犯，先後攻佔平津之後又向居庸關、南口一帶進攻。至八月十三日，日本藉口虹口事件又遣重兵進攻上海，至此我中央在忍無可忍之下遂決心展開全面抗戰，全國軍民在蔣公號召之下一致團結起來殺敵救國。

早在七月二十一日李德鄰主任及白健生總指揮聯名通電擁護今總統蔣公之對日主張。八月四日白健生總指揮奉召飛南京勸助中央策劃，臨行時將省內動員工作交我負責，加速準備。那時我是綏署副主任兼參謀長，自然責不容辭，其實本省抗日工作早已準備妥了。

八月下旬奉軍事委員會電令派李宗仁主任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白崇禧為陸海空軍最高統帥部副總參謀長兼軍訓部長。隨又奉軍委會電令着廣西編組一個集團軍，賦與第十一集團軍的番號，下轄三個軍，每軍三師編成之，並派我本人為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所轄之三個軍除廣西原有第七軍（軍長廖磊），第四十八軍

(軍長韋雲淞)外，另賦與第三十一軍的番號由劉士毅任軍長。奉令後，除照新編制調整充實原來之兩個軍並令準備隨時出發外，新編成之三十一軍及砲兵、工兵各兩個營，乃立即按原定之動員計劃略加修訂，征調士兵，選任官長，及整備武器，統限於九月底完成。原有錢靖主任公署酌留必要人員協同省府辦理留守業務外，其餘大部人員則編成一個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為徐祖貽，及一個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為何宣，後改派董彥平擔任。

第五戰區長官部之位置及第十一集團軍的集中地點中央規定為徐州。至九月中旬，原有之兩個軍均已完成功員整備，乃令韋雲淞之四十八軍先行向集中地出發，第七軍預定在九月下旬出發，三十一軍則須至十月初的經過動員點校之後再行出發。

自九月初旬起，敵我兩方已在吳淞上海一帶開始劇戰，我軍曾一度將敵擊退，嗣後日軍在上海方面不斷增援，我統帥部為掩護京滬一帶的物資及華衛京都，本擬在敵軍未全部到達以前將敵各個擊破，故亦從後方增調兵力予敵以迎頭痛擊。因此，戰線逐次擴大戰況頗為激烈，此時雙方互有進退。我先遣之四十八軍原係奉令向徐州集中待命，於開抵武昌後，復奉最高統帥部之命，改由武昌乘船向上海方面輸送。該軍到達蘇州附近後奉令向瀏河、蘊藻浜間推進為總預備隊，歸陳誠總司令指揮。爾後即參加蘊藻浜瀏河作戰從事反攻，當時適敵亦向我方來襲，乃與敵發生遭遇戰，戰鬥至為激烈，雙方都死傷甚衆。

九月底第七軍及第三十一軍均已動員編裝完畢，集結於桂林附近。十月一、二兩天，我親自檢閱各師，一般均精神抖擻，軍容壯盛，頗覺安慰。檢閱後，即令廖磊及劉士毅兩軍長分別率領所部出發，向徐州集中待命。當日晚向李司令長官報告部隊動員出發情形並請示行期，李司令長官遂定於是月十日飛往南京向統帥

部請示，長官部於編組完成則逕赴徐州。我因四十八軍已奉統帥部改調上海參加作戰的關係，亦決定先往南京向統帥部報告本集團軍編組及出發情形後，再赴上海前線視察該軍，集團軍總部則交由何參謀長宣率領於兩軍出發之後逕赴徐州。

我為了想沿途視察部隊行軍及輸送情形，決定於十月五日出發，自桂林乘汽車至衡陽，改乘火車經長沙至武漢，再換輪船下。

我自桂林出發後六日到達長沙。抵長沙時，何主席雲樵到車站相迎，老友相見深感愉快，同時適唐生智（孟瀟）亦正擬自長沙赴京，久別重逢，互道契闊，倍覺親熱，惜因公務在身無暇久留住長夜談。抵武漢後當即登輪東下，途中適逢雙十節，因當時正是抗戰開始人心振奮，而同船百餘男女旅客大抵為公務人員，教員及學生，熱心者發起慶祝活動，全船旅客無不贊同，於是立時在船上張燈結綵貼標語舉行慶祝大會。當他們知道我的身份後，大家一致要我擔任大會主席，我自然只有接受，會中我目睹各人興奮、熱烈、誠摯的表情，我不禁熱淚盈眶，我想民心士氣如此，抗戰焉有不勝之理，不過這次戰爭必然是長期抗戰，必須堅持到底，不可偶遇挫折即灰心喪氣。因此我在會中發表演說，說明抗戰必勝的道理，並鼓勵各人從各自的崗位致力於長期抗戰，不惜任何犧牲堅持最後勝利。會後大家一起把我抬起來，擁抱我，祝我勝利，熱情洋溢，這真是令人難忘的一幕。

是晚即抵南京，李司令長官在我數小時前到達，是夜遂同住白健生寓所，就當前作戰形勢與爾後的戰略指導等問題相談至夜深始各歸寢。入寢後，思潮起伏，久難入夢，尤其當日船上一幕令人難忘，復披衣起牀寫成五言排律一首以紀當日自漢赴京途中之感懷；附記如下：

海寇傾巢出，烽烟夜夢驚。
平津既陷落，淞滬復侵爭。

國祚關隆替，黃魂決死生。

哀軍嘗却敵，衆志足成城。

蕞爾二三島，何如億萬兵。

橫戈揮日起，大纛頂天行。

欲雪千秋恨，當思七尺輕。

時乎不我待，奮臂事長征。

翌晨蒙委員長蔣公召見，予我慰勉有加，並詳詢集團軍編組情形。我當將奉令以來之編成經過，以及數年來在桂服務對委座馳念之情一一面報，委員長惟頻頻含笑領首。

自十月上旬起，日本在上海方面之總兵力已陸續增加至二十萬人以上，開始向我發起猛烈之攻擊，我軍亦頑強應戰。至月下旬日軍恃其大砲飛機戰車之優勢猛烈攻擊，向我實施中央突破，如是大場、真茹相繼棄守，戰局暫趨不利。二十八日委員長親赴前線視察，並在蘇州的劉家花園召集各將領訓話，宣示其長期抗戰的戰略。是夜即住於劉家花園，感懷興起賦詩二首以誌不忘。

其一

長江蜒蜿向東流，風雨鶴鳴宿露收；
梅萼橫斜劉圃晚，角聲悲壯海天秋；

陣雲高集吳江冷，
旗影遙翻楚塞愁；
前席虛懷資策劃，
龍船爭戰護神州。

其二

烽火連關塞，
京門戟衛森；
舳艦連海曙，
鼓角動星沉；
浩蕩長江水，
忠貞報國心；
大軍吳下會，
仗劍起豪吟。

翌日回南京，準備稍作勾留後即轉往徐州。此時集團軍總部於十月十六日從桂林出發業已到達徐州。所屬第七、三十一兩軍亦已先後抵達。第七軍到達徐州後經鐵路繼續輸送至海州擔任警戒，第三十一軍則集中徐州附近加強訓練。

自十一月開始蘇常前方之作戰益趨緊張，敵軍藉海陸空軍配合不斷向我正面陣地突擊，統帥部遂決心逐次向後撤退。為支援上海附近大軍之安全撤退，又着手於太湖兩側地區部署新抵抗地帶。統帥部遂下令將本集團軍在徐海線上擔任警戒之第七軍全部調至浙江吳興，溧陽附近，準備增援該方面之作戰，所遺防務由第三軍團龐炳勋部接替。

十一月三日我從南京趕赴徐州，時第七軍正紛紛由隴海線轉津浦線向南輸送。我到徐州後知長官司令部亦已到達徐州，乃往長官部研究；因本集團軍已有兩個軍在江南方面作戰，為指揮方便計我之十一集團軍總部置於徐州是否適宜。研究結果認為徐蚌方面將來作戰仍須我分任指揮；於是由長官部電呈統帥部建議如次

：『為便於指揮，請以第七軍及四十八軍另編為第二十一集團軍，以第七軍軍長廖磊升任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原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升任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仍兼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

上項建議案旋奉統帥部批准。隨後李司令長官亦抵達徐州。

二八、京滬棄守

我由南京到達徐州之後，因各方面的情況，日見緊張，而徐州為一戰略要點，自古以來為兵家所必爭，為未雨綢繆計，請由長官部卽日召集各軍師長赴徐州附近各處，偵察地形，擬定防守計劃，並設置徐海一帶防禦工事。

十一月十五日我又率同參謀人員及龐軍長前往海州、新安、連雲港、日列等地從事偵察。連雲港為龍海路的終點，敵如從此處登陸可直薄徐州，對徐州之確保極關重要。魯南沿海各處地形雖然平坦，但海岸沙灘水淺，船隻不能近岸，唯連雲港為一天然良港最適於登陸，且設有碼頭等登陸設備，船隻可直接靠岸，可容許大軍團登陸。港口底部又恰有獨立之高地，可居高臨下控制全港前後左右，敵如佔有此高地不啻為登陸最好的掩護陣地。如該高地在我手中則可防止敵軍直接利用港口登陸，故對該港之防守頗為重要。因此當飭龐軍長先於該高地周圍建築防禦工事，並加強一切附屬防禦設施，同時應特別向遼海監視敵之行動，務期確保連雲港。至於魯南其他海岸，除青島外，可利用之處殊少，若能以一部兵力控置於臨沂，保持機動，作為魯南沿海一帶之監視部隊，即可無虞。

由連雲港返回徐州後，因此際上海早已棄守，嘉興、蘇州均相繼失陷，我軍已退至無錫、江陰之線，南

京國民政府已早於十月三十日宣佈遷都重慶，統帥部則向武漢遷移。就未來戰局之發展判斷，大別山之戰略重要性殊不可忽視，因此又派遣本部參謀處副處長薛奉元、秘書張岳靈等，前赴大別山區內部作兵要調查，從詳回報，以便策劃。

江南方面之戰況，自十一月五日敵之第六及第十八師團由杭州灣北岸金山衛登陸後，我吳克仁軍迎擊失敗，敵軍遂得威脅我軍之側背，淞滬守軍益感不利。九日松江又為敵佔領，我全線被迫撤退。因撤退倉卒，指揮失靈，吳福緣陣地亦告不守，淞滬各軍唯有逐次後退。由金山衛附近登陸之敵與滬杭線上之敵會合後，於十三日陷平望並同時猛攻嘉興，繼沿太湖南岸向西挺進。二十日敵攻佔南潯繼續西進；此時適我奉令南調之第七軍行抵吳興附近，遂與敵發生戰鬪。該軍旋佔領界山市大城鎮之線迎擊西進之敵。統帥部又令劉湘所部向廣德、泗安間運動策應第七軍之作戰。以劉軍行動遲緩應援不及，界山市、吳興旋為敵所攻陷，劉湘軍亦向後撤。嗣後敵軍以主力沿京杭國道直趨南京，一部經廣德、宣城，向蕪湖方面迂迴。

自淞滬後撤之國軍，以主力向浙贛方面轉進，一部沿京滬線向南京撤退。當敵軍二十五日陷無錫，二十八日陷宜興之後，南京之保衛戰已迫在眉睫。以整個戰略言，南京雖是首都，但無確保的必要，惟為消耗敵人及遲滯敵人之長驅直入，自不妨以所要兵力固守南京。惟南京城垣廣大，防守頗為不易，兵力小則不足分配，兵力大則如此犧牲殊為不值，蓋若無決戰之企圖則南京遲早為敵所攻陷，守軍除拼至最後一兵一卒外，亦斷無突圍之機會也。故當統帥部向武漢轉移，召集高級將領商討南京防守問題時，多數人均默不發言，僅唐生智則極力主張堅守，並自告奮勇，統帥 蔣公當予他嘉勉，並即以唐為南京防衛軍總司令，負防守南京之責。當我獲知唐孟瀟自告奮勇負此重任時，不免為老長官擔憂。以我當時的想法，如決定以一部兵力守南

京，則應構築堅強工事作死守之決心，如此既可換取消耗敵人之代價，亦可以守城之壯烈振奮民族精神。否則寧可宣佈為不設防城市，如此敵佔領之後既無宣傳價值，且可避免居民之慘遭荼毒也；可惜統帥部當時或未考慮到此。

唐孟瀟既就南京防衛總司令，負責保衛南京，乃令各軍分別佔領南京外圍之龍潭、湯山、醇化鎮、雨花臺、紫金山、獅子山各要點，依既設工事固守，另以一部推進至句容、秣陵關等地以遲滯敵之攻擊。十二月四日，敵軍分從京蕪路及京杭國道前進，句容、秣陵關兩地當日即告失守。五日敵主力進攻醇化鎮，一部攻湯山；劇戰至八日，湯山失守，醇化鎮、龍潭亦相繼陷落。十二日雨花臺亦失守，南京遂於十三日陷敵。我守城部隊除部份突圍外，其餘多作壯烈犧牲，唐本人於城破前由下關渡江退武漢。敵據南京後，劫掠縱火，姦淫屠殺，無所不用其極，情形之慘，較之滿清入關時之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尤甚，殺戮老弱婦孺十萬人以上，為我國有史以來一大悲劇。

日軍進攻南京時，曾向我政府提最後通牒，入南京後又如此燒殺，滿以為可以迫我政府訂城下之盟，殊不知此種滅絕人性暴行，更增加中華民族抗戰到底的決心與信念。抗戰勝利，我們以德報怨，除了中華民族而外，恐怕是任何其他國家所辦不到的，今後希望日本人記取這筆不求償還的血債，造福東亞兩大民族。

二九、徐州會戰與台兒莊大捷

日軍攻佔南京後，既不能迫我訂城下之盟，達成侵略目的，自然騎虎難下，唯有繼續西進攻取武漢，或可迫我作整個投降。敵欲進攻武漢，必當先控制長江下游兩岸重要地方，始可保後方之安全，尤其需將南北

戰場溝通一氣，以利兵力之轉用，因此判斷日軍在溯江西上進攻武漢之前，必先進犯徐州。

十二月中旬以後，敵軍不出我方之所料竟以約四個師團之兵力渡過長江沿津浦路北進，又以約六個師團之兵力及特種機械化兵團自德州沿津浦路南下，企圖夾擊徐州。津浦路南段之敵，其第十一師團於十二月下旬由瓜州攻佔揚州，爾後進出天長；其第十三師團經儀徵、六合與浦口之敵匯合後沿鐵路北進攻佔滁縣。

戰區司令長官部當初對敵南北夾擊徐州之考案及計劃大要如下：

一、在全般態勢上我居於內線作戰，應乘敵分離時集中兵力予以各個擊破。

二、依當時敵我態勢，最好先拒止南下之敵於黃河北岸，而集中主力先求擊破由南京北上之敵。

三、對沿津浦北進之敵，應以一部扼守蚌埠及蚌埠北方沿淮河北岸之線，使敵不能通過淮河大橋北上。

另以兩至三個軍位置於劉府、鳳陽、紅心鋪一帶，佔領側面陣地，俟敵沿鐵道線北上時，我即由西向東予以側擊，將敵截成數段而殲滅之。縱使不能將敵分段圍殲，亦可牽制其對徐州之攻擊，獲得遲滯敵人之效。

四、我軍主力控制於徐州附近，捕捉好機予敵各個擊破。

長官部基於以上之考案，遂由我指揮三十一軍及于學忠、楊森、徐源泉各軍以及安徽境內各部隊，負責實施津浦南段之作戰。令韓復榘指揮其所部各軍沿黃河南岸之線堅固防守，防阻敵軍南渡。令龐炳勛部移駐臨沂，防止青島及魯南登陸之敵。另由長官部電呈統帥部另派有力部隊迅速來徐作戰區之總預備隊，為爾後擔任打擊之主力。

我遵照長官部上述意旨，對所屬各軍下達如左之命令：

(一) 學忠軍位置於淮河北岸，沿淮河北岸構築防禦陣地，拒止敵之北進。並以一部進至南岸防守蚌埠，不得已時再撤回淮河北岸固守。

(二) 第三十一軍以一部在劉府附近，主力在鳳陽、紅心鋪附近佔領陣地，行攻勢防禦，對沿鐵道線北進之敵實施側面攻擊將敵切斷分割包圍而殲滅之。另以一部進出張八嶺、明光一帶實施游擊，遲滯並引誘敵之前進。

(三) 徐源泉之第十軍即由現地速向合肥推進，策應第卅一軍之作戰。楊森之第二十二軍在徐軍未到達前，以一部留駐和縣、裕溪口等處警戒江防外，主力即移駐安慶，擔任長江北岸一帶之防守。

(四) 二十一集團軍應即日由九江渡江北返向合肥集結整理待命。

(五) 第十一集團軍總部於元月五日移駐壽縣。

本集團軍總部移駐壽縣後，此時日寇正向六合、滁縣、揚州各地進擾；敵兵所到間間為墟，姦淫劫掠無所不為，敵機亦到處肆虐，轟炸民房屋宇；平民無辜被害者不可勝計，扶老攜幼棄家出走者絡繹於途。這一幅逃亡圖真是慘不忍睹。我於部署完畢後，遂親率隨從人員及地方行政官吏，馳赴各縣城或市鎮視察安撫，每至一地即召集地方父老賢達，詳為曉諭，告以抗日大義，報仇雪恥，政府人民務要上下同心，羣策羣力，共同殺敵，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經半月餘方視察完畢。一月末旬同至壽州集團軍總部。我沿途目擊難民悽慘，情景感懷之餘，成七律兩首，略寄所懷，時為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一日。

其一

頽垣殘宇斷荒鶴，半壁河山遍鐵蹄；

滿目瘡痍哀雁戶，一腔血淚鼓征鼙；

臥薪嘗膽思勾踐，採蕨餐薇恥叔齊；

大好神州陷醜虜，狼烟起處海天低。

其二

連營百里正陽關，刀戟寒光耀九寰；
八桂精英來嶺表，兩淮豪傑起田間；
旌旗遠蔽符離野，壁壘橫跨大別山；
收復神京朝夕事，蝦夷斬罷寶刀還。

津浦路南段之敵，當元月中旬，即逐次向北移動；十八日敵佔領明光鎮，三十日進佔池河鎮。我前方部隊依逐次抵抗，以遲滯敵之行動。二月一日敵搜索警戒部隊佔領臨淮關，於是敵隨以大部隊沿鐵路兩側向蚌埠前進。我三十一軍認為時機已至乃由紅心鋪、鳳陽一帶向敵之側後出擊，將敵切成兩段，鏖戰兩日，擊斃於鐵路附近地區者極衆。後以敵方有空軍支援，且後續部隊不斷增援，勢至兇猛，而我軍以兵力不足致不能澈底發揮側擊之效，將敵殲滅，且被迫退出紅心鋪、鳳陽，撤至定遠、劉府、考城一帶，對敵牽制。此時敵雖已佔領蚌埠，但仍不敢即行渡河。至二月六日，我二十一集團軍自江南北返歸建趕到合肥。經兩日之休息整頓，即令該集團分兩路出擊。周祖晃（時代理第七軍軍長）指揮第七軍由定遠經紅心鋪向鐵道線進出，遮斷敵之後方連絡線。以章雲淞之四十八軍連繫三十一軍之右翼，協同三十一軍對劉府、考城、蚌埠之敵攻擊。經劇烈戰鬥之後，斃敵千餘，擊毀敵戰車十餘輛，並一度收復鳳陽、考城。蚌埠之敵原已有一部渡至北

岸，經我攻擊後復退回南岸，不敢北上。鐵路以東之我游擊部隊，亦乘機收復天長、盱眙、臨淮關等處。此後津浦路南段乃與敵暫成對峙狀態。為防蚌埠之敵渡淮河西進，旋令卅一軍以主力移至上窯、洛河之線。此時我總司令部亦移至正陽關。此役可惜二十一集團軍到達過遲，未能最初即集中全力乘敵進出蚌埠之際加以攻擊，以致三十一軍雖一度將敵切斷而未能獲致殲滅戰果。

是月中旬，中央派陳調元總監前未勞軍，慰問備至。同時，三十一軍軍長劉士毅奉令調任軍訓部次長，三十一軍軍長一職由四十八軍軍長韋雲淞調任；遺缺則由張義純升充；廖磊亦正式發表升任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所遺第七軍軍長缺由張淦升充。為使戰區黨、政、軍統一指揮，以利作戰，中央曾任命李司令長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已於元月十七由徐州到六安就主席職；事畢仍返徐州。

津浦北段之作戰，由於韓復榘對長官部之命令未能切實執行，退縮畏戰，竟令敵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青城、濟陽間渡過黃河。敵渡河後韓軍幾未經抵抗節節後退。二十四日韓本人離開濟南，僅留少數部隊，待敵到來未經戰鬪即讓其進據。至三十日，泰安、濰縣、博山等重鎮均已次第放棄。一月二日，大汶口、濟寧亦為敵有。敵自渡過黃河以來如入無人之境。韓復榘軍除以少數在微山湖西岸警戒外，大部均潛移魯西南之單縣、曹縣、城武各處，沿津浦兩側之正面為之洞開。敵軍係分三路前進：正面一路沿津浦路西側地區前進，另一路經新泰、蒙陰指向津浦東側地區，青島方面之敵亦沿諸城、沂水之線南下，企圖經臨沂截斷徐海路威脅徐州之側翼。

戰區長官部面臨上述狀況，只好放棄原來作戰計劃，以甫經到達之第二十二集團軍鄧錫侯部沿津浦路北進迎擊南下之敵，另以張自忠軍調赴臨沂，增援龐炳勳軍防守臨沂，迎擊自青島南下之敵。同時將韓復榘軍

之作戰情形呈報統帥部。委員長以其臨陣退縮作戰不力，立予拿辦正法，而以其部屬孫桐軒軍長升任該集團軍總司令，並責令孫軍反攻濟寧、大汶口各地以牽制南下之敵。韓被正法後，該集團軍士氣為之振奮，竟屢建戰功，協助鄧集團軍達成了逕阻敵軍南下之任務。此後直至三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亦暫成僵持狀態。

三月初，津浦路北段之敵獲得大量增援後，於三月十四日開始向我界河之陣地發起攻擊，我界河陣地為敵攻佔並向滕縣撤退。翌日敵自濟南、青島方面前來增援之敵繼續增加，分向滕縣及臨沂攻擊。幸此際孫連仲及湯恩伯兩軍到達徐州，乃以湯軍馳援正面向進攻滕縣之敵迎擊。湯軍前進至臨城附近與敵遭遇，發生劇烈戰鬪。是日（三月十七日）我固守滕縣之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苦戰殉職，縣城為敵砲猛烈轟擊，城牆多處被毀，官橋陣地旋亦被陷。湯軍關麟徵師亦在沙溝附近為敵突破，及後續部隊到達乃自韓庄以南沿運河之南岸佈防，並以王仲廉軍於峰縣東北高地一帶佔領陣地，一〇一師則推進於台兒庄。翌日臨沂方面龐炳勛及張自忠兩軍作戰頗為得手將敵第五師團擊潰，敵之攻勢乃暫被遏阻。

當三月十四日敵開始猛烈南犯後，長官部為增加決戰方面之兵力，令我十一集團軍以卅一軍移至淮河北岸接替于學忠部擔任淮河北岸之防守，將于軍轉用於徐州以北地區支援臨沂方面作戰。同時又要我十一集團軍總部北上移駐宿縣，指揮徐州南方各軍作戰。

沿津浦路北段進攻之敵為日本陸軍第十師團磯谷廉介部及板垣師團，於攻佔滕縣後，繼續向韓庄推進，十八日攻佔韓庄。其另一路湘谷旅團則沿棗莊、台兒庄支線挺進，企圖迅速攻下台兒庄，進窺徐州。幸我孫連仲軍繼湯軍之後到達戰場，立予迎頭痛擊。湯軍團王仲廉部則與敵相持於峰縣附近。長官部為加強對敵側翼的攻擊，乃以一一〇師接替關麟徵師運河南岸的防務，令該師向峰縣以東地區挺進，協助王仲廉軍對當面

敵軍之側翼進攻。如此對敵形成一以運河為底的袋形陣地，台兒庄則恰為我攻勢的樞軸。自三月下旬至四月初，敵軍竭力以機械化兵團及野砲兵支援步兵向台兒庄之孫軍進攻。孫軍池峰城師竭力抵抗，台兒庄四分之三幾為敵軍佔有。此時我在東庄、峰縣方面攻擊頗為得手，敵軍雖有援軍到達，我仍積極圍攻，臨城、東庄、峰縣、韓庄均次第為我收復。臨沂方面之敵曾增援積極進攻，圖解台兒庄方面敵軍之圍，亦為我張自忠、龐炳勛部所痛擊，無法得逞。至淮河北岸陣地由卅一軍防守，數次將北進之敵擊退，確保固鎮南方一帶陣地，使台兒庄作戰容易收效。至四月初旬，敵軍之攻勢漸感不支；我軍方面復以新到之周呂軍投入戰場，加緊壓迫，磯谷板垣兩師團為我澈底擊潰，殲敵三萬餘人，虜獲大砲數十門，其他輜重不計其數，造成抗戰史上第一次最大的勝利。此役我軍大捷可說是將士用命，上下一心，誓死拼鬪的結果。惜終以敵我之實力懸殊，我軍裝備遠遜於敵，及敵再集中大軍來援，津浦路南段之敵亦越淮河西犯，蘇北淮陰方面之敵，亦向徐州之東南進迫，有大舉包圍徐州以報磯谷板垣兩師團被殲之趨勢。我軍為了保存實力，準備作長期抗戰計，乃奉統帥部命令放棄徐州。向平漢線方面轉移。

當四月七日台兒庄大捷時，前方軍民歡欣若狂。我午夜猶在等候前方部隊之詳細戰報，亦情不自禁，爰於燈下寫成七律一首：

武衛營前柳色鋪，漫天烽火掣征桴；
登壇飛將驚三島，越海么魔擾五湖；
固築長圍新壁壘，便教禍寇墜冥途；
慶功筵奏饋歌曲，腔臂當車奈若愚。

三〇、武漢保衛戰

台兒庄大捷之後，日軍於四月下旬分別在津浦路南北兩方大舉增兵，企圖在徐州一帶與我軍作一決戰，據估計其總兵力在三十萬人以上。

五月初津浦路南段之敵以一部向合肥進犯牽制我軍，主力循濁河出蒙城。五月九日陷蒙城，我四十八軍之一七三師副師長周元及以下官兵約二千人在蒙城壯烈犧牲，敵軍亦傷亡千餘人，爾後繼續向北前進；於五月十二日攻佔永城。津浦路北段之敵則循微山湖以西地區南犯。同時阜寧、淮陰之敵約三個師團又向徐州西進；蚌埠之敵經增援後亦渡過淮河北進。臨沂方面之敵於四月下旬再度攻陷臨沂後，亦繼續向徐州方向攻擊。顯然敵軍企圖集中力量包圍殲滅我徐州方面之野戰軍，攻佔徐州。

五月十一日魯西之敵攻佔鄆城，李司令長官命我馳赴曹縣，指揮魯西各軍迎擊由該方面南下之敵。我於十二日到達曹縣，尚未部署停當，此際因由蒙城北進之敵已到達永城，徐州頓受威脅，李長官復命我即日趕赴皖西，指揮皖中各軍，防敵西進，並掩護我軍向平漢線撤退。我奉令後當日即率領集團軍總部經歸德、亳縣、阜陽縣向六安。同時令四十八軍以一部進出淮河北岸，阻止蚌埠之敵西進，並準備掩護徐州方面友軍之撤退。

在轉赴六安途中，接獲情報報告獲知敵軍約一旅團自定遠向合肥前進。我即電令駐防合肥之徐源泉軍固守合肥，同時令第七軍以主力（兩師）即由田家庵沿淮南鐵路迅速南下協同徐軍邀擊該敵。十四日我到達六安接獲統帥部電報，謂據報徐源泉軍已放棄合肥，該地已為日軍佔領，究竟如何，着速回報。我聞後深為

驚異；正擬查報間，又接獲第七軍張淦軍長來電，報稱該軍兩個師已到達水家湖，惟合肥已為敵軍佔領，徐軍去向不明無法連絡，請示如何行動。至此徐軍逃避敵人棄守合肥業已證實，乃即指示第七軍主力迅速取道向合肥以西之大蜀山附近佔領陣地，阻敵西進，另留置田家庵之一師即退至壽縣附近防守。同時將徐軍擅自退避情形回報統帥部。十六日，第七軍主力到達大蜀山與敵發生接觸，當殲滅敵之一部，佔領大蜀山。合肥至六安僅七十公里，所幸我獲得敵軍向合肥前進之情報後即令第七軍主力南下，否則徐軍之擅自退避，真不堪設想。

關於徐州方面，統帥部鑑於自元月以來將屆半年，防守徐州的戰略目的已達。基於持久抗戰的戰略要求，必須避免決戰；因此，長官部依統帥部的指示，於五月中旬令在徐州以北及以東各軍，按照指示路線分途連夜轉進。長官部於五月十九日放棄徐州；經宿縣、蒙城越過敵之包圍圈移駐潢川。我三十一軍亦自淮河北岸西撤，退至渦河一帶。

我撤守徐州之後，敵軍一面沿隴海路向西挺進，企圖進出平漢線後，再南下奪取武漢，一面則溯長江西上。沿隴海路西進之敵，約為四個師團，並配備有大量裝甲部隊，一路經歸德、蘭封，另一路經毫縣、淮陽西進。此一地區為有名的淮河平原，最適於裝甲部隊運動，故敵軍進展甚速；至六月五日已攻佔開封，繼續向西推進。按當時情勢敵奪取鄭州當屬可能，惟事實的發展竟出人意外；當時敵軍為遮斷我後方交通，沿隴海路兩側大肆轟炸，六月八日竟將花園口之黃河河堤炸毀，形成一大缺口。黃河潰堤之後，滾濁濁流經中牟、尉氏，循賁魯河南濱而入於淮河上游之各支流。此一帶地形極為平坦，又值雨季，於是黃河之水將貫魯河岸地區造成泛濫，一片汪洋。當河水正泛濫時，敵軍先頭部隊適經過該地區，因逃避不及而遭淹斃者不少，或

器、裝備、輜重之損失更大。於是，敵沿龍海路的攻勢陷於停頓，爾後敵我在此一地區，遂成為隔泛相峙之局。此次黃河潰堤，日軍固「自作孽不可逭」，但泛區面積廣大，幾乎豫東各縣盡成澤國，我同胞生命財產所受之損失，亦不可勝計。

沿龍海路西進既為黃河構成之泛濫所阻，敵軍乃更積極集中兵力於長江方面，企圖略取長江兩岸要點，奪取武漢，以達其迫我屈服，速戰速決之迷夢。六月中旬，敵首先於安慶下游登陸，在其海軍艦砲的支援下向安慶進攻。我防守安慶之楊森部經一晝夜之劇烈戰鬪，因敵海軍砲火猛烈，死傷慘重，不得已於六月十五日夜退出安慶，轉進至源潭附近一帶高地。合肥之敵經大量增援後亦向西推進，我廿一集團軍及馮治安部乃逐漸轉移於阜陽河以西以及豆霍邱、六安、桐城之線防守。此時第五戰區長官部已自潢川移駐鄂境之宋埠，本集團軍總部則奉命轉移至鄂東之英山。

安慶附近長江之江面較狹，兩岸之地形足可控制船舶之通過。安慶失守後，統帥部曾下令責令前次擅自放棄合肥，私自轉進至潛山之徐源泉軍予以收復，立功贖罪，惟終以敵軍艦砲火力過於猛烈，未能奏功；敵且不斷增援沿長江北岸向西推進。我楊森集團軍及徐源泉軍於高河埠、潛山、小池一帶與敵經數晝夜之戰鬪後，不得已退入潛山西北一帶高地扼守，與敵對峙。

敵佔有安慶、潛山及其以西一帶長江北岸之地區後，即掩護其主力轉用於長江南岸要點之奪取。六月二十三日敵約以兩個師團之兵力，在海軍之協力下進攻我馬當要塞，經數日猛烈攻擊，且使用毒氣，至二十九日攻佔馬當，七月初攻佔彭澤、湖口，迄七月下旬九江亦為敵所攻陷。於是長江南岸險要盡失；不久敵復將攻擊重點轉移於長江北岸。

六月下旬，敵軍向武漢之攻擊行動已獲完全判明，統帥部為實施武漢保衛戰之作戰計劃，將當時所有可用之兵力編成武漢防衛軍；下轄四個兵團。由陳誠任防衛軍總司令兼第一兵團司令，羅卓英副之，擔任武漢附近及其以北之防守。張發奎任第二兵團司令，擔任南潯路廬山一帶之防守。薛岳任第三兵團司令，擔任瑞武路、幕阜山、九宮山一帶之防守。我被任為第四兵團司令，擔任大別山及其以南地帶之防守；沿潛山、太湖、宿松、黃梅、廣濟各處構築堅固工事，縱深設防，阻止敵沿長江北岸西進；並沿敵前進方向選擇地形，建立側面陣地，對西進之敵壓迫於長江而殲滅之；武穴及田家鎮應建立為江防要塞；並在田家鎮以下佈設水雷，阻礙敵艦船之活動。

我奉令後乃作如下之部署：

(一)以覃連芳之八十四軍守備黃梅及黃梅以南之長江沿岸地區。

(二)三十一軍以兩個師位置於宿松、涼亭、太湖一帶地區，阻擊沿長江北岸西進之敵。其餘一師位置於廣濟為預備隊。

(三)廿一集圍軍以一個軍在立煌、流波壘、霍山之線，阻止合肥西進之敵，固守立煌根據地。另一軍轉進至張家榜附近，佔領待機陣地，側擊由大別山南麓西進之敵。

(四)李延年軍擔任田家鎮要塞之守備。

(五)劉汝明之六十八軍位於彌陀寺擔任總預備隊。該軍旋以官兵不服水土，患瘧疾者達百分之二十以上，奉統帥部令調赴後方休息，另以二十九集圍軍王贊緒部接替其任務。

敵於攻佔安慶、九江之後，開始分為五路向武漢攻擊；在江南方面：一路沿瑞(昌)武(昌)路西進，

迂迴武昌之南；一路沿南溝路向南，攻佔德安掩護其左側背。在江北方面：一路沿大別山南麓，經太湖、宿松、黃梅、廣濟向黃岡進攻；一路沿大別山北麓，經固始、潢川、羅山、信陽迂迴漢口之北；一路經六安、霍山，越大別山出麻城，攻漢口東北之黃陂。再以海軍陸戰隊的艦隻，溯江西上，以海軍陸戰隊登陸攻擊沿岸的要點，企圖一舉捕捉殲滅我野戰軍之大部，迫降我國，以達其侵略戰爭早日獲得解決之迷夢。

七月下旬長江北岸之敵又開始蠢動，向望江、宿松、小池口等處進攻；同時敵艦逐漸增多，並向小池口砲擊；敵空軍亦每日以數十架向宿松、黃梅、廣濟等地進行轟炸。所有這些活動，顯示敵有在長江北岸採取積極攻勢，以配合其在長江南岸方面發展之可能。我第四兵團乃按預訂之作戰計劃，以有力兵團於大別山南麓利用地形佔領陣地相機出擊；一面沿長江北岸為縱深部署，依逐次抵抗誘敵深入，並逐次消耗其戰力；待其暴露於我攻勢地區，立即自側方發起猛烈之攻擊行動。部署既定，復將兵團司令部自英山移設於廣濟，以利指揮。

我到達廣濟之後，因連日敵軍機艦活動頻繁，顯有在長江北岸行動之可能，為了明瞭前方實際狀況，隨即由軍長連芳陪同並率衛兵一班，前往黃梅方面視察。當行至距黃梅約十餘華里途中，邊聞黃梅轟炸之聲隆隆不絕，判斷必係敵機正在空襲黃梅。遂吩咐司機緩慢行進，以期俟敵機去後再入黃梅。言猶未了忽發現敵機一架自黃梅沿公路上空低飛而來，轉眼即掠空而過；無疑已經發現我們這一目標必將襲擊。於是立令停車，令隨從人員分向道路兩側稻田散開，我亦奔向稻田的一處水窪中伏臥。此時敵機果然掉轉機頭向我們車輛所在之處飛來，一面向汽車投彈一面以機槍掃射；一時泥土飛濺，汽車兩側稻田中的禾苗猶如刀割一般爛腰切斷，數十公尺週圍以內盡為炸彈之爆風及破片所掃平。所幸人員均未受傷。當敵機通過後，我立即從

稻田中向附近的小村庄跑去，轉眼敵機又向村落之上空飛來，我深恐敵機再對村屋掃射、轟炸，又轉至村後的小樹林中掩蔽。敵機似已發現我們的行踪，仍不斷在此上空低飛盤旋。幸樹林內有一土堤勉可匍匐掩蔽身體，於是當敵機飛向左邊時，我立即跳至右邊，當敵機繞至右邊時，又立即跳回左邊，如捉迷藏一樣。如此數次，敵機始行離去，而我亦已精疲力竭，氣喘不止，同時滿身泥污坐車亦被炸壞，只好另覓車代步返回廣濟，停止黃梅之行。

八月初敵陸戰隊自九江對岸之小池口登陸，配合自安慶西進之敵連續攻佔宿松、黃梅。我第八十四軍及六十八軍於予敵遲滯後，分別轉進至團山河、大河鋪、大金鋪等地佔領既設陣地，阻止敵軍西進。至八月下旬，敵第六師團及第三師團之一部在其先頭部隊掩護下，沿潛山、黃梅大道西進。八月二十六日，我軍雲淞的四十八軍乘敵主力通過之後自側面發起攻擊，經一晝夜之戰鬪，二十七日收復潛山、太湖，二十八日繼續收復宿松，將敵後方連絡線予以切斷。翌日第七軍及十一軍復自黃梅以北之攻勢陣地，對被包圍於黃梅一帶之敵展開猛烈攻擊，經兩日之激戰殲敵軍甚多。惟此際敵在海軍之掩護下，改用小池口向後方連絡，獲得不斷之補給與增援，並以海空軍助戰；至八月三十日敵軍開始展開反撲；復經兩晝夜之激戰，因我缺乏空軍掩護，死傷累累，不得已逐步後退。九月六日，敵對廣濟猛烈轟炸，並使用毒氣攻擊，我防守廣濟之八十四軍及三十一軍於是日夜復向廣濟西北一帶高地撤退。兵團總司令部則轉移至西河驛開設指揮所。

九月八日，我鑒於敵之攻擊氣勢已趨衰減，復由黃婆四方面向敵側背攻擊，盤據廣濟之敵倉惶敗走，我再收復廣濟，並奪獲敵船隻甚多。自此之後，敵我遂相持於廣濟、界嶺之線，直至武漢棄守敵不敢再貿然循此一路線進攻；此可說是利用大別山對敵形成側面攻勢陣地的效果。

當黃梅、廣濟一帶，敵我雙方激戰，形成拉鋸狀態之際，在江南方面，敵於八月下旬攻佔瑞昌、德安，及武寧等地；在大別山以北之敵則於八月三十日攻佔六安之後，九月上旬復攻佔固始，迄九月中旬已佔領潢川，繼續向西發展。

九月中旬，長江敵艦集結於九江上游之新洲附近，開始向武穴及田家鎮猛烈轟擊。九月十六日，敵秘密自廣濟方面抽調一部約萬餘人，向武穴進攻，至九月十九武穴在敵水陸兩面夾攻下棄守；爾後繼續向田家鎮要塞攻擊。我為策應田家鎮之作戰，當抽調八十四軍之一部，側擊進攻田家鎮之敵。至九月二十八日，已進至田家鎮附近，將敵壓迫於黃泥湖地區，並殲滅其一部；惟此時敵軍一部已攻入要塞核心，加以大批敵機臨空轟炸，要塞守軍於二十九日放棄田家鎮要塞，退守蘄春。八十四軍以策應無效，亦退回廣濟附近之陣地。

十月上旬，敵在長江南岸集中五個師團的兵力沿瑞武路向西北推進。至十月中旬，陽新、大冶相繼為敵攻陷。敵於是分三路向武昌及其以南進逼；一路經箬溪、澤鋪、向通山；一路沿三溪口、高橋，向咸寧；一路沿大冶、鄂城直逼武昌，十月二十二日鄂城為敵攻陷。

長江以北，十月九日敵一度向蘄春進攻為我擊退。惟大別山以北之敵，於九月中旬相繼攻佔潢川、羅山之後，於十月十二日攻佔信陽，另一路則經由商城向麻城進出。

武漢保衛戰自六月初開始以來，歷時將近五月，我軍已有效達成遲滯與消耗敵人之目的。惟我軍每次與敵交鋒，因無空軍掩護，在敵空軍轟炸之下損傷慘重，故每次攻擊均少戰果。至此敵軍已自長江南岸及北岸進出粵漢及平漢線上，武漢內圍已無防守必要；且此時，政府機關均已遷往重慶辦公，統帥部為着眼爾後之長期抗戰，遂於十月二十四日下令放棄武漢，使各部隊分別向湘北、鄂西及鄂北、以及敵後控制地區轉進。

三一、武關道上

統帥部既決定放棄武漢，乃下令武漢及外圍部隊分別向指定地區轉移。長江以南各軍撤至湘北及鄂西一帶。在長江北岸之部隊，三十三集團軍撤至荊門、宜城一帶。三十二集團軍撤至襄陽、樊城、鍾祥一帶。我十一集團軍則撤至隨縣、唐縣鎮、棗陽一帶佈防。湯恩伯之十三軍進入桐柏山，劉和鼎之三十九軍進入大洪山擔任游擊。廿一集團軍及徐源泉之第十軍統由廖磊指揮進入大別山擔任敵後游擊。第五戰區長官部移往樊城。

我於十月廿四日，在上巴河集團軍總部獲得戰區長官部之指示後，當即變更所要部署，翌晨開始分令各軍依次向西通過平漢線轉進。當時信陽早已失守，武勝關方面狀況不明，我轉進各軍能否順利通過平漢線當不無疑問。為此除由統帥部指派劉汝明軍扼守平靖關掩護大軍通過平漢路外，並令卅一軍在後掩護全軍安全西退。結果該軍於花園、應山之間與越平靖關南進之敵遭遇，惡戰一晝夜，將敵擊退，使大軍完成西撤。該軍俟各部隊通過後，最後於廿六日始通過應山，到達隨縣一帶整理。該軍雖達成掩護大軍轉進之任務，但本身亦頗有損失。我集團軍總部於廿六日退至荊門，隨後再移駐棗陽；敵軍於二十六日亦進入武漢。

此次武漢保衛戰，敵我雙方在武漢外圍廝戰四月以上，敵雖佔有武漢三鎮，但其死亡損耗之大，據統計當在二十萬人以上。敵人進攻武漢之目的原在迫我投降，但結果並未能達成其目的，而泥足愈陷愈深，想非其始料所及者。

武漢會戰終了，我抗戰轉入另一階段。日軍因速戰速決之迷夢業已破滅，亦不得不重新調整其戰略。因

此自十一月起至翌年三月止，雙方無大規模戰鬪行動。本集團軍撤至鄂北後即積極從事整理補充。

是年十二月，委員長 蔣公在武功召開軍事會議，我奉令參加。是月二十日，我將本部一切職務上的工作交由參謀長董彥平代理，伴同李司令長官宗仁由內鄉啓程赴會；日夜兼程，經武關、商縣、龍騎寨、藍田等處到達西安。

武關又名荆紫關，為往昔由襄樊通陝甘的重要門戶。根據歷史記載，東晉的桓溫北伐秦苻堅時即取道武關、藍田以達長安。由內鄉至西安全程約三百餘公里，沿途多高山峻嶺，危崖深谷隨處可見。時值初冬，雲霧瀰漫，雨雪紛飛，行人稀少，所經村落土人均掘穴而居，屋在地下，對於防空實是最為理想。由此而聯想到抗戰前途，以我們的地廣人多，益之以山川形勢之險，與適應戰鬪的生活方式，豈是日本軍閥妄想用飛機大砲所能征服得了的。

是日午夜抵臨潼，宿於驪山下的華清池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在塵浴罷，心爽神怡，一時感興乃賦七律一首，題為藍田道上：

武關直北是長安， 越嶺攀巒古道難；
四面烟雲遮眼起， 滿懷雪雨透衣寒；
藍田急切鴉聲晚， 渭水昏沉月色闇；
玉液華清池尚在， 征塵浴罷五更殘。

在武功開會約一星期之久，會中除商討以後作戰指導方針外，並由委員長蔣公講評各次戰鬪中之缺點，與以後應注意改正之處，諄諄不厭其詳，好像教官在學校授課一般。同時並令各戰區主官將此次戰鬪經過提

出簡明報告。第五戰區的報告，委員長臨時指定由我提出。因事先並未預料由我提報，祇有將武漢會戰中本兵團方面的實際戰鬪經過，毫無隱諱的簡要敍述。其中提到徐源泉軍於奉令撤退時未照命令進入大別山擔任游擊，已自行退回沙市。我報告完畢之後，委座對此不免大發雷霆，當即下令將徐軍長扣留嚴辦。後來經過與會各長官要求由李司令長官宗仁出來為之說項，要求委座寬恕，委員長乃俯循衆請，從輕處分。我當時也深悔我的直言無諱，但在良心上，也不得不直說的。

武功會議完畢後，我隨李司令長官仍由原路返回樊城。此次武功開會，是我第一次的西北行；關中為漢、唐兩代建都所在，不乏名勝古跡，有此機會旅行殊覺難得。只可惜來去匆匆，未能訪勝探幽，一一憑吊為憾。

歸途申整日坐車，殊無聊賴，因將沿途所見口吟五言排律一首，題曰武關道上：

江漢忽淪敵， 僵惚赴鎬京；
聞鶴興午夜， 戴月趨長程；
路遠疑車緩， 風寒覺衲輕；
旅途憑酒興， 驛宿畫帘迎；
雪重鷺蹄滑， 山危鮮鳥聲；
武關當路立， 秦嶺臥雲橫；
古壘餘陳蹟， 霽光炤漢旌；
車騎屋頂過， 砧白空中鳴；

地擾三郵險，天空一柱驚；
暮鶴爭樹噪，村叟帶烟耕；
息息童息息，行行復行行；
林梢新月上，野渡一舟明。

二二一、哭母

從武功出席軍事會議回到棗陽，即接到家中來電告知母親去世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噩耗，真是五內俱裂無限悲痛，想不到父親和母親都不能在臨終見到我這兒子一面，他們是如何帶着不滿足的牽掛之心以去，我也將遺憾終生。

得訊後，一面準備束裝回籍奔喪，一面電呈委員長及李長官請求准予解職。旋奉李司令長官轉來委員長的覆電如下：『樂城李副司令長官鶴齡兄，來電悉令堂莫太夫人仙遊，至深痛悼，兄秉性純孝，素所欽佩，唯大敵當前，正賴戮力疆場，掃除醜虜，所請辭職奔喪，應毋庸議，特飭庫撥發治喪費陸千元，希飭員具領為盼，中正印李宗仁轉。』回家奔喪既不獲准，只好就地設靈遙祭，遵禮成服。因軍事倥偬，敵軍朝夕可至，為免各袍澤奔走弔唁，貽誤戎機，亦不敢對外宣佈。

先母莫太夫人是本鄉孔林莫鎮南公的次女，嫋淑端雅，精於女紅，幼時並得外祖父鎮南公親自教讀，故略通書讀，曉暢事理，二十歲與先父績卿公結褵，主持家政有條不紊，侍奉姑婢彬彬有禮，上下和睦，鄰里莫不稱贊。先父自登科食廩，即經常在梧州教學，家中一切均由先母負責。我家本屬小康，而先母外則督導

耕稼，內則躬操井帚，夙興夜寐，節儉勤勞，對子女之哺育管教尤不敢假手他人，飢食寒衣，有病則晝夜謹侍唯恐不周，有過則詞色俱厲毫不寬假。我弟妹等共有六人，均依次成長自立，皆吾母管教有方所致也。

我年十五赴桂習陸軍，我母初以我年幼離鄉背井，力加阻止，及後經我跪為陳說，獲知此行關係國家造才，亦為個人報國千載難逢之機會，乃毅然應允，並諄諄以珍重身體、努力學業、尊敬師長等相訓誡。自此之後由軍校而入伍服役，長年在外，甚少回家，即偶爾返里省視，亦祇能小作勾留，席不暇暖，實未嘗稍盡人子之職。而我在民初之十餘年間，因戰事頻仍常親冒矢石，固知我母為兒常憂憊戚戚也。

民十二年時，我任職湘軍，曾迎先母至湘，原期母子長此相依謀菽水之樂，無何北伐戰起率軍離湘。嗣於民國二十四年又迎養於桂林，時吾母雖年近七十，而健康如故，曾以為可克享遐齡，容我略贖前愆，不期又抗戰軍興，奉命赴京徐作戰；而從此人天永隔，永無報答之期，興念及此，能不痛哉！

又憶及先父續卿公於民十八年病逝香港，其時我正參與北伐，軍事雖已告終，而因事滯留北平，未能及時返港親視含殮，已是遺憾無窮，今蓋惟見背，又不獲撫棺哀泣；嗚呼，吾母！生我劬勞，生不能晨昏定省，死不能親視含殮，為人子者能不悲乎？！

是年冬季，天寒夜永，思母嘗難成寐，曾寫哭母詩一首，以誌哀思。

武功會罷返荆襄，靈耗驚傳慈母喪；

風暗西天悲靜樹，魂招南海泣高堂；

極峯垂訓忠為首，墨經從軍孝豈忘；

苦塊不曾親殮視，春暉未報慟肝腸。

三一、隨棗會戰

敵軍佔有武漢之後，發現仍不能迫我屈膝，達成其侵華的迷夢，於是改變戰略。日寇首相近備文磨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下旬發表所謂「中日兩國調整關係基本政策」之聲明，獨言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誘騙汪逆兆銘往南京，後來成立偽政府。同時着手經濟封鎖與疲勞轟炸，企圖枯竭與瓦解我抗戰之物質與精神力量。

我最高當局高瞻遠獨，早已立定長期抗戰之國策，並早在二十七年四月頒佈抗戰建國綱領，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及武漢失守，日寇發出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哀鳴，顯然日本軍閥對我長期抗戰的決策已感身陷泥淖，黔驥之技已窮了。

我五戰區各部隊於武漢棄守之後，主力撤至鄂西北，控制荊、襄、隨、棗，與撤入大別山之一部經常東西呼應向平漢線進擊，使佔領武漢之敵猶如芒刺在背，寢食難安。至二十八年春，日寇遂發起對我之攻勢行動；集中其第三、第十三、十五、十六各師團，以及騎兵第四旅團，先於二、三月間攻佔京山、鐘祥一帶，隨後於四月底發起對隨、棗方面之攻擊。

當時我為確保襄、樊，控制隨、棗地區，乃一面鞏固桐柏山、大洪山兩游擊根據地作襄、樊之屏障，一面令各軍依消耗戰之指導，逐次抵抗，誘敵深入並不斷求取有利機會予以打擊。其部署情形概略如左：

〔當時本戰區防守之地區概自桐柏山以南，武勝關以西，亘大洪山以南、鍾祥、荊門以北之線。在此地區內，大洪山概略居於防守地區之中央。在大洪山以西為漢水及荊襄公路所經，為敵進犯路線之一。〕

在大洪山以北至桐柏山之間即為隨縣、棗陽地區，有公路西通漢水上游，以及河南之南陽，東南經安陸、雲夢通達漢口，為敵進攻之另一主要路線。

(二) 戰區之防守地帶以大洪山為中心區分為兩部份。大洪山以南及以西亘鍾祥、荊門一帶為右地區，由十三集團軍防守。大洪山以北及以東以至桐柏山之間的隨、棗地區為左地區，由我第十一集團軍防守。大洪山由三十九軍防守，形成一獨立據點，牽制敵軍行動，但歸左地區第十一集團軍指揮。

(三) 左地區方面，除三十九軍外，另指揮第十三軍，八十四軍，及四十五軍之一部。八十四軍位置於鹿頭鎮、吳山店地區佔領機動陣地，並與十三軍連繫，準備予敵側背攻擊。十三軍向唐王店、大山廟、天河口、高城間地區佔領機動陣地，掩護我軍左翼，並準備對敵之側背攻擊。四十五軍之一二五師集結於茅次坂、朱家集、長崗嶺地區，準備策應左地區右翼方面之作戰，與三十九軍切取連絡，並與右地區洋梓方面之三十三集團軍部隊保持連繫。我十一集團軍總部在棗陽城外設立指揮所，以便指揮。

四月三十日，敵第三師團並以砲兵加強，由安陸、應山方面向我八十四軍正面攻擊。該軍一七三師及一七四師，於郝家店、徐家店與敵經一晝夜之激戰，撤退至塔兒灣陣地繼續抵抗。五月二日敵分別在飛機及砲兵之支援下，向我十三軍八十九師，一一〇師高城鎮附近之陣地，及塔兒灣陣地進犯。我軍奮勇迎擊，曾使敵之攻勢頓挫，死亡頗衆。我一七三師、一七四師與敵發生陣地爭奪戰，塔兒灣陣地失而復得達七次之多。

嗣後敵軍藉使用毒氣挽回其頹勢，至四日我塔兒灣陣地陷入敵手，十三軍方面之高城鎮陣地亦受敵壓迫而放棄。於是左翼方面遂轉移至溧水西岸防守。五、六兩日，敵分別向天河口、白廟鎮及江家河、盧山之線攻擊，戰鬥激烈，敵未得逞。惟此時右地區方面，攻佔鍾祥之敵經大洪山西側沿漢水東岸地區北上，突破一二

七師及一八〇師防守之長壽店及豐樂鎮一帶陣地後，迅速向北挺進，於六日已竄至襄陽對岸之張家灣附近，將襄、樊與隨、棗間之公路交通切斷；且其後續部隊正沿漢水東岸向北急進中。敵軍飛機數十架並將張家灣附近之公路浮橋炸毀。根據各種情況判斷，敵似企圖包圍我左地區部隊於大洪山北側地區。當時四十五軍已退至襄陽附近之漢水西岸，左右兩地區之間已失去連繫，我左地區第十一集團軍所指揮之部隊無從抽調以對付出現於張家灣附近之敵，情況頗為嚴重，在襄陽之集團軍總部已非遷移不可。經過與總部幕僚們的一番研究商討，乃即採取如左的處置：

(一)令八十四軍立即脫離戰鬪經隨陽店向唐河轉進。第十三軍仍退入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區，相機以攻勢行動攻擊西進之敵，並切斷敵後方聯絡線。三十九軍仍留駐大洪山一帶，牽制西進之敵，相機向敵後採取攻勢。

(二)總司令部即撤離襄陽，向隨陽店移動，與八十四軍會合後向唐河撤退。

(三)建議長官部即移駐老河口，並將左地區十一集團軍之情況報告長官部，及建議爾後左地區與長官部之連絡改為南陽、唐河之線。

總司令部於六日下午五時左右開始移動至隨陽店。入夜後九時左右，接得八十四軍軍長報告，該軍已全部撤出陣地，到達隨陽店與唐縣鎮之間；當即令該軍逕向唐河轉進。七日晨接得襄陽縣政府報告，敵軍步騎兵數千名已入據襄陽。隨縣則於八十四軍撤退後亦為敵軍佔領。

總司令部於隨陽店獲得八十四軍安全轉進之報告後，稍加休息，當夜繼續向唐河轉進，經兩晝夜之急行軍，於九日拂曉前到達唐河。到達唐河前之當夜，沿途聞左方不斷有槍砲聲傳來。及至唐河即接獲南陽方面

之報告，謂有敵軍騎砲約千餘人已到達新野附近。此時遙望新野方面，天邊一片紅光，在黑夜中非常明顯，當是敵軍縱火無疑。

九日八十四軍已到達唐河附近，十三軍亦已到達桐柏。此時敵軍之大部概已到達陽湖鎮、棗陽附近。總部於是於唐河下達命令，令八十四軍即在唐河、南陽之間選擇陣地，阻止敵之北進。第十三軍以一部留駐桐柏山擔任游擊，其餘部隊在泌陽附近佔領陣地，協同八十四軍阻擊北進之敵。總司令部於下達命令後即移駐南陽。

十日新野失守，該敵繼續北竄。至十二日當敵軍一部竄達南陽時，我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部適於此時亦已到達南陽整理完畢。於是第十三軍、八十四軍及第二集團軍開始反攻。河南當地之保安部隊與民衆武力由別廷芳領導，亦協助正規軍四面八方不分晝夜對敵襲擊。桐柏山我十三軍之一部，及大洪山之我三十九軍，則分由南北兩面切斷敵後方連絡線，並截擊敵沿襄花公路後退之敵。同時我右地區之三十三集團軍亦自漢水西岸向東岸出擊。此時竄擾鄂北豫南之敵，因輕裝急進，過分深入接濟應援均成問題，沿途被地方民團突襲損失頗多，加之後方補給中斷，遂成強弩之末；十四日起敵軍遂紛紛向後潰退，我八十四軍及四十五軍次第收復原來放棄之地區，至五月二十日左右，概已恢復至作戰前之態勢。

敵軍此次進襲隨、棗，可說是輕裝挺進戰術的嘗試。我軍因缺乏縱深部署且部隊的機動力較差，以致令敵狼奔豕突。但敵亦因缺乏持續而均衡的機動力，以致一遇較大的阻擊即行崩潰，而其所受的損失可能較我軍的損失為尤大。敵軍經過這次教訓之後，直至二十九年夏季以前始終蟄伏於武漢附近不敢蠢動；我軍亦乘機加強整訓。

中央統帥部對此次會戰深為嘉許，旋頒授我于城勳章一枚，以示獎勵。

我在會戰結束之後，一時感興曾寫成七律一首如下：

北斗橫空夜未央，羽書無間馬蹄忙；荆襄形勝開雄鎮，隨衆環迴作戰場。
滅寇計成擒豎子，沉舟志決擊強梁，妖氛掃淨河山固，峴首樓頭日月光。

三四、遊武當山

第一次隨衆會戰之後，那年秋天，大概是重陽前後，那時前方的狀況相當平靜，我率領隨員數人，由樊城至石花街視察後勤設施。視察完畢，當晚住在石花街。

石花街在武當山的東麓，上武當山不過數十里。武當是國內名山之一，是道教的聖地，在武術上提起武當派也是大大有名。我隨軍來到襄樊之後已近一年，對近在咫尺的名山本早有一訪的雅興，只是平時軍書旁午，很難抽出空來作一次專訪名山的旅行。住在石花街的當天晚上，大家閒談起來，認為當時正是秋高氣爽的天氣，不可錯過登山一遊的機會，向我請示；我本早有此心，同時又不致妨礙公務，乃欣然應允。

翌日清晨出發，先赴草店，再由草店換乘山兜登山。所謂山兜就是類似四川的滑杆。草店正在武當山的山脚下；據說原來只是荒僻的小村，後來建築武當山，因工程浩大，各方工人蒼卒於此，時日既久竟成為一大市鎮，迄今猶相當繁盛；後來第五戰區成立軍官訓練團即設立於此。

武當山，傳說是當初道教祖師張三峯，居此虔修，後為明燕王朱棣羅致軍中，頗著戰績，及即位，為酬庸其勳猷，乃敕建此一龐大林苑為其養真之所。一說是明燕王即位後，幾經尋訪建文踪跡均無結果，後聞建

文已在武當入山修道，乃留張三峯於此鎮守，不准再出。但為籠絡其心，乃不惜巨資為其建此勝地；計有三十六宮，七十二寺，規模之大其他名山罕與倫比；全部建築係用湖北二十四縣的七年糧賦建築而成，其耗資之巨亦可想而知。

離草店後開始迤邐登山；九秋天氣，陽光和煦，微風拂袖，令人心曠神怡。沿途樹木蔭森，泉聲瀝瀝，五里一亭，十里一站。同行諸人或高歌以舒懷，或談笑以為樂，偶或長嘯則谷應山鳴，靜聽則羣禽婉轉，塵慮頓消，渾然皆有忘機之樂。

行近黃昏，偶見樵夫負薪而下，遠友戴笠而歸，有頃則遙見園林一處，古木槎枒，雲烟半掩，近前則紅牆綠瓦，樓閣特峙，入口處有大石碑一方，上書紫霄宮三大字，算是到了武當山的大門。

紫霄宮為遊武當山的第一站，遊客多需在此寄宿，廟內亦備有養宿設備。我等入內後，旋有十數來髮道人，老少不一，趨前問訊，表示歡迎並請留宿，因請代辦養宿各事，是晚即宿於紫霄宮。

晚餐前後，廟內道長知道我是五戰區的高級長官，都前來謁談，年齡都在五六十歲以上。最後一位最老的道長蹒跚扶杖前來，視之頭童齒豁，面上皺紋形同網結。此老道身披單衣，腰掛布袋，脚穿芒屨，神氣瀟洒，耳聰目明，晤對間亦彬彬有禮，與言世事嘗答非所問，與談天道則津津有味，了無倦容。我問他：「高壽幾何？」他答道：「早已忘却歲月，無法奉告。」轉問旁邊另一位已七十餘歲的道長，據答他亦無法得知該老道的確實年齡，只記得自己十歲左右即到此山修道，那時此老已有他本人現在的年紀。據此推算，則此老道當在百三十歲以上。後來我再問他是何處人，他答道記得是山西解縣人，是關公的同鄉。又問他多大來此修道，他答道是十幾歲。我暗自盤算他在此修道竟已一百多年；於是再問他曾否看見以前的長毛賊在裏

獎一帶打仗，他答曾有其事，又問他看見長毛賊時他是多大年紀，他答道大概和施主你（指我而言）的年齡差不多。我那時年齡是四十九歲，距太平天國之亂為九十餘年，那麼，此老道的年齡算來確是百三四十歲了，令我對他肅然起敬，對他的來歷與修真的情形也更感興趣。

後來我邀此老道和我們共攝一影片，藉留紀念，他堅拒不願照相，我只好吩咐隨員暗中偷拍。後來沖洗底片時，其餘各人都有影像，唯此老道的位置空無所見；實令人奇異而莫可究其由。此老道是平日住於廟後的山洞中；洞中除雜草一堆，顯示有人經常在此坐臥之外，別無長物。據說其飲食極為簡單，每餐僅饅頭或米飯團一個，有時且數日不食。後來於民國三十三年我在安徽主政時，聽說此老道已於三十二年物化。

第二天從紫霄宮向最高峯的天宮前進。這天所經道路與第一天大不相同；攀峯越嶺，穿林入洞，大都是羊腸鳥道，深谿幽谷，懸崖削壁，莫敢俯視；忽而密林覆頂，不見天日；俄而烟霧瀰漫，不辨東西；大有山窮水盡疑無路之感。及至穿過層雲，攀登武當主峯，則雲生脚下有如海上乘槎波濤洶湧，峯巒露頂儼同龜鵠浮空，鵠鵠無聲，萬籟俱寂，別是一種境界。於是奮其餘勇，再事攀扎，登臨絕頂，循南天門西進天宮，登階入殿。至此已是武當最高峯頂，休息片刻，全身疲乏轉覺輕鬆。

此宮所有門牆、簷瓦、窗櫺、樓桷，以及佛像神龕、香爐、簽筒與其他用具等，無一不是用雲南的紫銅鑄造而成，且雕刻精巧。站立宮前，一望無際，雲收霧散，頗有萬里山河盡收眼底，八方巒嶂玉笏來朝之概。宮後有一巖洞，養有不少神鵠，遊客一到即羣出飛鳴，可能是已養成向遊客覓食的習慣。還有一種靈枝瑞草，一枝在手，滿袖生香，不知是何種植物。

我們因為時間有限，對全山的三十六宮，七十二寺無法一一遊覽，除了最高的天宮之外，只掠了幾處順

三四、遊武當山

一六四

路的參觀。其中有石殿一座，係由整座石山雕鑿而成，門窗屋瓦，以至佛像、神龕、香爐等，亦無不是就此山石雕琢出來，其工程的精緻堪與銅宮媲美。其他各處宮殿、廟宇，規模多屬宏偉，然以年久失修大都破敗不堪，很多碑柱牌樓，為風雨侵蝕，已成陳跡，唯張三峯石像仍兀立無恙。細懷當年開拓此山時工程之巨大，氣魄之雄偉，令人贊嘆。

當天下午仍同至紫霄宮住宿一宵，翌日下山，臨行老道送我仙桃、靈芝各一，以作紀念。仙桃攜下山後即腐爛；靈芝則保存至今仍然完好。

歸途中，在山兜上口占七絕、七律各一首以誌遊踪。

其一，七絕一首

為尋勝境武當遊， 邁步崎嶇興不休；
四面烟雲歸眼底， 疏疏林葉萬山秋。

其二，七律一首

崔嵬玉柱接蒼穹， 萬笏來朝七二崇；
老道古松爭歲月， 銅宮石殿闢玲瓏；
雲開腳底千峯翠， 身立天邊一目空；
瑞草琼枝香滿袖， 勝遊蠟屐興無窮。

三五、重回大別山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南京棄守之前，我覺得大別山頗有戰略上的重要性，曾派遣幕僚人員前往作兵要調查，事後曾擬好大別山區的游擊作戰計劃。武漢撤守，我第五戰區自鄂東向鄂西撤退時，即將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團軍駐大別山，從事敵後的游擊作戰並將前此擬訂的游擊作戰計劃交廖總司令參考實施；對於控制敵後地區廣大民眾，防止物資資敵，破壞敵軍交通運輸，以及襲攻敵軍策應主力作戰，曾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至民國二十八年秋，廖總司令以患高血壓不治，逝於立煙。廖是保定軍官學校前後同學，同我一樣是從湘軍中下級軍官幹起來的，最後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開始北伐時，他是劉興的團長後升師長最後任三十六軍軍長。北伐後回廣西服務，任第七軍軍長，以迄抗戰軍興，於二十七年初升任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他身體素稱強健，無任何不良嗜好，作事負責，且勇敢善戰，無論練兵作戰都是能手；但因秉性過於單純，不能肆應當時敵後的複雜政治環境，對共黨份子的興風作浪又無法控制，而愛好心切，以致演成高血壓，卒至中風不治，良堪痛惜。

廖磊病逝後，我們覺得這一地跨三省，包括數十縣，且控制津浦、平漢、長江的廣大戰略地域，如無得力之人前往主持，以致落於敵人或匪僞之手，對於國家前途當有莫大危害。正議論間，接到中央二十八年十一月二日的電，命我兼任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及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各職並須赴皖，主持該邊區黨政軍一切事宜，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職務交黃琪翔接替。我奉命後深知中樞對此地區之重視，雖自維能力棉薄恐難于勝任，但大敵當前何可推諉。惟為使爾後邊區工作能推行

無礙，必須將大別山區當前狀況，以往缺失，今後方針向中央詳陳與請示。於是，奉命後即趕往重慶謁見委員長 蔣公請示并詳陳所見。蔣公對我的建議都一一採納。嗣後又與中央各有關部、院、機關接洽及交換意見，並向各方面邀請推介皖籍賢能之士，一同赴皖工作，以資臂助。後來延聘同行者計有萬昌言，張宗良、范苑聲、儲應時、高長柱、汪劍影、汪平、鍾鼎文、陳維沂、張湘澤、汪少倫、周天固、桂競秋、韋永成、黃同仇、馬中驥等人，除最後數人外，其餘都是安徽人。

那時敵後工作最感困擾的事，莫過於抗戰開始後由共匪改編而成的部隊，他們在戰區以內假抗日之名行擴張之實，不遵守命令對日作戰，專事收繳民間槍枝，勒收稅捐，勾引國軍士兵及地方青年以期擴充實力，並破壞地方行政系統，視法令於無睹。又挑撥離間，製造摩擦，對地方政府或友軍顛覆破壞無所不用其極。當時在安徽的無為、廬江一帶也有由共軍改編之新四軍的一部，為此我在離開赴皖之前，特約請新四軍當時住在重慶的負責人葉劍英商談，希望他轉告前方新四軍的將領，務請以國家為重，認清敵友，團結合作，一致對敵，並請尊重地方政府法令，約束所部。我並鄭重聲明此後無論是何部隊如有不遵約束，妨害抗戰工作者，我為顧全大局起見，自不便緘默，請轉知駐在安徽的青部多多幫助感荷不盡。我這一番話真是發生了效力，當我到達立煌時，新四軍原來設在立煌的辦事處，已經悄悄的撤退了，以後新四軍的部隊也未發現再在轄區內公開非法活動。當然他們都很清楚的知道我是認真作事不是苟且遷就的人。

從重慶回到樊城後，立即一面整裝準備赴皖，一面對十一集團軍總部的人員加以安排；集團軍參謀長董彥平將軍因故不能赴皖，辭職返渝仍回軍事委員會工作，部份人員隨我赴皖，其餘人員及八十四軍全部交黃總司令琪翔接管。處理完畢後，於十二月下旬出發，先至老河口向李司令長官請示後，再率同警衛團經鄧縣

唐河、駐馬店，越平漢線，再經汝南、潢川、商城縣赴立煌到職。此一路線為自老河口繞越渝陷區往豫東之捷徑，不通車輛，全賴步行，承二十二集團軍孫震總司令派川籍善擡滑杆之士兵六人同行，以備必要時之需。全程約七八百里，曉行夜宿，初冬季節天氣良好，同時道路平坦，隨行官兵前呼後唱，逸興殊濃，以此雖屬長途跋涉，也不覺勞頓。所經各縣，地方軍政主官及民衆團體均自動前來迎送，非常熱烈，深為感動。

二十九年元月六日到達立煌，所有在立煌的黨政軍各機關人員及民衆團體，都熱烈的迎於郊外，從他們面部表情看出他們內心的真摯，我知道他們所感激的不是我個人，而是我代表的政府對敵後軍民同胞的關懷和溫暖。他們喜淚逆流，我也被感動得熱淚盈眶，哽咽難語。

我的住處省政府已早為我備妥，當晚即住入該宿舍內。翌日首先赴古碑冲的嚮山寺廖總司令靈前獻花致祭，並代表李長官慰問廖總司令的家屬。古碑冲是立煌郊外的一處比較寬敞的山凹，嚮山寺即在冲內之山崗上。時值寒冬，落葉滿山，朔風蕭瑟，憑棺默念益增悲愴，想起數十年來患難相共的同窗戰友，一朝永訣，不禁潛然。

祭奠後，即赴集團軍總部作一般巡視，與總部高級官長晤敘，因大部都是老戰友，久別重逢，自然倍覺親切。當即詳詢各人近況及軍隊情形，得知一切均屬妥適，深為欣慰。二十一集團軍的官兵都是我抗戰開始時率領出來的子弟，也是我今後達成任務的主要憑藉，我自然不能不特別關心。

從總部巡視完畢之後，返回立煌省府召見省府所屬各單位，以及省黨部等機構的主管人員並詳詢一切。隨後便訪問當地年高德劭的賢達，表示我對他們的尊敬，博取以後在工作上的衷心合作。翌日省府召集所有立煌之黨政軍各機關學校團體人員，行就職典禮；即席向全體轉達中央關懷敵後工作同志之意，並就國際情

勢分析我抗戰前途，希望全體努力奮鬥，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那時歐洲英法已為德侵波蘭對德宣戰，美國已宣佈廢止日美商約，我判斷全世界性反侵略軸心的戰爭不久便將爆發，後來竟絲毫不爽。

宣布就職之後，逐日聽取各單位的業務報告，俾澈底了解大別山區及其周圍的一切情形，作為擬訂爾後工作計劃的依據。當各單位均已報告完畢之後，我突然想起立煌大小單位的主管都已見過，惟有新四軍立煌辦事處的人員尚未獲見，不免納罕，乃即派人前往通知來見，旋即報該辦事處的人員已於兩日前秘密撤退，僅留下一塊辦事處的招牌，兩個帳蓬，及滿地散亂的雜物。看情形他們走得還相當倉皇。據報告原來設在立煌的新四軍辦事處，工作人員不下數十人，負責人張雲逸是海南島人，曾在廣西作事多年，這可能是因為二十一集團軍大部份是廣西人，便於接近之故。他此番不告而別，可能是做賊心虛，怕我對他們不客氣。

當時在立煌的軍事單位，除二十一集團軍總部和若干直屬部隊外，還有一部份學生軍。二十一集團軍的官兵都是我舊日袍澤，大都是本黨的忠實信徒，且訓練有素，共黨要煽動他們脫離本黨，投往匪幫，我相信是絕不可能的。惟新組織的學生軍，他們之中一部份是廣西大學未畢業的學生，以及其他學校志願從軍的學生，思想比較複雜，而且多數心志未定，認識不清，或有為新四軍引誘的可能。於是我就召集該隊學生軍至省府內訓話，予以告誡，使其提高警覺，不要受共黨的欺騙。不料該隊學生軍，已有極少數參加共黨，竟於是夜秘密逃往新四軍部隊去了。各縣長中也有數人曾加入了共黨，亦同時逃走。這麼一來，反使抗日陣營得以淨化，黨政軍上下人員一致為之額手稱慶。

經過一個星期左右的考察，對黨政軍各方面的情形，有了相當的瞭解之後，我開始根據各種狀況，遵照中央迭次頒發的政令，再參考各方面的意見，研擬黨政方面的整建計劃綱要，準備召集一次黨政幹部聯席大

會，提出討論，作為今後整個豫鄂皖邊區施政的總綱領。並召集各軍長，游擊部隊指揮官，各軍參謀長等前來立煌商討邊區全般對敵作戰計劃及軍事部署。同時着手調整黨政軍各機構的組織及重要工作人員。那時人事制度不像今天上軌道，新官上任總得有一番人事上的安排，這種積久而成的習慣，如新任主官到任之後不立即發佈人事，反使各部門的主管惶惶不安無心工作，且有新任主官一到便馬上提出辭呈表示讓位的，如新任要他繼任便加以挽留。我到立煌之後，除了必需調整者外，我儘可能責令繼續工作不予更動。雖然我邀請了十幾位人士隨我同行到邊區工作，我原是準備用在開展新的工作上，並不是為調換人員而來的，因各同志大都是我舊日袍澤或是能力優良之人員自無調動之必要，其中只有少數因特別緣故稍予調整而已。

在黨部的人事方面，因省黨部主任委員一席，中央為期便於統一指揮，已指定由我兼任，前任主委劉真如先生乃奉命令調省府委員。另省黨部委員陳鐵調聘為省府顧問，原委員兼書記長卓衡之專任委員，以楊績隸任省黨部委員兼書記長並兼皖報社社長。周新民委員久不就任改以蘇民遞補，其餘各委員如宋振耀、翟純、張一寒、王樸、王秀春、冷雋、范春陽等先生均繼續留任。

省府方面的人事，省府委員兼秘書長朱佛定繼續供職，委員兼民政廳長陳良佐、委員兼財政廳長章乃器均准辭職，他兩人在前廖兼主席任內，個人見解主張不能一致，造成內部不安；所遺委員兼民政廳長一職以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韋永成接替，委員兼財政廳長則由桂競秋擔任；教育廳長方治建設廳長蔡灝均留任。

另有一省動員委員會，因其中工作隊份子複雜，着予撤消，改在省府之下設一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由原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常恆芳調任。原有之各工作隊即停止活動，各隊員一律聽候調訓。

以我之能力棉薄而集黨政軍的責任於一身，要想各方面都能照顧週到，無虧職守，於是成立一黨政軍總

辦公廳，以邊區游擊總部參謀長董英斌兼總辦公廳主任（董未到任以丘國珍暫代），下設黨務、政務、軍務三個組及主任秘書一人。黨務組長由省黨部委員蘇民兼任，政務組長由省府委員萬昌言兼任，軍務組長由總部高參凌孟南兼任，主任秘書由省府參事鍾鼎文兼任。總辦公廳於元月二十七日開始辦公，所有黨政軍三方面的重要公文，尤其是涉及政策決定，需要協調的案件，隨時由省府秘書長、黨部書記長、軍方參謀長專送總辦公廳核閱，其餘普通文件仍由各部門主管擬辦彙報。實行結果對加強工作效率，加速業務處理，以及黨政軍的協調配合上均卓著成效，也節省了我不少精力，使我有時間到各處親自視察及考慮真正重要的問題。

為了黨政整建計劃綱要能及早頒佈實施，因隨令省府秘書處會同省黨部即日着手籌備黨政幹部聯席大會務於二月中旬以前召開，希望在本年三月中旬以後，黨政各方面都在新的整建計劃指導下一齊努力。同時規定黨政幹部訓練班也要在二月中旬以前籌備就緒，本年三月初開始召訓開學。

是月二十八日，經與廖夫人商酌之後，以交通梗阻廖主席靈柩歸葬不易，暫時將廖故主席營葬於古碑冲附近的山中，出殯時黨政軍機關及民衆團體一致前往公祭。安葬之後，又派員護送廖夫人回籍，以慰老友於地下。我在立煌以後的數年中，每逢佳節，我總要輕車簡從的到墓前憑弔一番，並曾許下心願，一俟抗日戰爭勝利，當為其歸葬故鄉，不期勝利之後接着共黨叛亂，迄無寧日，而今大陸陷匪擡頭臺灣，不知老友的墓園曾遭浩劫否！

三六、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

所謂豫皖鄂邊區，也就是以大別山為中心的週圍地區。大別山蜿蜒於豫、皖、鄂三省的接壤地區，在地

理上屬於淮陽山脈；其範圍概自平漢線以東，津浦路以西，淮河以南，長江以北。此一幅員廣大之地區，計包括豫南之潢川、羅山、固始、商城、光山、經扶等六縣，鄂東之麻城、羅田、英山、廣濟、黃梅、浠水，新蔡等七縣，安徽之六安、霍山、岳西、太湖、潛山、立煌、霍邱等，總共二十餘縣。

大別山一帶的地形為海拔二百至千餘公尺不等的連亘丘陵，結構相當複雜，其最高峯為岳西境內之天柱山，海拔達一、六九二公尺，其他海拔在一千公尺左右的山峯，尚有數處之多，確為從事游擊作戰的良好處所。

由於大別山北據淮河，南扼長江，形成武漢的自然屏障；向西可以威脅平漢線，向東可以控制津浦線，對於南京的敵人有如骨在喉之感。昔太平天國之戰時，曾國藩、胡林翼即據守此一區域阻止太平天國西寇武漢、北上中原、虎視金陵，最後終將太平天國擊滅。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年間，共匪亦曾盤據此區，後經中央以數師之衆，窮數年之久始將其消滅。今安徽立煌及豫南之經扶兩縣，即為紀念當時剿匪立功將領衛立煌、劉經扶兩氏而命名，其易守難攻於此可見。

此一地區不僅面積廣大，人口衆多，物產亦相當豐富。巢縣、無為沿江一帶為我國有數之產米區。淮河兩岸則盛產粟麥。此外大通之煤，蘇北之鹽，產量亦極可觀。同時淮上健兒勇敢善戰，清末繼湘軍而起之淮軍，也曾有過光榮的歷史。以如此的物力人力，我如善為控制利用，當可發揮對敵之莫大功效；如果委之敵手，則正足以遂其以戰養戰之企圖。

自南京、徐州、武漢相繼陷敵之後，此一地區除西北一隅尚可與大後方保持連絡外，大部份已陷於敵軍包圍圈中。不過敵軍只能控制點線，整個豫皖邊區敵軍除佔領長江沿岸及津浦、淮南兩鐵路線上之要點外，

其餘城鎮均為我軍收復，廣大鄉村地區更完全在我軍控制之下。安徽六十餘縣中，有四分之三均屬完整，其餘為半完整縣份。鄂東的十一個縣中，完整的有五，半完整的有三。豫南九縣則全部完整。蘇北、魯南完整的縣份也很多。

然而要想在此一廣大地區，能發揮有組織的抗敵力量，也不是很簡單的事。那時遠在重慶的中央政府，對此孤懸敵後的地區已有鞭長莫及之感，南京汪精衛的偽政府則已開羅，而最令人困擾的莫過於共產黨。日寇和漢奸是人人了解勢不兩立的敵人，而共產黨那時雖早已一反其在抗戰開始時的誓言，實行所謂「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張」的政策，企圖利用對日戰爭的機會，死灰復燃，發展壯大，最後顛覆政府，表面上却仍然打着抗日的旗號。因此，敵後工作除了對付顯然的敵人而外，還要對付另一個潛在的敵人。此外，為鞏固此一地區，確保行政權之行使，自然須藉軍事力量支持各級的行政設施，但基於長期抗戰的最高決策，我們尚不能以維持此地區的統治，運用當地人力物力對敵作戰為已足，更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建國目標和程序，積極從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建設，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因此，敵後工作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是包羅廣泛的政治問題。

處在這樣四方八面、內在外在都是敵人的環境中，如果沒有堅強的力量和有效的辦法，要想達成這樣艱巨的責任，無疑是很困難的。關於這些早在我到建立煌以前就已經考慮到了。可是既然受命，就只有竭盡心力邇勉從事，而且我相信我在民國二十一年至民國二十五年間，服務廣西時所得的行政經驗，今天雖不能完全用於敵後，但幹部訓練、民團組織、基政建立等當仍有可借鏡之處。其他黨政重要問題遵照中樞指示，針對戰地需要，並參酌敵、偽、匪、我的各種情形，權衡至當，總會找出適當的解決辦法。最要者，我個人認

為，為政之道不憂方案之不善，而憂政出多門，彼此牽制，以致窒礙難行；今中樞既賦予我黨、政、軍之全權，一切均可放膽去作，我想只要我能領導大家全心全力工作，必可克服困難達成任務；我就是抱着這樣的態度和信心來到豫皖鄂邊區的。

我到達立煌對各方面的情形有了進一步瞭解，並將軍事部署大致調整妥當之後，即着手黨政方面的整理與重建工作。首先召開安徽黨政整建大會制定戰時黨政實施綱要，研討各部門工作實施方案，作為今後施政的張本，同時籌備成立黨政幹部訓練班及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因我當時認為要在那種敵匪竄伺的環境中，將此一地區整理建設起來成為敵後堅強的根據地，達成對敵抗戰的使命，實非從根本做起不可。以往陳舊的工作方式，以及等因奉此，因循敷衍的工作風氣，實在不能適應敵後作戰的要求，必須大刀闊斧加以改革。為了建立新精神、新風氣、和新作法，一方面要對現有幹部灌輸新觀念新思想，使大家的思想、觀念一致，拿出新的精神和勇氣去硬幹實幹；這是召開黨政整建大會的主旨。其次，為政在人，行新政必須要用新人，尤其要有健全的基層幹部。他們既不能在工作上發生偏差和鬆懈，更要能在言行上博得羣衆的信仰；然後才能動員羣衆、組織羣衆和團結羣衆，達成所負的任務。同時政府必須重視階區青年知識份子的領導和運用，讓他們有貢獻其力量，服務桑梓，保衛國家，並創造其個人前途的機會。現有各幹部也需要不斷訓練，以培養其工作能力，激發其服務精神；這是成立黨政幹部訓練班及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主旨。

二十九年二月中旬，黨政整建大會在經過短時間的籌備之後，在立煌召開。在大會開幕前，我親自於百忙中擬訂了一份敵後黨政整建綱要草案，將黨政工作應守的原則，以及各部門的重要工作事項，加以列舉，交由大會研討修正，並計劃實施。茲抄錄於下：

壹、前言

敵後大別山游擊根據地之建立，為我國抗日總體戰爭中最重要之工作，而安徽又為大別山邊區內之重要省份，故要鞏固大別山為敵後作戰之根據地，勢須先將安徽省加以整頓及建設，把政治、經濟、文化統統動員起來，支援軍事需要，使成為敵後堅強的堡壘。

整建工作，首須符合中央政府對日總體戰的原則，並參照 總理遺教，三民主義的政治原理，一面抗戰一面建國。就總體戰的原則言，不外使全國人民，無分敵前敵後，在中央領導之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為爭取民族生存，獲致抗戰勝利而動員一切力量。就建國工作言，不外要力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項建設，其中尤其要團結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以及革新政治機構，提高行政效能，發展農村經濟，強化國防力量，提高民衆生活等。凡此種種工作，亦即本整建綱要所列舉者，均應詳為規劃，切實施行。

目前我對日抗戰已進入第二階段，我國的土地與人民，已陷於敵後者，幾達一半。人口最稠密，生產最富裕的省份，都在陷區之內，故整建敵後地區是總體戰中最主要之工作。其成敗關係我長期抗戰之勝負至深且巨。我邊區各省縣同胞，務共喻斯旨，同心同德，努力以赴，貫澈中樞此項政策，完成抗戰建國任務。現為工作容易起見，擬先將安徽一省的整建工作，全力作好，然後以安徽的成效為規範，推及邊區之其他省縣地方。

整建之程序，首當成立健全的組織及革新行政制度。規模既立，然後與全省工作人員以及同胞共同進行

抗戰建國工作。安徽戰前的行政組織與制度，遞嬗迄今，一切行政法令、人事作風，無非一仍舊貫，不獨工作鬆懈，且不適合戰時要求，更無法配合軍事，殺敵致果。復以抗戰開始之後，敵寇隨即入侵；當時战火連綿，人民四散逃避，地方行政機構亦隨之後退，工作人員大部失散；以致政令無從轉達，工作廢弛，組織形同瓦解。至武漢棄守後，敵軍轉移，前此淪陷縣份，又為我軍次第收復，亦有未經淪陷，仍屬完整者。截至目前為止，安徽全省，在我控制下之完整縣份，尚居十之六七，有敵盤據者不過十之三四。且其中多數為城鎮駐有敵軍，鄉村仍為我軍掌握。豫南、鄂東亦復如是。我今對敵採長期抗戰，運用持久消耗戰略，對此廣大地區，必需積極掌握整理。若任意放棄，不僅未善盡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責，且令敵得以掠奪此廣大地區的人力物力，遂其以戰養戰的企圖，此豈我國長期抗戰之道！以是政府決心對此敵後廣大地區加以整頓重建行政組織，領導陥區同胞一齊為抗戰建國而努力奮鬥。茲根據安徽當前情形，綜合各方意見，將本省各級行政組織，以及民、財、教、建、軍事、黨務各項整建事宜，訂為黨政整建綱要草案，提出安徽黨政整建會議研討修正，並準此擬訂實施計劃。

三、總綱

- 一、服膺最高領袖決策，以完成抗戰建國為總目標，以鞏固豫皖鄂邊區，從事敵後作戰為基本任務。
- 二、黨、政、軍一元化的指導，以期集中力量，統一事權，一切組織與行政皆以此為基準。
- 三、黨政軍須密切配合，以黨團力量推展行政設施，以行政力量擴大黨團組織，以軍事力量掩護行政工作，以行政力量支援軍事作戰。
- 四、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一切為勝利而服務。

五、一切須實事求是；政令須簡明易行，令出必行，嚴守信用；所有措施須適合需要與情況，不可空談理想或敷衍應付；一切須實情實報，不可隱瞞真相，粉飾鋪張。

六、實行寓兵於農，寓將於學，寓衆於黨。

參、黨團方面：

- 一、擴大黨團組織，發展羣衆運動，配合軍事與行政措施。
- 二、黨團須與軍事及行政組織打成一片，形成一堅強戰鬥體。
- 三、加強黨團組織紀律，消除內部派系組織。
- 四、軍事及行政幹部必須絕對信仰三民主義，參加黨團組織。
- 五、爭取青年學生參加黨團組織，獻身抗戰建國行列。
- 六、加強黨團組織活動，發揮黨團力量。
- 七、軍人及學生准許集團入黨。
- 八、行政與黨務工作幹部實施人事對流。
- 九、加強黨團組織活動，發揮組織的戰鬥功能。
- 十、清除潛伏機關、部隊、學校內從事搗亂，分化抗建力量的異黨份子。

肆、行政方面

- 一、建立堅強的行政組織系統，鞏固敵後政權，領導人民一致為抗戰建國而努力。
- 二、施行戰時新縣制，特別強化基層行政組織，以利組織及動員民衆。

三、建立各級民意機構及民衆抗戰團體，提高民衆政治認識，訓練人民行使四權。

四、聘請地方賢達、學者及專家擔任政府之顧問、參議或諮詢，匯集衆人才智，提供興革意見。

五、成立黨政及地方行政幹部訓練機構，健全及培養中下級行政幹部。

六、民政：

1. 確實調查戶口、編組保甲，以利施政。
2. 編組國民兵團實施軍事訓練，並成立民衆自衛部隊防盜防匪及協助軍隊作戰。
3. 基層行政機構採「三三一體」，以達成管教養衛齊頭並進。（嗣後遵照中樞政令稍有改變。）
4. 屬行禁烟、禁賭、節約浪費、倡導戰時新生活。
5. 擬訂土地政策保障佃農利益。

七、財政：

1. 整理財政，杜絕偷漏，開闢財源。
2. 徵資、征現合併採用。
3. 劃分省縣財政，開闢鄉（鎮）、保財政來源。
4. 實行物資管制，統制貿易。
5. 加強地方銀行業務，融通生產資金。
6. 切實執行預算決算。
7. 軍公教人員及眷屬生活必需品，儘可能行實物配給制。

八、教育：

1. 簿辦專科或大學教育，使陷區青年有受高等教育之機會。
2. 收容及協助陷區青年轉送後方求學。
3. 實施戰時教育，調整教育重點。

4. 高中以上學校由省主辦，初中由縣負責主辦，鄉（鎮）設中心國民小學，保證國民小學。
5. 高中以上學生一律施以軍事訓練，實現寓將於學之目標，初中學生須加強童子軍訓練。

九、建設：

1. 輔導農民革新農業技術。
2. 配合土地政策，擴大耕作面積。
3. 維持及發展民生日用工業。
4. 在不違背國家利益下，獎勵自由貿易。
5. 確保交通、通信、運輸的便利。

十、糧政：

1. 成立專業機構辦理糧政業務。
2. 充裕糧源、調節供需、防止資敵。

十一、保安：

1. 現有保安部隊力求充實精練。

2. 統一運用保安部隊配合國軍作戰。

上述整建綱要草案，因草擬時間匆促，自然難期周全而有系統，文字尤欠修飾，不過重要的事項都概括了。這份草案經過大會討論通過之後，安徽的黨政工作爾後即以此為準，由各部門訂定實施方案及年度工作計劃，付諸實施。每年一月舉行一次黨政檢討會，檢討一年的施政成果，根據檢討結果，再加訂下年度的工作目標和計劃。此項施政計劃及檢討制度，直至抗戰勝利後，在我繼續主持安徽省政期間，始終加以保持。後來中央推行行政三聯制，實際上安徽已經早就實行了。

本來豫皖鄂邊區的黨政軍一切事宜，奉中央規定一概由豫皖鄂邊區游擊總司令部負責，但事實上我只兼了安徽一省的主席及省黨部主委，對豫鄂兩省邊區各縣的黨部及縣政府並沒有直接的指揮權；對豫鄂兩省邊區各縣的黨政措施，還必須透過他們各別的上級省黨部省政府。因此，這次黨政整建大會只好以安徽一省的名義舉行，豫鄂兩省邊區各縣的縣政府和縣黨部，都是以列席的身份與會。會後由他們對討論通過的整建綱要或其他實施計劃帶回，分別呈報其所隸的省黨部或省政府參考辦理，以期彼此在行動上能夠配合。

由於戰地司令官對轄區內黨政的統一指揮，有時不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二十九年三月，中央遂於軍事委員會之下設戰地黨政委員會。各戰區或游擊地區則設黨政分會，在中央戰地黨政委員會之統一指導下，處理其轄區內的黨政事宜。

豫皖鄂邊區的黨政分會同月奉令成立，由我擔任主任委員，由轄區內原有主管長官及遴選當地具有聲望、資歷的才智之士擔任委員組成之。當時擔任委員者為豫南行署主任張軒、專員梅達夫，鄂東行署主任兼專

員程汝懷，安徽省動員委員會主任委員常恆芳，安徽省政府秘書長朱佛定、顧問魏旭初，二十一集團軍總部參謀長董英斌、高參丘國珍等九人。分會之下分五個處；計為秘書處，黨務處、政務處、軍務處、總務處。後來動員委員會改為宣傳委員會亦移隸於分會之下。黨政分會的各處長：秘書處由丘國珍委員兼任，黨務處長蘇民，政務處長李一塵，軍務處長凌孟南。分會成立後，我原設的黨政軍總辦公廳即行撤消，各項業務統移由分會接辦。

這個分會最初的構想是不錯的，但後來還是無法克服不同管轄機關的責任與權限問題。真正完全聽命於豫皖鄂邊區黨政分會的，仍只有我自兼省主席和省黨部主委的安徽省黨政單位。豫鄂兩省應屬邊區分會管轄的專區及縣各黨政單位，還是不能脫離各該省黨政當局的管轄。俗語說：「公婆過多，難為其婦」；以致這些專員公署和縣政府因上司太多，弄得無所適從，黨政工作反窒碍難行。有時各單位之間且不免發生衝突，甚至中央有關主管部門之間，亦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例如，黨政分會責令各縣興建防空工事，或支付某種款項，其所隸的省政府以未列預算，不准核銷。類似的情形經常發生；報請中央亦無法解決這種組織上具有的先天缺憾，我想其他的黨政分會自然也遭遇同樣的難題。所以，經過若干時間之後，至三十一年四月，中央電令各分會派員至重慶開會商討。會中議定各黨政分會對作戰地區內的黨政事宜只是消極的監督，而非積極的直接令行。這樣戰地黨政委員會以及所屬各分會等於都成了毫無作用的虛設機構，不久之後即行撤銷。

黨政整建大會結束之後，黨政幹部訓練班及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緊接着相繼開訓。黨政班是輪流調訓省政府各廳處之科長、科員、縣長、專員公署及縣政府之科長、區長、省黨部之科長、科員，各縣黨部書記長，各中學之校長、訓導主任及教師等。訓練內容，除行嚴格之軍事管理使體認戰地生活激發蓬勃的朝氣外，特

別着重總理遺教及領袖訓示之闡揚，民族大義之灌輸，基層政治革新與有關法令之講解，以及新縣制、國民兵團、保甲制度、國民教育等項，並授以必要的軍事學術，以適應戰地需要，旨在配合黨政整建工作之實施，使其認識且能忠實執行新政為目的。班內之教職員由省府及省黨部中指派適當之人員兼任；隊職管理人員由受訓學員中選任；軍事訓練則由總司令部派員擔任。

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訓練對象為地方基層行政人員，如鄉、鎮、保長，縣政府以下各級單位的幹事，小學校長、教員、國民兵團之專職幹部等，並招訓優秀社會青年予以訓練以備補充。訓練內容着重基層行政業務之講習與組織及領導能力的培養。除令熟悉各種有關法令規章，與各種業務處理的方法外，須使其真正成為民衆的直接領導者、組織者、教育者。為使其能與敵人、奸匪從事直接鬪爭，並須研究各種技能與方法培養其堅毅、勇敢，為國家民族，為三民主義而犧牲的無畏精神。這些由訓練團培養出來的基層幹部，在整個抗戰期間為敵偽、奸匪殺害者，勝利後根據各縣報請撫卹的統計，達一千餘人之多。其與敵、匪鬪爭的積極性與犧牲精神不難想見，亦足說明幹部訓練收效之宏也。

三七、戰時皖政實施紀要

前文言及我到立煌之後，隨即召開安徽省委政整建會議，通過黨政整建綱要。該綱要亦即戰時安徽的施政政策。茲再將主要事項的實施情形略述如後：

壹、黨團方面

一、在黨政整建大會之後根據黨政整建綱要，由省黨部訂定黨團整建實施方案一種，頒發各級黨部遵照

實施，其內容概要如左：

1. 所有黨團員須宣誓絕對信仰三民主義，服從黨中央的領導，堅決作抗日鬪爭，以達成國家獨立，主權完整，非達最後勝利決不中止。
2. 所有黨團同志，須切實自我檢討反省其工作，是否適應當前狀況與國家需要，是否在「國家至上，勝利第一」的原則下，已各盡其力各忠其事。
3. 所有黨團同志應在總裁領導之下親愛精誠，互助合作，為現階段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而努力；不應有彼此之分、派別之異。以後絕對不許黨、團中另樹派系，互相摩擦。
4. 各級黨部須注意發展組織，擴張黨團力量。軍公教人員必須入黨。青年學生，軍中士兵，以及農工商各界社會人士，應儘量爭取入党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軍隊、學生或人數衆多之團體，准集體宣誓入党。
5. 所有黨團同志須就近參加組織活動。每週舉行小組會議一次，由小組長傳達上級指示，分配及檢討各人之工作，並將會議記錄呈送 上級處理。
 - (1)洩漏本黨秘密者。
 - (2)在黨團內組織小派系者。
 - (3)違背黨的政策、命令或指示者。
 - (4)叛國、投敵、跨黨變節者。
6. 所有黨團員須絕對服從黨團紀律，有違反左列各項之一者，當嚴加懲處。
 - (1)洩漏本黨秘密者。
 - (2)在黨團內組織小派系者。
 - (3)違背黨的政策、命令或指示者。
 - (4)叛國、投敵、跨黨變節者。

(5) 行為貪污、腐化、工作不力者。

(6) 無故不出席會議者。

7. 服務黨、政兩部門之同志，得經由上級協調互調，俾黨政人事對流，工作配合更臻密切。

8. 黨、政兩部門工作同志，應經常定期舉行會報，以溝通意見，集中力量。省府常會省黨部書記長應列席參加。

9. 各地黨、政工作宣傳隊之名稱與指揮應予統一。

10. 黨團工作人員，應注意調查所在地區或單位有無異黨擾亂份子，並將其活動情形向上級呈報。

二、關於加強組織活動，發揮黨、團戰鬪功能，提高黨員的積極性，自我的職兼任省黨部主委之後，除要求自省黨部以下直至小組必須定期開會外，並規定以會議有無實際內容作為考核黨務幹部領導能力之標準。要求每次會議必須有工作報告、有提案、有討論、有決議。各級黨部須派員列席下一級黨部或小組的會議。小組會議的意見與建議，各上級黨部應特別重視；規定省黨部每週應選出若干小組會議的意見或建議，交由常務委員會討論實施。

黨務經過如上整理之後，黨團組織有蓬勃的開展，高中以上學校的學生幾乎全部都加入了黨團組織，軍公教人員更是人人入黨。同時黨團的活動也表現出生氣與力量。勝利後戡亂期間，安徽沒有學潮，社會秩序良好，與此番黨務的整建當不無關係。

貳、行政方面

一、堅強行政組織體系的建立：在我蒞任之初，安徽的各級行政機構，大都遵循戰前舊制，已不適合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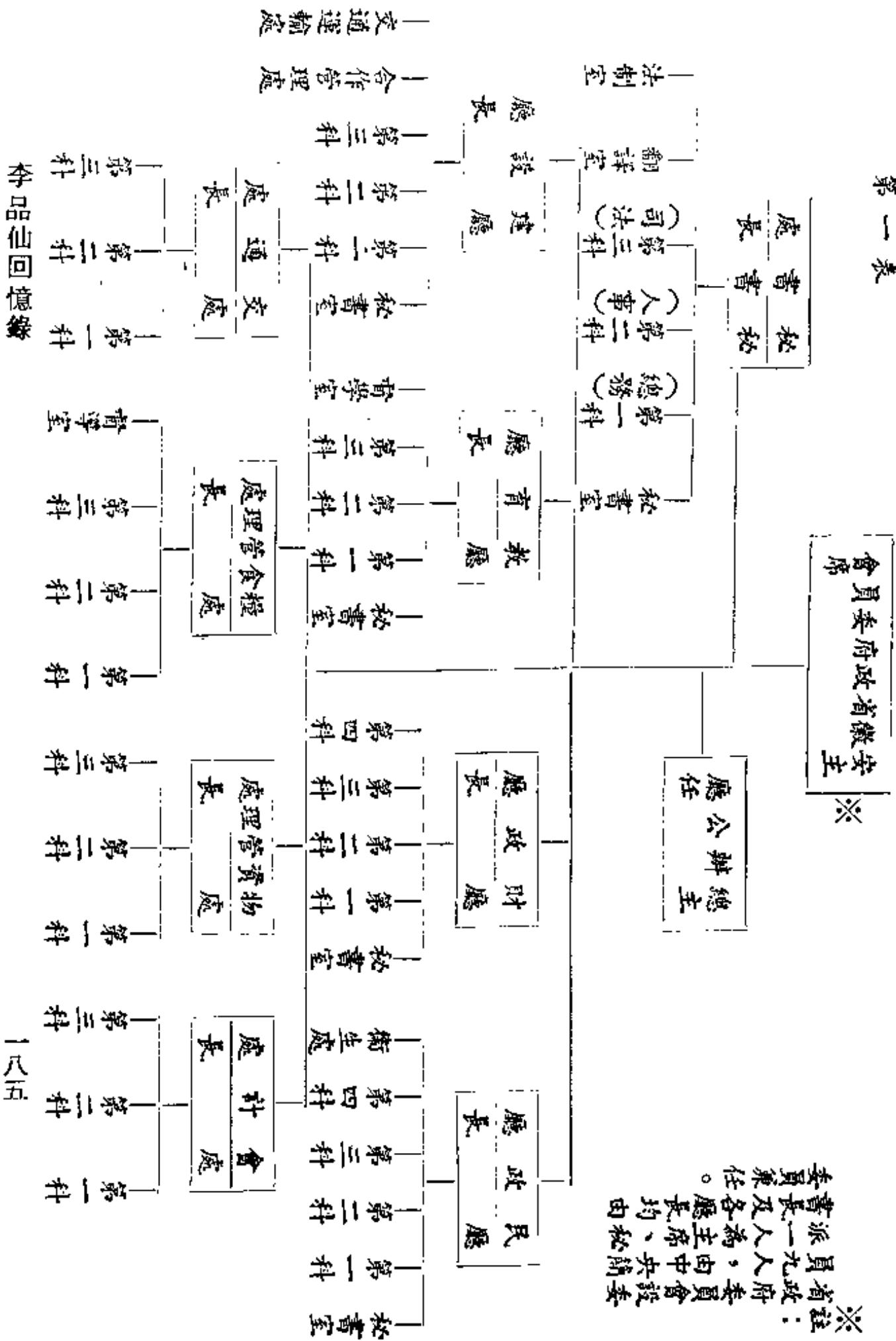
前的任務和戰時的要求。因此於黨政整建大會通過整建綱要之後，即將省府以下各級行政機構作必要的調整。調整後的各級行政組織概如左列各表。其中有若干須加說明者如下：

1. 省政府本身的組織，除保持原來的民、財、教、建等廳外，增設物資管理處及糧食管理處，以利執行戰時物資及糧食管理兩大要政。此外在秘書處之下增設一個科，管理全省人事，以及一個總辦公廳。
2. 安徽地跨長江兩岸，大江中分，當時長江水道在日軍的控制下，南北兩岸的交通極為不便，以致省政府對皖南各縣頗有鞭長莫及之感。當時皖南各縣在作戰地區的劃分上，雖係屬於第三戰區的責任範圍，但在行政上仍屬安徽省政府。為便於協調及指導政務的推行起見，乃在皖南設置一省政府的分支機構，稱為皖南行署，由省府派得力的省府委員一人及必要的工作人員組成之。此外為維持南北兩岸公務往來之交通，又於東流附近，雇用當地漁民秘密組織渡江機構，於兩岸配置渡船，並指定負責連絡人員及規定連絡暗號，使負責護送因公往來人員安全渡江。
3. 縣政府的組織按照新縣制的規定，但為適應戰時需要，特增設軍事、糧政兩科，如第四表所示。
惟此條適用於完整之縣份。如為半完整縣份，其組織可按實際需要加以擴益，例如加強軍事科的辦事人員，及鄉（鎮）、保公所之自衛隊幹部等，其他民、財、教、建、糧、地各科，則儘可能裁減，使組織簡化。因半完整縣份都在敵我接觸地區附近，組織必須精簡，使便於機動，隨軍進退。
4. 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之組織，以其不負實際處理行政業務之責，故儘量簡化，惟專設區保安副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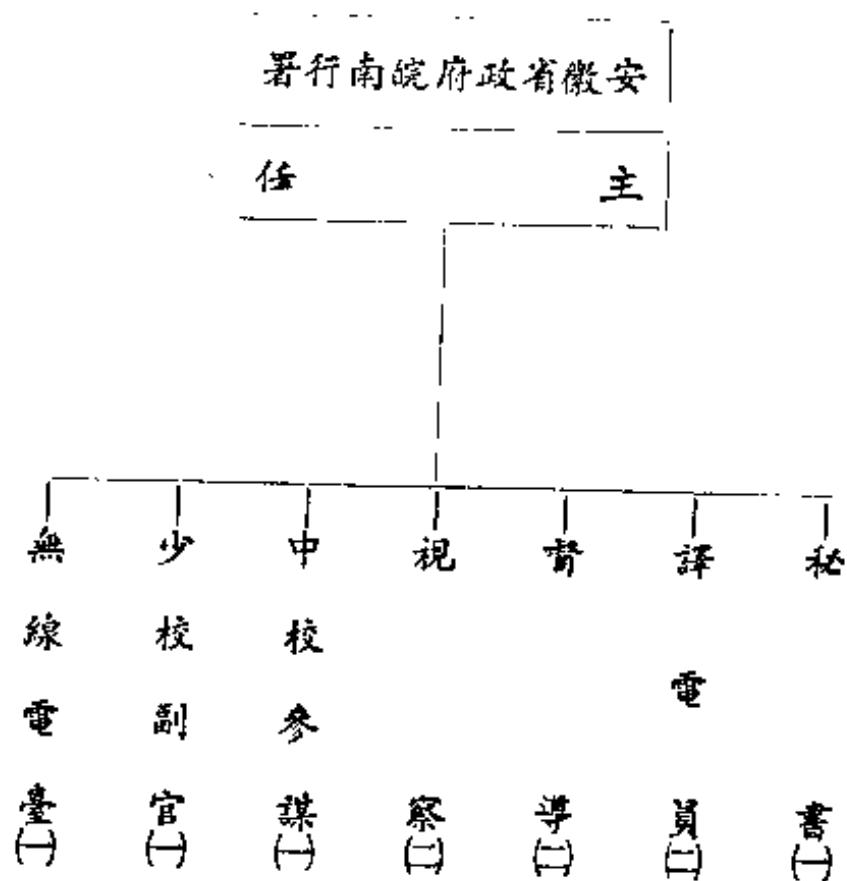
第一卷

安徽省鐵政委員會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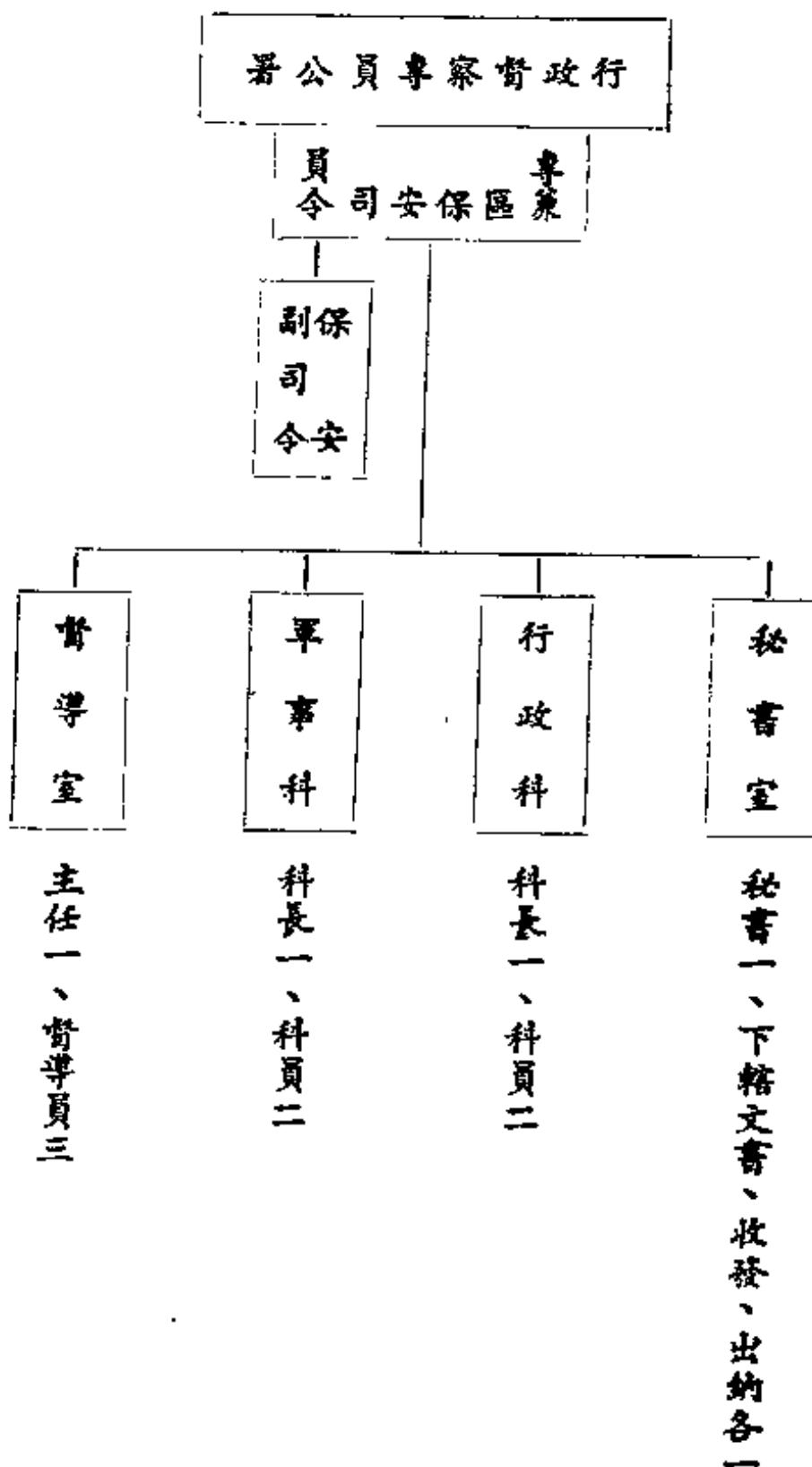
省政府委員會設委員會長及各廳長均由九人為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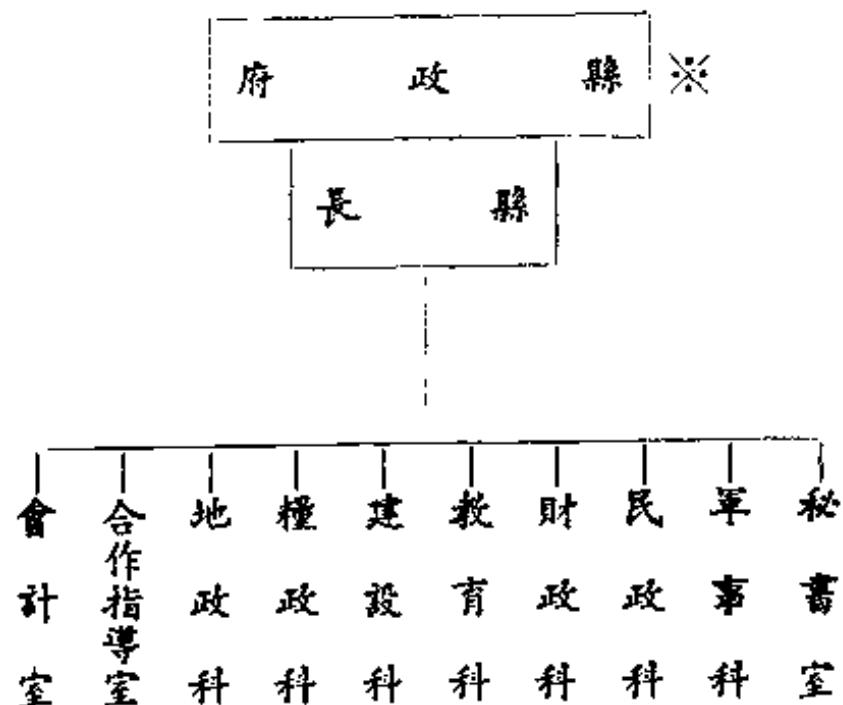
表二 第



表三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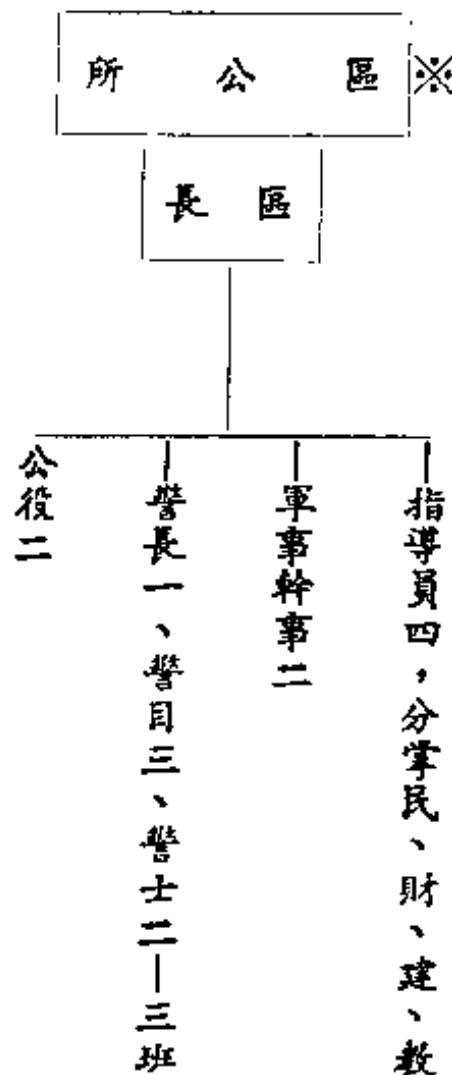


表四第



※註：為完整縣份之縣政府標準組織
各單位人員數視其業務之繁簡
而異。

表五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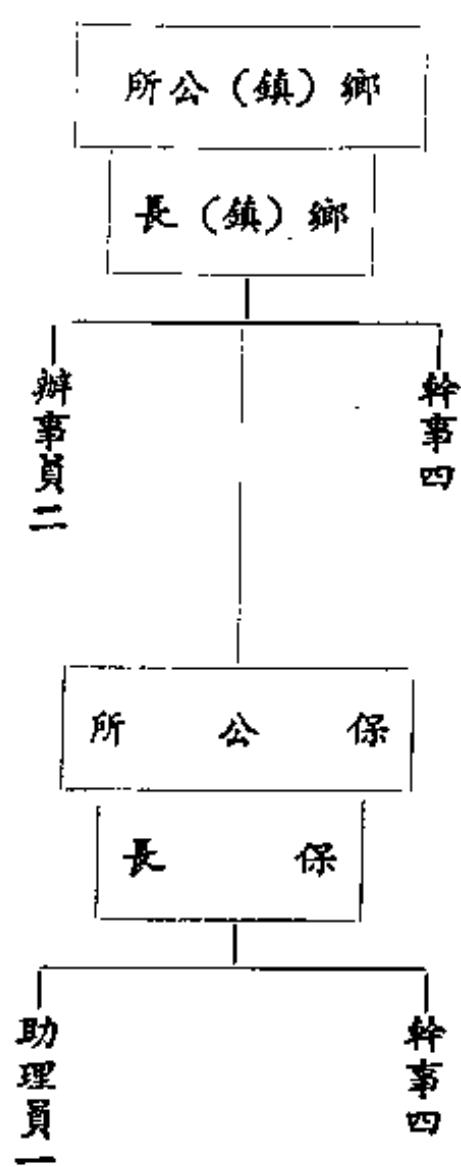


指導員四，分掌民、財、建、教

※註：參照行政院二十九年

一月頒發新縣制之縣
政府分區設署規程，
十五至三十鄉鎮得設
區署。

表六 第



一員，協助專員督導國民兵的訓練及指揮。

5. 為強化基層行政組織，以利組訓及動員民衆，貫徹政令，鄉（鎮）、保公所均配置幹事若干，使具備推行政務之能力。

二、建立各級民意機構：當時安徽雖在敵後，一切施政以動員抗戰為主，但為實現抗戰建國的國策，我認為有訓練人民行使四權，積極參加政治的必要，而且促進人民的政治認識，亦有助於人民自動自發的參加抗日總體戰爭；因此特於黨政整建綱要中提出成立各級民意機構。經大會討論議決之後，即根據行政院所頒法令，依次成立各級臨時參議會。首先由鄉（鎮）民大會選舉縣臨時參議會議員兩人，以及由縣黨政團體選出若干人，組成縣臨時參議會。然後由各縣之臨時參議會選出省臨時參議會議員候選人兩人，呈報省府，由省府核定一人，以及由省黨政團體選出若干人組成省臨時參議會。省臨時參議會設議長一人，由參議員推選產生。省、縣臨時參議會的成立，是本黨實現地方自治的重要步驟，從此人民有了監督政府的代表，也有了影響政府施政的能力。安徽省、縣臨時參議會成立之後，各級政府首長與臨參會之間，由於彼此尊重對方的職責，相處都極為融洽，對於動員民衆參加抗戰，建設地方尤多貢獻。

三、為集中衆人才智，貢獻省政興革意見，特延納地方賢達、學者、專家，擔任省政府之顧問、參議、或諮詢，每月定期舉行會議一次，對省政措施提供意見，對補偏救弊，殊有獻替。

四、民政：

1. 清查戶口，編組保甲。我國各地之戶口向無確實之調查，不僅奸宄容易混跡，對於各種施政亦感

缺乏依據。安徽在抗戰初期即淪於敵後，人民之遷徙必繁，而以往之戶籍資料在動亂中亦多散失。我奉命兼主安徽省政之後，認為嚴密基層組織鞏固敵後基地，必須重新確實清查戶口，嚴密編組保甲；乃於提經安徽省黨政整建會議議決之後，即由民政廳策劃實施，務使人必歸戶，戶必歸甲，戶無漏編，人無漏列。當時規定一家人口以同爨者為戶；無論工商團體、商店、工廠、公共場所、學校、社團、祠廟、教堂皆須分別編戶，由所在地鄉（鎮）公所調查登記。戶籍以縣為編業統計單位，居住船舶者以經常所在之縣為縣。經過編查之後，由鄉（鎮）、保員責登記於縣政府事先印妥之表冊上，並逐級派員抽查。以後如有出生、死亡，隨時報請登記或註銷。各縣編查登記完畢後，彙報省府，再由省府派員嚴密覆查；此後並得隨時派員抽查，如有不實即懲處承辦人。最後編定戶號，製釘門牌。自此全省戶口有了確實的統計與記載。

2. 編組國民兵團。為實踐抗日總體戰爭實施全民武裝，按照當時已頒之兵役法，及參照廣西前此之民團制度，將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子，依地區劃分，編成大隊、中隊、分隊，使服國民兵役。國民兵團之編組以一個行政督察區為單元，各行政督察專員兼任區保安司令，對其轄區內之國民兵統一指揮。縣長兼國民兵團團長，鄉（鎮）長兼任大隊長，保長兼任中隊長，每月依規定時間實施軍事訓練，並依需要編組特務班、交通班、消防班、通訊班，來擔任清查戶口、檢查來往行人，取緝漢奸防止暴亂，維持治安等工作。各鄉（鎮）亦可視狀況就所轄國民兵中抽調一至二百名，編組自衛隊，使脫離生產，專任保衛地方防敵剿匪及協助國軍作戰。此項地方自衛隊之武器彈藥由省府洽商軍隊提供，服裝、糧餉則由各地方自行籌辦。

3. 基層行政「三位一體」制之建立。為集中事權，鄉（鎮）保兩級實施「三位一體」制，即鄉（鎮）長，兼國民兵自衛大隊長，中心國民學校校長，保長兼國民兵中隊長，（國民學校校長。民國卅年之後遵中央命令稍有更改）。

4. 推行「二五」減租，保障佃農利益。在我到達安徽之前，共黨份子曾在地方積極活動。我到立煙就職之後，共黨份子雖已斂跡，但其挑撥分化，宣傳滲透活動，難免仍在進行。為制止奸黨的陰謀活動，除強化基層行政組織，加緊組訓民衆外，正本清源非實行三民主義，消除一切共產思想所賴以傳播的社會因素不可。安徽在共黨看來是有利於其發展的地區，土地的集中相當顯著。為保障生產農民的正當利益，消除共黨宣傳挑撥的藉口，於是決定積極推行「二五減租」。安徽一省直至三十七年我離開時，共黨的滲透潛伏份子仍發生不了效果，社會秩序井然，這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

5. 廣行禁烟禁賭，倡導戰時生活。烟賭不僅有害國民身心健康，助長奸宄有害社會秩序，尤有背於戰時新生活的旨趣。中央雖經懲為厲禁，但安徽處於敵後，難免日久玩生。我到立煙之後，遂提經黨政整建會議議決，再申前令，加強查緝；因麻將牌戲曠廢時日亦在禁止之列。此外同時提倡守時、節約、勞動等，倡導戰時新生活。由黨政分會訂定戰時生活公約一種，要求邊區軍民一致遵行，實行之後，所有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都一律布衣布履，家家種植蔬菜飼養鷄鴨。那時我的家眷住在立煙，自然也不例外；由內子督飭僕婦在住宅周圍空地種植瓜菜蔬菜，又飼養鷄鴨及乳羊數頭，以供作副食之需，並禁用妝飾品，外出多條步行，距離遙遠始以馬代步。招待客人亦甚

簡單，多為蔬菜甚少肉類，至若海鮮魚蝦之類早已絕跡，惟山珍野味則因立煌附近山中常有野獸出沒其間偶爾尚可得到。立煌街上看不到西裝革履的男人，也沒有燙髮和穿高跟鞋的女士。如有初到的仕女作此種裝束，因被大家當作奇裝異服般的注視，反覺慚赧不安，下次也必不敢再穿著了。這些，自然而然的蔚成了大別山樸實無華堅苦奮鬥的風氣。

五、財政

安徽戰時財經政策，消極的以滿足安徽軍民本身的生活需要為目標，積極的以支持長期抗戰，爭取勝利為鵠的。因此舉凡增加生產、增益及整理稅收，儲備及管制戰略物資等，均莫不在策劃實施之列。其中有關財政之事項如左：

1. 取銷苛捐雜稅及一切妨害生產之稅收，用以鼓勵生產，充裕及培養稅源。
2. 舉辦所得稅、遺產稅。
3. 整理稅務機關，廓清積弊，務使涓滴歸公。
4. 劃分省、縣、鄉（鎮）、保各級經費，以免混亂。
5. 各級機關一律實行年度預算及決算制度，杜絕一切浮濫不當的開支。軍政一切開支須事先呈報計劃，核定預算。
6. 為安定軍公教人員及其眷屬之生活，盡可能舉辦實物配給。
7. 嚴禁民間的高利貸。
8. 擴大省土地銀行，調節及活動金融。

9. 設立農民銀行，舉辦農業貸款及農村倉庫，並推廣合作以融通農業資金。

以上各種措施，配合農業革新與工商業之發展，都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安徽在抗戰期間財政上不僅達到了自給自足的目的，且提供中央太抗軍糧。

六、建設

抗戰期間，安徽孤懸敵後，隨時有受敵襲擊之顧慮，大規模之建設自不容許，只能擇其與國防民生有必要，而不易為敵所摧毀利用者為之。茲擇要分述如左：

1. 在農業方面着重農業技術之革新，如改良作物、施肥、病蟲害之防治等。為擴大耕作面積，並從事整荒及興修水利。為實施此項政策，除成立農業指導機構外，並辦理公地出租放領，私有土地不耕作者收歸公有，由公家合作耕種。同時提倡畜牧、養魚等農村副業之發展。那時為強化基層行政組織，鄉（鎮）、保之工作幹部頗有增加，因此鄉（鎮）、保之經費亦相對增加，此項增加之經費，既不可向人民攤派，亦不能增列稅收或增加已有的財政負擔；因此，曾推行公共產運動，由鄉（鎮）、保公所利用公有土地或私人荒地，以公耕合作方式，從事種植、造林、畜牧、及經營榨油、碾米、磨粉等加工業。此不僅解決了當時鄉（鎮）、保等基層行政的經費問題，亦有利於農村之經濟建設。

2. 在工業方面，為配合農業發展及適應民生需要，以發展小型機械工業、紡織、農產加工、製茶、以及小型水力發電等為主。較大規模之工業，安徽素無基礎，資本、技術亦極貧乏，且為環境所不許。

3. 在商業方面，為繁榮經濟准許自由開拓土產市場，凡非管制物資准許商人運銷敵偽佔領區，並採購民生必需物資。為防止私人壟斷居奇，及適應人民生活需要，另設立物資管理局，對除糧食以外之一切

物資，就產銷、貿易實施管制，以調節供需。

4. 在交通、通信、運輸等方面，那時主要交通幹線或為敵控制，或為防敵利用而加以破壞，且敵後地區汽油來源斷絕，無論公私運輸均以獸力之駄輶為主。故特別成立機構發展驛運，作為邊區的交通運輸主要手段。至三十三年，應乎中美空軍之作戰需要，於立煌附近闢建機場。該機場雖以供軍用為主，但自此之後向大後方之交通便利甚多。

七、糧政

戰時軍民糧食的充分供應為一至為重要的事。而此項工作的主要職責一為充裕糧源，一為調節供需。充裕糧源是生產的問題，前面已概略的說過，且就安徽的情形而言，皖南、皖中靠近長江的各縣都是產米區，產量素稱豐富，蕪湖即以此而成為全國四大米市之一，皖北淮河流域則盛產小麥、雜糧，故糧源充裕無虞匱乏。其主要問題在於調節供需，以及如何避免賣敵。

為充分供應軍民糧食，當時中央已規定田賦征費，並且規定征購餘糧，以免賣敵。由征費征購所得的糧食，又發生了運輸與儲存的需要。於是為處理征實、征購、運輸、儲存、加工、發放等等的業務，遂成立糧食管理處專司其事。安徽陷在敵後，幾乎四面都是敵偽環伺，為避免賣敵，征費征購所得大批公糧，除留置一小部份於當地，供給軍公人員短期內的食用外，其餘大部份因須運入大別山根據地內，設庫儲存，以備爾後之需，即民糧部份，除供目前使用者外，亦須由各縣選擇安全地點，秘密設庫代為保管儲存。以此糧食之儲存，運輸實為一極艱巨之工作，尤以當時缺乏有效運輸工具為然。

為將大批糧食運至立煌附近之儲存倉庫，當時在運輸上係使用分段運輸法，沿途由所經各縣分別負責，

交替運送，其所耗之人力至為巨大，每屆收割季節之後，此項運糧隊伍即絡繹於途綿亘不絕，如同螻蟻搬家一般。

糧食管理局後來改為田糧處。該局雖係戰時的增設機構，但因抗戰勝利之後繼之戡亂，糧食管理依然為要政之一，故迄未撤銷。

八、教育

1. 在教育政策上，根據抗戰建國的需要，決定以加強民族與倫理的道德教育，以及加強科學與技術的藝術教育為重點。前者旨在藉教育發揚民族精神，提高國家觀念，及消滅階級鬥爭的毒素思想；後者旨在促進有利於國防與民生的各種創造發明。

2. 抗戰前設於安慶之安徽大學，戰爭爆發後即已停辦。我到立煌之後，深感安徽青年往大後方投考大學，不獨路途跋涉極為不便，且除家境富有者外，一般鮮有前往後方求學之能力，因此殊有恢復大學教育之必要。惟當時安徽孤懸敵後，不僅教育設備極為困難，教授尤難羅致，如欲辦理一所完全的大學自為事實所不許。幾經商酌，旋呈經教育部核准在立煌設三年制的政治學院一所，使志切向學之優秀青年而家境貧寒者不致有向隅之嘆，亦可造就地方所需要的各種行政人才。同時對所有志願前往後方升學的青年，由省府於沿途設置收容站，轉送後方。政治學院後來奉教育部命令改為師範學院，勝利後遷到蕪湖繼續辦理。

3. 中等教育及國民教育方面，規定保辦國民小學，鄉（鎮）辦國民中心小學，縣辦初級中學，高中及高中以上之專科學校由省辦理。國民基礎教育，一律免費，並限期普及。

4. 為準備戰時軍隊所需之大量下級幹部，仿照廣西以前的辦法，實施學生軍訓，也就是「寓將於學」，將高中以上學校之學生在畢業以前，以一個學期施以軍事教育，授以充任軍隊下級幹部的必要軍事學識及技能。畢業後，遇有需要即可征調充任軍隊中之下級幹部。學生軍訓之實施，係由省府洽商駐軍協助，設立學生軍訓大隊，集中各校應訓學生入隊受訓。軍訓所需經費、服裝、津貼等，由省府籌撥，武器、器材則由駐軍部隊供應。此外各機關公務人員以往未經軍事訓練者，亦輪流抽調入營，接受短期之軍事訓練。高中以上學校之女生及女公務員，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五歲者，一律施以半年之看護教育，並接受軍事管理，以備依緊急需要徵調擔任看護工作。

九、保安

保安業務抗戰前係由省府轄下之保安處辦理，抗戰初期保安處之體制仍舊；保安處之下轄有六個保安團，其編制與正規部隊之步兵團概略相同。卅二年四月，為應乎戰時需要，加強保安業務並賦與其獨立性，將原有保安處撤銷，改編為省保安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司令，另設副司令一職，助司令辦理一切業務。司令部內設參謀、副官、經理、醫務、軍法、秘書、軍械等處。當時六個保安團中，有兩個係配置於皖南維持治安，在皖北之四個團則係分別配屬於各地區指揮部統一指揮，從事抗敵及剿匪等工作，實際上與正規部隊無少異。卅七年，為加強地方武力對付共匪之叛亂，奉中央命令另增編保安部隊四個團，連原有之六個團共達十團。為指揮方便計，編成三旅及一個獨立團。至戡亂末期正式改編為軍，由張湘澤任軍長，統率作戰。

十、兵役行政

兵役業務，在軍、師管區成立以前係由民政單位辦理。至三十三年遵照中央命令成立軍管區司令部，辦

理體檢、登記、抽簽、征集、退伍，以及兵役名冊管理等事宜。軍營區司令奉令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另設專任副司令一人，辦理兵役一切業務。成立之初，副司令一職，由兵站副監陳啟調任。軍營區之下設若干師營區，為節約人員經費，其工作人員由配屬營區之部隊主官派任。軍師營區成立後，協同各行政區及縣，將國民兵團內適合現役征召之壯丁，按年次抽簽分別編為常備兵及補充兵兩種，隨時依軍隊需要，補充其缺員或擴編部隊。

三八、鞏固邊區及兩次軍制作戰

二十九年二月，在黨政整建大會開幕之前，我為明瞭各部隊的狀況，並指導爾後之軍事作戰，當召集各軍、師、團長及有關幕僚人員於立煌舉行軍事會議，研討豫皖鄂邊區的作戰方針、部署，以及各部隊的任務與一般工作事項。

當時豫皖鄂邊區所屬的作戰部隊，主要為二十一集團軍所轄的第七軍及四十八軍，每軍轄兩師，另有五個游擊縱隊及六個保安團，其編組及部署情形如次：

豫皖鄂邊區總部

駐立煌

總司令 李品仙（本人）

參謀長 董英斌

第二十一集團軍總部

駐立煌

總司令 李品仙（兼）

副總司令 張義絕

參謀長 陸蔭群

鄂東地區指揮部

駐勝家堡

指揮官 第七軍軍長 張 淹（兼）

參謀長 第七軍參謀長 姜日華（兼）

第七軍司令部

駐勝家堡

第一七二師 師長程樹芬 駐麻城、英山一帶

鄂東游擊縱隊 司令程汝懷 駐麻城、英山、浠水一帶

皖西地區指揮部

駐岳西

指揮官 第四十八軍軍長 区壽年（兼）

參謀長 第四十八軍參謀長 顏僧武（兼）

第四十八軍司令部

駐岳西

第一七六師 師長鄭滄容 駐懷寧、潛山、太湖一帶

第一三八師 師長莫德宏 駐桐城

皖東地區指揮部

駐六安

指揮官 第一七一師師長 漆道微（兼）

第一七一師 駐六安附近

李品仙回憶錄

三八、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

100

皖東游擊第十縱隊 駐古河、梁園一帶

司令 柏承君

皖東游擊第十一縱隊 駐定遠、王子城一帶

司令 龍炎武

豫南地區指揮部 駐潢川

指揮官 第七軍副軍長 王贊斌（兼）

豫南游擊縱隊 駐宣化店

司令 張湘澤

立煙警備司令部 駐立煙

司令 保安副司令 陳維沂（兼）

保安第一團 保安第四團

保安第二團 保安第五團

保安第三團 保安第六團

〔註〕 保安第五團及第六團原駐皖南維持治安，受第三戰區長官部之節制。莫樹杰的八十四軍當時尚

駐在樊城歸黃琪翔指揮。

在作戰方面，根據持久消耗的全盤戰略，我敵後作戰部隊的主要使命為控制敵後廣大地區，阻止敵搜括物資以戰養戰之陰謀，並進而對敵軍實施襲擊、破壞，不斷消耗敵軍戰力，積小勝為大勝，或襲攻敵軍佔領

的重要城鎮與交通要點，牽制與分散敵軍兵力，策應我主力軍之作戰。其次在支援地方政府，掩護各種行政設施，協助訓練民兵，編組地方自衛隊，肅奸、剿匪等。為預期對付敵軍向我基地的掃蕩，除指示各地區部隊，對所在地區內之敵可能前進路線，扼要構築有縱深的隱秘工事，準備阻止、伏擊敵軍，並加強內部的交通及通信設施，以便部隊之機動及確保情報之靈通。所有當年所採的游擊戰術，實際與美軍現在在越南所遭遇者相同，只是在技術上現在越共的游擊戰有更好的條件而已。

敵後作戰係以游擊戰為主，所以小部隊的戰鬥活動幾乎無日無之。從二十九年起以至抗戰結束止，斃傷敵軍人員總計不下數萬人，並且擊落過敵軍飛機，擊沉過敵軍艦艇。其間為策應主力作戰或對抗敵軍較大規模的進攻，也有過若干次大規模的作戰。

二十九年五月初，敵軍發起第二次隨東會戰，從豫南、鄂北、鄂中分三路向西進攻。我大別山兵團為牽制敵之西進，於五月上旬以第七軍之一七二師由麻城經乘馬崗向黃陂進擊，豫南游擊縱隊張湘澤、張軫、及沈光武等部由禮山向黃安、應山方面進擊，鄂東游擊縱隊程汝懷部分向浠水、蘄春、蘭谿口等處遮斷長江水路之交通，四十八軍一七六師襲攻黃梅、武穴，一三八師襲攻安慶。下令後我亦親率總部及必要人員由立煌出發，經膳家堡、麻城至乘馬崗開設前進指揮所，親自指揮各部向平漢線南段之敵攻擊，以期提高聲勢，令敵認為我有乘虛攻佔武漢的企圖。

至五月十日左右，豫南游擊縱隊已自禮山向黃安、應山方面出擊，並破壞平漢鐵路遮斷其交通。一七二師向黃陂挺進，與防守平漢線南段之敵發生對峙。鄂東游擊縱隊亦向浠水、蘭谿口一帶襲擾。一三八師一度襲攻安慶機場，斃敵數十名，並焚燬敵汽車庫。爾後各部隊繼續對敵牽制，直至五月中旬，我襄樊方面主力

部隊已獲得勝利，會戰結束，我豫皖鄂邊區各部隊始停止攻擊，並逐次撤回原防。我亦乘此機會巡視鄂東各縣；每至一地即集合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及軍隊、學生說話，告知抗戰必勝之理與我們努力的途徑，並歡迎愛國青年前往立煌受訓，共同為鞏固大別山抗日根據地與爭取最後勝利而努力；事畢始率指揮部人員返回立煌。

回立煌時，正值酷暑，以白晝火傘高張人馬苦熱，且為隱蔽行動計，乃改在夜間行軍，白晝休息。沿途清風習習，星月皎潔，別有一番境界。五月底返抵立煌，爰將途中所感賦成五古一首，題曰鄂東道上，以誌不忘。詩曰：

溽暑賦長征，
三軍出柳營；
旌旗翻皓日，
笳鼓趨長程；
大別臨江起，
雄關照眼明；（松子關）
水分津派泛，
地接楚吳闊；
曲曲環山路，
蕭蕭落葉聲；
汗浸衣甲重，
風迷馬蹄輕；
渴飲岩泉渥，
餓餐藜藿羹；
貪涼林下宿，
愛月夜中行；
舉首觀河漢，
停驂弄玉華；
氣吞雲夢澤，
誓復武昌城。

從鄂東返回立煌後不久，鑒於津浦及淮南兩路在敵軍控制之下，大別山基地與皖東各縣之聯絡受其阻隔，以致該地區之行政頗受威脅，為掩護皖東各縣之行政，確保其不落於敵偽或奸匪之手，乃派達一三八師師長莫德宏率領所部越過淮南鐵路以東實施游擊，以古河、梁園為前進基地，並指揮皖東兩游擊縱隊，不斷向敵襲擊，破壞其交通線。敵軍深感威脅曾數次派遣部隊向我進行掃蕩，但我始終屹立不搖。至民國三十年三月敵以其十三旅團及十五師團之一部，附砲三十餘門，向我皖東游擊前進基地實施大規模的掃蕩。三月一日開始，敵分由滁縣、全椒、合肥、定遠，以全面包圍的態勢向一三八師進攻。我當令該師以一部置於內線，依固守堅固工事誘敵來攻，主力儘量逃出包圍圈於外線待敵。同時急令第一七二師兼程自鄂東經立煌向合肥附近前進，漆道微之一七一師亦準備向淮南鐵路以東進出，增援一三八師之作戰。三月三日自全椒西進之敵進至古河，五日繼進至柘皋附近，於是四路敵軍均以梁園為目標，企圖一舉圍殲我莫德宏的一三八師。六日夜程樹芬的一七二師越過淮南路進至草廟集，漆道微的一七一師亦挺進至路東，尾擊向梁園來犯之敵。七八兩日在梁園附近發生激戰，敵軍經我內外夾攻，傷亡慘重，漸感不支。至十日敵分別向定遠、全椒潰走，於是古河等據點一一為我軍收復。

此役我一七二師團長盧明陣亡，另傷亡官兵數百人，敵則傷亡千餘，為我邊區作戰最慘烈的一役。敵經此教訓之後，不敢再輕視我軍，佔領皖東地區之企圖終不得逞。此後直至抗戰勝利，安徽能在敵後長期支持者，此役實為最重要的關鍵。

同年九月，敵軍第二次發動長沙會戰，我統帥部判明敵軍行動後，令各隸屬戰區及敵後游擊部隊先期對各自當面之敵發動有力之攻擊，以期牽制敵軍，妨害其集中。我豫皖鄂邊區總部奉命後，於九月上旬開始，

令當時在襄花公路沿線準備歸還本邊區指揮之八十四軍以有力之一部協同豫南游擊縱隊進攻信陽附近之敵。另由第七軍派遣有力部隊，協同鄂東游擊隊，向禮山、花園方面出擊，與隨襄方面之我軍互相呼應，襲擊平漢線兩側之敵。四十八軍則分向長江沿岸之敵軍據點襲擊，遮斷長江航運。皖東我軍亦配合游擊隊向津浦路南段襲擾，妨害敵軍之運輸。以上各種牽制攻擊行動，直至長沙第二次會戰勝利結束之後方行停止。此次牽制作戰，敵軍為我抑留於當面不得參與長沙第二次會戰之兵力可能不下三個師團，其有助於長沙第二次會戰之勝利，實非淺鮮。

此次牽制作戰結束後，戰區長官部因原十一集團軍之編組撤消，已將八十四軍改隸歸回本邊區指揮，遂令該軍歸建，控制於商城、麻城一帶，一面整訓，一面擔任豫南、鄂東地區之掩護。原駐防鄂東之第七軍一七二師移駐皖西霍山、六安一帶，該軍司令部亦移駐六安以西附近之獨山。從此豫皖鄂邊區以三個軍的兵力為骨幹分佈於大別山之週圍，配合各地區之游擊隊向敵不斷襲擾、破壞、聲勢益壯。

三九、皖南行與立煌事變

敵軍鑑於大別山在我軍控制之下，威脅着敵軍三條戰略運輸線，對其西進之軍事行動發生極大的牽制作用，乃企圖對大別山作一次摧毀性的攻擊。三十一年十二月初旬敵集中第十三師團、十四獨立旅團之主力，及四十師團一一六師團各一部，由敵第十一軍軍長駐武漢軍司令官塙田攻指揮，準備向我大別山基地進犯。

攻擊開始前，敵首塚田攻率領作戰參謀人員，攜帶作戰計劃圖表等由漢口東下，乘機經過太湖附近上空，為我第一三八師擊落，敵首塚田攻及其隨員參謀等九人悉數斃命，並獲其計劃表，敵於是立即分路向我大別山區挺進。察其用意，一則在我尚未明瞭其計劃或不及調整部署之前，發揮奇襲之效，一則為搜索敵首下落予以搶救。我軍初期因散佈過廣，一時不及集中，各部隊只有逐次向基地內部撤退，周圍各縣如羅田、麻城、英山、浠水、廣濟、黃梅、宿松、太湖、潛山均暫時棄守。此際敵軍或認為我軍已為其擊潰，企圖乘勢北進橫掃大別山向潢川、商城、六安、桐城之線進出，我軍乃分路邀擊，嘗發生激烈戰鬪。敵經我迎擊之後，終不支後退，我軍遂猛烈向各方面予以追擊，隨將敵軍佔領之邊區各縣再度收復。惟我軍此時正作廣泛之全面推進，所有戰鬪部隊，均已運用於前線之戰鬪，基地後方反呈空虛，且各方面進展順利，警戒不免鬆弛，遂為敵軍所乘。十二月底，在我各路乘勝發起追擊之後，敵軍一股約三千人，由英山方面乘虛突入，經青臺關直竄立煙。當時立煙附近僅有一個擔任周圍警戒的保安團，及軍官訓練一個大隊，兵力過於薄弱，且正值新年疏於防範，遂令乘虛而入之敵一度竄達立煙。

我是那年十月奉召赴西安開軍事會議，會後乘便隨委員長蔣公同機赴渝述職，並向中央各部會接洽公務。事畢又經委座准許經桂林、寧北轉赴皖南視察各縣政務。經桂林時，因先母去世之後迄未返里，不免在家盤桓數日並設奠拜祭略盡哀思，故到達屯溪已是十二月下旬。我到達屯溪時，雖獲得報告知道大別山基地一度受敵攻擊，但獲知敵軍既已為我擊退，所以仍按預定計劃，前往各縣視察。迨視察休寧、祁門、黟縣、歙縣完畢之後返回屯溪，已是除夕。翌日三十二年元旦，屯溪地方父老及各界人士，為慶祝元旦並歡迎我的南巡，舉行盛大聚餐，餐後並演京戲助興。不料正在觀賞京戲的時候，接獲重慶來電告知，謂立煙於是日午

後為敵軍突襲失守。我接到這突如其來的消息，真不勝駭異；後來回到立煙始獲知其詳。

據說元旦當天上午，立煙各界正舉行慶祝大會，忽接獲報告謂竄入之敵已到達立煙南面之長春嶺附近。那時立煙只有一軍官大隊，別無部隊可用，最近的第七軍也在六安、霍山附近距立煙有百里以上的行程，歸救不及，因此只好一面令軍官訓練團的軍官大隊馳往長春嶺附近阻滯敵人，一面傳令立煙所有黨、政、軍機關採取緊急疏散。是日下午三時，敵軍一部進入立煙市區，立即放火焚燒房舍。立煙大部份都是竹、木結構泥牆茅頂的臨時建築，這場大火幾乎把立煙完全化為灰燼，好在公文檔案平時早有準備，臨時緊急疏散均已遷至安全地點，所有各處倉庫亦毫無損失。翌晨第七軍部隊趕回立煙附近，敵軍立即竄逃。該軍原擬將敵退路截斷，然後將敵包圍殲滅，但敵軍頗為機警，不從原路撤退，反向北經商城、潢川方面竄去，爾後經禮山繞回武漢，惟敵軍經我各地部隊堵擊，亦死傷慘重，沿途遺留傷兵、死屍不少。

大別山與皖南地區中隔長江，抗戰期間皖南地區行政上雖受安徽省政府管轄，但軍事上則歸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管制。同時因長江水道在敵人控制之下，兩地交通頗受阻隔，故我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雖已三年，而在此之前迄未巡視皖南各縣。這次巡視完畢之後，原擬再多停留幾天，應當地士紳許某及省臨參會議長江暉先生之約，相偕一遊黃山，嗣因獲得立煙失守的消息，那裏還有遊興，只好作罷，匆匆北返。

元月二日我自屯溪啓程北返，最初打算在東流附近渡江，抄捷徑逕回大別山。經慎重考慮之後，因當時大別山狀況不明，尤恐敵諜探知我的行踪，中途攔截；萬一發生不測，豈非欲速不達，故結果仍決定繞道重慶。是日晚宿上饒，當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祝同見面；夜間轉到重慶發來的電報，說是日上午立煙已為我軍收復。二十四小時內這樣令人一憂一喜的急劇變化，在沒有獲得詳細的報告前，簡直使我不敢置信，納悶。

不已。於是一面電知皖南行署，一面電立煌省府與邊區總部告知我的行踪並飭速謀整理恢復原狀。

元月五日返抵桂林，休息一日，七日繼續赴渝。至渝後，先謁委員長蔣公報告皖南情形，並請示今後邊區工作方針，當蒙慰勉，並派專機送我到老河口轉往立煌。翌日離渝，所乘專機為舊式四座雙翼螺旋槳機，除駕駛、副駕駛外，只容兩人乘坐，我只好帶一名隨員同行，其餘隨行人員乃另由水路至秭歸，再循陸路經老河口轉赴敵後。我的專機上午八時自重慶起飛，選擇的航線是先飛漢中，再沿漢水東下。往常飛機應在漢中着陸加油後再繼續東飛，這天不知為何竟一反常例，幾乎發生不測。當飛近漢中時，駕駛員問我是否需要在漢中停留，如無必要則不在漢中着陸，逕飛老河口，以便早一點到達目的地。我當表示首肯，於是飛機向右一轉，逕向老河口飛去。不料飛至鄖縣上空，油量指標突然下降。駕駛員初猶以為油錶損壞，及將指標扶起之後又復下墜，始知燃油已經用盡，不免發生恐慌，隨即向我報告，謂油已不足恐需迫降。這時任何責備或憤怒的話都是多餘，於是我很輕鬆的回答說，這可能是你們空軍人員必須要有的經驗，在我來說倒真是機會難得，而且迫降無論如何比碰上敵人被他打下來強多了。接着飛機迅速下降沿着漢水河谷低飛，我想可能是想找一處比較平坦的沙灘降落，萬一找不到平坦的沙灘，最後向水中迫降也要安全得多。此時我內心雖然焦急，但只好聽天由命了。

駕駛員在兩岸找不到可以迫降的平地，只好一面以手幫滿打油，一面勉強繼續飛行。過了幾分鐘之後，發現老河口已隱約在望，駕駛員利用最後的一滴油將飛機儘可能的爬高，然後開始向老河口滑翔；到達老河口機場，已無法再選擇方向運行着陸了。下得機來，各人雖然都是一身冷汗，但總算死裏逃生，值得慶幸。

在老河口停留一宵，並將一切經過向李長官報告。翌日即由陸路趕回立煌。十三日到達阜陽，內子囑如

已在該處相候。她是立煌失陷時倉惶疏散至此。在阜陽休息二日乘便視察阜陽政務。關於立煌失陷經過，獲得張專員戚遜之報告後，亦已得知其梗概。十六日回到葉家集，黨政分會丘秘書長國珍在該處迎候，是夜由他將此次立煌事變經過作了更詳盡的說明，同時又接到立煌轉來重慶白部長健生的電報，調張副總司令義純赴渝受訓，旋又接到陸參謀長蔭輝的電話，謂張副總司令已於是日晨啓程經商城、潢川赴渝。我想張副總司令明知我已回到葉家集，隔日即可謀面，竟不待一晤即離部赴渝，必係因此次事變處置欠當內心不安之故。翌日由葉家集回立煌，總司令部及省府諸同仁均在鴨子灘迎接，見面時不禁悲喜交集。午後相偕返立煌，當我進入市區，目覩原來鱗次櫛比的房舍蕩然無存，房屋焚燬的痕跡零落滿地，為之駐足太息良久，其他同仁亦相對默然。回到省府後，我當即向所有的人員說：「此次事變各位都盡到了應有的責任，並能安然無恙，我深深感到安慰，並為各位慶幸。至立煌被敵焚燬，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立煌原是荒村野店，是在我們手裏建設繁榮起來的，讓我們再來一次努力，要比原來建設得更好。敵人只能燒掉我們的房子，決損害不了我們大別山的精神。」我說完之後，馬上發現每一位同仁的眸子裏又充滿了希望的光輝。後來果然不出數月所有機關和部隊的營舍都重新建造完成，面目一新，私人的房舍也次第恢復。

我回到立煌之後，除了積極督導各機關、部隊、學校迅速完成重建工作外，同時集合黨、政、軍高級人員，對此次事變提出檢討。此次敵軍乘虛鑽隙竄入立煌，當時立煌黨、政、軍機構事實上事前毫無防範，在遭受奇襲之下，能沉着而迅速實施疏散，以及將重要公文檔案與物資加以掩藏，除房屋被焚燬外，沒有遭受很大的損失，要算難能可貴，應該提出嘉獎。在軍事方面，我軍作戰部署將全部兵力分佈四週，未能形成重點，又未控置總預備隊於核心地區，頗值檢討。敵軍能從英山方面乘虛踏蹠深入立煌竄擾，足見前方部隊左

右的連絡殊欠確實，各處情報尤過於疏忽，凡此均應力求改進。

檢討會舉行之後，一方面將軍隊的部署作必要的調整，同時着手整頓軍隊，加強部隊的教育和訓練。在人事上也作了若干調整；原副總司令張義純及參謀長陸蔭楫都以立煌事變處置不免有失誤之處，經統帥部另調工作，遺缺分別以張淦及鍾紀升任；其餘第七軍軍長由徐啓明繼任駐防皖東，第四十八軍軍長由蘇祖馨繼任駐防皖西，第八十四軍軍長由張光緯繼任駐防豫南商城及鄂東麻城一帶。

關於整頓軍隊，加強教育訓練方面，於是年春由各部隊派人組成了一個參觀團，前往後方各軍事訓練機構及部隊，觀摹他人的方法和長處，回來後舉行了一次軍事教育會議，聽取參觀團的報告，檢討自己過去的缺點，並研究今後改進部隊的詳細計劃，準備頒發各部隊遵照實施，務期邊區各軍在精神、紀律與戰鬥技能各方面齊頭併進，短期內練成勁旅，俾在最後反攻作戰中擔負更大的使命。

是年夏天，李司令長官德鄰前來豫皖鄂邊區視察，在立煌盤桓幾達一月之久，直至秋初始返回鄂北。他在立煌期間，對安徽的軍、政措施極為嘉許。

四〇、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

民國二十九年，我到達立煌之後不久，中央鑒於原共匪改編之新四軍，在皖南一帶，假抗日之名，行擴張之實，破壞行政系統，違反政府法令，勒收捐稅，騷擾人民，散佈謠言，動搖軍心，乃嚴令該軍於二十九年年底以前將所部悉數開往黃河以北作戰。該軍對統帥部之命令置之不理，且各種越軌行動更趨積極。統帥部不得已於三十年六月中旬下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執行懲處；除將該軍大部繳械，軍長葉挺被捕解重慶

法辦，副軍長項英於拒捕時擊斃外，其餘該軍首要分子陳毅、張雲逸等則率領一部向江北逃竄。

新四軍部隊原有一部駐於江北之無為、廬江一帶，本集團軍亦同時奉令協助堵擊圍剿，除截獲其一部人員外，其殘餘部隊竄逃蘇北。此股新四軍殘部，爾後在蘇北、魯南一帶，先後各附國軍游擊部隊李明揚、李長江、王守為等部，勢力逐漸擴張，至三十三年開始向皖東推進，與我皖東部隊乃發生衝突，最後並惹起大規模的戰鬥。

我皖東地區原在全椒之古河、梁園、王子城一帶建立有前進根據地，掩護皖東各縣之地方政府，推行政務，保衛人民，免於敵偽之搜括侵擾，由第七軍副軍長漆道微擔任指揮官，所轄部隊為第一七一師（師長曹茂琮）之三個團，第一七二師之五一五團，保安團，皖東游擊第十縱隊（司令柏承君）所轄之三個支隊。以上各部隊總計約一萬六千人。

匪新四軍陳毅部主力原在津浦路以東，魯南、蘇北一帶。其一部第二、七兩師於三十三年初進出津浦與淮南兩鐵路間之地區，並經常偷襲我皖東地區部隊。其第二師以滁縣、定遠兩縣交界附近之皇甫山、藕塘鎮一帶為巢穴，其第七師則流竄於無為、巢縣、含山、和縣等沿長江北岸一帶地區。

三十三年九月初旬，匪由津浦路以東秘密向藕塘鎮以北地區增加約八個團之兵力，連同原來匪第二師之六個團，第七師之四個團，總計約三萬人，在匪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指揮下，大有進犯我古河前進基地之模樣。

先是九月上旬，我一七一師五一二團於合肥東北之占鶴崗受匪之襲擊，團長蒙培瓊重傷被俘。我皖東地區指揮官即以一七二師之五一五團前往增援。適於此時獲知匪軍調動頻繁，並獲得大量增援之情報，我皖東

前進基地指揮官漆道微乃準備集中兵力於廣興集、王子城以南，青陶集以北地區，嚴陣以待。

九月十一日黃昏，我一七二師之五一五團到達王子城南之三官集附近，匪即傾巢來犯，首先以主力圍攻我守備王子城之第十縱隊第一支隊，隨即展開激戰，同時各以一部向畢園、大馬廠前進，似企圖以兩翼包圍的態勢指向古河，對我皖東根據地作一次摧毀性的攻擊。

當匪軍主力圍攻王子城時，我一七一師之五一三團即迂迴攻擊匪之側背，旋匪復以全力向我五一三團之側背進攻。為策應五一三團我五一二團及五一五團又將匪軍包圍；而原向大馬廠前進之匪又回頭猛攻我五一二團之側背。於是形成匪我相互的數重包圍，展開一團混戰；其戰鬥之猛烈程度為我從征以來所罕見。我五一二團團長謝堯身負重傷，大腸流出腹外，五一三團團長蕭湘湯亦負傷督戰。如此混戰兩日，幸我遠在善後集保三團團長莫仲慶之主力，在大馬廠之第十縱隊第二支隊，以及在柘皋之五一一團之一營，於十三日先後馳至增援，內外夾擊，激戰至十四日凌晨；匪不支潰退，紛紛向津浦路以東回竄。

梁園方面，我五一一團團長黃振雄於十二日拂曉率領該團赴援王子城方面，途中與匪遭遇亦發生激戰，因匪衆我寡被匪包圍，黃團長亦裹創督戰。至十三日夜，匪因王子城方面潰敗，乃乘夜解圍退走；我五一一團當發起追擊。大馬廠方面，我皖東游擊第十縱隊前方各據點僅有零星戰鬥。

巢縣、含山、和縣一帶，匪第七師亦自十一起，紛向四處竄擾，企圖牽制我軍，至攻王子城之匪潰敗後，該師亦相繼退走。

此役我軍以寡擊衆，匪軍以兩倍的優勢進犯卒為我軍擊潰，戰鬥之慘烈前所未見；四個團長中兩個重傷一個輕傷，營連長以下傷亡者六百餘人。匪軍為我擊斃者兩千以上，生俘者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三百餘支。

這只不過是有形的勝利。無形的勝利要比有形的勝利重要得多，因匪新四軍此番對我皖東前進根據地之攻擊乃是進寇大別山的前奏。如果匪軍一戰而摧毀我皖東前進基地，必然進一步竭其全力進犯大別山，整個安徽省都將落於匪手。誠如此，則日寇投降之際，津浦沿線固非吾有，即南京、上海，恐亦為匪所接收矣。好在此次大獲全勝，匪經此打擊，悉數竄回蘇北，從此安徽全省遂無匪踪，以迄抗戰勝利。

四一、邊區雜憶

我到達大別山一年之後，開始分期往邊區各縣視察，考核黨政整建方案的成果，作為檢討改進的依據。

民國三十年二月，首先往豫南商城、潢川及皖北潁上、霍邱方面視察。在潢川視察黨政情形與該防區部隊狀況後，轉往霍邱途中，經過李家寨，李家寨是儼如一座小城般的私人建築，四面都是磚砌的大圍牆，高可二丈，周圍約里許，圍牆之外有大水溝，水深過丈，不能徒步，上設吊橋以通四門。寨內核心為李姓族人所居，亭、臺、樓、閣點綴其間，規模宏敞誠屬鮮有。寨外週圍即為李家佃農所居住，佃農平時耕種李家田地，遇有匪寇則執武器共同捍衛此一城堡。由李家寨的建築及李姓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便使我想起古代的封建社會。當時因係匆匆一宿，未能詳盡考查僅知主人之祖先係平定太平天國有功人物，其家世至今猶未式微。據說李家寨於民國二十四年共匪倡亂時，為匪軍千餘圍攻數日不下，日寇經過亦未受損失，可見其潛力之大。爾後在其他各縣，亦發現有類似的情形，大抵都是先世為官，受到朝廷的賞賜，官爵厚一旦衣錦榮歸廣置田園，興建巨宅，好些大屋都極雄偉。這些大地主自然是共產黨宣傳的口費和開爭的目標，同樣也不合於本黨民生主義的宗旨，因此我在安徽主政時期特別要求貫澈推行當時「二五減租」的政令，希望能逐漸

走向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目標。

在潁上視察時，住於當地的游家花園。園內種植各種花木，幾乎應有盡有，最名貴者如牡丹與茶花皆高可及丈。亭、臺、樓、榭亦極壯麗，並蓄有各種禽鳥點綴其間，漫步園中，賞心悅目，渾忘此身猶在漫天烽火中也。經二日對政務及國民兵團檢閱完畢後，園主人親來為我導引，參觀他的花園。他遠走遠說，謂此園為其先祖所培植；其先世蓋亦宦場中人，余因追憶其先祖之襟懷，較之集寨置堡者，雅俗固不可以道里計也。遊畢感興，爰賦七律一首，題為潁上游家花園：

春到芳園一日留， 主人前導探清幽；

堤圍楊柳飄羅帶， 石砌闌干上繡樓；

綠艷紅嬌傾國色， 冰姿玉質自風流；

猶欣老鶴知迎客， 侍立池邊數點頭。

合肥、舒城、廬江頻臨巢湖一帶地方，範圍百餘華里，自昔為匪類出沒之區；據說百餘年以來從未清剿淨盡，每值事變即乘機而起四出劫掠，附近一帶人民在宿匪長期劫持之下，不堪其擾。抗戰開始後新四軍與其勾結企圖蠢動。我安徽省政府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林中奇，為杜絕亂源決心肅清該地匪類，於民國三十年秋，動員各縣自衛隊，統一指揮從事清剿，責成各鄉鎮長負責封鎖交通，堵塞各處要道，然後自率大隊進入匪區，一面清查戶口，一面搜剿匪巢，並獎勵人民密報匪踪及檢舉匪首姓名。結果擒獲宿匪百餘人，經偵訊無枉後悉予誅戮，以是此一地區匪類無法匿跡。此次清剿之所以圓滿成功，完全得力於民衆自衛隊，而民衆自衛隊之所以奏效，則又得自民團幹部訓練之功也。三十三年十一月，我於共匪新四軍竊擾皖東之後，前

往舒城、桐城、廬江一帶觀察，發現前此為匪徒盤踞之區，今閭里安謐如恆，黨政工作推行無阻，不勝欣慰。

桐城在昔文風鼎盛，名家輩出，有桐城派之稱，清康熙年間桐城張英父子為相尤傳為佳話。張英的相府在城內的三尺巷，建寨宏偉，抗戰期間尚完好無恙。三尺巷的由來，據說是當年張英在朝為相時，其家人以經營府第，央求鄰居折移界牆讓地三尺，作為通路，降人不許，反要求張府自讓三尺。兩家相持不下，張府家人欲以權勢迫人遷讓，乃致書北京，請張宰相出名令降人讓地。不料張宰相覆函家人，函中書七言絕句一首，詩云：「千里家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是張宰相的豁達處，其家人得書遂自讓三尺，降人知之，也同時讓出三尺，共得六尺闢成一巷，後人紀念這段佳話便命名為三尺巷。三尺巷張相府工程之大，較霍邱之李家寨尤有過之，令人嘆為觀止。只可惜巍峨府第今猶在，不見當年張相爺。

廬江城外相傳有周瑜墓，觀察廬江時，特抽暇一往憑弔；但見墓地頽敗不修，雜草蔓長。想起蘇東坡所寫的那一闋念奴嬌，直是我當時心情的寫照。

廬江視察完畢之後，又前往潛山、太湖兩地觀察，最後經岳西返向立煙。大別山的主峯天柱山在岳西境內，為古時的南嶺，因乘便登臨一探其勝。天柱山距岳西約四十華里，往返費時三日。第一日入山，夜宿於山中之古寺內。寺的建築並不宏偉，但頗幽靜。寺內僅有老僧數人，招待周到。翌晨繼續登峯，沿途道路雖頗急峻，亦非險絕；惟穿林越嶺景物隨時隨地而異，忽而麗日中天，忽而雲烟瀰漫，忽而清流湍急，忽而古樹參天。時值隆冬，四周松柏滴露凝冰好似巖中垂翠；羣峯積雪儼如玉琢銀粧。行行息息，至正午時分始至

主峯脚下；策杖乎于卒上巔頂。峯頂有一天然水池名曰天池，又有兩石斜立相互連接，名曰天橋。坐於橋上，舉目四顧，雲海波濤了無涯際。移時，雲烟四散，遠望長江隱約可見，又另是一番景象。山頂朔風強勁，雖着重裘猶不勝寒，遑緩步下山。是晚仍憩於來時之古寺中。寒宵夜永，賦詩遣興，成七言絕句及七律各一章。

登天柱山七言絕句一章

古巒雲山似畫圖，仙槎銀海有中無；
長江千里鉤文錦，一夜烽烟亂碧蕪。

又七律一章

羣巒圓繞最高峯，拔地崔嵬上九重；
萬里江流連佩帶，無邊山色寄游踪；
雲迷古刹張華蓋，露浥明珠結玉松；
雲海仙航何處是，天池橋畔喜相逢。

在岳西檢閱國民兵團及視察黨政工作完畢之後，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經磨子潭、黑石渡返立煌。是日天氣極寒，大雪紛飛，道途冰滑，騎馬俱極不便，只好步行。午后經磨子潭附近，見道旁麥田中有野雉十餘隻正在覓食，一時興起即向隨從手中取來獵槍，跨過路邊水溝，隱蔽接近麥田邊緣，對準那羣正在覓食的野雉一擊。槍聲響處，已有兩隻命中落地，其餘則驚起羣飛，落入附近之樹林內。我為了更多獵得數隻，以便晚間給隨從人員飽餐一頓，又向山邊的樹林走去。及至山邊，雉羣又疾飛而起，向另一樹叢飛去；於是折回山

下準備再追蹤邀擊，不料由於全神貫注獵物，忽略山路冰滑，竟被滑倒，左足腳掌折向左方，腳踝脫臼，立時失去知覺無法站立行走。幸當時隨從人員附有滑桿得以趕回立煌，命醫治療。因立煌醫療器材缺乏，久治不愈，直至三十四年四月赴重慶出席六中全會時，始由美國軍醫院骨科醫生主治方愈。於此數月間幾乎都是在牀上批閱公文，不料偶一失慎竟帶來一場不小的災難，損失太大了。

四二一、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

民國廿九年九月，那時的歐洲德國已橫掃法、荷、比諸國之後虎視英倫，義大利則侵入希臘。在亞洲方面日軍因侵略我國深陷泥淖，一面企圖切斷我國西南地區的國際供應線迫我談和，一面亟欲掠取戰略物資以補給其軍事需要，乃乘法國之危進兵中南半島。於是德、義、日三國於九月底正式宣佈結成軍事同盟。

美、英兩國最初對中、日戰爭原採中立態度，英國甚至應日本的要求一度封鎖滇緬路。及至德、義、日三國結成軸心，美、英在太平洋的勢力遂感受威脅，乃不得不對獨力抗拒日軍已經三年以上的中國括目相看，並開始同情我國。於三十年上半年，美、英兩方相繼正式照會我國允於戰後取消在華特權。至八月一日美國空軍並在陳納德將軍的領導下組織志願隊前來我國助戰。

是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及新加坡，正式揭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我國亦即加入美、英同盟，成為全世界反侵略陣線的一員，從此我對日抗戰與世界大戰合流，不再陷於孤立。三十一年七月美援華志願空軍改編為美國空軍第二十三驅逐機隊，此後美國基於同盟義務，逐漸增加對我國之軍經援助。當時雖然歐洲方面之大戰正酣，太平洋方面美軍亦正在苦戰，但吾人對抗戰勝利之信心已益為堅定，已隱約看到勝利的

曙光。

三十二年，美駐華空軍第二十三驅逐機隊復擴編為第十四航空隊，從此我中美空軍的力量大增，不僅可防護我後方城市，並開始向江浙沿海與長江下游出擊，攻擊日軍後方補給線。惟當時中美空軍以四川之成都及重慶附近為基地，以當時航空器之續航力與速度而言，此等基地稍嫌過遠。我有見及此乃向中央及美軍總部建議，在大別山設置一秘密前進基地，以供出擊飛機中途休息及加油之用。那時美軍很想在中國大陸沿海擡置一、二基地，作為美國艦隊空軍轟炸日本本土後回程着陸之用，大別山雖距海城約有二百餘哩，但尚可供此一目的之需。因此中央及美軍很快採納了我的意見，派人前來，選定大別山內之立煌西南方吳家店附近一處平坦谷地，闢為機場。該谷地長約千餘公尺，廣數百公尺，稍加擴充整理即可使用，並且隱蔽良好不易為敵發現。地點選定後，即由美方派出工程人員，我方派遣部隊及僱用民工積極施工，不出三月即告完成。

此後中美空軍即利用此大別山前進基地，轟炸長江下游及沿海敵軍軍事設施及補給系統。敵空軍勢力不久便為中美空軍所制壓，日本本土亦在我中美空軍攻擊之下了。

三十三年，美軍派遣顧問組前來立煌，除協同規劃空軍轟炸事宜外，並擔任二十一集團軍之連絡事宜及訓練部隊中官兵對美援新武器之使用。他們對大別山邊區未來地面作戰之戰略價值特別重視，建議中美當局加強本邊區之軍事設施，特別補充裝備。自此美方軍事人員經常來往立煌重慶之間，各種新式武器裝備亦開始逐漸運補；我邊區部隊已摩拳擦掌準備反攻了。

與此同時，日軍鑒於其在華中方面之作戰，一則因我大別山之日益壯大而深感威脅，一則因長江航運在我空軍之威脅下維持不易，有另闢後方連絡線之必要，於三十三年春以打通平漢線及孤立大別山為目的發動

豫中攻勢；至五月上旬，敵軍先後攻佔鄭州、新鄉、許昌、確山、臨汝、遂平，並西進圍攻洛陽，平漢線遂為敵軍控制。

敵軍打通平漢線之後，五月下旬，復在湖北發動攻勢。此次攻勢，由後來敵軍之行動判明，旨在繼打通平漢線之後，繼續打通粵漢、湘桂兩鐵路，溝通北起我國東三省，南達中南半島之陸上動脈，以延續其戰爭的命運，因此時日本海軍在太平洋連續為美軍擊敗之後，海上運輸已頻中斷，不得不集中全力於陸上求取各戰場之聯繫也。惟此時我國於苦戰七年之後，戰力消耗過甚，美國雖已給予軍艦援助，無如當時中印緬公路尚未打通，美援物資裝備完全仰賴自印度超越喜馬拉雅山的駒峯實施空運，耗水車薪，無濟於事，故敵軍遂長驅直入，長沙、衡陽相繼失守，是年底，桂林、柳州亦告陷落，敵軍先頭且竄抵貴州之獨山附近。這是自抗戰開始以來日寇攻勢最兇猛的一次，成都、重慶都不免為之震驚，真是驚鳴不已而風雨如晦，黎明前必有最黑暗的一段。

日寇佔領平漢線之後，豫皖鄂邊區與第五戰區長官部的地面連繫為之受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軍事委員會電令，將原來的豫皖鄂邊區，加上山東的大部，蘇北及豫東劃為第十戰區，命我為第十戰區司令長官，統一指揮區內的黨政軍一切事宜。三十四年元月十二日於立煌成立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部，正式就職。

第十戰區的作戰區域為平漢線以東，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詳如附圖）。所統轄的作戰部隊，除原有的二十一集團軍外，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陳大慶的十九集團軍，以及牟中珩的山東挺進軍，王懋功的江蘇挺進軍，張紘的豫東挺進軍，程汝懷的豫東挺進軍等，都編入本戰區的戰鬥序列（詳見附表）。

戰區司令長官部係由原來的豫皖鄂邊區總司令部改編而成，由原來邊區總部的參謀長董英斌將軍改任戰

區長官部的參謀長，戰區政治部主任則由原邊區黨政縱隊長丘國珍中將調任，同時黨政縱隊亦改隸戰區，歸戰區政治部指揮。山東挺進軍總指揮牟中珩，蘇北挺進軍總指揮王懋功，都分別兼山東、江蘇兩省政府的主席，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奉中央統帥指示，擔任戰區臨泉指揮所的主任，因此他們三人都兼任戰區的副司令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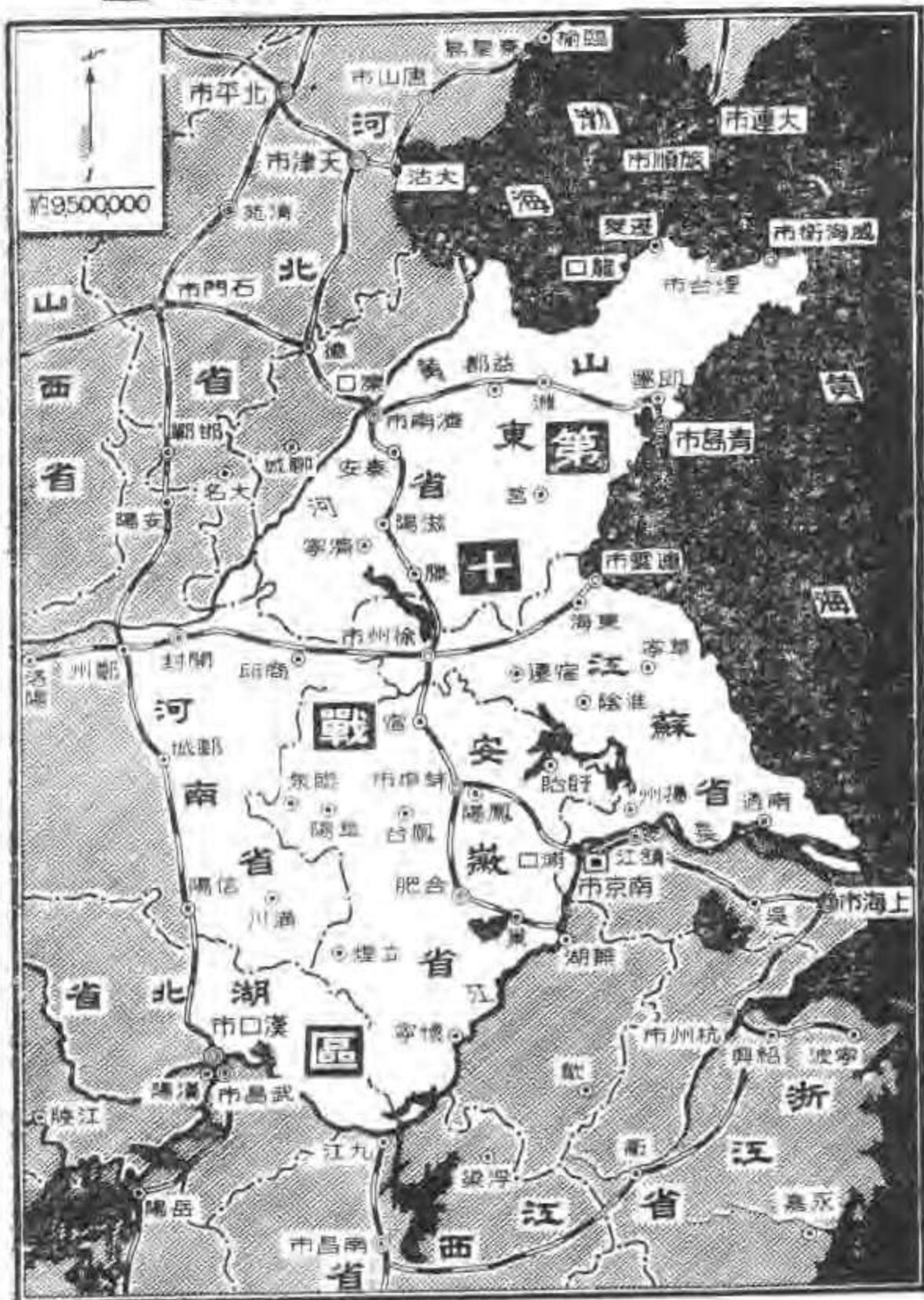
緊接戰區長官部成立之後，在立煌召開了第十戰區的首次作戰會議，各集團軍總司令及挺進軍總指揮或其代表均前來與會。會中決定各部隊之部署及作戰任務以及指揮關係等。那時蘇北、魯南已在匪新四軍盤據之下，各該省的省政府主席兼挺進軍總指揮事實上均不能進入其轄區指揮作戰；因此，江蘇省政府及蘇北挺進軍總指揮部暫駐皖東之天長，山東省政府及山東挺進軍總指揮部則暫駐阜陽，以後相機進入各該省區作戰。十五及十九兩集團軍在商邱，臨泉一帶。為統一協調該兩集團軍之作戰，奉命於臨泉設立戰區長官部之指揮所，以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分別擔任臨泉指揮所之主任、副主任。

附：第十戰區作戰地區圖

第十戰區戰鬥序列表

圖 區 地 戰 作 區 戰 + 第

四二、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



第十戰區戰鬪序列表

第十戰區司令長官部

駐立煌

司令長官

李品仙

副長官

王懋功

副長官

何柱國（兼臨泉長官部指揮所主任）

副長官

牟中珩

參謀長

董英斌

第二十一集團軍

總司令

李品仙（兼）

副總司令

張淦

第七軍 軍長

徐啓明

第一七一師 師長

曹茂琮

第一七二師 師長

朱乃瑞

第一七三師 師長

劉昉

第四十八軍 軍長

蘇祖馨

第一三八師 師長

李英俊

四二、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

一一一

第一七六師 師長 李本一

第八十四軍 軍長 張光輝

第一七四師 師長 謝何易

第一八九師 師長 張文鴻

第十五集團軍

總司令 何柱國（兼）

騎兵第二軍 軍長 廖運澤

騎兵第三師 師長 徐長熙

第五十一軍 軍長 周毓英

暫十四師 師長 李鳴慈

第一一三師 師長 李玉堂

第一一四師 師長 李步青

騎八師 師長 馬步康

暫二旅 旅長 張秀青

暫三旅 旅長 李金淮

第十九集團軍

總司令 陳大慶（兼長官部臨泉指揮所副主任）

暫一軍 軍長

王毓文

第三十三師 師長

段海洲

第二十九師 師長

第十二軍 軍長

霍守義

第一一一師 師長

孫漢彩

第一一二師 師長

于一凡

山東挺進軍（駐阜陽）

總指揮

牟中珩（兼）

副總指揮

李延年

暫二師 師長

趙呂原

暫三十六師 師長

劉世銘

其他各地區之遊擊部隊（略）

四三、日寇投降

民國三十三年（西元一九四四年）六月，美英法聯軍在諾曼第半島登陸，向歐洲大陸進軍，接着以疾風閃電之勢，恢復了法、比、荷諸國。是年底聯軍越過齊格菲防線陳兵萊茵河畔；至此歐洲方面的戰事，已實際接近尾聲。同一時期美軍在太平洋也開始採取積極的攻勢。在中國戰場上，日軍雖集中全力豕突狼奔，作

最後掙扎，企圖苟延其悲運的到來，但我們已可確定勝利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三十四年一月底，中印公路隨我軍在緬北的節節勝利完成通車，美國援我軍用物資開始源源輸入。國軍部隊經過短時間的補充整頓之後，亦開始在各戰場上發動攻勢。我國對日抗戰顯示即將轉入反攻階段了。

五月七日，時我正在重慶出席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德國正式向美、英投降，歐洲的戰爭已告終止。當時我認為，只要美國把使用在歐洲的軍事力量轉移一小部份至亞洲戰場，日本的抵抗便可迅速瓦解，但我絕未想到僅僅在三個月之後，日本便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日本出乎意外的迅速崩潰，自然是兩顆原子彈的功勞，不過就當時的情形，縱使沒有原子彈，日本也決不可能再拖上一兩年之久。

我於五月底自重慶出席六全大會回到立煌之後，立即加緊各種軍事準備，迎接反攻的新形勢；預期全面開始反攻時，我第十戰區即向徐州一帶進軍，並準備開放連雲港使美軍直接在中國東海岸登陸。

八月六日，美軍投擲第一枚原子彈於日本的廣島，八日第二枚原子彈繼投於長崎，日本朝野為之震怖。同日投機的蘇俄亦對日宣戰。在此種狀況下，日本如再不及早投降，則戰爭的毀滅性可能使日本萬劫不復。於是，日本政府於八月十日正式照會瑞士轉達中、美、英、蘇四國請求投降。

八月十四日，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立煌軍民直至十五日晚間始獲知此一令人興奮的消息。十五日上午，我原已召集本戰區的軍長、集團軍司令，及各副司令長官在長官部開會。是日適值週末，晚間有晚會上演平劇。當正在觀賞平劇時，傳來美軍顧問組方面的不斷槍聲，接着曳光彈在夜空滿天飛舞，正擬遣人查詢究竟，即接獲統帥部來電告知日軍投降的消息，同時顧問團連絡組的通報也是如此。當即轉知戰區所有部隊及黨政機關，以及軍民人等。這個消息發佈之後，立煌的軍民奔走相告，如醉如狂，彼此見面喜不自勝，

相互擁抱而涕淚縱橫者比比皆是。情緒之熱烈感人，誠非筆墨所能形容也。

我得到這一消息之後自然也是感奮無比，當夜興奮過度不能成寐，想起杜甫那首「塞外忽傳收蓟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詩反覆吟哦。然而軍人當久了，在極端危險、悲傷、或興奮的時候，自然會產生需要冷靜的警覺。我想到復員接收的各種問題，也想到今後國家建設的各種阻礙，後來事實證明，我們對這些問題都不應盲目的樂觀。

翌日我分別指示戰區的參謀長及省府的秘書長，下令所有各部隊、機關，除停止主動對敵攻擊外，一切照常工作，尤其要慎防匪徒及不良份子的非法活動。同時立即召集在立煌附近的各黨政機構主管及部隊師長以上指揮官開會，指示受降接收的各項準備工作，以免臨事倉皇發生錯誤。以後在本戰區受降及接收工作方面能有條不紊者，未嘗非此次會議之功也。

九月九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最高統帥在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此時本戰區的受降接收準備工作概已完成。翌日，即在立煌開軍民慶祝勝利大會，所有在立煌的軍民、學生及美軍人員在內，不下數萬人，歡呼聲、炮竹聲、鼓樂聲震動山谷，其盛況為前所未有的。午後舉行聚餐會，機關、部隊自不用說，民間亦家家置酒互相邀飲，狂歡竟夕。醉臥地上者比比皆是，尤以美軍官兵為最多。是夜余亦歡飲微醺，興奮不能成眠，因作七言絕句及律詩各一首。

欣聞日寇投降七絕一首

歡欣鼓舞遍塵寰， 捷報相傳百二關；
苦戰八年終勝利， 凱歌齊奏大刀環。

同前題又七言律詩一首

陣裏忽傳日寇降， 翻教熱淚灑征裳；
初聞捷報疑狂嘆， 的是盟軍破夜郎；
八載備嘗薪牘苦， 一朝贏得國魂香；
天河洗甲還都日， 又是河山重建忙。

慶祝大會完畢之後，奉統帥部命令派我為徐州、蚌埠地區受降主官。九月十一日正式召集各有關部隊及單位開會，決定受降及接收事宜，其大要如左：

(一)蚌埠由長官部負責接收，徐州由何副長官杜國協調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陳大慶負責接收。安慶由四十八軍軍長蘇祖馨負責接收。

(二)接收時間由各負責接收之主官規定後通知日軍指揮官遵照辦理。

(三)地方行政事宜，在安徽省境內者，由安徽省政府派委員一人負責接收；徐州區由江蘇省政府派委員一人負責接收。

(四)各地區內日軍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裝具以及其他軍用物資，應分別責成日方造具清冊，集中於指定地點，聽候點驗及接收。

(五)投降日軍官兵於點驗後，仍由日方派人負責管理聽候遣送回國。

(六)戰區政治部編組三個接收督導組，分別配屬徐州、蚌埠、安慶各地區之接收主官，協助督導接收工作。各地區之政治工作隊應攜帶各種佈告與曉諭日軍官兵之文告等。

會議完畢之後，即分令第七軍進駐蚌埠、四十八軍進駐安慶、第十五及第十九集團軍進駐徐州。同時以備忘錄送達本戰區日軍負責指揮官十川次郎中將，輸知本戰區受降接收規定事項及各地區接收指揮官，着其於規定時間內派員向我各地區接收指揮官接洽投降繳械事宜。隨後我於九月十七日率領長官部各主要人員自立煌前往蚌埠主持本戰區受降工作；經蘇家埠、六安至碼頭集，改乘民船循渾河順流而下至迎河集，再換乘小汽輪至正陽關轉入淮河，於二十二日下午到達蚌埠。沿途各地父老熱烈歡迎，到蚌埠時，地方民眾扶老攜幼自河岸沿大馬路長達數里之遙，遂為之塞，萬頭攢動，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聲震雲霄，余命坐車緩緩前駛揮手致謝。降軍指揮官十川次郎以下各級軍官亦列隊歡迎，但見彼等面容肅肅，其心固黯然也。

二十四日下午正式舉行受降典禮，儀式簡單肅穆；我以受降主官身份率隨同受降人員坐於上方，日方投降主官十川次郎及其隨員，卸除佩刀後由衛兵導引坐於對首下方。然後我以訓令一件交日方投降主官十川次郎，彼閱讀後立即簽署再呈交與余，並口頭表示日本軍隊絕對服從命令，遵照規定繳械。余領首示意，日方投降主官及隨員敬禮退席，隨後鳴炮二十一響，樂隊演奏國歌，全部儀式即告完畢。

在典禮進行中，我回憶戰抗八年我同胞遭日寇荼毒之慘狀，與目覩今日日軍投降之情景，真是無限感慨。是晚舉行慶祝宴會，宴後感懷往事，歷歷在目，因賦七言古詩一章，題為接受日軍投降有感，抄錄如下：

蘆溝橋邊戰端起，吹角鳴戈自此始；

漫天烽火遍神州，塞北江南盡摧毀；

堂堂華夏竟蒙羞，怒髮衝冠報國仇；

百萬男兒為戰死，凌雲壯志亘千秋；

江淮秋深早飛雪，
彈雨槍林難為坎，
滿地礮聲裂錦衣，
叮嚀猶憶爺娘語，
黃塵湧洞張天幕，
殺氣騰空作陣雲；
頻年爭戰氣雄豪，
魑魅猖狂何日已，
長江南北皆陷阱，
盟軍協力自東來，
當初入寇氣何昂，
此日降城高槩就，
歡聲鼓舞揮熱淚，
三軍共舉慶功杯，

霜風勁草天遼月；
據鞍渴飲蝦夷血；
糧車轔轔道中馳；
不斬倭奴誓不歸；
旗影逶迤聯專郡；
敵騎瑟縮依地廓；
拔壘寡旗斬六營；
丘陵難比岳雲高；
泥足深深夢未醒；
驛霍一聲繩繫頭；
掠地攻城似虎狼；
棄戈匍匐似羔羊；
復國同登太平世；
齊祝河山衣帶礪。

翌日蚌埠地區即由第七軍部隊開始清點接收，然後轉報中央處理。對投降日軍指定其駐紮地點並配發給養，聽候遣送；在未遣送前，由我軍指定整修附近道路及整理市容等勞動工作。

蚌埠受降接收工作處理完畢之後，於十月初，率同戰區政治部主任丘國珍，及有關幕僚人員前往徐州督

導。徐州父老對我之歡迎與蚌埠無少異，此皆八年來處日寇鐵蹄之下受盡折磨，一旦勝利欣喜若狂的自然表現。翌日即為雙十節，徐州各界舉行慶祝國慶及勝利大會，同時舉行閱兵典禮，盛況空前。余於大會後出席徐州各界的座談會，即席報告八年抗戰情形與日寇投降經過。翌日復召集黨政軍各部門首長，聽取有關接收事項之報告，並給予有關指示。越二日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亦來徐州視察，除聽取各部門的接收報告及本戰區的軍隊部署外，因當時共軍已在魯南企圖蠢動，乃指示以十九集團軍開赴泰安、兗州、曲阜一帶，防護津浦鐵路。

余原擬在徐州事畢即回蚌埠，不料盤據蘇北之共黨匪軍竟開始發動叛亂，向徐州以南竄擾，將徐州與宿縣間三堡附近之鐵路予以破壞，雖當即派遣郝鵬舉部自徐州向南，同時電令第七軍以有力之一部自蚌埠向北合力進剿，該匪旋即向蕭縣方面逃竄，但破壞之鐵路一時無法恢復通車，直至十月二十一日我始單獨乘飛機返回蚌埠，其餘隨員及衛士便只好由龍海路至商邱再改乘汽車經毫縣返回蚌埠了。

回至蚌埠後，於月底又出發往大通及安慶兩地視察。為便於處理該兩地投降之日軍，並令日軍第六軍團之參謀長隨行。我們一行先乘火車至南京，而後乘永濟艦溯江西上至大通，再往安慶。船行無事，因召日軍參謀長閒談；我問他日本為何失敗？渠良久始答，謂日本失敗之主因在於科學落後。余察其意乃指美國之原子彈而言也，因為之解說，大意謂，科學落後其一端也，但不盡然。以科學發達言，日本固遜於美國，但較之中國則優越甚多，然而何以日本侵略中國八年之久迄無結果？八年來日本憑軍事技術的優越攻佔很多中國的城鎮，但不過是一時佔據而已，此等地區的人力物力仍在中國政府掌握之下，日本對勝利的成果並不能消化利用。日本佔領下的許多地區，人民耕種、貿易、工作一如平時，其收穫所得的糧食、物資並不向日本

納稅，却仍然向中國政府繳納。壯丁亦不逃避兵役，仍然輾轉跑往後方中國的軍事單位報名入伍。可說日本只有佔領之名，而無佔領之實。中國土地之大，大過日本數十倍，人口之多，亦超過日本近十倍，日本侵佔我國的地方不過點線而已，未佔領的地方固然有豐富的物力、人力可供我利用，即使淪陷的地方，人力及物資亦未損失，縱再戰十年仍然無虞枯竭。反觀日本，早在美國原子彈落在廣島、長崎以前，維持戰爭所需的人力、物力，便已顯露捉襟見肘不能支持的模樣。日本對付中國本已力不從心，還要加入軸心國捲入世界大戰與美、英為敵，試問日本以這樣的國力如何能長久支持這場戰爭，勝敗之數不待原子彈便已判然了。原子彈的威力誠然可怕，不過也因對象而異，假如你們日本用原子彈轟炸中國，以中國之大便決不是幾顆原子彈可以屈服的。渠唯唯稱是，並說日本主政人物委實過於近視，說畢太急一聲似有無限感慨。

十一月五日抵安慶，蘇副總司令（蘇祖馨時已升任二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率各軍師長及地方各界人士民衆團體數萬人迎我於江岸。座艦靠岸時，河灘上人羣擁擠，手中揮舞着小旗，歡聲雷動，熱烈情形較徐州、蚌埠尤有過之。

安慶在抗戰以前原是安徽省會，抗戰初期迭遭日機轟炸，原省府各機關的房舍，悉遭摧毀、蕩然無存，以致勝利後省政機關無法遷回安慶，決定暫時遷駐合肥辦公。因此，我到安慶後只有將行轅設於同仁醫院。翌日，安慶各界舉行慶祝勝利凱旋及歡迎大會。我出席接受各界的歡迎，並即席致詞，代表中央政府並以省主席身份對安慶各界父老致問候之忱，並對他們在淪陷期間所受的痛苦表示關切。會後召集黨政軍各部門首長及地方各界首腦及民意代表等座談，詢問地方情形及徵詢復員後對於地方興革之意見。

我在安慶住了三天，董參謀長吳斌忽自南京乘專機前來安慶，謂奉何總司令命令，各戰區司令長官在南

京集合，一同前往重慶出席復員會議，特派機前來接我。於是即將安慶地區接收事宜交由董參謀長及蘇副總司令處理，當日即搭乘派來之專機飛京轉渝。

四四、隨勝利上演的悲劇

三十四年十一月八日，我從安慶飛赴南京，翌日即由京隨同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一同赴渝，出席十一日舉行的軍事復員會議。與會人員，有陸軍總司令、軍政部部長、軍令部部長、各行營主任、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其他軍事重要部門主管；會議由軍政部部長陳誠將軍召集。此次會議的內容，顧名思義，可想而知是使軍隊由戰時的擴張狀態，回復戰後的平時狀態。其主要議案大意如左：

- (一) 各戰區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等主管職位及機構一律撤消。
- (二) 全國軍隊按平時編制，以師為單位，保留六十個整編師。
- (三) 停止征兵。
- (四) 所有游雜部隊及偽軍一律收束編遣。
- (五) 軍事人員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 (六) 行政官吏不得兼任黨務工作。

會議進行非常順利；很少有人提出疑問，大部時間都是聽取議案的解釋。此等議案想早已議妥並經考慮週詳，所以很快都獲得通過。閉會時主席說明，此次大會議定各案，實為戰後整軍，使軍隊國家化的要務，既經全體決定必須迅速實施。

早在我赴渝出席軍事復員會議之前，於前往徐州視察受降及接收情形之際，曾獲知共匪陳毅等部隊在蘇北一帶有企圖異動之情報，並已組織蘇魯皖邊區蘇維埃政府，嗣又派遣軍隊竄至徐州南方之三堡附近，將鐵路破壞，阻撓國軍運輸，及迫令當地日軍向他們投降。當即判斷共匪必在最短期間內公然從事叛亂。故我同至蚌埠之後，即欲建議中樞，在徐、蚌接收之後，以第十戰區之現有兵力進剿蘇北共匪，根除後患。當時我十九集團軍正奉命自徐州向泰安、濟南北上保護津浦路之交通，十五集團軍已進駐徐州，廿一集團軍在蚌埠以南，另有郝鵬舉、張嵐峯兩部偽軍，各約一萬餘人，隊伍亦頗整齊，則在徐州至歸德一帶候命收編。依當時的計劃，擬以何柱國的十五集團軍及陳大慶的十九集團軍，沿津浦路及徐海路，遮斷蘇北與魯南共匪的連絡，阻止蘇北共匪北竄；然後以二十一集團軍為主力，配合郝鵬舉、張嵐峯兩部偽軍，由盱眙、天長東進，向蘇北共匪包圍進剿，予以殲滅；最後轉移主力指向魯南沂蒙山區，將魯南殘匪圍殲於東海岸一帶地區。二十一集團軍過去與共匪作戰多次均獲勝利，頗有經驗，共匪對他非常畏忌，相信不難予以肅清。

上項計劃我曾向李主任宗仁申說（李當時任行營主任），請他轉請中樞核奪；我至重慶開會時，亦想將之作成提案，密陳統帥部核辦。至開會後，因會中第一個議題即是復員整軍，戰區長官部、集團軍總司令均在撤消之列，所有各軍均頒縮編為師，同時規定遣散所有游雜部隊及偽軍；我深感我的提案與會議各案的性質大相背馳，為免與中央政策發生牴觸，遂將提案的計劃取消。李宗仁主任可能亦因此未便向統帥部提議。當時我曾就是否應另向中樞建議一事，反覆思量，後來我想到統帥部對各方面的情形當知之較詳，對共匪的陰謀必有應付良策，不必過分憂慮而作罷。

於是，會後即返合肥，着手辦理復員整軍工作；首先將我所兼的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一職報請解除，

由中央黨部派劉真如同志接任。嗣即下令撤消戰區長官部、各集團軍總部、軍司令部等機構。其間因人員安置調動及編遣經費領放等問題一時未獲解決，執行不免稍有遲延。至三十五年二月中旬，中央政府還都南京後，又召開第二次復員會議；會中討論議案，概仍是上次議案的重申，不過解決了若干枝節問題，主要在催促實施縮編而已。會後我即將第十戰區長官部一切未了事宜於四月中的辦理結束，所部各軍師亦悉按命令整編完成。二十一集團軍的三個軍，縮編為三個師，改隸第八綏靖區管轄，由中央派夏威為第八綏靖區司令，我本人則奉令專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此時鄒鵬舉、張嵐峯兩部偽軍已由徐州北去，迄無下落，可能已為共匪所迫編了。

當中央政府積極進行復員整軍之際，共匪却乘機積極擴充，同時襲攻國軍，爭據城鎮。中央政府要撤消淪陷區的各偽組織，共匪則在竄據地區成立共黨政權，與中樞分庭抗禮。中央政府召集國民大會從事制憲及選舉總統副總統還政於民，共匪則拒絕參加，並煽惑各地青年學生遊行示威，反對政府。同時派林彪匪部竄往關外，在蘇俄的掩護下，接收東北全部日軍遺留的武器、物資，迫編以前偽滿的全部偽軍，不下十餘萬人。我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軍隊與人員，蘇俄則拒絕移交或藉故阻撓。如是共匪乃乘機坐大，數月之間，僅東北一隅，共匪軍隊即發展至數十萬之衆。其他蘇、魯、冀南，晉西等地，共匪接收及劫掠的人員武器，合計起來亦不下數十萬人。從此匪軍勢力益形膨脹，愈難就範了。

中央政府在日本投降後，即決定裁軍復員，取消戰時各級軍事指揮機構，調整黨政工作人員，並已決定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普選，還政於民。此乃是國家建國必然的程序，無論任何黨派，任何軍隊，均應絕對遵守。共匪對此不但不予以遵守執行，反而利用機會擴大軍隊，組織蘇維埃政府，霸據地盤，襲擊國

軍，破壞國家統一，其企圖傾覆政府，已昭然若揭。我中央政府，如在此時，即不顧一切，毅然決然宣佈共匪罪狀，下令討伐，乘我軍勝日餘威，以領袖 蔣公受舉國人民熱烈擁戴之德望，復以戰時指揮機構猶未撤消，軍隊部署仍能迅速，即集結大軍分途進剿，以當時強大之形勢，對付破敗不整之共匪，未始不可一鼓蕩平；縱使一時不能解決，亦不至使共匪若是猖狂。無如我中央政府，因受外交上之壓力，與盟邦不友誼的行為，竟使我中華民國不亡於日本，而毀於共禍，實非吾人始料所及。言念及此，能不痛心！

中日開戰之初，蘇俄本是支持我國的友邦，旋因有事於歐洲，轉與日本拉攏，訂立中立條約，最後復出兵對日，其不顧信義，世所熟知，且蘇俄是國際共黨的首腦，其暗助中共亦不足怪。惟美英兩國，在日本襲擊珍珠港，攻佔新加坡之後，已與我締盟共同對日，期我能牽制日軍主力於中國戰場，以減輕彼等所受之壓力，俾彼等能從容集中力量拯救歐洲，理宜與我開誠相見有始有終，不料在德、義、日軸心行將崩潰之時，竟與俄國簽訂雅爾達秘約，出賣我國；不經中國的同意，即將我東北之中東、南滿兩鐵路，以及大連、旅順兩港的特殊權利讓與蘇俄，並承認外蒙古之獨立，以換取其對日參戰。這種以犧牲中國，來減輕美國對日負擔的作法，實有悖信義。如果企圖以此換取蘇俄放棄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轉而支持我中央政府統一全中國，那無異緣木求魚，更荒謬可笑！

結果，雅爾達秘約徒然使中國八年抗戰的成果遭受犧牲，由雅爾達秘約所帶來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只是一張白紙。反使蘇俄假借對日參戰之名入據我東北之後，一方面阻撓我對東北主權的接收，同時在其掩護之下，使共匪方面利用旅順、大連源源闖入東北，並盡量協助共匪，將日本關東軍在東北所遺留的大量武器轉移於共匪之手，支助共匪顛覆我中央政府，以遂其赤化中國進而赤化亞洲與世界的一貫政策。這樣，中國固

然是首蒙其殃，對赤化整個世界，又何嘗不是推進了一大步！卒至造成今日東亞險惡的風雲及未來的危險，試問美國友邦對自身是利乎？是害乎？

更可慨嘆的，是美國朝野對蘇俄赤化世界的陰謀既毫無警覺，對中國共黨的狡詐欺騙更蒙昧無知，中了國際共黨宣傳的毒素與滲透分化猶不自覺，一味聽信共黨對盟邦政府捏造攻許的調言，及潛伏於其國務院內一批共黨同路人不盡不實的虛報，早在抗戰結束前後迭次派遣外交人員前來我國調處，要求我中央政府接受共匪的無理要求，使共匪得售其奸計而得龍望蜀益形狂妄。這樣調處實無異引風滅火，益助其燃，自然得不到效果。及後，共匪已全面發動叛亂，此時政府軍事力量尚能控制全局分別防剿之際，美國復於三十四年底又派遣馬歇爾以特使身份前來我國調處，成立三人小組，要求政府下令停戰從事協商；殊不知共匪是一向不守信義的，國軍遵令停戰而共匪反乘機擴張，且惡人先告狀，共匪每次開會必控訴國軍違反協定。馬歇爾可能早已中了共匪宣傳毒素，總是偏聽共匪謊言，認是國軍違背停戰令破壞協議，對國軍大加限制。這樣停戰調處，與其說是調處，無寧說是提供共匪襲擊國軍的掩護，變非法為合法；若國軍遵令停戰協商則無異自縛手腳。共匪得此便利，遂利用協商作談談打打，有利則推翻協議造成既成事實，不利則呼籲停戰解除危險；結果共匪得以坐大，國軍則從此日削矣。

馬歇爾特使八個月的奔走斡旋，在共匪屢次破壞協議之下，不但不能達成停火，而衝突益形擴大。至三十五年八、九月間，共匪在蘇俄的掩護下，已控制大部份東北地區，取得了東北日軍遺留的大量武器，並收編了十餘萬的偽軍。此時共匪在關外羽翼已豐，在關內也完成了各種部署，遂變本加厲，將政治協商會議已達成的協議，全部推翻並大舉進攻國軍，所謂三人小組已無形解體。馬歇爾在調處失敗之後，竟停止對我政

府的軍援，並於三十六年一月回國，一走了之；同時撤退全部顧問人員與經援物資，使政府遭受缺乏軍事補給與經濟崩潰的雙重壓力，更無異於落井下石了。

共匪是俄共的螟蛉，目的在赤化中國；他要奪取整個政權，而不是僅僅想分一杯羹的。說得更透澈一點的話，他是遵照蘇俄第三國際共黨的指示，以赤化中國作為赤化世界之主要步驟；因此決不是馬歇爾前來調查處可以解決，也不是平分政權或組織聯合政府可以滿足其欲望的。

共匪最初偽裝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來騙取美國人的同情，更經由國際共黨之助，得到一批美國的共黨同路人為他瞎吹亂捧，遂使美國短視兼幼稚的政治家、無聊的外交掮客，為他所利用。早在抗戰結束之前，已有若干美國人員奔走於延安道上，對共匪大送秋波，共匪遂因此而身價陡增，由本來無足輕重的叛亂集團，一躍而成為有國際地位的政治團體，公然與政府分庭抗禮。勝利後，復藉美國居間調處的掩護；共匪之所以能得勢於中國，美國實在給予不少的便利。可是共匪究竟是俄帝的螟蛉，並不念美國提挈扶植之恩，在其羽翼豐滿全面得勢時，亦全面發起反美運動，不斷製造仇美事件，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甚至襲擊美軍，迫使美國放棄中國，孤立我中央政府，以便最後赤化中國，以至整個的亞洲。倘馬歇爾來到中國的時候能有警覺，認識共匪真面目，幡然改圖，積極協助政府，援助國軍，以一如後來援助南韓、南越的決心，不獨可以消滅共匪勢力，使中國政局安定下來；並且可以使以後在南韓、南越的犧牲亦可避免。可惜美國當時不此之圖，深怕得罪共匪，竟把這樣危及整個亞洲，影響全世界的嚴重問題，輕輕錯看，飄然置身事外，停止一切援助，後來還發表了白皮書，將一切責任推給中國政府，遂使我政府在大陸首由經濟崩潰，直至軍事失利，最後令共匪竊據了整個大陸，亦由此而導致了爾後的韓戰、越戰及將來整個東亞的赤禍蔓延，這豈止是中國

的不幸！亦美國的不幸甚至是全世界的不幸！

四五、安徽的復員與接收

我於重慶參加軍事復員會議完畢之後，因當時安徽省政府正自立煌移駐合肥，地方行政的復員與接收亟待開始，乃立即趕回合肥。

我回到合肥時，省府各主要機構已遷駐合肥開始辦公，遂於是月中旬於合肥召開安徽黨政復員會議。會中決定原來各縣對該年度施政計劃中之預定事項，仍按計劃實施，另議定有關復員、接收之事項如左：

1. 前此淪陷縣市之地方行政機關、工廠、建築物、學校等，由各該縣市長負責接收。民衆團體、及宣傳、文化事業，由各縣市黨部負責接收。各專員公署應負責監督糾查，並分派省府廳處長或委員到各區視察。
2. 與光復地區相鄰之各縣市，除加強本身的建設工作外，應協助恢復光復地區之交通。
3. 各縣市接收工作人員，務潔已奉公，各專員公署每週亦應將接收情形、物資種類、數量列表呈報省府備查。
4. 清查淪陷前地方機關之檔案文件及圖書，以及淪陷時期敵偽地方機關所有重要事項之檔案。
5. 曾充任敵偽機關重要職務之人員，以及著名之惡劣份子，應查明事實報省核辦，不得藉公報復，牽累無辜。

6.不屬於縣市之機關，依其性質分別由省府各廳處負責接收。其物資、建築物、業卷、文物，尤須詳為登記。

7.為敵僞破壞之省屬機關、工廠、道路、學校、公共交通事業等，由各主管單位依據實際情形擬定修復計劃。

8.各縣市為國捐軀或因公務傷殘人員，由各縣市詳為調查呈報，優予撫卹。

9.各縣市須特別注意維持治安，肅清匪僞殘餘分子。

由於安徽在抗戰期間雖孤懸敵後，實際為敵佔領的城鎮與地區不多，同時共黨份子自三十三年秋天在皖東區那場戰鬪中失敗逃回蘇北之後，已不敢再來嘗試，因此安徽的接收復員工作比較簡單，沒有遭到共匪的阻撓；不過月餘即已接收並清查完畢。至三十五年三月，中央派監察使陳肇英先生前來視查時，見各項業務井井有條，表報賬冊莫不完備，深為嘉許。

三十五年四月，原第十戰區的部隊已按軍事復員會議的規定縮編完畢，戰區長官部於同月撤銷，我奉命專任安徽省主席。此時省政接收及復員工作已均完成，今後的主要工作當在從事建設，因之安徽未來的永久省治遂為省內人士所關心。有的主張仍遷回安慶，亦有主張即以合肥為省會者；兩派一時爭執甚烈。主張遷回安慶的，大抵以安慶為戰前省治所在，且控扼長江，天然形勝。主張合肥者，大抵以合肥位置適中，交通方便，且有充分擴展都市建設的餘地。由於兩說各有理由，利弊互見，乃將此一問題正式提交省臨時參議會討論表決。討論結果，大多數以安慶受地形限制，幅員狹小，缺乏建設未來都市的條件，同意即以合肥為永久省會所在地。議決後，於是年冬成立安徽省會建設委員會，以省建設廳長張宗良為主任委員主持其事。經

過詳密的策劃與設計之後，於三十六年初開始第一階段的建設工程，預計於兩年內完成以下各項：

1. 建築省政府及各廳處，以及省議會之辦公房屋。
2. 建築自來水廠及發電廠等公用事業。

3. 拓寬合肥城內外街道。

4. 修建以合肥為中心的公路及電話系統。

5. 協助淮南鐵路局修復淮南鐵路。

上述省會第一階段各建築工作，經積極的努力，至三十七年秋天已概略完成。惜此時戡亂戰局已有逆轉之勢，余亦適在此時調往華中長官公署任職，未能目覩其成。

四六、空城計

三十六年八月，當時國軍正集中兵力向魯南沂蒙山區之共匪巢穴進剿，原駐津浦路南段及長淮間地區，由前第十戰區二十一集團軍改編歸第八綏靖區指揮之部隊，均已奉調至徐州以北參加剿匪作戰。此時匪軍劉伯承部數萬人由豫北渡河南竄，於八月下旬經豫南之潢川、固始、商城，東趨六安、合肥。此時合肥已為安徽省治所在，但除省府之警衛營外別無駐軍。當劉匪到達六安之後，省府上下及合肥民眾莫不為之震恐。未幾復接獲合肥縣府電話報告，謂匪軍先頭部隊已到達六安以東之金井；當時雖知中央已令邱清泉自龍海路南下堵剿，但係隨匪之後趕來，距離尚遠，因此余亦不免為之焦灼。金井距離合肥僅七十餘華里，匪軍旦夕可至，此時若令省府各機關撤退在時間上已不容許，若言防守以一警衛營之兵力亦感不濟，乃忽然情急智生，

當即下令合肥城廂內外各鄉鎮之國民兵團火速集合於合肥城外，由省府衛隊營為骨幹派兵協助指導，連夜點燃燈籠火把趕築碉堡、戰壕等城防工事，並於各大建築物內樹立軍隊旗幟，派衛兵把守，且不時吹奏號音；同時以一部鄉鎮自衛隊在合肥城外由東到西，由南到北，來往運動，模擬已有大軍到達從事備戰的模樣。城廂內外居民一律各安其業不許逃避；各省政機構亦照常工作，不許張皇。我個人亦親赴城廂各處指揮部署，督導施工。如此經一晝夜，至翌日下午接得自金井方面之報告，謂劉匪於年前已轉向舒城方面竄去。余聞訊如釋重負，不禁喜極而泣。一晝夜來我雖外示處之泰然，內心實不免為我的空城計憂也。由於我的態度鎮定，在此期間省府上下各級人員及合肥市民竟無人要求遷避。參議會議長江暉先生，我因其年事已高恐不堪驚擾，暗示其難開合肥暫避，彼初亦堅持不去，表示要伴我守城，後經我再四催請，始允乘車前往蕪湖。我之喜極而泣，蓋亦為安徽父老對我忠誠信賴，臨危不棄而有動於衷也。

越日追剿劉匪之邱清泉部始趕至合肥。因劉匪已竄往舒城，邱部某旅隨後追趕；後該旅在舒城以西遇匪伏擊，損失慘重。又越日，第八綏署所屬第四十六軍亦自皖北趕回並對劉匪追擊，劉匪乃經大別山向鄂東、豫南方面竄走。

此次劉匪伯承南竄，未乘虛進襲合肥，而中途折向舒城，是否因我的空城計所炫惑不得而知，惟我事後回憶總不免心有餘悸；當時有感於此因作五言古詩一章，以誌其事，題為合肥却敵，抄錄如次。

已掩東伐鼓，何來鳴旆鉦；蕭牆變患起，瞬息喪遼寧；

湖北脫轄繫，烽烟漫兩京；大軍爭魯北，八皖已空營；
賊虜乘虛入，江淮萬戶驚；敵鋒迫淝水，急智贍邊生；

奮起召羣衆，鳴戈揚戰旌；懸燈夜纂壘，詐示大軍聲；

昔敵知吾性，聞風竟退兵；臨危施妙算，諸葛守空城；
成敗雖難卜，人謀亦可勝；援軍指日到，一戰慶救平。

由於劉匪之竄大別山周圍，中央深恐日久成為隱患，未幾派白崇禧部長於九江成立剿匪指揮所，專任清剿竄擾豫鄂邊區之劉伯承匪部。

是年十一月中旬，白部長於九江召集有關軍政主管人員，召開剿匪軍事會議，電邀我前往參加，提供剿匪意見。抗戰期間我在大別山六、七年之久，基層黨、政工作均有相當基礎，自信當地居民深明大義擁護政府，對剿匪軍事必然支持。會後大軍即開始進剿，至三十七年春，劉匪終於無法在大別山駐足，不得不向豫西回竄與陳賡合流。

我在九江會議之後，曾乘便重遊廬山，時值深秋，景物蕭瑟，感懷戰亂，不勝唏噓，遊興頓減。翌日即乘機經蚌埠轉回合肥。是時，中央為統一指揮蘇魯豫皖剿匪軍事又成立徐州綏靖公署，以顧祝同上將為主任我兼副主任。

我回到合肥，正值辦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投票完成，安徽各縣代表均順利選出。我亦由原籍蒼梧父老以三十餘萬票推選為國大代表，旋奉總裁指示退讓友黨，乃即辭去。是年十二月及翌年元月又分別選舉監察委員及立法委員。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揭幕，至五月一日閉幕，選出蔣公中正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並於五月二十日宣誓就職。我國從此進入憲法之治。惟自政府決心行憲以來，共匪深知其邪說並不受廣大羣衆歡迎，依法競選必然慘敗，於是變本加厲發動全面叛亂，

阻撓憲政之實施；政府雖於排除一切困難之後，終於完成普選，還政於民，可是此時共匪的叛亂已益為擴大，漫天烽火，警報頻傳，大局反而日趨險惡了。

四七、勘亂戰局逆轉

三十七年春，第一屆國民大會開會前後，戡亂局勢已面臨惡化。在大會揭幕之前，東北事實上已只剩下長春、瀋陽兩座孤城，陸上和海上的交通線都已被共匪切斷，完全仰賴空運維持。華北的平綫線、山東的膠濟線、河南的龍海線，在大會開會期間也都紛紛告警；洛陽和濰縣都是在此一期間失守的，可見當時共匪已轉取攻勢，而且攻擊力量已不容忽視。那時南京方面正在選舉總統副總統，總統一席以蔣公勳業之隆萬民仰戴，自然非蔣公莫屬，可是副總統一席角逐者多，却爭得相當熱鬧，此時所有的人，連報章雜誌在內，都將注意力集中於選舉之上，而忽略了當時局勢正在惡化。

大會閉幕之後，我國軍之形勢已陷於被動，中央為鞏固華中，貫澈戡亂，作未雨綢繆，籌議成立一包括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五省的軍政統轄機構，由原國防部長白崇禧出任軍政長官。籌議之初適我亦因公前往南京，故得預聞其事。當時我有一種感覺黃河以北可能已為共匪所控制，江、河之間尚可與爭，長江以南政府必須採取一切措施，力求鞏固；因此我很贊同派一大員坐鎮華中，統率大軍屏障西南，北控鄭、許，使南京中樞能一意應付津浦線上之作戰。

五月底，行憲新政府正紛紛改組成立，白崇禧既未入閣，以之擔任華中軍政長官一職自屬適宜。果然在六月初，我於合肥接得白部長的電話，謂華中軍政長官已決定成立，中樞派彼前往負責，並邀我出任他

的助手副長官。華中軍政長官公署之設立雖早經預聞，但出任他的副手，却是我所未料到的事。這突如其来
的問題，既不便在電話中商定，也不便肯定作答，我只好說我對任何職務都無所選擇，只要中樞考慮我能以
勝任的事，我都樂於效命。

六月下旬，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白長官後以電話告我，說他已向總統蔣公請准派我為副長官
，安徽省政府主席一職已另派員接任。不期此事果然就此定案了。不久正式命令到達，我於交代辦完畢之
後，於八月下旬始離合肥赴京。

我是二十九年元月接任安徽省政府，到三十七年七月，整整八年又半。我與安徽父老兄弟姊妹推誠相與至
為融洽；自投身軍旅以來，除湖南外從未在一地服務如此之久，因此安徽真有如我的第二故鄉，一旦卸職離
去，頗有不勝依依之感。安徽省議會獲知我調職是無法挽留的，特召集會議全體通過贈我以安徽省的榮譽公
民以表親切之意，並頒授證書。臨行時合肥各界父老及機關團體列隊相送，長達里許，我幾度停車與他們握手
，欲語哽咽；看他們凝重的表情，想起這番較日寇更為兇殘的紅禍，真是不忍離去，及車抵南京猶悵懷若
失，感興書懷，因賦七律一首如次：

辭安徽省政府主席留別父老及同仁

揮手臨歧別皖疆，
湖雲幻變干戈後，
八載同仇如手足，
難懷幾許情難訴，
清風拂袖九秋涼；
國事蜩螗歲月長；
一朝遠別感參商；
霜冷方知晚菊香。

余到京後，翌日即謁見總統蔣公，報告安徽地方情況及請示今後工作方針。當時總統蔣公想起民國二十八年我在鄂北因先母逝世電請辭職奔喪的事，垂詢先母營葬情形，我以抗戰勝利後緊接剿匪戡亂迄未返里有虧子職對，並乘機請假，當蒙蔣公給假兩月返里營葬；總統慈孝榮及先母，感戴難忘。

我將返里葬母事電告白長官之後，於九月初由南京經上海搭機飛廣州轉赴梧州故里，臨行總統蔣公及副總統均先後賜宴錢行。經上海時，正是金元券發行之後，政府執行經濟管制，京、滬商人屯藏物資不肯出售，市面蕭條，黑市猖獗，當時我認為軍事上前方打一兩次敗仗關係不大，但如果這次幣制改革再不能收到維持幣信穩定物價的效果，人民生活感受痛苦，以致對政府的戡亂失去信心，則其後果當至為嚴重，不禁愁然憂之。

中旬抵家門，一別十餘年，與家人、父老相見，自是悲喜交集，殷殷存問，無限親切；惟昔在襁褓孩提中的子姪輩，此時皆已玉立亭亭，對我似大有陌生之感，一時想起賀知章那首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詩，誠不勝感慨。時先母已由家人先擇地安葬，惟尚待建墓立碑，余遂於告祭後鳩工泐石。不期假期尚未屆滿即迎接白長官的電報，促我即日赴鄂。那時我從報上獲知長春、瀋陽均相繼淪陷，濟南、鄭州也已棄守；各地物價飛漲，京、滬一帶已發生搶米風潮，情勢之嚴重，不難想像。於是匆匆啓程，經桂林轉乘火車赴鄂，於十一月中旬到達武漢；車南入站即發現白長官及長官公署各處長，地方行政主管等人員均在車站迎我，私衷感甚。

我到達武漢之時，徐蚌會戰已經開始。過了幾天不利的消息不斷傳來；先是黃伯韜兵團在碾莊被圍，苦戰十餘日，彈盡援絕，自殺殉國。黃伯韜兵團消失之後，共匪陳毅部自徐州東面直趨宿縣，徐州遂陷於四面

包圍之中。最後自徐州突圍之國軍，與向徐州增援之國軍均分別為匪所圍困；突圍不果，幾全部犧牲。

徐州失守，南京不免有唇亡齒寒之感，同時東北的共軍於攻下瀋陽、錦州國軍最後兩個據點之後，源源入關，平津形勢丕變，至三十七年十二月中下旬，那時全國上上下下人心惶惶，謠言紛起，南京若干機關開始撤退，社會秩序已形混亂。繼北平的傅作義與共匪醞釀局部和平之後，京、滬兩地也傳來和談之聲。事實上，徐蚌會戰失敗，國軍精銳被創，尤其經濟崩潰，人心渙散，士氣衰落，繼續作戰已無多大把握，所以當時不僅第三方面的人士出而奔走和平，即本黨部分政要、元老也主張停戰恢復和談。

三十八年元旦，總統蔣公發文告，表示不計個人進退，促進國內和平之願望。過了幾天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羣先生與黃紹雄銜命飛來漢口訪晤白長官崇禧，徵詢和談意見。他們在漢口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長沙訪晤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頌雲。此時華中長官公署之下只有在荆宜一帶的宋希濂集團，在平漢線上豫南一帶的張軫集團，以及在漢口外圍的張淦集團；這三個集團總共不過十數萬人，原來加上黃維集團對付劉伯承、陳賡兩股匪軍尚可應付，今黃維集團於兼援徐蚌途中為匪包圍殲滅，而今後匪軍陳毅及林彪兩股均可傾巢而來，面臨此一危險情勢，實在有捉襟見肘之感。因此明知和比戰難也只有贊成一試了。經過一番研究之後，白長官乃電呈中央贊同和議，雙方停戰，以期博取一時的緩和。據說那時南京方面副總統在邵力子、張治中、黃紹雄、甘介侯等包圍慫恿之下也力主和議。

於是，總統蔣公於三十八年元月二十一日宣佈暫行引退，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早在總統宣佈引退的前幾天，共匪方面就提出所謂「和談八條件」，行政院也發表了政府願雙方先無條件停戰，再各派代表協商和平辦法的意見。共匪的八條件自然荒謬絕倫與行政院的意見相去太遠，可是主張和談的人士看來，

既然對方已開出價錢就總有談判的餘地，初不知這只是共黨的心戰，實際上他自認已勝利在握，根本無和談的需要了。

李代總統視事之後，為表示政府謀和誠意，一面派定邵力子、張治中等為和談代表，聽候和談，一面與李濟琛、羅隆基等共產黨的同路人連絡斡旋和平；同時為討好對方下令取消全國戒嚴令，解除報章雜誌禁令，釋放政治犯，及撤銷特種刑事法庭等；最後並逕電毛匪澤東，承認以毛匪所提之八條件作和談基礎；可說已極盡謙恭忍辱的能事。可是共匪竟百般挑剔，幾經磋商，直至四月一日纔開始和談，而所謂和談實際等於強迫無條件接受投降條款而已。經過三次限期，兩次會議，最後於四月十五日，共匪方面以最後修正的八條二十四款要求簽字，並以四月二十日為最後期限。這八條二十四款，可說至為苛刻；後來想起共匪定在四月一日愚人節開始和談，不禁啞然失笑。

四月十六日，李代總統派遣的和談代表之一的黃紹雄由北平返回南京，將共匪的八條二十四款攜回請示。我當時適因事由漢去京，是晚得在代總統官邸參加聽取黃代表有關和談經過報告。當黃代表報告完畢並將共匪所提出的條款宣讀之後，所有在座的人面面相覩默無一語約有兩三分鐘之久。我素來心直口快，覩此光景實在有些忍不住了，於是對黃紹雄說：「我看這些條款的內容，不是和談，完全是迫降罷了。」黃代表有幾分尷尬的說：「我們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才達成這樣的條件。這是最後的決定，共方是不會再讓步了。我們自己也要考量考量，如不承認，只有再戰；再戰結果，有無把握？」此時在座諸人仍然默不作聲，最後李代總統掃視大家一遍之後說：「茲事體大，容我考慮後再行答覆。」和談事實上就此停止，四月十九日正式予以拒絕。

這次和談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既沒有利用這段時間作重新有效的備戰，反而讓共匪利用這段時間作有效的心戰、滲透，瓦解我軍民士氣。四月二十一日共匪大舉渡江；長江雖稱天塹，但戰線過廣我軍守備兵力不足，且如江陰要塞，守軍將領的無能為敵所乘，至使匪軍毫不費力即從此先渡，隨後荻港亦被敵強渡，長江天險遂即失守。我前二十一集團軍四十八軍之一七四師（師長吳中堅），自一月底以來據守安徽，作為國軍在長江北岸的橋頭堡，經匪數度猛攻始終屹立不動，至此亦只好自動放棄，向長江南岸撤退。

同日，我政府又發表文告，堅決作戰，李代總統並令何應欽上將兼長國防部統一指揮軍事。那時，大部份政府機關早已於二月初即遷往廣州，南京遂於四月二十三日自動撤守。共軍渡過長江之後一面進攻上海，一面沿浙贛路發展進出江西。此時江北共軍除原來的陳毅、劉伯承兩股外，其他原來東北、華北各戰場的共軍，如林彪、彭德懷等的部隊亦傾巢南犯，其總兵力已數倍於我。因此戰局遂呈一面倒之勢；不久武漢、上海均相繼棄守。

華中長官部在和談期間，本中央備戰求和的決策，在軍事上以張幹兵團在平漢線上至南陽一帶，防止共軍南進，張淦兵團防守武漢外圍確保武漢三鎮，宋希濂兵團則集中荆宜一帶整補，準備策應各方面之作戰；在政治方面遵照中央戡亂動員綱要，參酌地方情形，擬妥戡亂時期施政大綱準備實施；及共匪渡江，佔領京滬並沿浙贛路深入江西，側背頗感威脅，同時傳聞長沙綏靖主任程潛有向共匪靠攏的消息，遂不得不放棄武漢於五月中下旬逐次向湘北、湘中轉進。

中央拒絕共匪迫降條款決心繼續作戰之後，李代總統即任命我為桂林綏靖公署主任，要我回廣西加強作戰準備，與鞏固後方基地各事宜。我於五月一日率領必要人員自漢口乘機赴桂林；因我的老上司唐生智當時

住在長沙，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我想順便探聽他的意向，同時武漢方面已戚傳程潛有舉湖南赤誠的消息，也想藉商議西南防務問題順便觀察他的動靜，遂決定中途在長沙停留一日。抵長沙後當日即分別訪晤程頌雲主任及唐孟瀟，以及若干昔日的袍澤友好。由各種跡象觀察及得自可靠人士的報告，長沙確在醞釀向共匪靠攏，當地工農各界團體都有共黨份子在內把持，且有欲將我扣留之說。是夜程在省府設宴招待我，飯後我約他密談，我說：「頌公，你在黨國歷史上是勳業彪炳，極有地位的人，今黨國危亡，從大處看應該領導我們奮鬥救黨救國，從小處看無論如何應該珍重自己的光榮歷史，不能隨便附和年輕一輩人的意見輕舉妄動。這是就我們應有的道義而言，如果就實際利害權衡，你是湖南的家長，當然要以保全湖南大多數人的身家性命為基本考慮，今駐守湖北的國軍不下十餘萬，其中大部份是廣西的子弟，將來情況不利必然要假道湖南退回廣西，所謂歸師勿遏，湖南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如果湖南有變，屆時長沙百數十萬人口的生命財產豈不無辜遭劫，是公愛之道足以害之！我為公謀，還是安定下來從長考慮為好。」

程聽完我的話囁嚅的說：「此地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大家都是擁護政府的呀！」

我說：「我到此還不到半天已經得到許多報告，說長沙就要響應共黨，宣佈獨立了；我親眼在街上看到已經張貼了若干措詞不妥的標語。」

他說：「不會如此罷。」

我說：「請頌公派人暗中切實一查便可知曉。」稍停，我繼續說：「湖南是我的第二故鄉，頌公又是我的老長官，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今天赴桂中途在長沙停留一夜，就是遠道傳聞不敢輕信，特地前來拜望老長官了解實情。我明天上午即乘機飛桂，以後請隨時與武漢白健生兄連繫好了。」程頻頻領首。

翌晨，我又往訪唐孟瀟，那時街上原來的標語已經不見了。孟瀟堅留我吃午飯，我們談了很多，但談到對時局的看法，他便盡量閃避，表示不願過問。最後我告訴他，如果長沙環境有什麼變化，不願再住下去，希望老長官不要見棄，我歡迎大駕經桂林再到廣州參加戡亂工作。後來程附逆之後，他遂寫了一信由他的夫人偕同顧法師淨緣一同來到桂林，要我派出飛機送赴香港，他本人為何未離開湖南，我想他可能想暫時留在湖南，觀察一下大局情形再行定奪，及後他本人欲走時已無法出境了。

我和程潛的一夕話總算是發生了一點效果，原來他是準備與陳明仁於五月中的上演附逆醜劇的，由我鄭重的告訴了他的利害，因此他才延遲了兩個多月，迨華中部隊撤至寶慶之後，方行公開附逆。

我回至桂林之後，於五月五日成立綏靖主任公署開始工作。本人離開廣西已經十年有餘，廣西的情形大體上是與戰前不相上下，地方行政人員仍多舊日抱澤，其中部分已經升調或因故去職，為時既久人事變遷，勢所不免，同時八年抗戰兵燹之餘，商業蕭條經濟衰落，亦屬必然之事。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對本省十年艱苦支持始終不懈，實是難能可貴的事。惟目下戡亂戰事頻頻失利，平津失守，京滬淪陷，各地土共紛紛出現，學生工人羣起搗亂，影響人心擾亂秩序，廣西不免亦被牽連，加之金融混亂風潮迭起，大局危機迫在眉睫。我廣西位在西南，已成反攻基地，一切工作急待進行，惟以時間迫急無暇兼籌並顧，只有選擇重要事項先行實施者如左：

- (1)廣西原有保安部隊統歸綏靖公署指揮。
- (2)省保安司令部奉中央行政院令撤消，其業務歸綏靖公署辦理。
- (3)增編若干保安團充實戰備，其經費與省府會同籌劃。

(4) 協助省府實施總動員法，動員人力物力配合國軍作戰。

(5) 幫助省府整理內政，安定人心，維持秩序。

(6) 加強地方國民兵團配合國軍作戰。

(7) 分區綏靖肅清土共。

在我就任桂林綏署主任後，時李代總統於南京撤守後，途經桂林，猶未前往廣州，省府主席黃旭初先生一日召集了一次臨時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後來獲知係徇省議會前議長李任仁之請而召集的，座談會開始，李任仁首先說了很多為共匪張目的話，並說目前時局已經惡劣萬分無可挽救，和談二十四款不必害怕，這是與共黨合作的最後機會，接受二十四條款不失為明智之舉。當時在座的除黃主席而外，尚有軍管區司令呂競存，省府委員陳雄等多人，桂林市長陳恩元及蘇新民等人亦列席。他說完之後，在座諸人均相顧默然不語，僅省府委員陳雄表示贊同。最後黃主席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李先生的想法是放棄戡亂與共黨合作，這完全是政治問題，我是軍人，軍人不應參與政治，只有服從政府的決策。與共黨合作的主張應由中央政府來決定，現李代總統正在桂林，可否請李先生向代總統建議。只要代總統決定了，我們自然秉承中樞命令行事；無須問我。」於是大家便悶不作聲，無言而散。

李任仁是白長官崇禧小學時代的老師。師以生貴，大家以往對他都表示尊敬。他一直在廣西擔任黨務、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工作。聽他的這一次言論，就可見廣西此時社會上的思想也有多少分歧。廣西在抗戰以前是思想最單純，民衆最團結，地方組織最嚴密的省份，李任仁先生竟有此主張，是我意想不到的。

四八、大陸淪陷

共匪渡江南犯之後，戡亂戰局，急轉直下。五月三日，杭州即告失陷。那時長江下游國軍，係集中兵力固守上海，匪軍亦集中兵力約二十萬來攻。激戰半月，至五月二十七日，上海終告失守。

上海失守後，在浙、閩方面的國軍退守東南海疆。沿浙贛路前進之匪軍，於攻佔南昌後，以一路進出湖南，拊華中國軍之背，一路向贛南發展，配合其進入福建匪軍，向廣東前進。至八月下旬，贛州、福州均已相繼失守，退守湘南衡寶一帶之華中國軍部隊，雖曾穩定一時，並一度收復湘鄉、安化，及獲得青樹坪的勝利，但此不過曇花一現而已。至十月上旬，由贛南前進之匪軍已竄陷韶關，湘西之匪軍已進至芷江；我據守衡寶之華中部隊陷於兩翼包圍的形勢中，不得不再向西撤入廣西。

韶關陷匪，粵北之門戶洞開；衡寶撤守，匪軍可源源而下。當時廣州雖為政府所在地，却缺乏大軍防守，事實上亦無險可守。政府遂於十月中旬再遷重慶；廣州旋即放棄。此時，關中方面之國軍早已退守陝南川北一帶，湘西方面之匪已至貴州及廣西邊境。鄂西的重鎮宜昌在七月下旬即已失陷。因此政府移駐重慶不到半月，巴東告急，貴陽旋亦被匪竄入。重慶在東南兩面威脅之下，政府仍無法立足，故喘息未定，又倉皇疏遷成都。及遷至成都，不到十日匪軍已跟踪而至，而昆明方面又告不穩，不數日盧漢即公然投共。我國民政府，至此在大陸已無可遷之處，遂於十二月八日由行政院長閻錫山先生（閻於五月在廣州繼何應欽為行政院長）率領行政院及各部會，乘機速運臺北，開府辦公，維持政務。當時李代總統，於十一月下旬隨政府自重慶遷蓉之後，因胃疾復發已赴港就醫，中樞一切委由閣院長負責處理。今總統蔣公當時以總裁身份，見大

陸局勢危在旦夕，亦於十一月中旬由臺北飛重慶，重慶危急時又飛赴成都，終以當時局勢已經混亂，軍隊闖志瓦解，回天乏術，於成都棄守前飛返臺北。於是，整個四川隨告淪陷，在川各軍無形瓦解潰散。大陸的戡亂戰事，旋亦隨之落幕。匪偽政權則已於十月一日在北平上演。

自共匪於四月下旬渡江南犯之後，至五月下旬，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我京滬、武漢、西安均相繼失守，戰局已是一面倒之勢。當時我奉命回到桂林成立桂林綏靖公署不久，適李代總統亦返桂林小住，我感於當時的局勢，如國軍再在匪軍追蹤之下節節敗退，一任匪軍狼奔豕突，可能誠如俗話所說「兵敗如山倒」，整個國軍將迅速土崩瓦解，危險極了；我政府此時，必須下大決心，作大步後退，迅速脫離敵人，求得整理內政、部署軍隊、進行外交的機會，始可再戰。因此，我曾向李代總統提出如下的建議：

(一)中央政府應決心一舉即遷往雲南，以昆明為行都，擺脫匪軍威脅，使中樞能有時間安定下來，處理一切業務。

(二)在軍事方面，立即選派三至四個得力的軍，移駐川南、黔西、桂西一帶，選定優良地形，部署堅固防守的陣地，並鎮壓滇省內部的可能異謀，安定後方。然後令其他各軍，分途牽制匪軍，使其不能迅速接近滇省。爾後再待機反攻。

(三)在東南沿海各軍，則防守海疆及閩浙一帶，與西南川、滇、黔、桂各軍互相聲援，維持目前態勢，俟整理完畢再行反攻。

(四)恢復滇緬路及確保滇越鐵路對海外之交通運輸。

(五)加強及開展外交工作，擴大國際宣傳，仍爭取美英各國的協助，使彼等了解國際共黨赤化中國之真相。

及未來赤化世界之危險，粉碎共黨的虛偽宣傳，揭開共黨偽裝土地改革者的假面具，以期獲取外援，及恢復美國對我的軍事援助。

上項建議，是當李代總統駐節桂林時當面條陳的。當時李代總統對此建議頗覺稱意，可是後來他離開桂林後，一直不見有下文。也許我的建議，往後說來，已經緩不濟急了。如果當時能立即採納實施，將政府直接遷往昆明而不遷重慶、成都，就擋時日，仍有從容部署時間，並能收容許多部隊，及爭取空間。美國或能幡然覺悟，改變政策，一如爾後對韓戰對越戰般的熱心，援助我國恢復中原，消滅共禍，亦未可知。

華中區所屬各軍，於十月上旬自衡寶向廣西撤退途中，曾於冷水灘附近對追蹤前來的匪軍予以有力的反擊，殲滅甚夥，使匪軍一時不敢西進。爾後曾在湘桂邊境對峙了一段時間，後因廣州失守太快，為防敵沿江西進，直扣梧州，拊我軍之背，乃不得不將我軍主力轉移於梧州方面。於是防守的戰線愈為延長，兵力益感不足。十一月中旬，廣州方面之匪已逐漸逼近梧州，並向欽、廉方向前進，我軍側背大受威脅，復因兩面對敵作戰，兵力分散，不得不將桂北一線之守軍向西南柳、潯、梧、鬱方面轉移，暫將桂林放棄。

早在放棄桂林之前，對以後之作戰計劃究竟如何決定，實在頗費考慮，曾由白長官召集各高級軍官舉行軍事秘密會議。我是奉命參加會議的一員，當時大家對放棄桂林以後的行動，大致分為兩案；此兩案的第一步行動，都是退守慶遠、柳州、潯州、鬱林之線，但第二步行動則頗為不同。第一案主張不得已時撤往海南島，第二案則主張逐次向西退守滇桂邊境；當時對兩案的爭論各有理由。夏副長官威力主第一案，白長官隨後亦同意該案。我是主張第二案的。我之所以主張第二案，乃是基於前此向李代總統建議退守雲南方案所發展出來的；主張此案的尚有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主席黃杰將軍。因當時中央政府已遷入四川，以後不得已時

可能仍須逃至雲南，以昆明為最後根據地。政府既在川滇，我們的軍隊自應以中樞的行動為行動，無論如何應確保後方雲南的安全，作為他日反攻的基地，因此應盡可能確保桂西，以屏障昆明。當然此系可能因當時昆明已謠喙紛傳，而不無顧慮，但我曾建議由政府下令先派遣一個軍進駐滇東，以建築最後防禦陣地為名，以監視龍雲為實。如果中央有一軍駐在昆明，龍雲必不敢異動，則此一顧慮自可消除。事實上我對雲南的情形前已經注意，在十月初即派綏靖公署副主任甘麗初前往昆明視察。據他歸來報告，說事有可疑尚無實證。當時我即將此種情形詳報李代總統，並由甘副主任在廣州面報中央及總裁蔣公。倘當時決心採取此案，當可及時制止。

主張第一案的人，只着眼海南島容易防守，因當時共匪尚無海軍，無法渡海，可說是一種消極的主張。殊不知自己大軍渡海撤退或將來反攻登陸也同樣是不簡單的事。我們自己有否準備大軍渡海的工具，有無充分的時間，有無預先週詳擬妥的計劃，似乎都未加考慮。鑑於歐戰敦克爾克之役，以英國海軍之強，船艦之多，敵前渡海撤退雖然成功，但也只救出人員，武器、裝備幾乎完全拋棄了。試問我們那來這樣多的船舶；而且部隊登艦還要有從容的時間，方不致混亂，如果計劃不週，準備不夠，屆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仍是不堪設想的。當時白、夏兩位都主張渡海退守瓊州，其把握如何，我真是不敢樂觀。

因我當時已專任綏靖工作，在長官部決定放棄桂林必要時退守海南後，我隨即將綏靖公署移駐南寧。我自己在往南寧之前，一度衝命飛赴海口與陳長官濟棠及薛主席岳接洽，轉告白長官於必要時率軍撤往海南的意願。陳、薛兩位亦極力主張華中軍退至海南，協同防守，徐國恢復大局，並說以後一切總當在互商之下協力進行，彼此無庸客氣等語。我返回桂林復命後，即轉赴南寧，就綏靖工作略為調整部署。不料局勢惡化竟

如此之速，在僅僅不足一月的時間內，桂林、貴陽、重慶、成都均一一棄守。我華中軍自撤回廣西之後，可說未經一次重要的會戰即迫於情勢不得不倉皇急退。長官部對大軍最後的行動，無論採取何策也未能加以準備。我軍轉進至慶、柳、潯、鬱之線後，事實上已無法立足，遂繼向南寧外圍撤退。此時，長官部召集各高級軍官再行會議，決定退守海南，令各軍逐次向廣東之欽廉轉進。

我素來心直口快，會議中我實在忍不住又說話了；我說：「現在盧漢已經投敵，昆明是不能再去了。我們的部隊只有渡海向海南撤退一途，而渡海地點現在只有龍門港一處可用了。可是龍門港地狹水淺，稍大船隻不能靠岸，未審長官部對於登船之碼頭、躉船，以及船船等項，是否已準備完妥？裝載的區分及指揮系統，以及裝載計劃等已否策定？如有一項準備不夠，都是會發生極大危險的。」我這一問，長官部的幕僚及原來主張第一案的諸先生，好似如夢初醒，竟瞠目結舌無法回答。於是，白長官又要我再飛海口，商請陳、薛兩位籌調船隻前來接運。我明知在時間上已經是來不及了，也只能盡人事而聽天命，遂立即束裝出發，臨行並吩咐綏署副參謀長照料綏署人員，以後統隨長官部而行動。

翌日我乘機抵達海口，嘗與陳長官及薛主席洽商，請他們協助調集所要船隻，前往龍門港集中應用。陳長官告以，此時此地那有如許船隻，當地海軍艦隻僅有太倉艦一艘，砲艇一艘，其他無論漁船、商船在港內停泊的亦甚少，如需大量船隻，必須向外港徵集，且徵集外港船隻也非三數日即可辦妥的。及轉商薛主席，所得的答復亦是如此。我親自赴各處調查打聽，也完全相同。此時，真如冷水澆頭，只有望洋興嘆。無奈何只好將交涉情形立電南寧復命。三數日後，鬱林、博白、欽州、雷州等地紛紛為匪軍竄入，並傳聞張淦總司令亦為匪軍所俘虜。接着夏副長官及白長官亦相繼來到海口。此際各路部隊則悉向防城、小董且戰且走；其

中沿粵桂邊境之一路，中途曾為匪軍截擊，小董亦為匪軍佔領。各部隊知龍門港已無渡海可能，遂又折向龍州方面轉進，一部則入十萬大山作游擊戰。南寧則於十二月下旬失守。最後到達龍州之部隊，由黃杰將軍率領進入安南暫避匪鋒，待機復國。整個大陸由此淪陷，痛心無已。

廣西局勢，如此急轉直下的原因，除受全般形勢影響，勢已無法再戰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此乃抗戰期間原屬我第二十一集團軍轄下之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等軍，其官兵大部份都是廣西子弟，他們在抗戰初期出征，由我率領轉戰於豫皖鄂一帶，離鄉背井已有十年之久，一旦部隊回至廣西，不免均思家心切，在父母倚門兒女情長的情形下，初則紛紛請假，請假不准則繼以逃亡。因此，這枝久經戰陣，素稱驍悍的部隊，回到家鄉不過一月，未經大戰，人員已減損過半，循至士氣衰落人無鬪志，遂使十餘萬大軍，轉瞬之間化為烏有。回想太平天國時，因內部不和自相傾軋，翼王石達開率所部數十萬人遠走四川，亦以所部均屬八桂子弟，於經過黔桂邊境時，散失過半，及抵四川所餘無幾，卒至在大渡河為清軍所殲滅。我華中軍此役，無異歷史重演，蜀勝慨嘆。

三十八年底，整個大陸，皆陷入魔掌。這一幕歷史的悲劇，距今天雖然已經二十多年，但在這二十多年中，曾不知有多少次撫劍長吟，唏噓太息。我在三十八年八月間，京滬相繼淪陷，贛南又復告急之時，眼看大局已有土崩瓦解之勢，曾寫下七言古詩一闋，以記當時內心之沉痛，歷年來嘗反覆吟哦，長歌當哭；茲录之於左：

京滬淪陷

當年赤共脫羅網，竄據陝邊成伏莽，謊言抗日欺國人，陰謀早蓄偷天掌，約言墨瀋猶未凝，假借和談眩衆聽，招軍納叛蒐兵戈，盜惑農工為內應，一朝卵化羽毛豐，掀起白山燕地風，偏有蘇魔為虎儀，關東刦奪勢尤凶，可憐將士無鬪志，慘雨愁雲雪滿地，霎時形勢若轉蓬，鐵鑄長城全拋棄，赤旗紅鼓復西來，塞上烟雲暗燕臺，雲嶺獨看明月落，萬家悲哭有餘哀，虎狼坐噬吞燕晉，豫魯徐淮成灰燼，滿天禍亂迫眼前，海內惶惶大驚震，秦廷待赦赦無期，臺閣羣公計莫施，委心協議議無就，天塹長江乏力守，哀哉京滬復淪漚，魔掌難逃血淚新，從息軍民播粵海，生離死別最酸辛，五嶺迢迢潦水急，扶老攜兒衣履濕，羸餐露宿無奈何，鶴唳風驚相對泣，雨花臺畔血花飛，野塘彙聚戰後遺，石頭城下東流水，鎮日悠悠恨可知，黃塵湧洞風蕭瑟，遠路蒙紛泥蓋膝，瀟江兩岸遍流氓，萬苦千辛向誰述，宋明鼎革史昭然，何日旌旗奏凱旋，河山錦繡遭離亂，文物劫灰最可憐。

四九、林泉息影

大陸淪陷，華中長官部及桂林綏靖公署僅少數人員在南寧失守前飛離大陸撤到海口，長官部及綏署辦理結束，報請撤消。我因奉白長官之命前來臺北洽辦兩署結束事宜，及向中央政府請示爾後的行止，十八年十二月底到達臺北。不久，白長官亦由海口來臺。

此時因李代總統在美割治胃疾，業已出院，中樞擬派我赴美探視，旋因未得美國同意，大使館不允簽證，遂作罷論。及總統蔣公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依法復職後，遂蒙委派為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歷等兩載，無所獻替。至四十二春，因現役限齡屆滿，乃奉命退休；自此還我初服，息影林下。念自從戎以來，歷經辛亥起義、討袁、護法、北伐、抗戰、剿匪戡亂諸役，死生間不容髮者不知凡幾，今得保全首領歸隱田園，已屬過望，夫復何求。故退休之日真是喜出望外，不獨我個人感謝政府的恩惠，家中老少亦蒙蔭多矣。當時曾寫下七言律詩一首，以誌所懷，抄錄如下：

嶙峋傲骨本天生，
不為恩仇不為名；

家國興亡人有責，
風雲暗淡劍空橫；

常懷戲練悲風木，
猶幸趙庭慰晚情；

太息春光今漸減，
歸田遠隱樂身輕。

退休之初，租寓羅斯福路四段水源里十號。民四十二年冬，值臺省依地方自治法規選舉隣里長，街坊上的父老慕我虛名，竟推舉我為隣長。隣長職位雖小，究係由人民公選，故雖數次推辭，仍無法脫卸；一任兩年，不無感慨，因戲賦五言俚句一章，如下：

百戰廢身歸，貲廡新市上，父老慕虛名，推余為隣長。

堅辭不獲已，偑促安可想，昔統十萬師，今作百家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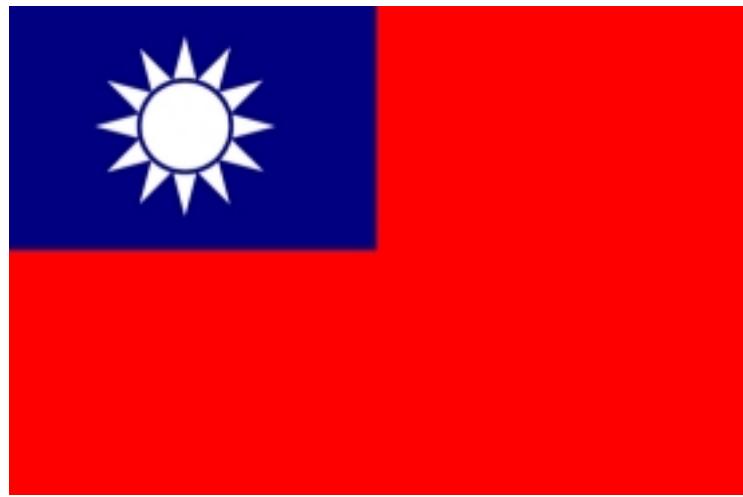
終日課公令，無時安虛幌，民事本嘗為，高卑何足講。
回念役人多，亦應甘俯仰，天道重循環，因果固不爽。

當年呼百諾，咄嗟無痛癢，從此識下情，慚然悔已往。

感謝隣里人，使我知聞廣。

余家非素封，且以往無暇為衣食謀，雖歷總師干並膺禮寄，而宦囊羞澀，賴先人在九龍遺有薄田數畝，開為魚塘出租，以資挹注。退休既三年，深感坐食山空，良非得計，乃於臺北市郊承租山坡公地數頃，賣刀買牛，開為農莊，還我初服。於是親自鳩工，開荒闢草，種植各種蔬果。初意不但可以消遣時日，且可維持生計，一舉兩得，亦至樂也。怎奈後來連年遭遇颶風，眼看菜木成林，開花結實，竟於一朝一夕之間，殘枝委地，滿園景色化為烏有，數年辛苦卒成白費。時余年邇七十，不復堪灌園芟草之勞，重以患攝護腺肥腫病，久治未癒，遂於民五十六年乘赴港求醫割治之便，商諸老妻，將九龍魚塘房產，悉行變賣，返臺後，復將農莊出讓，然後在市內置屋一所，聊蔽風雨，藉度餘年。

余生逢戰亂，棄文習武，雖一生戎馬無補時艱，然俯仰無愧，差無遺憾。所憾者，今年且八十矣，知來日無多，猶棲遲海島，西望故園，不禁興陸游之悲耳。



更多好書：

<http://mybooks.googlepages.com>